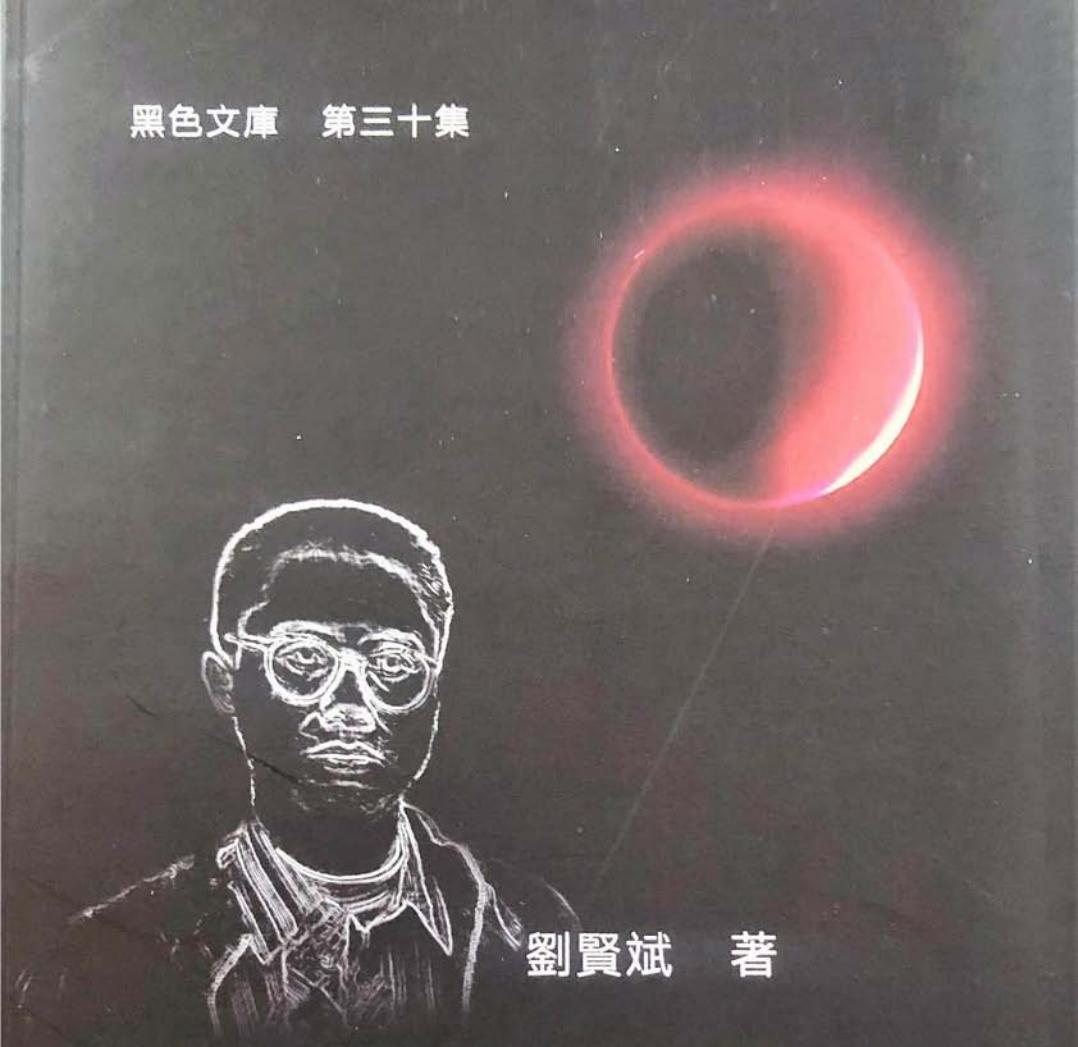
黑色文庫　第三十集



劉賢斌　著

若為自由故

——劉賢斌文選

黑色文庫　囚　劳改基金会出版

若為自由故

——劉賢斌文選

劉賢斌 著

勞改基金會

華盛頓，2011 年

若為自由故——劉賢斌文選
黑色文庫 第三十集
編者/黑色文庫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勞改基金會
封面設計/ 殷世文
華盛頓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 作者 劉賢斌
本書版權為作者所有，勞改基金會擁有中文發行權。非經作者及基金會同意，不得翻印、複製或轉載文字與圖片。

本書由勞改基金會設計、編輯及出版。若獲盈利，僅用作《黑色文庫》的出版費用。

If It Is for Freedom
-- A Selection of Liu Xianbin

Black Series Volume 30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09
www.laogai.org

ISBN 13：978-1-931550-02-4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價： US$20, HK$60, NT$260

出版緣起

勞改作為中共專制統治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遠在其建黨未久，在其江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革命根據地”已存在了。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參照了當時蘇聯的勞改制度，在史達林派來的“古拉格”專家指導下，融合了毛澤東的“改造與生產結合”的思想，發展出這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監獄制度。勞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滅犯人的獨立人格和意志，剝奪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並美其名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這項龐大的無償勞動力，為共產政權創造財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國的勞改犯就被調動去築路架橋，修河造壩，挖煤墾荒。這些無聲無息的奴工為共產政府獻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沒有人記得他們。中國共產黨對人民生命價值的輕賤和蔑視，直接造成了對中國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殘。隨著毛澤東時代的結束，原始瘋狂的暴力行為和愚民式的政治運動逐漸式微，而鄧小平為暴發戶和拜金主義者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了社會發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年的開放政策使中國社會從粗暴進入俗媚，從暴戾走向糜爛。一個經過土改、反右、大躍進、文革、批林批孔、反精神污染這些顛倒黑白是非、絕滅人性、輕視知識和道德長達四五十年的社會，如果不經過反省、懺悔、痛定思痛和懲惡撫善的過程，怎麼可能就直接跨入現代化的社會呢？無可諱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變化，但是毛澤東架構的極權政治制度，包括勞改制度並沒有根本的改變。

中國大陸的社會必須經過徹底的反思，對災難的根源進行檢討和思辨，重新認識知識和道德的重要性，中華文化中特有的人文主義精神才有復蘇的可能，也只有這樣才能防止荒謬無知的悲劇重新上演。然而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幾十年的毀滅性破壞，得有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這樣的淨化過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體制內，自由和人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開展。

作為社會最底層的勞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犧牲者。以往共產黨將人任意劃成不同的階級。以階級分貴賤，以階級區分天堂和地獄。成千上萬的人因為階級出身、思想意識、政治觀點、宗教信仰，甚至因為微不足道的個人原因，被共產黨政府送去勞改。勞改營裏，在“強迫勞動”、“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靈魂、脫胎換骨的嚴酷環境下，人被剝奪了意志、尊嚴、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在備受折磨後，幸能存活，心靈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蹂躪和殘害也萬難癒合。人們在尋求歷史的真實面目時，那個時期裏，人為因素所造成的歷史災難，特別值得我們警惕。歷史巨輪所輾過的苦難者的經歷是一面忠實的鏡子，倖存者的故事永遠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勞改營倖存者的生活經歷和資料就成為我們拂拭染上塵埃的歷史鏡子的必不可少的一個塵拂。

勞改基金會自 1992 年成立以來，一直鍥而不捨地尋訪及收集勞改倖存者的事蹟和證據，迄今已達五百餘份。在當前全球商業化的過程中，世界更傾向於資金財富的集中，文化事業的推動備為困難。雖然在重商業、輕文化的趨勢下，不少倖存者非常艱苦地一字一行地把他們的親身經歷寫了下來，卻苦於無處出版。還有一些人不具備寫作的能力，也有些人喪失了記憶的能力。那些來自勞改的呼聲和吶喊，那些血淚記錄的文字實在應該有一個機會被容納及保存。這是我們對子孫後代的責任，也是對公正及自由的承諾。勞改基金

會願意，向散佈在全球，特別是如今尚在中國大陸的勞改倖存者繼續徵集資料，整理、編輯並出版這些文集，我們稱之為《黑色文庫》。

勞改營是中國畸形社會的縮影，它的倖存者就如但丁《神曲》裏那些經過地獄煉火煎熬過的光怪陸離的眾生。烙在這些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賤民身上的，是專制政權掌控下國家機器的鐵的印記。勞改不僅對這些受難者摧筋斷骨，殘其軀體，還對他們洗腦換心。他們有些進去時是沒有受過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來時已是白髮人；即使受過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這個大煉獄，也跟知識和資訊長期絕緣。因此倖存的生還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圓滑機靈生命力特強者有之，至於心智消磨殆盡，看破紅塵，苟延殘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庫》就是要保存這些人的聲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體拙樸的記錄，我們都願保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們也都不加文飾，原文照登。相信讀者自能判斷。遇到當事人自己不能親自執筆的情況，我們則儘量以接近原始敘述的語調和情感予以記錄，以求傳真。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經歷了“失語”的時代，鄧小平和他的繼承人又想把中國人變成一個“失憶”的民族。讓我們來記錄歷史，為專制政權譜寫挽歌，為民族喪失的記憶招魂。

《黑色文庫》編輯委員會

2009 年於華盛頓

序　言

吳弘達

劉賢斌生於 1968 年，我生於 1937 年，整整相差了 31 年。我在他還沒有出生的時候就已坐了八年的牢，一直到了他十一歲時（1979 年）才坐完 19 年的牢。但是，過了十年後，到了 1989 年劉賢斌就開始坐牢了。第一次判了兩年半，他沒有“回頭”，又判十三年，又不“回頭”，2011 年又判了十年。他的 20、30 歲的年代就沒有過幾天普通人的好日子。現在開始又要走他四十歲的年代，還是坐共產黨的牢。

我也是把 20、30 歲的年代給了共產黨的勞改隊。1985 年來了美國，終於重獲自由。那時快 50 歲了，就不要折騰了吧！十年後（1995 年），我又給共產黨抓起來，判了十五年，這次卻好多了。我有“護身符”——美國的護照，所以只扣押了 66 天，沒有坐共產黨的 15 年的牢。

為什麼 1995 年又要抓我？因為我要回中國去。決定回中國去幹什麼？我就覺得中國這個國家的情況沒有多少變化。再一個，世界上誰都知道希特勒德國的集中營制度，蘇聯的古拉格制度，世界各地都知道，都蓋有紀念館，記錄這些事和這些慘死的人。我的目的是希望這樣的制度，這樣的暴行就不要再發生了。但是中國呢？

當我到了美國，我知道，這一步是真正的跳出了火坑。說死了，我是不會回去的。人生苦短，世上的人自出生以來都只有一個終點——死亡。劉賢斌也一樣，他已經荒掉了兩個十年，再要來個十年！？變成一個白髮老人，駝背彎腰地在世上活着多沒意思！當我

來美國，首先想把過去在中國大陸的苦的篇章合起來，另開新的篇章，平平靜靜地生活，享受一下人生的樂趣吧。那個什麼共產黨，管他什麼“開放”，什麼“改革”，去他媽的，它只是在太平洋那一邊，與我無關了。

但是，如果我買了汽車，買了房子，娶了妻子，有了孩子，享受了人生，然後死了，成為泥土，也就算過完了一生吧。可是有人問我，你走過的路，為什麼劉賢斌還走呢？為什麼歐洲的猶太人走過的路，蘇聯的“地主”、“資本家”、“反革命”走過的路，今天在中國還有人走呢？我怎麼回答呢？

人自生來走到終點，許多人就是這樣渾渾噩噩地走過了。但是還有不少人——直到死了——總留下一些記憶給別人思考，給人們受用。我用我的頭顱去撞擊那個制度的石牆，也許對它是毫無損傷，但是血染石牆，觸目驚心。再有劉賢斌這樣至死不“回頭”，也要去撞牆的人，千萬人往矣！這堵石牆一定會垮掉的。人們會有自由、和平的生活。

我同劉賢斌有個不同的地方。剛開始，我坐牢，我不知為什麼，後來知道，不管我說什麼，做什麼，我一定會倒楣，因為我父親是資本家，自己又是天主教徒，這兩條是共產黨最放不過去的。劉賢斌卻沒有“階級烙印”，他只是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作為一個人的自由，一個人的尊嚴。他不能屈服共產黨的專制暴政，他不能有虛僞的言辭，這是和共產黨“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我仔細讀了他的文章，他的經歷，他可是有好多機會，只要稍微低頭，稍微卷縮，就可以過去了。有好多機會，就可以今天在北京，明天在上海，同許多“富二代”一樣神氣活現了。不說做什麼壞事。誰不是這樣子呢？誰不是追求好的生活呢？但劉賢斌從四川省的遂寧縣這個小地方到了北京，讀了大學，就不走這條“康莊大道”，就

不同於“天安門事件”裏的某些哥兒們那樣，今天在政府哪個部門當個全職老闆，甚至不吭一聲在國內哪個企業當個老總，不是照樣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嗎？劉賢斌真有點“執迷不悟”。竟然三次坐牢，依舊步伐堅定。

劉賢斌在生命的縫隙間留下來一個女兒。但是，女兒不認識他，沒有感覺。當她年及妍華，才“認識”她自己有個父親，但又那麽遙遠，在中國，在四川的某個地方的牢獄之中。

張前進也是天安門的一把好手，也在覆滅之中重生起來，他和劉賢斌一樣坐牢二年，顛沛流離，苦悶中尋求到基督的恩典，煥發了新的生命，以後成了一名侍奉上帝的牧師。他不忘天安門血染下的“同志”，把陳橋——劉賢斌的女兒接了出來。2011 年她到了美國才清楚自己的爸爸是怎麽一回事。也許若干年後，陳橋就是又一個劉賢斌。

這篇序言沒寫完，傳來了陳衛被四川警方抓捕又判了九年的消息。看著陳衛的照片，胖胖的，不高的個子，確實是令人驚奇。這麽一個人就是這樣堅決地堅持正義和自由，在所不惜。劉賢斌在書中談到了好些仁人志士。共產黨判了陳衛，又判了貴州的陳西十年，共產黨似乎十分得意，為了維護他的的專制，一定得這樣做下去。但是我相信劉賢斌、陳衛、陳西都有一天——不到九年，十年，會被人們尊敬為英雄的戰士，屹立于人間。

編者弁言

今年 3 月，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劉賢斌十年有期徒刑。不久，一部名為《劉賢斌文集》的書稿（含圖片）輾轉交來勞改基金會。眼下這本書，就是在該書稿的基礎上增刪編選而成的。

劉賢斌是自由的踐行者。自 1989 年以來，除去坐牢的日子，都在孜孜不倦地為自由而奔走。文集中的第一卷、第三卷基本上是他對這些年來參與民主運動的回憶與記述。劉賢斌也是自由的思想者。獄裏獄外，從未停止對中國民主憲政之路的思考和探索。文集的第二卷精選了他的七篇理論文章。

本書選編的文章大多是在他第二次出獄和第三次入獄之間的一年多時間內公開發表的。首發在“人與人權”、“民主中國”、“觀察”、“北京之春”等網刊。書中所附法庭文件來自勞改基金會收藏。

本書註腳由勞改基金會編者所加。原書稿中有少量註釋夾雜在正文中，是原網刊編輯所為，還是書稿編纂者所為，暫無法考證，故依仍其舊。

值書稿殺青，我們特向原書稿編者、照片提供者、刊載劉賢斌文章的原網刊、勞改基金會檔案館等，致以誠摯謝忱。

劉賢斌把人生大半時光（除去懵懂的孩提時代）交給了鐵窗和鐐銬，拋妻別子，無怨無悔……這種決絕的追求，義薄雲天，可歌可泣。

我們滿懷敬意地編印這部文集，惟願劉賢斌揮斥方遒的文字，像驚雷劃破鼾聲起伏的夜，搖撼東方專制的重重宮門。

編者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目　錄

出版緣起 i

序言（吳弘達） iv

編者弁言 vii

卷一、荊棘路

血與火的洗禮——我在 1989 年 3

我的民運二十年（之一）陳衛被捕 21

我的民運二十年（之二）我成了專政對象 28

我的民運二十年（之三）地下民運 34

我的民運二十年（之四）走進秦城 41

我的民運二十年（之五）審訊室裏的交鋒 47

我的民運二十年（之六）秦城監獄的生活圖景 55

我的民運二十年（之七）秦城監獄的政治犯難友 63

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檔（選二） 68

1999 年法庭辯護詞 71

出獄一百天 74
第九屆中國青年人權獎獲獎答謝辭 101

卷二、思想者

憲政民主：走出東方專制主義的藩籬 105
街頭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形式 110
劉曉波遭重判後的民間道路選擇 117
以哈維爾之眼看中國 123
從“人民當家作主”說起 133
圍棋中的民運啟示 143
專制統治的最後壁壘 150

卷三、同路人

曉波，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牽掛你嗎？ 159
民主黨人印象（之一）胡明軍 162
民主黨人印象（之二）佘萬寶 168
民主黨人印象（之三）許萬平 174
民主黨人印象（之四）秦永敏 180

民主黨人印象（之五）浙江群英 187
民主黨人印象（之六）湖南群雄 194
民主黨人印象（之七）貴州同仁 201
蜀中多義士，如韭割複生 209

卷四、天倫劫

獄中家書（選十） 217
我和劉賢斌的聚散人生（陳明先） 232
我和我的父親劉賢斌——陳橋自述（陳橋） 245

附錄、法庭文件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1992 年） 255
遂寧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1999 年） 257
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1999 年） 260
遂寧市公安局起訴意見書（2010 年） 266
遂寧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2010 年） 269
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1 年） 271

卷一

荊棘路

直到“六四”槍聲響起的時候，我才徹底認清了這個政權的本質，從此就義無返顧地走上了反抗專制、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道路。只是我沒有想到這條道路是如此的漫長，直到今天，我們還要為之付出艱苦的努力。——《血與火的洗禮》

二十年來，雖然我走過了一條漫長的坎坷的抗爭之路，但這是我自己自覺的選擇，我求仁得仁，無怨無悔。——《第九屆中國青年人權獎獲獎答謝辭》

血與火的洗禮
——我在 1989 年

我要感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因為是她讓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沒有泯滅。

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我認為這句話不無道理。一個人的性格一旦確定，那麼在面對一件事情時，他就會與其他人有不同的選擇，而這種不同的選擇決定了他與別人不同的命運。二十年前，我還是一個充滿青春活力、有著光明前程的大學生，誰也沒有想到，二十年後，我卻成為了一個飽經坎坷但仍奮鬥不止的民運人士。我的父母都是正直、善良的普通人，我的身上流淌著他們的血液，我從小就決定為國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如果生在一個政治清明的時代，我也許會做官或者成為一個學者，然而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改變了我的命運。由於受到“自由化”運動的影響，我在 1988 年就對這個政權失去了信心，當“八九”民運興起的時候，我就迅速地卷了進去。但直到“六四”槍聲響起的時候，我才徹底認清了這個政權的本質，從此就義無返顧地走上了反抗專制、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只是我沒有想到這條道路是如此的漫長，直到今天，我們還要為之付出艱苦的努力。二十年來，我兩次被捕入獄，坐牢時間接近十二年，並無數次受到當局的打壓和折磨，但是一想到二十年前那血淋淋的一幕，一想到二十年前那麼多無辜的年輕的生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就一再咬緊牙關堅持了下來。二十年來，我從來沒有為自己的選擇後悔過，我甚至要感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因為是她讓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沒有泯滅，是她讓我明白了自由民主

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旋律，是她讓我找到了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從而總算做了一個真正的人。

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八九”、“六四”可能是相當陌生的字眼，但對於我們這些經歷了那場偉大運動的人來說，那五十多天的日日夜夜卻一直銘刻在我們的腦海裏……

一

1968 年 10 月 2 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厲害的時候，我來到了這個世界上。

我的父親是個普通工人，母親是個普通農民。在母親嚴格的管教下，我從小就是一個受父母、老師喜歡的乖孩子。讀小學的五年，我一直擔任班長，那些小學同學到現在還稱我為“老班長”。讀中學的時候我也一直擔任班幹部，甚至在高中畢業的時候還獲得過市級“優秀學生幹部”的稱號。可以這麼說，在青少年時期，我是一個典型的“共產主義接班人”。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我這個“共產主義接班人”最後竟然變成了共產主義的掘墓人。記得在 1991 年 6 月，我因積極參與“八九”民運而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時，提審我的員警看見我特別頑固、無可救藥，就呵斥我“忘恩負義”。我真的忘恩負義了嗎？沒有！從中學到大學，從 1989 年到現在，我在骨子裏仍然是一個中國人，我的胸膛裏跳動的仍然是一顆滾燙的中國心。早在上初中的時候，我的一個地理老師就經常給我們講中國的近代史和世界現代史。就是在這個時候，也就是在我 14 歲時，我就決定將此生奉獻給這個國家和民族，我立志要像拿破倫那樣來改變我的祖國的命運。所以說，我最早的信仰不是共產主義，也不是自由民主主義，而是民族主義。因為這個緣故，我在初中畢業時沒有去報考師校，而選擇了讀高中，

而且考上了遂寧最好的高中——遂寧中學。又因為這個緣故，1987年我考上了一所專門培養國家幹部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我的這種人生志向，同學們都很清楚，因此在高中畢業的聚會上，許多同學都祝福我將來能夠成為中國的拿破倫。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的同班同學歐陽懿——一個喜歡詩歌和文學、秉持良知且追求真理的人——慢慢成為了我的知心朋友。二十多年來，我們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鼓勵，最後一起成為了堅定的民主鬥士。

對於一個像我這樣來自農村的學生，大學無疑是知識的海洋。進入大學後，我感覺到了知識的極度匱乏和飢渴。聽說當時的人大圖書館藏書幾十萬冊，但我幾乎都沒看過。於是除了上課之外，我將自己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看書上面，甚至由於有些課程——諸如《政治經濟學》、《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太過枯燥乏味，我還經常蹺課到圖書館去看自己喜歡的書。由於具有民族主義的思想，一開始我主要是看一些歷史、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書籍，後來就愛看一些世界經濟方面的雜誌。我逐漸瞭解到，中國的實力並不像中共所吹噓的那樣強大，在中共統治的幾十年裏，中國社會在各個方面並沒有取得多大的進步，於是我開始對中共所編造的一系列謊言產生了懷疑。所謂“知識越多越反動”大概就是指這種情況吧。剛上大學的時候，我還像許多同學那樣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也就是說我曾經也向中共組織主動靠近過，但僅僅過了大半年，我就徹底打消了入黨的念頭，我認為這樣的組織不值得我效忠。

1988 年暑假回遂寧時，歐陽懿給我推薦了一本《山坳上的中國》，這書給我強烈的震撼。我沒想到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與世界的差距竟然如此嚴重。我徹底打消了對中共的一切幻想，陷入了焦慮和痛苦之中，我不知道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怎樣才能實現我的強國之夢。回到學校後，我在人大遇到了一個朋友，經過一番交談，我發現我們的思想竟然驚人的相似。不久，這個朋友就提出應當組

織一個政黨去取代中共的統治。這真是一個大膽的想法，我非常吃驚。在後來的幾天裏，我一直處在極度興奮之中。不過後來我們還是沒有組建政黨，只是經常聚在一起討論一下關於民族主義方面的問題。在這期間我寫了一本《魂系中華》的集子，都是關於民族主義方面的文章。

1986 年劉賢斌（右）與歐陽懿合影留念

那個時候，“自由化”的春風刮得正猛。

1987 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支持學潮和“自由化”運動而下臺，而接替他的趙紫陽很快也對“自由化”運動採取了支持態度。因此在當時的高校裏，“自由化”氣氛相當活躍，許多老師在課堂上都有意無意地向學生進行自由民主方面的啟蒙，同時一些知名知識份子也經常到各高校主持講座，向學生們宣講自由民主的基

本理念。同學們對這種講座非常歡迎，記得 1988 年 4 月 1 日有人貼出海報說方勵之當天晚上要到人大來舉行一場講座，於是還在上午的時候大教室裏的位子就被占完了，我也好不容易占了一個位子，後來才知道這天是愚人節，我們幾百人都受到了捉弄。1988 年底，“新權威主義”非常流行，於是有心人在人大組織了一場“新權威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辯論，由“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吳稼祥、黎鳴等幾人同“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許良英等幾人進行辯論。這場辯論的場面非常火暴，八百人的大教室被擠得水泄不通，最後雙方好象打了個平手。

與此同時，各種“自由化”書籍在高校也非常流行，特別是金觀濤、劉青鋒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特別受歡迎。當時我母親每月給我寄一百元生活費，我總會從中擠出一些錢用來買書，主要就是買《走向未來叢書》。後來蘇曉康、謝選駿、遠志明等人製作的電視片《河殤》，也引起了廣大學生的關注和熱議。此外，由戈揚主編的《新觀察》和由欽本立主編的《世界經濟導報》也很受學生們歡迎。

這股“自由化”的春風吹醒了我們這些年輕學生的頭腦，她直接孕育和導致了“八九”民運的到來。雖然當時民族主義還在我的頭腦中作梗，但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和多黨制等基本概念也已深入我心，只不過我對這些觀念的理解還相當模糊和膚淺，更談不上是信仰。

1987 年 10 月，中國足球隊擊敗日本隊挺進了奧運會決賽圈，北大的學生組織了一次慶祝遊行，當他們經過人大並動員人大學生參與時，人大的學生表現出了出奇的冷漠，於是北大的學生就說人大是“第二黨校”，對此我感到特別恥辱，我非常後悔報考了人大。我經常在想，如果我當初報考北大的話，我可能早就信仰了自由民主理念，我可能會參加王丹等人在北大舉辦的“民主沙龍”並成為

王丹的第一批戰友。

1989 年的寒假，我回家過春節，組織了一次高中同班同學的聚會，大概有十個人參加，其中自然少不了歐陽。聚會中我向他們暢談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思想，沒想到我的談話得到了大家的積極回應。他們紛紛發表對中國時局的看法，並談到了《河殤》、《世界經濟導報》和“新權威主義”，一看就知道他們深受“自由化”運動的影響。遂寧中學高 87 級文科班很不簡單，全班有四十多人考上大學，其中有一半人考上重點大學，全國的名牌大學幾乎都有我的同學就讀。雖然他們在全國各地讀書，但我感到他們的思想認識一點也不遜於我這個在北京讀書的人，甚至有幾個同學已基本上接受了自由民主理念，而當時的我卻正對自由民主理念和民族主義思想糾纏不清呢。

在這次聚會上，正在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的羅宗傑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說 1989 年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中國可能會發生學潮。對此我們都深有同感，於是我們相約，學潮發生後，我們應當有所作為，但又不能太激進，不能去冒頭。我們認為，即將發生的學潮可能會與 1987 年的學潮[1]一樣遭到失敗，因此就不必去作無謂的犧牲。

由於我們志趣相投，於是有人就建議我們應當像劉關張“桃園三結義”那樣結拜兄弟，大家紛紛表示贊同。於是當天晚上我們就舉行儀式結拜了兄弟，孔傑排行老大，歐陽排行第二，我排行第六，羅宗傑排行第七，楊勁松排行第八，馬烈排行第十。沒想到在以後的二十年裏，由於我從事民主運動而長期受到當局的打壓折磨，好幾個兄弟都因此而受到了牽連。1991 年我被當局抓捕後，馬烈的父親馬述亮因被當成我們這幫兄弟的“黑後臺”而被關押了半個月，

[1] 习称“86 学潮”。下同。

馬烈被關押了一天，歐陽被關押了三個月，其他幾個兄弟的畢業分配都受到了影響。1995 年我因與王丹關係密切而受到追捕，孔傑被關押了一個星期，楊勁松被關押了半個月。讓我驕傲的是，這些磨難一點也沒有影響到我們兄弟的關係，我們之間的感情反而變得更加真誠和親密，尤其是歐陽懿在經過無數磨難之後與我一樣成為了一個堅強的民運人士，這讓遂寧的國保大失所望。其他幾個兄弟雖然沒有像我和歐陽一樣走在中國民運的第一線，但他們卻一直對中國民運抱著深深的同情。2002 年，羅宗傑所在單位的領導想勸羅宗傑入黨，但前提條件是要向當局認錯，並斷絕與我們的往來，羅宗傑對此予以嚴詞拒絕。2008 年 1 月，羅宗傑病逝了，當時我正因 98 年組黨的事情而在監獄裏服刑。噩耗傳來後，我為他偷偷地大哭了一場。出獄之後兄弟們告訴我，在羅宗傑病重時，他們共籌集了幾萬元錢來醫治他，在他去世後又隆重地安葬了他。有友如此，夫複何求！

歷史將會記得，在“八九”民運來臨的前夜，在四川遂寧這個小城市裏，有一批年輕的學生為了民族的未來而走到了一起。

二

1989 年 4 月 15 日，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突然去世。胡耀邦是中共黨內少有的有良心的領導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組織開展了平反全國冤假錯案的工作，大批“右派”分子和歷史“反革命”被摘掉了帽子，八十年代他又一直對“自由化”運動和學潮採取寬容的態度，後來終於因“縱容和包庇”1987 年的學潮而下臺，所以他一直深受廣大知識份子和大學生的愛戴。我是在 4 月 15 日下午聽說這個消息的，我立即意識到這將是點燃 1989 年學潮的導火索。我把我的這個看法告訴了同宿舍的其他同學，他們都不相

信。但在我的鼓動之下，我們在當天晚上還是寫了一個很大的“奠”字貼在了宿舍的窗戶上，以寄託我們對這位有良心的中共領導人的哀思。

我的預感很快就得到了驗證，第二天早上我就看見人大校園裏到處都貼滿了悼念胡耀邦的對聯、標語和大字報，還有人在我們居住的“學九樓”和人大研究生居住的“學八樓”對面的紅磚牆上寫了幾個大字：“人大民主牆”。這讓我想起了十年前的“西單民主牆”運動。我立即意識到一場大規模的學潮已經開始了。我馬上就到北大去看了一下，因為我知道北大一直就是中國政治運動的晴雨錶。北大的大字報主要集中在“三角地”，大字報的數量比人大的還多，其水準也比人大的高。雖然我沒有去其他學校，但我知道這些學校的情形與人大、北大肯定都差不多。這一切都是自發的，完全體現了當時的人心所向，1989 年註定要發生學潮，胡耀邦之死只不過將發生的時間提前了。

從北大回來後，我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馬上就在宿舍裏寫了兩篇大字報。一篇是《胡公托夢記》，我借胡公托夢的形式說明了胡公的遺願是要在中國實現自由和民主；一篇是《反思中共歷史》，我非常尖刻地說中共是“一代奸黨”，並套用金觀濤的理論論證了“中共是一個即將潰敗的組織”。這兩篇大字報都採用了匿名，並在 4 月 16 日和 17 日晚上貼到了人大的民主牆上。第二篇大字報在牆上保存了很久，觀看的人很多，還有不少人在上面留言，對我的觀點表示贊成，類似於現在網上的跟貼。但是在“八九”之後，北京的李海卻說我的這篇大字報缺少策略，給中共留下了把柄。現在回想起來確實如此，後來我就是因為這篇大字報而獲刑二年半，當時我真是初生牛犢不畏虎啊。

4 月 16 日，人大的學生成立了悼念胡耀邦的“治喪委員會”，並建立了悼念胡耀邦的靈堂。我到靈堂去的時候，裏面已經放滿了

花圈和松柏枝，陸陸續續有學生進去在胡耀邦像前進行哀悼。

4 月 18 日早上，我聽說北大的王丹在 17 日晚上曾帶領一批北大的學生呼籲人大學生一起到天安門廣場去，但人大學生應者寥寥。我們“學九樓”在人大的後門，許多消息都不能在第一時間知道，這嚴重制約了我在“八九”民運中的行動。如果我當時碰見王丹他們來呼籲，我肯定會跟隨他們前往廣場。類似的情況在“八九”民運中我遇到了好幾回，有好幾件事情我都沒能迅速作出反應。如果我住在人大的前門附近，我可能在“八九”民運中會卷得更深。

直到當天下午吃完晚飯後，我聽說有人正在組織人大學生前往廣場，我才約了兩個同班同學一同前去報到。隊伍集結完畢之後，我們就將一個大花圈綁在兩輛自行車上面，然後一同騎車前往廣場。到廣場的時候已經晚上 7 點，我看見廣場上已有上萬人，大家都聚集在紀念碑的北側，而紀念碑上面已放上了胡耀邦的遺像和許多花圈。這個時候我的心情格外激動，因為這畢竟是我生平第一次參加這樣大規模的公共政治活動。我頭腦中不斷出現“五四”運動和“四五”運動的歷史畫面，我感到我們現在也正在書寫新的歷史。

當我們人大的隊伍進入人群時，所有的人都對我們報以熱烈的掌聲，並自動地讓出一條通道，以便讓我們把花圈送到紀念碑上。我一直走在隊伍的前列，與幾個人一起抬著花圈，最後在大家的推動下我爬上了紀念碑，把人大的花圈放到了紀念碑上。人們看見人大的花圈也上了紀念碑，於是人群中又爆發出一片熱烈的掌聲。這個時候廣場上的人越來越多，我看見許多人在發表演講，還有人時不時地喊幾句“打倒官倒”這樣的口號。不久，我又看見一位個子瘦弱的學生拿著一個喇叭大聲念讀一份文件，好像是要求當局為 1987 年的學潮和自由化運動平反。有人告訴我說這個人就是王丹，

當時我對他好佩服，一是佩服他的勇氣，二是佩服他能夠寫出這樣的綱領性文件。在整個“八九”民運中，我只見過王丹這麼一次。沒想到直到四年多以後，我第一次坐牢出來才在他家裏又見到了他，並從此成為了關係密切的戰友。

大概晚上 11 點鐘的時候，廣場上的人又開始舉行環廣場遊行。遊行一圈之後，有人提出到新華門去請願，於是我們又到了新華門。新華門是國務院辦公所在地，數千人在新華門前坐了下來，門口的武警戰士緊張地排成了人牆，但我們並沒有往裏擠，只是時不時地齊聲高喊：“李鵬出來！李鵬出來！”有人說，如果是周總理，他一定會出來接見學生，但李鵬一直沒有出來。後來在“八九”民運整個過程中，李鵬一直都表現得很強硬，並在鎮壓“八九”民運中立下了頭功。人民不會忘記他的所作所為，歷史終究有一天要對他進行公正的審判。

大概淩晨 3 點鐘左右，人大校方調來了幾輛大客車，並呼籲人大的學生回校。有些學生就坐車回去了，但我和大部分學生還是留在新華門前繼續示威。淩晨 5 點左右，北京市公安局的大隊人馬來到了新華門，他們先用高音喇叭對我們進行勸說，勸說無效之後就對我們進行驅散。潰散之後，我一時找不到自己的自行車，於是只好乘地鐵回校。

4 月 19 日我休息了一天，後來聽說當天晚上又有更多的學生來到新華門前示威，並與警方發生了流血衝突，人們稱之為“新華門血案”。4 月 20 日我到各高校轉了一圈，明顯感覺到大字報的內容這時已發生了變化，悼念性的文章減少了，反腐敗和宣傳自由民主的文章多了起來。從這個時候開始，這次學潮的性質已由偶發的悼念性活動逐漸變成了一場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運動。

4 月 20 日下午，我離開北京到了天津南開大學。當時南開大學的學生也在自發地舉行悼念活動，校園裏也貼滿了大字報。為了激

發南開大學學生的鬥志，我以“悼胡社”的名義寫了一份通訊，詳細介紹了近幾天北京發生的情況。寫好之後我將之貼在了南開大學的一個食堂外面，吸引了許多學生觀看。可能受此影響，很快就有許多天津的學生趕到北京聲援。後來我想，如果在整個“八九”民運中我們都能把北京的消息及時告知全國各地，也許“八九”民運的聲勢將變得更加浩大，全國的民運就會更加協調和統一。一旦全國民運形成遍地開花的形勢，中共當局對付起來就會非常困難。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帝國的瓦解有兩種自下而上的方式，一是民眾的普遍反抗，二是各地方對中央的脫離。法國大革命表現為第一種形式，辛亥革命表現為第二種形式，蘇聯的瓦解則表現為兩種形式的混合。但是在“八九”民運中，民眾並沒有廣泛參與，各地方的民主運動也沒有形成規模和力量，整個運動都是北京的學生在主演，這就決定了“八九”民運最後必然失敗的命運。

我在天津只呆了兩天，因為 4 月 22 日要舉行胡耀邦的追悼會，因此我在 4 月 21 日下午就趕回了北京。4 月 21 日北京市政府宣佈：在 4 月 22 日舉行胡耀邦的追悼會時，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要實行交通管制，其目的當然是為了阻止學生的大規模行動。但這個時候學生的情緒正在高漲，針對當局的交通管制措施學生們想到了一個高明的辦法，那就是提前進入廣場。因此在 4 月 21 日傍晚，各個學校的“治喪委員會”就將各個學校的學生組織起來，在北師大集合宣誓後一起前往廣場。由於剛從天津回來，我就沒有參加這個活動，第二天上午我才趕往廣場。

我到廣場的時候，長安街和廣場周圍已經實行交通管制，但當局可能擔心與學生發生衝突，因此我們憑學生證也能從廣場南面進去。進入廣場之後我立即找到了人大的隊伍，很快也與大家一起整整齊齊地坐在人民大會堂前。這時我才注意到幾乎北京各個高校的學生都來了，估計當時廣場上有十幾萬學生。為了防止學生衝擊人

民大會堂，當局調集了大批的武警和員警守在大會堂前，不久他們也坐了下來，與學生隊伍形成對峙。上午 10 點，追悼會正式開始，由趙紫陽主持，楊尚昆致悼詞。但在追悼會結束後，廣場上的學生並沒有退場離開，不久我就看見三名學生走出人群，在人民大會堂前的臺階下跪了下來，好像是在向當局請願。這個舉動後來受到了許多人的批評，說公民不應該像臣民那樣向當權者下跪。但我當時卻沒有這麼高的認識，我覺得這個舉動並沒有什麼不妥。而且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這個舉動也暗含高明，因為這種軟弱卑微的舉動恰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出了這個政權的冷酷強硬本質。這是一種政治上的急智，是從事政治運動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一個基本素質。若干年後，我才知道其中的一個下跪者居然是我的四川遂寧老鄉，他叫周勇軍，當時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後來還擔任了“高自聯”的第一任主席。

直到下午 1 點，當局也沒有接受學生的請願，於是我們就感到非常氣憤。經過各個學校學生代表的緊急商量，大家一致決定從即日起開始罷課。於是我們馬上就開始進行環繞廣場的遊行，接著就向各自的學校遊行回去。在遊行途中，雖然我們情緒激動，但也始終不失理智。我們一邊高喊“人民日報，胡說八道！光明日報，沒有光明！中央電臺，顛倒黑白！”、“打倒官倒！剷除腐敗！”、“罷課！罷課！”等口號，一邊在遊行隊伍的兩邊用手拉起了人牆，以免社會上的其他人員進入。

應當說，當時的學生包括學生領袖都非常天真純潔，他們只想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根本就沒有長遠的政治目標，壓根兒就沒有想到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因此他們一直都不願受到社會上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的利用和操縱。然而中共統治者卻不理會這一點，只要一場運動威脅到了它的統治，甚至只是掃了它的顏面，它就會毫不留情地予以鎮壓。當時的學生不明白這點也就罷了，然而直到

今天，我仍看到不少追求自由民主的朋友還對中共的本質缺少最起碼的認識，還將中國民主事業的希望完全寄託在中共身上，我真為他們感到悲哀。我認為，任何一個專制統治者都不可能主動進行政治變革，它之所以有時候也會讓步，乃是因為內外的強大壓力，如果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不夠強大，它一定會通過各種花招來應付和糊弄人民，實在不行的話，它就會訴諸暴力。我還認為，民主運動從來都是一種民眾運動，她不可能也不應當是少數人玩的遊戲，因此民主運動本身就離不開民眾的廣泛參與。“八九”民運為了保證學生運動的純潔性而始終將人民排除在運動之外，就註定了這場運動走不了多遠。

大概下午 5 點左右，我們回到了學校，然而我們卻並沒有回去休息，而是在校園裏繼續進行遊行，並高喊著“罷課！罷課！”的口號。這樣，雖然對胡耀邦的悼念活動到此結束了，但一場聲勢浩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才剛剛開始，而這正是我所期望的。

三

4 月 22 日下午的遊行結束之後，隨著學生情緒的高漲，各高校的一些學生領袖在當天晚上就聚集在一起，決定成立一個非官方的獨立的學生組織來領導運動的持續進行，經過商討，他們決定將這個組織取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或“高自聯”。第二天即 4 月 23 日，各個學校又組織成立了“學生自治聯合會”，作為“高自聯”的下屬機構。“高自聯”的成立對“八九”民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此北京各高校的行動就有了統一的領導和協調。

這天晚上 7 點左右，人大的“學生自治聯合會”也在“八百人”大教室成立了，但直到晚上 8 點我才獲知這一消息。當我來到

了“八百人”大教室時，我看見裏面已經擠得水泄不通，連教室窗戶上都坐著人。好不容易擠到裏面時，競選卻已經結束了。如果早來一個小時，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由於情緒激動而登臺參加競選，但由於我早就預感這場運動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我多半不會去參加競選。“六四”之後，我無數次為自己當初的這種態度感到深深的愧疚與後悔，我一方面希望把運動搞大，一方面卻又不想承擔責任，這是一種政治上的投機主義，我要對我的這種自私的行為進行強烈的譴責。正是因為像我這樣的人太多了，“八九”民運最後才遭受了失敗的命運。後來我深刻地吸取了這個教訓，在“八九”之後的歷次抗爭活動中，我再也沒有退縮和猶豫過。我認為，雖然我們的個人努力在運動的洪流中顯得微不足道，但也許在某個時候它卻會成為壓垮專制強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人大的“學生自治聯合會” 最後由七個人組成了，七人當中有兩人是我所在的勞動人事學院的學生，一個是 88 級的馬少華，一個是 86 級的邱軍。其中馬少華後來與我的關係非常親密，我們一起在九十年代為中國民運做了一些事情。“自治會”成立後，當時就有人說，這些“自治會”的人沒有什麼能力，許多有水準的人根本就沒有跳出來。他們說的也許是事實，但他們不知道，在反抗專制統治的鬥爭中，勇氣比能力和水準更重要。早在二千多年前，有人就問過孔子：“三思而行怎麼樣？”孔子說：“再思可矣。”也就是說，凡事考慮多了就有私心，這是政治投機分子的一個主要行為特徵。“八九”民運的最後失敗再次證明，普遍的投機主義對運動的傷害是多麼嚴重。所以直到今天，我還要對王丹、馬少華們當時的英勇表現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經過“八九”民運以及後來無數次政治抗爭活動的考驗後，已逐漸成長為中國民主運動的中堅力量。

“高自聯”和各個學校的“自治會”成立後，校內民主運動馬

上就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各個學校的“自治會”通過募集資金辦起了廣播站，組織了糾察隊，並製作了大量的旗幟和標語，從而將“八九”民運推到了一個更高的水準。

從 4 月 24 日起，北京各高校都開始罷課了，這是“高自聯”成立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情。那天早上，我很早就來到了教學樓下，看見“自治會”的人正在勸阻有些想上課的同學，同學們基本上都能予以理解，於是我們學校就順利實現了罷課。與此同時，各個學校的“自治會”又組織隊伍到其他學校進行串聯遊行，4 月 24 日北京外語學院等學校的學生就到人大進行了遊行。經過精心準備，4 月 25 日，我們人大的數千名學生也在“自治會”的有序組織下到青年政治學院、首都師大、中央民族學院等學校進行了遊行，一場自發的學潮終於逐漸演變成了一場有組織的民主運動。

然而現在回想起來，我認為，在廣大學生對民主運動的熱情日益高漲的時候，“高自聯”應當迅速擴大組織，應當制定、公佈自己的行動綱領，並讓那些贊成這些綱領的學生加入“高自聯”，使“高自聯”成為一個像 1980 年波蘭“團結工會”那樣一個強大的反對派組織。這樣當局鎮壓這個運動時就會有所忌憚，而且即使鎮壓了，以後也會有很多人自覺地繼續從事民主運動。“六四”之後，“高自聯”的學生領袖都受到了通緝、抓捕或被迫流亡，那些在運動中表現積極但卻沒有加入“高自聯”的大部分學生很快就屈服於當局的高壓淫威之下，一場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更要命的是，“六四”之後的二十年來，當初那些積極參加運動的人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能夠矢志不渝、堅持抗爭的人實在是少之又少，這使得中國民主運動的力量直到今天還非常弱小。所以說，在“八九”民運那麼好的條件下，中國民運沒有借勢形成一個強大的反對派組織，實在是一個嚴重的失誤。

4 月 23 日，趙紫陽出訪朝鮮。由於學生運動的規模和力量越來

越強大，中共高層的頑固派對此極為恐懼，於是他們就利用趙紫陽出訪之機開始密謀鎮壓運動，他們決定像 1987 年那樣將運動扼殺於搖籃之中。4 月 25 日晚上鄧小平發表了一個講話，他將北京的學潮定性為“動亂”。4 月 26 日，《人民日報》又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那個時候，學校的氣氛非常緊張，許多人都在觀望“高自聯”的態度，而更多的人卻對“4・26”社論感到義憤。本來在“4・26”社論發表之前，“北高聯”就已經決定組織北京各高校在 4 月 27 日進行一次統一大遊行，然而在頑固勢力磨刀霍霍的囂張氣焰下，年輕的大學生們能經受得起這次考驗嗎？值得驕傲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廣大學生沒有被嚇倒，各個學校反而在加緊準備即將來臨的大遊行。

實踐證明，在每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中，如果雙方勢均力敵，那麼勝負的關鍵往往取決於在危急的關頭你是否能頂住對方的壓力。俗話說“狹路相逢勇者勝”，在政治鬥爭的關鍵時刻，勇氣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膽小者將被嚇死，勇敢者將笑到最後。政治鬥爭本來就是一種膠著的鬥爭，你退他就進，你進他就退，如果不是為了大局和長期的戰略性考慮，你根本就不能選擇軟弱和退讓，一旦你選擇了軟弱和退讓，那麼形勢就會急轉直下並一瀉千里，就像甲午戰爭中的中國軍隊一樣。幸運的是，在 1989 年的 4 月底，我們沒有選擇軟弱和退讓，於是我們就在 4 月 27 日與專制力量的一次決定性戰役中取得了勝利。

當然，中共裏面的頑固派也不是吃素的，他們一定會採取種種手段來破壞我們的預定計畫。果然，4 月 27 日早上我們剛起床，就聽說北大已經被大批員警包圍了。於是校園裏議論紛紛，有主張繼續遊行的，有主張暫停的，但大多數人還是在等待“北高聯”的明確指示。然而“北高聯”這個時候也顯得有些猶豫不決，一會兒說取消遊行，一會兒又說按原計畫繼續遊行。於是人大“自治會”只

好自己拿主意，經過短暫研究後終於決定繼續遊行。開始只有幾百人，都是像我這樣的積極分子，於是我們就在校園裏遊行了一圈以壯大我們的力量。直到人數達到兩千左右時我們才走出校門，朝北大挺進，準備先去把北大的隊伍救出來。但是當我們走到中關村的時候，我們卻碰上了北大的遊行隊伍，原來他們已經成功突圍，不知道他們是自己沖出來的還是其他學校的學生救出來的。於是我們人大的隊伍立即掉頭，朝天安門廣場挺進。在之後的遊行過程中，我們人大的隊伍始終走在最前面，“人大研究生院”的大旗在前面顯得格外耀眼。這讓人大的學生感到特別揚眉吐氣，我們終於在這天以出色的表現徹底摔掉了“第二黨校”的惡名。

當遊行到北京理工大學附近時，我們卻遇到了員警人牆的攔截。我們沖了幾次都沖不開，後來一些市民就在員警人牆的的背後與我們配合著衝擊，我們才終於突破攔截。北京市民這天表現得相當好，他們不僅與我們一起衝擊員警人牆，而且在沿途不斷地給我們送水、送雪糕，這讓我們非常感動。隨著北京理工大學、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外語學院等學校的隊伍的加入，我們這支遊行隊伍的陣容就越來越壯大，圍觀的市民也越來越多，許多市民在窗戶上向我們揮手致意。在紫竹園和西直門附近，我們又先後遇到兩道員警人牆，由於有了經驗，我們很快就衝破了他們的攔截。有人算過，這天我們一共突破了八道員警人牆，最後在長安街上時，員警人牆已經不起任何作用，輕輕一沖就自動潰散了。在遊行之中，我們一會兒喊口號，一會兒唱《國際歌》，情緒一直都非常激昂。到長安街之後，幾乎是北京所有高校的隊伍都匯入了進來，不少市民也加入其中，幾十米寬的長安街上全是遊行的人們，前後竟有數公里之長，場面頗為壯觀。我一直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頭，直到今天我還為自己參加過這次偉大的遊行而深感自豪。

由於在幾次突破員警人牆的攔截過程中耗費了大量的時間，下

午 4 點左右我們才到達天安門廣場。到達廣場後不久，當局就調來了幾十輛軍車，車上全是全副武裝的士兵，企圖對我們進行鎮壓。但這些軍車馬上就淹沒在人海之中，許多學生爬上了軍車，向這些士兵進行演講和宣傳，高喊著“人民軍隊愛人民”的口號。不久，這些軍車就灰溜溜地開走了，人群中響起雷鳴般的掌聲。至此，“4·27”大遊行取得了徹底的勝利。當我們離開廣場時，路邊的市民向我們熱烈鼓掌，甚至那些員警也向我們打出“v”型手勢，慶祝我們取得了勝利。在廣場休息一會兒之後，我們又沿著二環路繼續遊行，直到晚上十二點才回到學校。

我的民運二十年（之一）
陳衛被捕[2]

2009 年“六四”期間，海外“八九一代”授予我“中國青年人權獎”，在頒獎詞中，他們說我幾乎參加了“八九”之後國內的所有重大的民運活動。我得承認，在很大程度上他們說的確實是事實。由於機緣的巧合，也由於我 20 年來堅定不移地追求“八九”民運的自由民主理想，我確實參與和目睹了 20 年來尤其是上個世紀 90 年代的許多重要的民運事件，例如“九二組黨”運動、《和平憲章》運動、1995 年簽名運動、“九八”組黨運動和《零八憲章》運動。由此我接觸和認識了許多為自由民主理想奮鬥的民運人士，並從中獲得了很大的一筆精神財富。為此我只有感謝上帝對我的眷顧，是他讓我見證了黑暗時期中國民運先行者們的種種探索和努力，是他讓我經歷了這麼一段不平凡的生活。

鑒於目前中國的民主之路仍佈滿荊棘，鑒於許多後來者對過去的民運歷史不太瞭解，我覺得我現在有責任將我所知道的許多事情講述出來，以彰顯那些先行者們的艱辛業績，並讓後來者獲得一些經驗和教訓。

我投身於民主運動之中是從參加“八九”民運開始的，但成為一個堅定的民運人士卻是“八九”之後的事情。關於我參加“八九”民運的具體情況，我已在《血與火的洗禮——我在一九八九年》

---

[2] 2011 年劉賢斌遭重判，本篇為判決書提到的三篇文章之一。

（發表於《人與人權》2009 年第 4 和第 5 月號）中做了詳細的敘述，因此在這裏我就不再談“八九”民運方面的事情，我直接從“八九”之後說起。

“六四”事件之後，我回到了老家四川遂寧，當時我的心情異常悲憤，我從“六四”事件中看清了這個政權的邪惡本質，我決定此生要與這個邪惡的政權較量到底，直到自由民主的理想在中國完全實現。因此儘管當時恐怖的氣氛已經蔓延到了全國，甚至連我們這個西南小城也未能倖免，但我對此並不害怕，我反而加深了對這個政權的痛惡。由於這個緣故，我就與我的幾個高中同學商量，說應當為中國的民主做一些事情，最後我們決定辦一份地下刊物以宣傳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並將這份刊物定名為《民主論壇》。這幾個高中同學都是我在“八九”民運之前因為志同道合而結拜的弟兄，其中歐陽懿與我的關係最好，他後來與我一樣都成為了堅定的民主戰士。在“八九”民運中歐陽懿是遂寧川北教育學院的學生領袖，組織了川北教育學院的遊行和罷課行動，後來又與我一起在遂寧城裏張貼傳單。歐陽懿喜歡詩歌和文學，受魯迅的影響很大，於是我就讓他為《民主論壇》寫了幾篇文章。我自己也寫了幾篇，主要都是宣傳自由民主理念的，但我還寫了一篇猛烈攻擊中共的文章，題目是《起訴中國共產黨》，我對該黨幾十年來的罪惡進行了羅列和控訴。所以在“六四”剛剛結束的時候，我和歐陽懿就走上了反抗專制、追求民主的道路。

有一天，我與我的同學姜坤又聊到了辦《民主論壇》方面的事情，姜坤突然說我們應當找一下陳衛。我說我不認識陳衛。姜坤說陳衛也是遂寧中學八七級的學生，後來留了一級，在 1988 年考上了北京的理工大學，他們不僅是小學同學，而且他們的父母都是遂寧紡織廠的職工，他們都住在遂寧紡織廠的職工宿舍區裏。姜坤還說他們前兩天剛見過面，據說他是北京理工大學的“高自聯”成

員。我聽了立即感到很興奮，儘管我在“八九”民運中表現得很積極，但我一直沒有參加“高自聯”，因此也與這些“高自聯”成員沒有什麼接觸，現在聽說我們的同學中居然有“高自聯”的成員，我當然就迫不及待地想認識，說不定認識之後我們還可以一起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當然在我的同學中，陳衛並不是唯一一個“高自聯”成員，北師大的梁慶敦也是“高自聯”成員，而且是被政府通緝的 21 個學生領袖之一。梁慶敦與我都是遂寧中學八七級的學生，我們讀中學時就已認識，後來在北京也見過幾次，不過因為受到通緝，這個時候我肯定不可能再見到他了。

2010 年與陳衛白衣紀念六四

第二天，我終於在姜坤的家裏見到了陳衛。他當時的個子很瘦小，不像現在這樣體格健壯，他的眼睛雖然不大，但目光卻很犀利，談話也很有激情與邏輯。我們先聊了“八九”民運中的一些事情，

後來我就談了自己的一些打算，並將創辦《民主論壇》的事情告訴了他。他對此表示完全贊成，並提出接下來應建立“地下高自聯”。其實在“八九”民運中，當中共當局在 5 月 20 日宣佈戒嚴之後，“高自聯”的一些人就預感到了運動最後會被鎮壓，因此有一天在天安門廣場上就有人問我是否願意加入“地下高自聯”，我當時就表示同意，並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不過後來他們卻一直沒有與我聯繫，我也就一直游離於“組織”之外。現在我認識了陳衛，感覺到自己終於找到了組織，而且居然參與了“地下高自聯”的籌建，別提我當時心裏有多高興。但很快我就為陳衛的安全擔心起來，我說當局現在正在到處抓捕學生領袖，你應當找個地方躲一下。但陳衛對此一點也不害怕，在我與姜坤的反復勸告下，他才答應過兩天到鄉下他外婆家去躲一段時間。

當天下午，陳衛又將姜坤、馬烈和我帶到了他的家裏，從一個箱子裏拿出了一件他在“六四”那天穿的、寫有標語的衣服，又拿出了一些照片、資料和一雙帶血的鞋子，這是他保留的“六四”大屠殺的證據。20 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否認“六四”大屠殺這件事，但歷史的真相豈能如此輕易被抹去。陳衛告訴我們，6 月 3 日晚上軍隊進城的時候，他正在長安街上，他親眼看見一個年輕的女學生被一個軍官拿著手槍頂著她的腦袋當場開槍將她擊斃，當時他的腦袋一片空白，但他還是記住了那個軍官所乘車輛的牌照編號。陳衛還告訴我們，那天晚上，槍聲一直不斷，地上到處都是血跡，他們只是不停地流著眼淚，一邊呼喊口號，一邊唱著《國際歌》中的那句“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一切全靠我們自己！”“六四”事件發生時，我不在北京，但“六四”事件發生後，我與我的同學兼兄弟馬烈一起又於 6 月 7 日回到了北京，準備參加我以為會發生的巷戰。在 6 月 9 日當局開放長安街之後，我們在木樨地一帶親眼看見了兩邊大樓的玻璃窗戶上佈滿了彈孔，完全可以

想像出當時場面的是多麼地慘烈。所以當我看見陳衛帶回來的這些東西時，我在心裏面再次發誓要推翻這個暴虐的政權，要讓殺人者受到正義的審判。

正當我準備和陳衛一起大幹一場時，不久姜坤卻匆匆忙忙地告訴我說陳衛被捕了。後來陳衛告訴我說，就在我們認識後的第二天下午，陳衛與他的同學在一起時，遂寧的員警已經在他周圍布控。當天晚上 7 點多鐘，遂寧公安局的一大批員警來到了他家，陣勢很大，好像陳衛幹了多大的壞事一樣，圍觀的人很多。這些員警把陳衛的家抄了個遍，那些衣服、帶血的鞋子、資料、照片之類的東西當然不能倖免。之後他們把陳衛關押在遂寧的靈泉寺看守所，一直關了三個月，後來又把他押送到北京，關押在秦城監獄，使他有幸成為了“秦城大學一期畢業生”。直到 1990 年 12 月，在經過一年半的審查之後，當局才對他免於起訴予以釋放。陳衛進去後，我們幾個同學到他家去看望過他的父母，他母親每次見了我們都要流淚。

陳衛進去後，我還是沒有害怕，我與歐陽懿等人繼續準備著創辦《民主論壇》。這時遂寧的氣氛也非常緊張，大家都在議論梁慶敦的事情，有的人說某某前幾天還見過他，有的人說他是“高自聯”的財政部長，身上揣著幾十萬元，當局根本就無法抓住他。後來梁慶敦確實也沒有被抓住，他在躲藏一年多之後成功地逃到了美國。這時我的母親也特別害怕，我雖然沒有告訴她我幹的事情，但她還是預感到我不是一個安分的孩子。“八九”民運中，她一直通過電視關注著北京的事態，她雖然沒有什麼文化，但憑直覺她也知道大學生的行為是對的。我回家後，她經常在我面前罵共產黨，有時她還會告訴我她在外面聽到的一些消息，例如她曾告訴我說遂寧永興鎮有兩個大學生被打死了。後來她又從電視上看見當局在到處抓人，為了我的安全，她居然在我們家的樓上系了一根粗繩子，以

讓我隨時可以逃掉。不過由於我沒有加入“高自聯”，不在當局的黑名單上，這樣的事情終於沒有發生，我相當安全地度過了這個假期。

除了到處抓人之外，當局在“六四”之後還開足了他們的喉舌機器，大肆篡改“八九”民運的歷史真相，惡毒攻擊和和批判“八九”民運的許多領袖，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人民日報》發表的《抓住劉曉波的黑手》和《萬潤南搬起‘石頭’（STONE 四通）砸自己的腳》這兩篇文章。7 月中旬，我從 7 月 16 日的《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文章，把我嚇了一跳，文章說有的人早就想發動“動亂”，特別列舉一篇《反思中共歷史》的大字報，說大字報的作者攻擊中共是“一代奸黨”、是“一個即將潰敗之組織”，並叫囂“中國大亂將至，中共滅亡在即”，然後又對金觀濤先生進行了一番猛烈的批判。這篇文章我讀得讓我心驚肉跳，因為它所提到的這篇大字報正是我寫的。我是在 4 月 16 日即胡耀邦逝世的第二天寫的，寫完之後我貼到了我們人民大學“民主牆”上。後來這篇大字報在牆上保留了很長時間，而且被人到處傳抄。不過當時我用的是化名，我估計當局不容易落實到我的頭上。

8 月初，我收到了學校的開學通知書，宣佈學校在 8 月 10 日開學。這時我們已經將《民主論壇》第一期所需的文章寫完了，但由於當時氣氛太恐怖，我才發覺我們根本就無法將它印製出來。由於我馬上就要回北京讀書，我考慮到將這些文章帶在身邊會很多危險，如果被檢查出來，不僅會給自己也會給朋友們帶來很大麻煩，於是我就只好將這些文章付之一炬，燒了個精光。

回到學校後，我們並沒有立即上課，而是接受學校當局的洗腦。前 10 天我們一直被組織學習“4·26”社論（也就是根據鄧小平講話而發表的《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和其他文件，後 10 天則要求我們每個人寫出自己參與“八九”民運的情

況和自己的認識。我們雖然都是第一次經歷中共的這種政治運動，但我們好像都很有經驗，既承認了一些人所共知的如參加遊行、絕食之類的事情，又回避了一些可以當做“罪證”的重要事情。在寫這些材料的過程中，我們還要相互交流情況，生怕有人說了不該說的事情。所以在這個材料中，我就沒有“交代”我寫大字報的事情，其實這個事情有許多同學都知道，但沒有一個人予以揭發。學校當局也很注意保護學生，並沒有對每個人嚴格審查，所以我們幾乎每個人都在這次政治審查中順利過關。其實當時全國各地都在開展此項活動，當局最深刻的動機就是要藉此在全國形成一種高壓恐怖態勢，讓我們對他們的統治感到害怕。應當說當局達到了這個目的，因為在這種高壓恐怖統治之下，20 年來國內再也沒有興起一場類似“八九”民運這樣大規模的民主運動。

這個時候，歐陽懿正忙於畢業分配的事情，他們川北教育學院是兩年制的中專，所以他比我們提前兩年畢業。與這一年畢業的所有大學生一樣，歐陽懿的畢業分配受到了“八九”民運的嚴重影響。在遂寧的時候，他還告訴我說他有可能會留在城裏的學校教書，但是後來他卻寫信告訴我，他最後被分配到了偏僻的真武中學。這個地方是遂寧、樂至、中江三地的交界，是遂寧最偏遠的地方，從那裏乘車到遂寧需要幾個小時。在我看來，這根本就不是分配，而簡直就是發配，若以歐陽懿的才華而論，他完全可以留在川北教育學院任教，但是由於他在“八九”民運中的積極表現，他在當局的眼中就成為了一個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在這樣一個只講政治、不講人性的社會裏，他必然會為自己的選擇付出沉重的代價。在陳衛被抓、歐陽懿被發配之後，我仍然在學校順利讀書，我以為我這個“漏網之魚”可以成功逃脫當局的注意，但是在強大的專政機器面前，這一切都是徒勞的，我很快也被納入了當局的視線，從此我的個人命運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我的民運二十年（之二）
我成了專政對象

雖然在開學後的政治審查我順利過關，但中共的專政機器可不是吃素的，他們很快就將我這條隱藏得很深的“泥鰍”挖了出來。1989 年 10 月的一天，我收到了我二哥劉賢貴的一封來信，他在信中說我們在遂寧張貼傳單的事情已經被遂寧市公安局偵破了，而且他們已經找了他本人，他也如實地講了所有情況。1989 年 5 月底，在成功阻截軍隊進京之後我回到了遂寧，當時我帶回來很多傳單，並找到歐陽懿，經過商討之後我們決定在遂寧大量印製、張貼這些傳單。為了解決刻制、印刷的困難，我想到了我的二哥劉賢貴，他當時正在順南街小學教書。由於他也對“八九”民運抱著同情的態度，所以他聽了我的想法後立即表示願意從學校借出刻制工具。後來幾天，我就一直在他家裏刻寫傳單。刻制完後的當天晚上，二哥就帶我進入了他們學校的油印室裏，並且幫我把所有的傳單印刷出來。6 月 1 日晚上，我就與歐陽、馬烈一起將這些傳單張貼在了遂寧二十多個地方。當時為了安全起見，我在傳單上故意留下了“重慶高自聯”的落款。沒想到，遂寧公安局在幾個月之後還是查到了我們頭上。二哥在信中還說，好像歐陽也被他們找過了。

看了二哥的信後，我知道這一天終於來了。雖然以前我從沒有與專政機器打過交道，但共產黨的革命史還是讓我學到了一些鬥爭經驗。所以面對這種情況，我並沒有感到任何慌亂，我只是在想如何才能將損失減低到最小程度。經過短暫的考慮，我決定先偷偷地回趟遂寧，找到我二哥和歐陽，摸清遂寧公安局從他們那裏瞭解到了哪些情況，然後再相機行事。當天晚上我就乘火車離開北京。回

到遂寧後，我讓母親把二哥叫到了家裏，然後讓我二哥把他告訴遂寧公安局的所有情況再詳細地告訴我。之後我又迅速趕到真武中學找到歐陽懿，詳細詢問了遂寧市公安局從他那裏所掌握的情況。這一切弄清楚之後，我又迅速回到學校，安然等著遂寧市公安局找上門來。當時我心裏很清楚，與我在北京所做的那些事情比較起來，我在遂寧所幹的事情實在是“小巫見大巫”，我在北京參加遊行、絕食都沒有受到學校的處理，在遂寧張貼一些大字報又算得了什麼呢？

我剛回到北京沒兩天，遂寧市公安局的人就來了，他們把我叫到人大的一間教室裏，詳細詢問我在遂寧張貼傳單的事情。於是我就裝著很配合的樣子，將他們已經掌握的情況完全重複了一遍，他們對我的態度非常滿意，並勸我要珍惜上大學的機會。後來他們還告訴我，說我們張貼傳單的事情是建國以來遂寧最大的“反革命”案件，還說他們為了偵破這個案件，他們竟然到重慶去瞭解了“重慶高自聯”的情況，結果重慶根本就沒有什麼“高自聯”，後來他們用了幾個月時間從紙張、油墨的成分開始分析才慢慢查到我們頭上。我聽了這些，一方面對他們的偵破能力感到佩服，一方面也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驕傲，尤其讓我開心的是，我們將馬烈保護了下來，沒有讓他受到任何牽連。僅僅用了一個多小時，他們就對我詢問完畢，後來他們與學校商議後，就決定對此事予以結案，不再對我進行刑事追究。許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天來找我的就是遂寧市的國保人員，其中一個叫肖明志（編者按：應該是肖雲志），是遂寧市國保支隊的副支隊長，另一個是遂寧市中區的國保人員。肖明志後來還告訴我說，那天他們本來是準備將我帶回遂寧的，但鑒於我的良好態度，再加上學校領導的保護，他們才放了我一馬。

我以為事情就這樣結束了，不由得松了一大口氣，誰知這只是我二十年來坎坷命運的開始。由於我在遂寧所幹的事情，我很快就

納入了人大保衛處和北京市公安局的視線，而且他們由此掌握了我的筆跡，因為我們在遂寧張貼的傳單都是我親自刻寫的。人大保衛處先是不斷地找我談話，詳細瞭解我參與“八九”民運的情況，顯然他們已經不再相信我先前所寫的那些材料，因為我在那份材料中並沒有提到在遂寧張貼傳單的事情，他們估計我還隱瞞了不少事情。每次找我談話的都是一個姓馬的人，聽說他是人大保衛處的處長，長得尖嘴猴腮，一口牙齒也很不整齊，而且被煙熏得焦黃，讓我每次見了他都很不舒服。但他對審訊工作還是很有經驗，每次對我都很客氣，總是裝著很愛護我的樣子，讓我很難拒絕回答他提出的問題，也讓我對繼續上大學抱有希望。由於我經常到保衛處交代問題，慢慢保衛處的人都認識我了，甚至有時我到人大電影院看電影，那些在電影院賣票、實則是保衛處的人也會向我打招呼。

有一天，老馬又把我叫到保衛處，但他卻沒有問我任何問題，而是讓我寫幾個字給他們看，而且他在辦公桌上早已為我準備好了紙張和筆墨。我開始沒有反應過來，便用鋼筆隨手在紙上寫了幾個字。老馬又讓我寫毛筆字，並讓我寫“中共”、“反思”、“歷史”等幾個字，我一下子醒悟過來，原來他們已經懷疑《反思中共歷史》這篇大字報是我寫的，我心裏產生了一點慌亂害怕的情緒，但這時已經晚了，我只好硬著頭皮寫了這幾個字。由於我已經知道《人民日報》曾批判過這篇大字報，我知道問題很嚴重，我估計我會因此而坐牢。但是老馬當天還是讓我回去了，他們並沒有馬上採取行動，我估計他們還要對我的筆跡做一下鑒定。不久老馬又把我叫到人大保衛處，直接問我是否寫了《反思中共歷史》這篇大字報，一開始我還想抵賴，但由於他始終扭住這個問題不放，問的次數多了，我也就豁出去了，乾脆承認了這篇大字報是我寫的，看他們會把我怎樣，大不了也像陳衛一樣進去坐牢。然而他們後來卻並沒有馬上處理我，只是叫我寫一下對這件事情的認識材料。

我的問題很快就在我所在的勞動人事學院裏傳開了，聽說學院領導還專門就我的問題開過幾次會。有些老師也知道了這些情況，他們有時就會向我問起這方面的事情。記得有個教我們《政治學》的叫趙凱農的老師，他在下課後就多次關心我的問題。我記得趙凱農老師在“八九”民運中也曾經參加過一些聲援學生的政治簽名，我知道他的思想也傾向於“自由化”。由於 1989 年上學期的課沒有上完，因此在開校之後的政治審查運動結束後，有一個月時間我們都在補上學期的課。補課之後就進行上學期的期末考試，趙老師就讓我們寫一篇論文，我寫的論文題目好像是《論社會動盪的原因》，明顯就是與“八九”民運有關，沒想到後來趙老師居然給我打了滿分。

在我受政治審查期間，學院的有些領導也很關心我。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不久就會面臨著畢業分配的事情。當時學院的黨委副書記李瑛主要在負責管理我們這個年級的事情，因此許多同學為了在畢業時能夠分配一個好工作就經常找李瑛彙報思想，但我卻不屑於此，居然從來沒有找過她。我的這種表現引起了她的注意，有一次她就專門請我到她家吃飯，主動瞭解我的思想狀況，並向我講了她以前的一些經歷，還與我討論了一下史達林主義。“八九”之後，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民主社會主義，看了許多馬恩列斯著作和“修正主義”、“機會主義”以及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著作，從理論上比較徹底地認清了傳統社會主義的理論缺陷，最後寫了一篇長達幾萬字的《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怎樣實現社會主義》的文章，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所以在與李瑛討論史達林主義時，我就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李瑛聽了之後就說我的思想太反動了，我聽得出她對我很欣賞。後來她又經常請我一起去看電影或音樂會，甚至還帶我去“莫斯科餐廳”參加她朋友的聚會，這樣我們就慢慢成

為了無所不談的朋友。後來有一次她居然帶我到學院辦公室，拿了一份《內參》給我看，說看了這些的話我的思想會更反動。在我寫大字報的事情敗露之後，她又勸我，讓我說是學院一位在“六四”後流亡到英國的老師寫的，但考慮到我已經承認了這件事情是我所為，我認為沒有必要再推諉，就拒絕了她的好意。

1990年中秋節，我們班舉行了一次聯歡會，吃完水餃後大家就開始跳舞，我不善此道就一直在旁邊看同學們跳舞。這時李瑛走了進來，把我專門叫出去，指著一個我不認識的同學說：“這位是馬少華，是你的四川老鄉，他剛從監獄裏出來，你們認識一下吧。”當時我感到一陣驚喜，雖然我不認識馬少華，但是他的大名我卻早就知道，他比我低一級，是我們學院八八級的學生，在“八九”民運中參加了我們人大的自治會，是我們人大的學生領袖，“六四”後也與陳衛一樣受到當局的關押審查。沒想到他這麼快就出來了，我真為他感到高興。李瑛知道我們之間有話要說，她介紹完後就立即走了。於是馬少華就告訴我說，“六四”之後不久他就被捕，一直關押在秦城監獄，現在當局考慮到他問題已經交代清楚並且認識態度良好，就決定對他免於起訴，並同意讓他繼續回校讀書。他還告訴我說，與他一起被釋放的還有許多人，看來當局對學生的處理還是比較寬大。對我來說，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看見馬少華出來了，我估計陳衛很快也會出來，而且我估計我寫大字報的事情可能也不會受到當局太重的處罰。

但是我的好心情還沒有持續幾天，新的麻煩卻又來了。我有一個高中同學叫潘光華，他在蘭州大學讀書。在“八九”民運之前，由於受到“自由化”的影響，我已經對中共政權失去了信心，正想找一些人成立一個反對中共的組織，起名為“中華民族先鋒黨”。為此我給潘光華寫了一封信，談到了我的思想主張，但沒有告訴他這個組織的名字，儘管如此，我的思想主張還是把他嚇壞了，他在

回信中委婉地表示不同意。但在“八九”民運中，他的一個大學同學曾專門到人大來找過我，我們又討論了組黨的事情。“八九”之後，作為思想上的朋友，我們之間繼續保持著書信來往。由於我在人大已經暴露，我的書信來往就可能受到了當局的監控，於是他們就由此找到潘光華，可能潘光華就將我們之間交往的情況包括組黨的事情坦白地告訴了他們。這樣當局對我的看法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不再認為我是一個可以挽救的“犯了錯誤的青年學生”，而將我看成是一個極其危險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於是我的問題就開始交由北京市公安局直接處理，人大保衛處就不再找我了。

記得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說讓我到學院去一趟，當我來到學院辦公室時，兩名我不認識的人把我請進了學院的一間會議室，他們直接對我亮明身份說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員警，要向我瞭解一些情況，然後就開始對我進行正式詢問。在接受審訊的過程中，由於我不知道對方掌握了哪些情況，因此我就支支吾吾地交代以前已經向人大保衛處交待過的情況，他們就說我每次回答就像“擠牙膏”一樣，不願把所有問題交代清楚。我就問他們到底因為什麼事情找我，他們說你自己的事情自己清楚，我說我不清楚請他們提示一下，他們最後只好問我是否認識一個叫潘光華的人，我立即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於是我就半真半假地進行了交代，承認了與潘光華的交往，但堅決不承認自己搞過什麼組織。這次詢問之後沒多久他們又找過我一次，仍然是問那個組織的事情，我仍然堅決予以否認。後來他們就沒有再找過我了，但李瑛告訴我說，我的問題已經被立案了，學院專門為此開會討論過，鑒於我的問題很嚴重，學院最後只好同意對我立案。不過他們一直沒有動我，我也樂得繼續抓緊時間在學校多讀點書，當時我還對讀完大學還抱有希望，但是在我大學快畢業的最後一刻，我的這個希望還是破滅了，我最終還是成為了當局的專政對象。

我的民運二十年（之三）
地下民運

馬少華的出獄給我的個人生活帶來了很大的變化。一年多來我一直是一個人承受著學校保衛處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審查和折磨，我沒有將這些情況告訴家人，也沒有告訴我身邊的同學，我只是成天在學校的圖書館不停地讀書和思考，對畢業分配和其他個人前途一概不予考慮，我知道在強大的專政機器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我深深地預感到我未來的生活將註定十分坎坷。當然這一切都沒有從精神上壓垮我，這得益於我樂觀的天性，我始終相信我們的追求終將得到歷史的認可。然而在那一年多時間裏，我畢竟是一個人在戰鬥，看見身邊的同學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我真的感到很孤獨。但是在馬少華出獄之後，我很快就通過他認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終於可以向他們傾訴我的遭遇和我的追求，我終於告別了那種孤獨的生活。友情真的是一劑良藥，在朋友們的影響和鼓勵下，我很快就變得精神煥發，我很高興能夠與他們一起為中國社會的進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馬少華給我引薦的第一個朋友叫陸明霞，他也是人大“自治會”的成員，出獄後也被允許回校繼續讀書。陸明霞與我是一個年級，我們都住在人大“學九樓”，因此我就經常到他寢室裏去，幾乎每次都是高朋滿座。陸明霞好像是法律系的學生，他說話很有邏輯，也很風趣，我很喜歡聽他講話。在陸明霞的寢室裏，有時我還會碰到其他學校的“自治會”成員，有一次我就遇到過一個北航的學生，但他的名字我現在已經忘了。那段時間，陸明霞那裏簡直就

成了前“高自聯”成員們的聯絡中心，後來他本人也成為了“九二組黨”的一個核心人物。

不久馬少華又介紹我認識了陳青林，他當時是北京氣象學院的學生，“八九”之後他也沒有受到當局的關押審查。他不善言辭，但意志卻十分堅定，是一個非常樸素非常踏實的人，認識不久我就把他當成了自己最值得信任的朋友，我經常到他們學校找他聊天。陳青林告訴我，他是內蒙古赤峰地區的人，他的父親以前就因為政治原因坐過牢，因此他從小就在父親影響下對中共沒有好感，即使“八九”民運最後失敗了，他也沒有放棄對自由民主的追求。隨著與陳青林交往的增多，我慢慢瞭解到他雖然在民運圈子裏面沒有什麼名氣，但他卻是一個民運的有心人，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與許多民運朋友來往了。有一次，陳青林說北京有個朋友要搬家，想請我和馬少華去幫忙，但那一天馬少華沒有去成，我就與陳清林一起去了。經陳清林介紹，這個北京朋友叫高玉祥，他是一個個體戶，當時在北京的虹橋商場做小生意，好像他在“八九”民運中與“工自聯”有聯繫，後來他也參加了“九二組黨”活動，並被關押了兩年多。

後來，陳青林又介紹我認識了北京語言學院的王國齊，他是語言學院的一個工人，他也與“工自聯”有聯繫。當時王國齊在語言學院有一間小屋（編者注：作者記憶有誤。實際上王國齊從秦城監獄出來後，語言學院分給他的小屋在語言學院對面的地質大學校內），平時沒有人居住，於是不少民運朋友就住在那裏。正是在那間小屋裏，我認識了湖南的李海文，他當時就臨時寄住在這裏。據陳青林講，在“八九”民運中，李海文是湖南的一個大學生（編者：應為廣州的大學生，原“外高聯”成員），運動失敗後他專門跑到北京來找民運組織，結果他還真找到了。李海文也是一個不善言辭的人，與他在一起，他幾乎都是聽別人講話，自己難得說上三句話。

記得有個晚上我與李海文在人大後面的村莊裏散步聊天，我們聊了幾個小時，他都沒有說什麼話，一直都是我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講。但我看得出來，他一直在十分認真地聽，有時候他聽到我講得很有道理就會不停地點頭。當時天氣已經非常寒冷，但他沒有表現出任何不耐煩的樣子，遇到這麼好的一個聽眾真好，我記得這是我二十年來講話最多的一次。李海文的外表雖然木訥，但他實際上是一個很聰明的人，聽陳衛說，李海文的圍棋下得特別好，不過我沒有見到過。

認識馬少華、陸明霞之後，我一直都在期盼陳衛早點出獄，每當從報上看見當局釋放學生的消息，我都要仔細尋找有沒有陳衛的名字。終於有一天，好像是 1991 年 1 月的一天，我從報上看到了陳衛出獄的消息，當時我高興得不得了，馬上就與我的老鄉兼最好的朋友之一吳忠富痛飲了一次。吳忠富是人大法律系八九級的學生，也是從遂寧中學畢業的，但直到他讀了一年之後我們才相互認識，很快我們就成為了最好的朋友。我經常在他面前講我的事情和我的思想，甚至我在那個時候寫的文章也只有他一個人看過。陳衛出來一個月後好多天，我們才放假，回到遂寧後我立即找到了他，讓我感到高興的是，經過一年半的監獄生活，陳衛的精神狀態非常好，我感到他比以前更加成熟了。

在那個寒假裏，我與陳衛經常在一起喝茶聊天，聽他講述監獄裏面的事情。他告訴我說，秦城監獄關了好幾百人，不僅有各個學校的“高自聯”成員，還有許多著名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如劉曉波、陳子明、王軍濤等“黑手”都關在那裏。他說，他與王有才等五六個人關在一個房間，他們經常討論各種問題。他還說，他們在裏面生活還可以，每天都有饅頭吃（實際 90 年 10 月後每天才有一頓吃饅頭），監管人員也不敢惹他們，因為他們很團結，動不動就要搞絕食抗議。他們還經常互相鼓勵，他們甚至驕傲地宣稱他們是“秦

城一期”的畢業生。聽了這些，我不由得對秦城監獄的生活充滿了嚮往，能夠與這麼多民運精英關在一起，在我看來這真的是一種幸福。儘管陳衛獲得了自由，但他也付出了很大的損失，他沒能像馬少華他們那樣被允許繼續在學校讀書，而是被學校勒令退學，因此當我告訴他馬少華他們的情況後，他顯得憤憤不平，決定要回校爭取自己讀書的權利。

春節過後，我與陳衛一起回到了北京，我在學校繼續讀書，他則到北京理工大學去找學校領導理論，同時也與那些出獄之後的難友進行聯繫。我不知道他那個時候住在哪里，他每隔三五天都要到我這裏來一次，只聽說他經常與熊焱在一起。我回到學校後，陳青林又經常來找我，有一次他給我引見了一位朋友，他叫李海，是北大哲學系的研究生，“八九”民運時曾參加北大的“對話團”。李海的年紀比我們大很多，當時大概有三十多歲，因此從外表上看不出他是學生。李海這個人非常樸素，每次見到他時都看見他肩膀上挎著一個黃色的軍用挎包，身上穿得也非常簡單，但他當時身上別有一個傳呼機，這在當時還是比較先進的通訊工具，我對此有些好奇，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傳呼機對他非常重要。陳清林告訴我說，李海在“八九”之後一直在從事與各地民運朋友聯繫的工作，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他已經聯繫上了無數的朋友，包括我已經認識的這些朋友都是他一個一個聯繫上的。李海的這種工作是民運建設的基礎性工作，對整合和壯大民運力量有著特別重要的作用，所以當我知道這些情況後就對李海充滿了敬意。李海還告訴我，由於他長期在全國各地跑動，他的行為已經引起了當局的注意，為此經常受到跟蹤監控。但他反偵察能力很強，他能夠很容易就把“尾巴”甩掉。所以每次我見到李海，都發現他警惕性非常高，有時候甚至讓我感到他有些神秘兮兮。與李海熟悉之後，我把我這一年多受到審查的情況告訴了他，當我說到我寫大字報的事情時，李海批評我的這篇

大字報不夠策略，給當局製造了誣陷我們的藉口。我聽了之後接受了他的批評，我怪自己當初太年輕，不懂政治策略。

後來，李海曾帶我到他家裏去過，他煮了一頓水餃招待我。那個時候，北京的民運朋友還會時不時搞一些聚會，有一次陳青林就準備組織一次聚會。但在組織的過程中，由於有人聽到消息後到處宣揚說某天某地將有一個大型“party”，這在當時北京的政治氣候下還是比較危險的事情，陳青林最後只好放棄。不過沒多久我就跟著李海參加過一次聚會，為了不引起當局的注意，我跟著他繞了幾個圈子，發現沒有被跟蹤之後才到聚會地點。這次聚會有很多人，聽李海介紹他們都是“八九”民運的參與者或組織者，與我一樣都是學生，許多人的名字我已經忘了，我只記得其中一個叫殷紅勝，還有一對好像是戀人，後來聽說他們好像出家信佛了。這次聚會本來是為了給一個朋友過生日，但吃了一會兒飯，大家又聊到了“八九”民運方面的事情。由於我在“八九”民運中沒有參加“高自聯”，與在座各位又不熟悉，因此我根本插不上嘴，只好靜靜地當一個聽眾。我記得李海即興發表了一番演講，博得了大家的熱烈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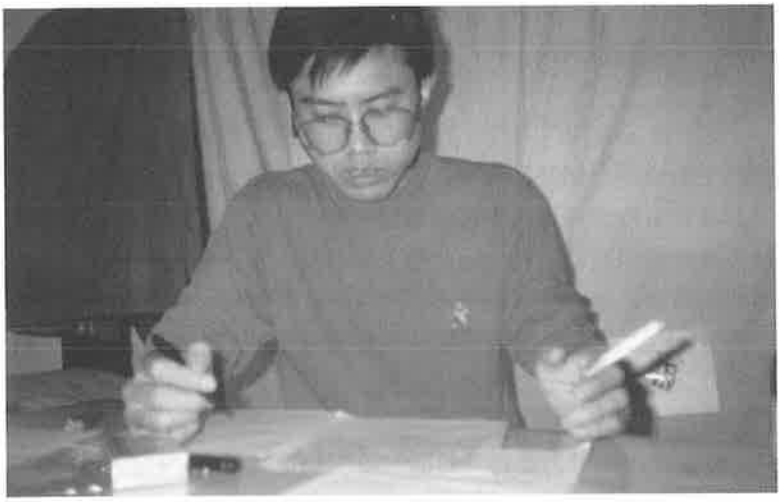
1991 年 4 月的一天，李海神秘地告訴我說當天晚上將有一場重要的會議，問我願不願意去。我立即表示願意去，因為在認識陳青林、李海等人之後，我已經非常自覺地在向他們看齊，我對從事民主運動充滿了興趣，我甚至已經把這當成了我終生的事業，我覺得只有在這項崇高的事業中，我個人的價值才能得到最好的體現。於是那天傍晚，我們吃過晚飯後，李海又經過一番反偵察行動後將我帶到了安定醫院，找到了一個穿白大褂的人。這個人叫康玉春，是北京中醫學院的研究生，當時正在安定醫院上班，他雖然長著一臉絡腮鬍子，但由於他戴著一副眼鏡，因此看起來他仍然顯得文質彬彬。見面寒暄之後，康玉春把我們帶到了他在醫院的一間宿舍裏，

陳青林早已等在那裏。過了一會兒，康玉春又帶進來兩個朋友，年齡都比我們大，不像是學生。果然康玉春給我介紹說，其中一個叫胡石根，是語言學院的老師，另一個叫劉京生，是北京公交公司的一個工人。胡石根的外貌很普通，而且身上有一種很自然的親和力。劉京生當時穿著一雙布鞋，看起來比較精明強幹。又是一番寒暄之後，我們就分別找了一個床鋪坐下，李海首先說了一下這次聚會的目的，原來他們要討論組黨方面的事情。與李海、陳青林交往一段時間了，他們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提到這種事情，後來我想他們可能一直在對我進行考察吧。在當時那種高壓恐怖的政治氣氛下，我完全能夠對他們的謹慎態度予以理解。由於我是第一次參加如此重要的會議，也可以說是第一次近距離接觸當時地下民運的核心人物，所以在整個會議期間我一直鮮有表態，只是默默地聽他們講，但我的腦子卻轉動得飛快，我在仔細捕捉每一個資訊並馬上予以分析處理。

隨著會議議程的進行，我終於聽明白了，原來胡石根、劉京生他們主張成立一個秘密政黨，但李海、康玉春、陳青林表示反對，認為這在當時那種環境下比較冒險。在“八九”民運之前，我本來就曾經有過組黨的衝動，因此聽了胡石根、劉京生他們的意見後我感到很興奮。但由於我與李海、陳青林比較熟悉，而且他們的意見也很有道理，因此輪到我表態時我也表示不贊成組黨。雖然那天晚上在這個問題上雙方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但雙方都同意以後繼續對此進行交流。

後來我才知道，其實當時胡石根與劉京生等人已經成立了一個叫“自由民主黨”的組織，而康玉春、陳青林等人也已經成立了一個叫“中華進步同盟”的組織，只不過“自由民主黨”更加嚴密、正規，而“中華進步同盟”則比較鬆散。而且我還慢慢知道了，王國齊、高玉祥等人也已經加入了“自由民主黨”，而陸明霞、安寧

等人也是“中華進步同盟”的重要骨幹。後來我將這些事情告訴了陳衛，陳衛在坐牢之後顯得要謹慎成熟一些，他也對組黨這件事持反對意見。然而在胡石根等人的努力之下，康玉春、劉京生、陳青林、陸明霞、安寧、陳衛、王天成、趙昕等人最後都加入了“自由民主黨”（編者注：趙昕沒有加入自民黨，但是他與其中許多核心人物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掀起了“八九”民運之後第一波反抗專制、追求民主的高潮。如果我後來不提前出事，毫無疑問我也會成為“自由民主黨”的一員，但中共當局沒有給我這個機會，不久之後他們就把我關進了監獄，讓我直到今天還對沒有進一步參與“自由民主黨”運動而感到惋惜。



寫作中的劉賢斌

我的民運二十年（之四）
走進秦城

1991 年 4 月 15 日也就是胡耀邦逝世兩周年紀念日的上午，我們班唯一的中共黨員、也是學習委員蔡為民通知我下午到學校保衛處去。他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找我了，我以為他們這次找我又是為以前那些事。吃過午飯後，我正準備在床上休息一會兒，突然聽到有人在巷道裏喊蔡為民的名字，這個人的聲音我聽起來很熟悉，好像是保衛處老馬的聲音。我正在納悶老馬為什麼要找蔡為民，我就聽到了敲門的聲音，打開門一看，原來正是老馬。我說蔡為民不在這個屋住，老馬說他就是找我，要我馬上跟他到保衛處去。在去保衛處的路上，老馬錶現出很關心我的樣子，不住地問我學習和生活的情況。雖然以前他也有過如此表現，但我還是感到他這次對我的態度顯得確實太過殷勤。這種不正常的表現引起了我警覺，在路上我一直在琢磨他們到底為什麼找我，最後我以為他們可能注意到了最近我與民運朋友們之間頻繁的交往，這引起了我的警惕。來到保衛處樓下時我頭腦中靈光一閃，說我要去上廁所，老馬猶豫一下之後就同意了，但我在蹲廁所的時候，老馬又跑進來看了我一眼，這一眼讓我心裏咯噔了一下，我預感到可能要出事了。於是我立即把口袋裏的東西清理了一遍，把留有陳青林、李海、康玉春等人聯繫方式的小本子扔進了廁所裏，我怕我出事之後讓員警順藤摸瓜給他們帶來麻煩和危險，然後我就從容地跟著老馬走進了保衛處。

推開門一看，滿屋子都是穿著制服的員警，至少有五六個，果然他們終於對我下手了。他們在出示證件之後就對我的姓名、身份進行了核實，然後宣佈對我予以正式逮捕，並讓我簽字。這畢竟是

我第一次經歷這種場合，我心裏還是有些慌亂，在簽字的時候我的手抖個不停，寫出來的字根本就不像我平時寫的字。接著兩個員警又對我進行了搜身檢查，把我的口袋都翻遍了，只搜出了一些飯票和紙幣等不重要的東西，之後就把我帶上了停在人大保衛處樓後面的一輛吉普車裏。

當汽車開到人大校門口時，我輕輕地在心裏說："別了，人大！"我知道這一離開會有很長時間，也許我從此根本就不可能再回校讀書了。當時我正在讀大學四年級，六月底就應該畢業，我的畢業論文也已經寫好了，但在這即將畢業的最後時刻，他們讓我大學畢業的夢想徹底破滅了。這個政權就是這樣的冷酷，直到這時我才深切感受到了雷鋒所說的"對待敵人要像冬天般嚴酷"這句話的真正含義。離開人大後，車子在城裏飛馳，我沒有心思看周圍的景色，我一直在琢磨他們會把我帶到什麼地方。我希望他們把我關到秦城監獄，我以為秦城還是像陳衛所說的那樣令人嚮往。不知道走了幾條街之後，車子終於停了，我下車後首先就抬頭看這是什麼地方，但我沒有看見"秦城監獄"這幾個字，只看見了"北京市公交分局"的字樣，當時我心裏很是失落，我以為像我這種級別的政治犯根本就進不了秦城監獄。

進了北京市公交分局之後，他們馬上就在一間辦公室裏對我進行了審訊，問的內容還是以前他們曾經問過的那些事情。當時我已經橫下心了，我決定不會告訴他們任何新的事情。所以我只是承認了在"八九"民運中參加遊行、絕食和堵軍車以及張貼大字報和傳單的事情，對於組建政黨的事情始終予以堅決否認。整個審訊持續了好幾個小時，直到天都黑了審訊才結束。之後他們就一直讓我待在這間辦公室裏，我後來就坐在椅子上睡了一覺。第二天他們沒有審問我，我就一直待在這間辦公室裏。在此期間，我曾看見有個員警在過道上審訊一個小偷，他沒有讓這個小偷坐在椅子上回答問

題，而是讓他蹲在地上，在審訊的過程中他還對這個小偷又打又罵，這個小偷只好不停地認錯求饒。我很慶倖他們沒有對我這樣，要是受到這樣的侮辱，我不知道自己會做出怎樣過激的反應。直到這天下午三點多鐘，他們才叫我出去，並將我帶到了一幢陰森森的大樓前，準備把我關進號裏。正當我按他們的要求解下腰帶準備進號時，突然從大門口開進來一輛“桑塔納”小汽車，車上下來一個員警，他好像帶來了什麼新的指示，讓我重新系好腰帶，並讓我坐進車裏。然後他們就帶我離開了北京市公交分局。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北京市公交分局就是北京有名的“炮局”，據說吉鴻昌當年就是在“炮局”被殺害的，還聽人說陳佩斯在“六四”之後也曾經被關進過“炮局”。

離開“炮局”後，車子一直在朝北開，他們沒有告訴我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而我也懶得問他們，因為我這時已經抱著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我已經做好了坐牢的準備。汽車快到昌平縣時，便向右轉上了一條林蔭小道，當車子停下來時，我看見前面不遠處有高牆電網，顯然這裏是一所監獄。我還看見，在高牆下麵的空地上還有許多武警戰士在進行訓練。這兒離監獄門口還有一段距離，但值勤的武警不讓我們開車過去，我們只好下車走過去。走到監獄門口時，我猛然看見大門的上方寫有“秦城監獄”幾個大字。我內心一陣狂喜，我終於被他們送到了我夢寐以求的地方，陳衛他們已經是“秦城一期”的畢業生，看來我也可以做“秦城二期”的畢業生了。辦完登記手續之後，他們就把我帶進了監獄，沒想到這裏的環境真的還不錯，道路兩邊都是參天的大樹，樹上還有喜鵲在嘰嘰喳喳地吵鬧。我早就知道秦城監獄是一個專門關押中共高官的地方，聽說“四人幫”就被關押在這裏。但我沒想到秦城監獄是如此的大，我看見道路兩邊都是一幢一幢的高樓，我根本就無法數清楚，估計至少有幾十幢吧。走了很久我們才終於走進了其中的一幢高

樓，我猜這可能就是我以後要待下去的地方。後來聽號裏面的人說，這幢樓叫 204 樓，聽說江青當時被關押在鄰近的 202 樓。

進入 204 樓之後，他們首先在大樓門口的一間屋子裏辦理我的入獄登記，我看見這間屋子裏擺放著許多腳鐐手銬，每對腳鐐至少有十幾斤。當聽說我是因為參加“八九”民運而進來的時，裏面一個身材高大、長相粗魯的獄警立即對我大聲呵斥道：“真該把你們這些大學生弄到山西去挖煤，免得你們吃飽了瞎折騰！”登記完後，送我來的員警就回去了，我再一次被要求解下腰帶，然後就被一個獄警帶著走進了一條黑乎乎的通道，說要把我關進 7 號倉。這條通道很深，而且還死一般地沉寂。走了幾十米我們就停下了，那個獄警“哐當”一聲打開了通道側面的一扇厚重的木門，原來這是一間關押囚犯的囚室，我看見裏面非常整齊地坐著二十來個光頭囚犯，他們幾乎都戴著腳鐐，臉色都顯得異常的蒼白，他們都直溜溜地盯著我看，讓我感到毛骨悚然。這與我腦子裏所想像的秦城監獄完全是兩回事。看來陳衛以前對秦城監獄的描述真的是太浪漫了，我這時看到的情況才更合乎監獄的情形。木門裏面還有一道沉重的鐵門，打開鐵門讓我進去後，獄警又“哐當”幾聲鎖上了鐵門和木門。

等大門一關上，裏面一個三十來歲、穿得很體面的人凶巴巴地叫我蹲在屋子的一個角落裏，然後問我叫什麼名字，因為什麼事情進來的，當他聽說我是人大學生並且因為參加“八九”民運而被抓時，他說話的語氣明顯變得溫和起來，說：“學生！哎，沒什麼事，幾個月就會放你。”看來他對以前關在這裏的學生領袖比較瞭解，以為我也會和他們一樣，最後得到政府的從寬處理。但我對此已不抱什麼幻想，因為他們在已經放了很多學生領袖的情況下還決定要抓我，已說明了我的問題很嚴重。接下來他又對我說：“這間屋裏關的都是刑事犯，至少都要判十五年以上的徒刑，許多人或許還會被槍斃，你看他們腳上都帶著腳鏈兒，你要注意遵守這裏的規矩。”

然後他就把號裏的規矩簡單給我講了一下，講完後就讓我也與那些刑事犯一樣在牆邊抱膝而坐，用這裏的術語來講就叫做“坐板兒”。直到這時我才開始注意觀察屋裏所有的人，我很納悶為什麼一個專門關政治犯的著名監獄怎麼居然關著這麼多刑事犯。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北京市看守所在進行重新修建，於是北京市公安局就向公安部借了秦城監獄的一幢樓來關押這些未決犯人。這些普通刑事犯對自己能夠有幸關押在秦城監獄非常自豪，我後來經常聽到他們說：“來到秦城監獄坐牢，即使死了也心甘。”

沒多久吃晚飯的時間就到了，外面有人送進來了一桶水煮的大白菜和一盆窩窩頭，然後有人給每個人分了一碗菜和兩個窩窩頭，我自然也分了一份。但看著這麼難吃的飯菜，我就沒有吃，只喝了一碗湯。號裏的人見了也沒人說我什麼，知道我剛進來肯定吃不下去這樣的飯菜。吃完晚飯後，號裏的所有人都自由地從事娛樂活動，有打牌的，有下棋的，也有聚在一起聊天的。由於我是新來的，便沒有人理我，我就只好一個人坐在牆邊仔細觀察他們。我看見剛才向我訓話的那個人這時正舒服地躺在鋪上，有一個犯人正在給他按摩，用號裏的術語來說這叫“拿肌”。當時我看到這種情況，我以為這個人可能不是犯人，而是政府的工作人員，因為他與其他的犯人確實很不一樣，他在號裏確實太特殊和自由了。後來我才知道，其實他也是犯人，只不過他是牢頭，是政府專門安排來維持號裏的秩序的，其正式名稱叫做“學習號”。

大概到了晚上十點鐘左右，一切娛樂活動都停止了，於是大家就從牆邊的“被垛”裏拿出自己的褥子和被子，鋪在木板和水泥地板上，準備睡覺。我剛進來什麼都沒有，學習號就讓我和一個叫郭新民的人睡在一起，我們都睡在水泥地板上。由於房間太小，不到二十個平方的屋子居然關押著二十多個犯人，晚上睡覺就顯得特別擁擠，我和郭新民根本就不能朝同一個方向躺下，我就只好睡在他

的腳那頭，睜開眼睛就可以看見他那亮晃晃的腳鐐。這些人很快就睡著了，我卻一直無法入睡，我倒沒有想案情方面的事，我對他們要如何處理我已經抱著無所謂的態度了，我一直在想我的母親。我母親雖然沒有什麼文化，但卻很明事理，為了培養我們幾兄弟成才，幾十年來她一直辛辛苦苦地勞作，並且對我們嚴加管教，因此我從小就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孩子。當初我考上人民大學時，許多人都向我母親表示祝賀，我記得那是她一輩子最幸福的時刻。但是我現在卻突然成為了一個階下囚，我不知道這會對她造成多大的打擊，我不知道她將如何面對別人的閒言碎語。想著想著，我的眼淚就流了出來，我痛責自己真是一個不孝之子。後來由於這兩天沒睡好覺，我終於在淚眼模糊中沉沉睡去。

半夜的時候，我突然被人弄醒，說是叫我起來值班。原來在這種關押重刑犯的看守所裏，為了防止出現脫逃或自殺事件，號裏面都要安排人值夜班，每晚兩班，每班兩人。與我一起值班的剛好是與我睡在一起的郭新民，我們一直要守到天亮起床的時候。為了打發這難熬的時間，郭新民問我會不會下棋，我說會，於是我們就下起棋來。但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對手，下了幾盤他就覺得沒勁兒了，於是他又向我問起了我的案情，最後我也問了他的案情。原來他是一個小偷，有一次他到賀龍的一個兄弟家裏行竊，被保姆發現了，他居然殘忍地殺害了這個保姆。他說他現在很後悔，他對不起他的母親，說著臉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在這裏我看到了人性的複雜，即使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在他們內心的最深處也仍有一絲良知。聊了一陣之後，我們彼此之間就沒有話了，我只好睜著眼睛再次打量這個陌生的地方和這些陌生的人們。很快我就發現，在白色的牆壁上好像有一些模糊的字跡，仔細辨認才看出了“翟偉民”三個字。原來“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翟偉民也曾關押在這間屋裏，我一下子感到不再孤獨了，我一定要堅強地度過我的“秦城二期”。

我的民運二十年（之五）
審訊室裏的交鋒

到秦城監獄才幾天，北京市公安局就對我進行了正式審問，審問的地方就在 204 樓的一間很簡單的審訊室裏，主審官是一個年紀大約有四十多歲的老員警，書記員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員警。主審官的外貌看起來比較和善，但我很快就看出他是一個對審訊工作很有經驗的人。在問了我的基本情況之後，他就說現在我的案子由他來負責，並說他們很文明，讓我不要害怕。然後他就從頭開始詢問我的事情。於是我又把以前已經對他們說過的情況復述了一遍。他問得很仔細，時間、地點、事情經過都要反復核對。因此連續提審了幾次，他才把我以前已經講過的事情問完。後來有一天他突然問我是否與一個姓楊的同學有來往，我立即知道他是想問我關於組建“中華民族先鋒黨”的事情，對此我十分警覺，我知道這個事情很嚴重，如果我說出來，這個姓楊的朋友一定會與我一樣有牢獄之災。這個姓楊的朋友是人大的一個學生，組建“中華民族先鋒黨”就是由他提出來的。雖然在“八九”民運之後我們之間的關係已經比較疏遠，因為我已經開始信奉自由民主理念，而他仍抱著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不放，但我還是不想連累他。為了保護這個朋友，我就假裝想了半天才說出我有一個高中同學姓楊，叫楊勁松，是西南政法大學的學生，他與我在 1989 年初一起結拜成了兄弟。主審官聽了之後眼睛突然一亮，好像獵狗發現了獵物一樣。於是他就問我有哪些人與我結拜成了兄弟，我就說有歐陽懿、馬烈、孔傑、羅宗傑等人。

當時我認為結拜兄弟算不了什麼事情，他們知道了也沒有多大關系。然而讓我沒想到的是，我的這些兄弟後來卻因為這個事情而受到了不小的牽連。中國員警尤其是政治員警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無中生有地對別人進行構陷。在構陷的過程中，他們從來不管別人的生活和前途會受到多大的影響，只要他們能夠因此而立下大功，他們就會冷酷地對別人進行迫害。這是由中共的本質所決定的，“AB”團、富田事件、延安整風以及中共建政之後的許多政治災難就是這樣產生的。所以當他們聽說我們結拜兄弟這個事情後，他們立即想當然地認為我們這個兄弟會就是“中華民族先鋒黨”，或者至少與“中華民族先鋒黨”有關系。但事實上二者並沒有任何關係，所有的兄弟包括歐陽懿在內都不知道我參與組建“中華民族先鋒黨”的事情。

但是他們不管這些，他們很快就將魔爪伸向了我的這幫年輕的兄弟，使我的這些兄弟們的生活、工作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接下來的近二十天時間他們再也沒有找我，對此我感到很納悶，後來才知道他們到四川找我的這幫兄弟調查去了，同時還對我的四川老家進行了抄查，他們妄想從中挖出一個特大反革命集團案。由於歐陽懿與我關係最密切，他們已經知道我和他一起在遂寧張貼過大字報，因此最先受到衝擊的就是歐陽懿，他被關進了遂寧市公安局的靈泉寺看守所，一直被關押了三個月。除他之外，其他兄弟也被專案組的人找去問過話，馬烈被關押了一天。據馬烈後來回憶，專案組的人主要問他是否和我一起搞過什麼組織，還問他是否與我商量過上山搞遊擊的事情，馬烈當然予以堅決的否認。關於上山搞遊擊的事情，我記得我從來沒有產生過這種想法，也從來沒有與其他人談過這種事情，我估計他們是在搞訛詐，他們想以此嚇倒我的這些年輕的兄弟，但事實上我的這幫兄弟中一個也沒有被嚇到，由北京市、四川省和遂寧市公安局組成的聯合專案組沒有從我的這幫兄弟中

挖出對我不利的任何實質性的東西，專案組臨走時甚至還公開對馬烈說："你們遂寧這幫兄弟真了不起！"直到今天我們這幫兄弟還維持著牢不可破的友誼，這讓我深感自豪，當然也讓那些一心想迫害和拆散我們的政治員警始料不及。

但是我還是沒有想到，在這次變故當中，馬烈的父親馬述亮也受到了我的牽連。1988 年，當我對中共的統治合法性產生懷疑的時候，我曾經給我的許多同學在信中談到過我的思想，有一次我給馬烈在信中也表露了我對當今中國社會的不滿情緒。馬烈的父親看了這封信之後，就給我寫了一封回信，大概意思就是批評我們這幫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馬烈的父親是遂寧市教委的一個科長，作為一個長輩，他經歷了很多政治運動，深知中共的政治運動的殘酷性，因此他很為我們擔心。馬叔叔的回信我一直保存著，因此當我出事之後，他們就從我的宿舍裏抄走了這封信，並據此將馬叔叔當成了我們這幫兄弟的幕後黑手，從而將馬叔叔關押了半個月。他們以為我們這批年輕的大學生思想不可能有這麼反動和激進，一定有"長鬍子"的人在我們背後指使，然而事實上馬叔叔確實從來沒有鼓動過我們反抗現實，甚至從來沒有與我們交談政治方面的事情。莫須有的罪名無法成立，他們只好釋放了馬叔叔，但從此之後他就在單位裏受到排擠，在當局的眼中他已經是一個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了。2005 年，馬叔叔去世了，我當時還在川東監獄服刑，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感到很難過，因此在 2008 年我出獄的當天，我就與馬烈一起來到他的墓前，獻上了我遲到的祭奠。

從四川回來後，他們並沒有善罷甘休，而是對我實施密集的審訊，一連二十多天，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我都要被他們帶到審訊室接受他們的審訊。這種疲勞戰術是他們的一種常規戰術，它會讓被審問者的精神高度緊張，直至最後崩潰。許多人都經受不起這種戰術的折騰，最後往往把事情和盤托出或者完全按照辦案人員的認

定承認自己的罪行，這樣他們才能從這種沒玩沒了的審訊中得到解脫。所以這種疲勞戰術實際上是對被審問者基本人權的嚴重侵犯，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刑訊逼供。後來我在川東監獄服刑時曾經與許多腐敗官員關在一起，他們告訴我說他們最害怕“雙規”，因為“雙規”中的疲勞審訊會把一個人完全逼瘋。原四川省交通廳長劉中山就曾經告訴我說，他的案子是一個冤案，他本來沒有接受對方給他的大筆賄款，但由於他經受不起“雙規”中的沒玩沒了的疲勞審訊，最後他就豁出去了，乾脆承認了辦案人員強加的犯罪事實。後來他被判處了死緩，他對此很後悔，因此在監獄裏他一直都在進行申訴。我看了他的一些材料，感覺他的案子確實是一個冤案，而且國內法學界許多專家也認為這是一個冤案。然而讓我驕傲的是，我雖然是第一次進監獄，第一次經受這種疲勞戰術的折磨，我最後還是終於挺過來了，他們的疲勞戰術在我面前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本來在開始應對他們的審訊時，出於自衛的本能我不自覺地採用了他們所說的“擠牙膏”的戰術，即首先摸清他們的意圖和所掌握的情況，然後再一點一點地交代事情，他們如果不主動提到別的事情，自己就不要在回答過程中去提到別的事情。當那次遂寧公安局來找我瞭解與歐陽懿貼傳單的事情時，我就採用了這種戰術，居然讓我最後蒙混過關。據我瞭解，許多人在面對員警的詢問時，通常都會表現出很配合的樣子，對最後的結果都抱有某種幻想，有時為了隱瞞某種情況，他們就會在員警面前編瞎話，然而這樣的瞎話根本就騙不了員警，他們很快就會通過調查或者推理，掌握很多你本來沒有告訴他的事情。例如當他們問我姓楊的朋友的事情時，我就假裝提到了我在遂寧的那幫兄弟，但這卻給我的兄弟們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因此在面對員警的詢問時，編瞎話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而且我最早採用的那種“擠牙膏”的戰術也沒有多大的效果，

他們通過沒玩沒了的疲勞審訊，最後總是能夠把你口中的牙膏擠完。

幸虧我被抓捕之後，他們沒有及時對我採用疲勞審訊的戰術，在他們去四川的這二十天裏，我利用這一大段空閒時間對自己的案情和麵對審訊的防守策略進行了仔細的分析和冷靜的思考，我不僅徹底擺脫了剛進來時的那種慌亂情緒，而且對他們的仁慈和寬大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為了保護朋友和減輕自己的法律責任，我決定要死扛到底，決定從此之後不再告訴他們任何實質性的東西。即使完全失去繼續讀書的機會，即使被他們判幾年徒刑，我也絕不會出賣任何朋友。我不會再在他們面前編瞎話，也不會再玩弄“擠牙膏”的小把戲，而是決定不開口，聽憑他們最後對我的處置。下了這個決心之後，我的心態反而穩定下來了，我對最壞的結果都做好了心理準備。

因此，當他們從四川回來再對我採用疲勞戰術時就已經晚了，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天的連續審問中，他們沒有從我嘴裏得到任何實質性的東西。只要他們一問到涉及朋友的事情，我就直接告訴他們說我不想回答這方面的問題，因為我不想給朋友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如果他們問“中華民族先鋒黨”方面的事情，我則始終回答說：這只是我頭腦中的一個想法，並沒有付諸實施。而如果他們問我的思想，我則不再做任何隱瞞，我會在他們面前侃侃而談，有時甚至可以談幾天。我知道，在當今中國社會，一個人的思想無論多麼反動，當局也不可能據此對我定罪。由於在“八九”民運失敗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裏，我每天堅持在人大圖書館看書、思考和寫作，我的理論水準不知不覺有了很大長進，我不僅可以在他們面前大談民主自由，而且可以大肆抨擊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各種問題，我發覺在這方面他們根本就不是我的對手。由於這些思想不管多麼反動，他們都無法據此對我定罪，因此他們也懶得進行記錄。所以每次審

訊完後他們讓我簽字按手印時，我看見他們的記錄都很簡單，同樣的問話，同樣的答復，沒有任何新的內容。看見他們拿我沒有辦法，我心裏感到暗自高興，我終於發現了對付他們的最有效辦法，那就是避實就虛或者乾脆拒絕回答他們的任何問題。

由於我的案情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他們便試圖改變對我的審問方式，準備對我採取威嚇手段。有一天，主審官帶了一個長相兇狠、年紀大約三十多歲的員警進來，當看見我的態度依然頑固時，這個人就對我勃然大怒，居然在我面前吐出了髒字，並說要對我加重處罰。然而對他的兇狠表現我一點也不感到害怕，我只是平靜地告訴他說："你的素質太低了，我不願和你這種人說話。"此後不管他說什麼，我都拒絕回答，他氣得一點辦法也沒有。第二天，這個人就沒有來了，還是那個脾氣溫和的主審官慢慢地來找我磨。當他們的軟硬兼施都在我面前失效之後，他們又對我採取了利誘的辦法。有一天，一個姓胡的管教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裏，先問了我在監獄裏的生活情況，對我顯示出非常關心的樣子，然後又說他以前管過蒯大富、王丹等人，說他們都沒有我這麼頑固，最後他說識時務者為俊傑，勸我改變現在這種態度，主動向政府交代問題，只要認識態度良好，有可能他們會讓我回校繼續讀書。然而我還是拒絕了他的意見，我知道如果我改變態度、企圖得到他們的寬大處理，那我就可能在他們的引誘下一步步掉進他們的圈套，這樣不僅害了朋友，而且也會害了自己。後來胡管教還找過我兩次，都是勸我向當局認錯，我都明確予以拒絕。

在種種手段使盡之後，他們最後只好對我進行結案，在 1991 年 10 月將我的案子移交到了檢察院。讓我沒想到的是，檢察院的人來提審我時，再也沒有問我朋友和"中華民族先鋒黨"的事情了，只對我寫"反思中共歷史"的大字報一事進行了詢問。最後到 1992 年底，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就根據這個事實以"反革命宣傳煽

動罪”判了我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得到這樣的處理結果，我感到很滿意，我終於在第一次面對當局的政治迫害中取得了勝利，我終於以不大的代價換來了朋友們的平安。在秦城監獄時，我常常聽到號裏的人說：“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還說：“軟硬兼施我都不怕，就怕你用美人計，如果你用美人計，那我就來個將計就計。”又說：“槍斃你是為你好，免得你再犯錯誤。”雖然這些話不是正兒八經的大道理，但確實是他們許多年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也充分說明了共產黨的監獄從來都是處罰人而不是挽救人的殘酷本質。後來我果然在裏面碰到了一個因“坦白從寬”而將“牢底坐穿”的罪犯，他最早是因為盜竊財物被抓的，但後來在員警的誘供下，他最後交代出了自己以前強姦、搶劫、盜墓的事情，本來他因為那次盜竊最多只判幾年刑，但最後他卻可能會被判處死刑，號裏的人對他這種害人害己的行為非常鄙視，因此他一直都在號裏混不起來。而我卻因自己的堅強表現贏得了號裏人的普遍尊敬，我很快就混到了“二板”吃飯，即混到了牢頭之下、“鼠妹”之上的中間水準。

看來監獄也是一個鍛煉人的地方，學會應付員警的審訊也是一門學問。通過這二十多天在審訊室裏的交鋒較量，我已經掌握了對付他們的有效辦法，這也許應當是“秦城大學”的一門必修課吧。這個經歷對我後來從事公開的民運活動並經常直接與員警打交道大有裨益，每當面對他們的審訊時，我都會採用避實就虛的策略，不告訴他們任何實質性的東西。雖然當時我還不知道法律上有“沉默權”之說，但在當時我卻已經不自覺地在運用這個權利。1999 年我再次入獄後又在他們面前祭出了這個法寶，不管他們是問我的事情，還是問其他朋友的事情，我都明確告訴他們我拒絕回答。他們有時候為了引誘我開口，就會說：“你不說沒有關係，但你的朋友會告訴我們的。”遇到這種情況我就會說：“別人怎麼說我不管，

但我肯定不會告訴你們任何東西。你們掌握了什麼證據，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吧。”對此他們會一點辦法也沒有。所以在從事民主運動中，如果我們必須面對員警的審訊，我們首先就不要抱任何幻想，我們要在他們面前表現出無畏的勇氣，我們一定要在氣勢上壓制住對手，對於他們的任何提問，我們都可以行使我們的沉默權，拒絕回答他們的任何問題，這是我在“秦城大學”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

劉賢斌和女兒玩跷跷板

我的民運二十年（之六）
秦城監獄的生活圖景

秦城監獄是中國最著名的監獄，但它卻遠非陳衛以前所描繪的那樣浪漫，二十年來我曾被當局關押進過許多地方，在我看來，秦城監獄的生活是最艱苦的。

秦城監獄是五十年代蘇聯援助修建的，因此它的建築完全是蘇式建築，高大威猛且十分堅固，讓人自然產生敬畏、壓抑和絕望的情緒。就拿它的牆來說吧，竟然厚達八十公分，據說牆中還有很多鋼條。每個監舍的鐵門也十分厚重，每根鋼條的直徑至少有三公分寬，何況鐵門外面還有一道厚重而結實的木門。一個人被關進這樣的一個屋子裏，他很快就會安靜踏實下來，他將再也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即使是最大膽狡猾的囚犯也會自動放棄逃跑的念頭。這是一個真正沒有任何自由的地方，甚至連牆上的兩個窗戶也與我們平常所見的窗戶設計得完全不一樣，它不能平推著打開，而只能從上往下打開四十五度，除了一小片天空，我們根本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就像宋徽宗、宋欽宗被金國人關在井裏一樣。每個監舍大概有二十個平方，完全合乎伏契克所說的“從門到窗戶是七步，從窗戶到門也是七步”的標準。但是伏契克是一個人被關進這樣的一個房間，而秦城監獄的每個監舍卻竟然關押著二十多個囚犯，所以我們連伏契克那種可以在房間散步的自由也沒有了。難怪有個牢頭沒事的時候就會大聲吼道：“讓人進出的門緊鎖著，讓狗爬出的洞敞開著，爬出來吧，給爾自由！”

不過，雖然秦城監獄是五十年代修建的老建築，但是每個監舍

都有一個廁所，不像有些監獄到了晚上只有使用馬桶。廁所的牆壁上和監舍的木門一樣都有一個“貓眼”，管教幹部可以通過它看到號裏的所有情況。到了夏天，由於監舍太小且空氣不夠流暢，廁所的濕氣會讓監舍的牆壁變得很潮濕，一滴滴水珠在牆上清晰可見，許多人都會因此而患上各種皮膚病，最常見的是患上疥瘡。所以每當那個叫劉阿姨的女醫生來給我們看病時，大家都會找她要治療疥瘡的藥品。但是在冬天，這裏面卻很暖和，因為每個監舍都安有暖氣管。監舍的房頂上安有一盞電燈，不管白天還是黑夜它都一直亮著，所以叫做“長明燈”。監舍的四周是白色的牆壁，下麵是水泥地板，地板上有一個十公分高、半個監舍大的木板床鋪，上面可以擠著睡十個人左右，每到白天，所有的被褥都必須收拾在一起，做成一個“被垛”，然後大家就直接靠牆坐在木板上，一坐就是半天。監舍門邊還有一個較小的床鋪，可以睡三至四人，一般都是被牢頭所占，牢頭們可以不“坐板”，白天他們一般都在小鋪上面打牌、下棋或聊天。剩下的人只能睡地鋪，通常都是那些剛進來的新犯和那些一直混不起來的“鼠妹”。

所以在監舍裏面，囚犯的等級秩序非常嚴格，牢頭們掌控者號裏的絕對權力，他們可以讓一個人從“鼠妹”混到“二板”，也可以把一個人隨時打回“鼠妹”。牢頭他們俗稱“扭爺”，混得差的就被稱作“鼠妹”，這兩個詞簡直讓人遐想不已。我剛進去的時候也是“鼠妹”，吃飯在第三板，睡覺在地鋪，只不過由於我是一個大學生，他們才沒有安排我去打掃廁所，而是讓我抹地板。牢頭們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會經常對“鼠妹”辱罵毆打，而且基本上每個剛進來的新犯都要受到毆打，這就像《水滸》裏面所描寫的武松在發配中遇到的“殺威棒”一樣。但是我剛進去的時候卻沒有挨打，也許是他們覺得我是一個大學生，社會惡習比較少的緣故吧。但是有一次我結束審訊回來站在門口等幹部開門時，我好奇地透過

“貓眼”看了一下號裏，這個行為被來開門的幹部看見了，於是他就對號裏的人說：“這個人不懂事，給我管教一下。”牢頭們當然聽懂了他的意思，等門一關上，幾個牢頭就撲上來給我一頓暴捶，還有一個人扇了我一個嘴巴。我被打得暈頭轉向，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極大的侮辱，因為我長到二十三歲，只有我的父母打過我。看見我很委屈的樣子，學習號就把我叫過去，好言進行開導。不過我在秦城監獄時只挨過這麼一次打，我這個人適應能力很強，平常不多言語多餘，而且在他們面前表現得不卑不亢，因此牢頭們對我也比較尊重。再加上我在提審過程中的堅強表現，他們對我就慢慢好起來了，只過了不到一個月時間我就混到了“二板”。

牢頭現象是中國監獄裏面的一個普遍現象，由於政府幹部不能直接對號裏的囚犯進行管理，他們通常就會從犯人中選一個比較得力的人當學習號，這個學習號自然就是牢頭。學習號為了保證號裏秩序的穩定，僅憑一個人的力量也不夠，他還會找幾個幫手，少則三四人，多則五六人，他們在各方面都很特殊，不僅經常克扣其他囚犯的飯菜和東西，而且還經常對其他囚犯進行打罵。如果有人“扎針”即向政府幹部反映號裏的黑暗現象，政府幹部一般都會偏向牢頭。因此在中國的監獄裏尤其是在看守所裏，“躲貓貓”的現象非常嚴重，經常會出現把人打死打傷的事情。

1992 年當我們全部回到“半步橋”看守所時，我曾經也當過幾個月的學習號，並試圖改變這種依靠暴力來進行管理的老辦法，但是這很難，原因在於有些囚犯的社會惡習很深，他們還就服暴力這一套。不過我還是儘量不採用暴力這種方式，一般都是通過疾言厲色來進行嚇唬，幾個月裏號裏只出現了一次打人的現象，而“躲貓貓”和“殺威棒”這些程式都被我廢除了，所以協助我的牢頭們對我的心慈手軟很有意見。在我管號的時候，我也不允許克扣其他囚犯的飯菜和東西，當然當時的生活條件也有了巨大的改善，家裏已

經可以給我們寄錢來，然後我們可以用錢買到許多東西。所以說物質的匱乏是牢頭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難怪古人會說“倉廩實而知禮節”，仁政必須建立在物質生活改善的基礎上。後來我們號裏又進來一個經濟犯，他叫崔曉初，家裏很有錢，每個星期我們都要找管教幫我們在外面買許多菜進來，然後分給大家吃。所以在我滿刑前，我就推薦崔曉初接替我當學習號。管教幹部很欣賞我的管理方式，就同意了我的意見，這也是以前沒有出現過的事情。

但是秦城監獄的生活條件實在太差，所以牢頭現象特別嚴重。在秦城監獄，我們的飲食非常糟糕，每天的早餐都是一人一個窩窩頭和一碗玉米粥，同時還能分到幾顆鹹菜，午餐和晚餐都是一人兩個窩窩頭和一碗湯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大白菜和西葫蘆。只有星期一、三、五的中午每人有兩個饅頭，因此雖然每天的日子都是一成不變的老樣子，但是每個人都對這天是星期幾記得很清楚，因為大家成天都在盼著吃饅頭。不過有些懂事的“鼠妹”們會把那天的饅頭“孝敬”給牢頭，而甘願吃那些“扭爺”們不吃的窩窩頭，這樣牢頭們以後就會對他好些，否則如果不懂事的話，他不僅很難擺脫“鼠妹”的等級，而且還容易受到牢頭們的辱罵毆打。在秦城監獄裏，“改善”即吃肉是很少的，一般情況是一個月吃一次，有時候要三個月才能吃一次，除此之外就要遇到國慶、春節、五一才能吃上肉，因此所有的人都很饞。遇到“改善”，牢頭們首先會把菜裏的肉先挑出來，大部分歸他們所有，“二板”的能分到幾塊肉，而“鼠妹”們則只能喝點有油的菜湯。平常時候，如果菜湯裏面有油，牢頭們也會首先把油撇出來，供自己拌窩窩頭吃，其他人連油水都沾不到。

1991 年 6 月 4 日，為了紀念“六四”死難者，我決定在號裏進行絕食，牢頭們知道後對我非常佩服，就主動卷了一支煙給我抽。要知道在秦城監獄裏，最珍貴的東西就是香煙，因為按照秦城監獄

的規定，香煙是一種違禁物品。由於每天的生活太過枯燥，所有的人都想抽一口煙來減輕自己的精神壓力，如果號裏面連續幾天斷了煙，牢頭們就會表現得煩躁不安。因此牢頭們除了維持號裏的正常秩序以外，成天琢磨的就是怎樣弄到香煙。一般情況下，香煙主要來源於管教幹部，這需要牢頭與管教幹部處好關係。這些管教幹部也很懂囚犯們的心理，雖然他們明令禁止號裏面抽煙，但為了籠絡牢頭以讓他們維持號裏的正常秩序，他們也會時不時地偷偷給牢頭們幾支香煙。有時候，牢頭們還會用號裏的東西從管教幹部那裏換煙，有一次我就親眼看見牢頭們用一件名貴的衣服從管教幹部那裏換來了三支煙。還有一次，我們號裏進來了一個處級幹部，他帶進來了一根金項鏈，牢頭們高興壞了，立即就把這根金項鏈送給了一個幹部，這讓號裏很長時間都沒有斷煙。另外，如果牢頭們與管教幹部關係到位，有時候管教幹部就會讓他們出去幹一些打掃衛生之類的事情，回來的時候他們一般都會帶點煙進來。一個號裏如果每天都有人能夠出去幫管教幹部幹事情，那麼這個號裏的香煙來源基本上就得到了保障。

在秦城監獄的時候，每個月家裏人可以給我們送一次東西，有些有經驗的家人就會在送來的被子或者褥子裏藏有煙絲，只要得到這麼一床煙被子或者煙褥子，號裏面的人就可以保障幾個月不斷煙，因此這也是香煙的一個主要來源。當然“斷糧”的情況也是經常會有的，這時牢頭們就會想法從其他號里弄煙進來，他們會找別的號裏借衛生紙之類的東西，借來的衛生紙裏面自然就會藏有香煙，下一次別的號裏沒有煙了又會從我們這兒借東西，大家一起相互周濟著過日子。最壞的情況就是鄰近幾個號裏都沒有煙抽了，這時牢頭們就會安排那些出去接受審訊的人弄點煙進來，每個人在這方面也很自覺，接受審訊的時候一般都會找審訊人員要煙，抽了幾口就馬上掐滅，然後就偷偷地藏在身上帶回來。在來去的路上，如

果看見地上有“螞蚱”即煙屁股，也會迅速地撿起來帶回號裏。不管是誰，只要能夠把香煙帶進來，那麼他就是號裏的功臣，甚至一個新犯如果在剛進來時帶有香煙，牢頭們就會在高興之餘免去“殺威棒”這樣的程式。

然而在秦城監獄時，每隔幾個月監獄就要進行一次徹底的清監，主要就是清繳香煙等違禁物品。一般情況下，在清監之前，主管幹部會提前將清監的消息告訴號裏的牢頭，於是牢頭們就會提前把煙藏起來，有時是藏在被褥裏，有時是用塑膠口袋把煙包起來，然後藏在便池裏。如果在清監的過程中被查出了香煙等違禁物品，那些清監的幹部就會問是誰藏的，一旦落實到某個人的頭上，這個人就會受到這些清監的幹部的一頓暴捶。事後主管幹部還會煞有介事地對牢頭們大發脾氣，說你們是怎麼搞的，盡給我添麻煩。由於香煙在裏面太珍貴，幾乎沒有人整只整只地抽煙，而是將一支煙分成三至四截，然後用報紙將每截卷成“蛐蛐兒”，一支“蛐蛐兒”可以夠三至四個人抽，因此一支香煙可以讓十個人左右吸上幾口。而且每天抽煙的次數也有規律，一般是吃飯後、睡覺前、半上午和半下午吸一次，所以只要每天號裏有幾支煙，就可以讓大家非常愉快地過一天。後來在半步橋時，崔曉初每週給送飯的犯人一百塊錢，保證每天送進來一包五毛錢的“天壇”牌香煙，這是我們號裏香煙供應最穩定的一段時期，幾乎號裏每個人每天都能吸上煙。有一次，有個新犯帶進來一包“萬寶路”，我們奢侈了一回，沒有卷成“蛐蛐兒”，而是抽的整只煙，結果許多人只吸了兩口，腦袋就暈忽忽的站不起來了。號裏面一直沒有打火機和火柴，但是這難不倒我們，只要從被子裏面扯一點棉花，然後再撒上一點洗衣粉，接下來把這些棉花卷成一根棍，再用布鞋的硬底子在水泥地板上使勁地搓一會兒，很快棉花棍的中間就會燃燒起來。

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其他時間幾乎都在“坐板”。“坐板”

是政府的要求，目的是要大家對自己的罪行進行反省，但實際上這是對囚犯的一種變相的體罰。“坐板”的時候，每個人都要把雙腿併攏，雙手要抱在膝上，坐上幾個小時，屁股就會酸痛難忍，但時間長了就會慢慢習慣。“坐板”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它逼得每個人不得不回憶和反思自己過去的所有事情。我剛進去的時候沒有書看，號裏面只有一本破舊的《新華字典》，於是我在“坐板”的時候就把它放在兩腿之間，一個字一個字地慢慢翻看，牢頭們知道我是一個有文化的人，他們並沒有阻止我的這種行為。結果我後來用了幾個月時間，竟然把一本《新華字典》從頭到尾地看了一遍。所以直到現在，我的妻子作為一個中學語文教師還要經常向我請教不認識的生僻字詞。但是許多人由於無事可做，每天在“坐板”的時候就只好不停地用牙膏皮製成的夾子拔鬍鬚，或者聽牢頭們聊天。後來我當了學習號之後，為了減輕他們“坐板”的痛苦，我就允許他們在“坐板”的時候不必再抱腿，只要求他們在幹部開門時才抱腿坐好。同時我還經常給他們講歷史故事，甚至我還用了幾天時間講我在“八九”民運中的經歷。他們很喜歡聽我講這些，從來沒有人向幹部反映我在號裏散佈反動言論。

除了這些枯燥乏味的生活之外，唯一讓大家感到高興的事情就是放風。秦城監獄的監舍沒有配設風圈，風圈在大樓的外面單獨設置。為了保證監管安全，政府很少對我們放風，一般要幾個月才能出去放一次風。在風圈裏，大家會把衣服解開，讓太陽曬曬皮膚。由於成年累月曬不到太陽，每個人的皮膚都顯得非常蒼白。在號裏的時候，大家每天都一直坐著圈著，難得舒展一下身體，因此到了風圈裏，每個人都會不停地快速走動，走累了之後就觀看藍天白雲和周圍的景色或者與鄰近號裏的熟人大聲地打著招呼。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的收審制度還沒有取消，許多案子都要拖很長時間才能結案，因此很多人常常幾個月出不了監舍的大門，有的人甚至

一年多時間都沒有人理會他，所以放風對他們來說簡直就像過節一樣。

秦城監獄的名氣確實很大，但從剝奪人的自由、尊嚴和損害人的身體健康來說，它也是最黑暗的一個地方。儘管陳衛曾經把秦城監獄的生活描繪的很浪漫（這也許是他們當時全部關押的都是參加八九民運的學生和知識份子吧，而且他們每個號都只關幾個人，有的甚至只有一兩個人），但是當我後來到過其他監獄之後，我才發現秦城監獄才是環境最惡劣的地方。正是因為我第一次坐牢就來到了秦城監獄並經歷了種種磨難，後來我到其他監管場所時，我才覺得失去自由的生活並不是特別可怕。

我的民運二十年（之七）
秦城監獄的政治犯難友

我剛到秦城監獄的時候，號裏的人說當時王丹還在秦城，這讓我感到很興奮。我覺得能夠與王丹一起在秦城監獄服刑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不過後來陳子明和我談到此事時說，他和王軍濤、王丹、包遵信、劉剛等人是“八九”政治犯中最後離開秦城監獄的幾個人，他們在 1991 年 4 月初就離開了秦城監獄而轉到北京市第一監獄服刑，而我是在 4 月 16 日到的秦城，所以我與他們是失之交臂。

因此，在很長時間裏，我一直都比較孤獨，周圍都是刑事犯，幾乎沒有可以交談的朋友。只是有時候，號裏的一些老犯會說到他們以前與“八九”民運領袖關押在一起的一些情況，例如我碰到的第一個“學習號”就說到他曾經與翟偉民、郭海峰等人關押在一起，對此我就會饒有興趣地仔細聽他講。只有在這個時候，我才會想到自己是一個與周圍人們不一樣的政治犯，我才會勉勵自己要堅定信念，要有尊嚴地在秦城監獄生活下去。

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將近一年，直到 1992 年我才聽說又進來了幾個與我一樣的政治犯。在秦城監獄裏，有些牢頭主要是“學習號”會經常被管教幹部安排出去幹活，他們甚至有時候還可以在許多號之間竄來竄去，因此他們就可以帶進來許多新鮮的資訊。有一天我們號的“學習號”幹活回來，興高采烈地向我宣佈，說 13 號進來了一個政治犯，他叫王勝利，好像也是人民大學的學生，聽說他們搞了個叫“人民黨”的組織，每個人都分配了諸如農業部長、外交

部長之類的職務；還說王勝利他們早已被當局盯上了，因此當他們最後一次在北大未名湖邊開會討論黨章的時候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一網打盡了。我聽了之後深感遺憾，我知道在“八九”民運之後的高壓恐怖統治下，許多有良心和有勇氣的人為了反抗專制統治，總會設法建立秘密組織，這樣的組織只要經常開展活動，最後都難免會被當局偵破。因此看見王勝利他們因為搞組織而被關進監獄，我不由得為胡石根、李海、康玉春他們擔心起來，我生怕他們因為行事不夠謹慎而受到當局的殘酷鎮壓。我的這種擔心很快就變成了現實，在王勝利進來之後不久，胡石根、康玉春他們果然就出事了。

大概在 1992 年“六四”前後，有一天我們的“學習號”又在外面幹活回來，他又向我透露說進來了一批政治犯，其中關進 9 號的那個人姓康，滿臉絡腮鬍子，並且與我認識。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迅速地沉了下去，我知道這個人一定是安定醫院的康玉春，他當時與胡石根、李海、陳清林、劉京生等人是“八九”之後北京敢於繼續從事民主運動的少數勇士，他們是“八九”之後國內民運最重要的一股抗爭力量。

沒幾天我又聽說胡石根也與康玉春一起進來了，胡石根被關在 6 號，與我們 7 號相鄰，而且都在拐角位置，於是我就在窗戶上朝 6 號大聲地喊胡石根的名字，胡石根很快就做出了回應，我們互相問好並互相鼓勵。但胡石根剛進來，他的喊話就受到了號裏人的制止，我不可能從他那裏瞭解到更多的情況。在秦城監獄裏，由於夏天監舍裏面非常潮濕，因此每個星期管教幹部就要安排每個號的牢頭出去晾曬衣服，為了省事，通常都是幾個號的人同時出去，這也成了各個號交流資訊的一個機會。有一天，他們晾曬衣服回來，我看見了康玉春從我們號的門口走過，我們雖然沒有來得及打招呼，但我們的眼神已經表達了一切。後來有一次我也出去晾曬衣服，終於碰見了康玉春，他才告訴我說他們這次進來了十幾個人，包括我

認識的劉京生、陳青林、陳衛、王國齊、高玉祥等人。他還告訴我說，在“六四”之前他們從境外弄進來一架遙控小飛機，準備在“六四”那天用這架遙控小飛機在天安門廣場上空撒傳單。但是在5月底他們的行動就被當局偵破，抓他的那天他正在前往語言學院去學日語，結果在半路上就被員警用一只口袋蒙了起來塞進車裏。

胡石根等的被抓使我非常難過，國內當時最大的地下民間政治勢力被打壓對中國民主運動帶來的損失簡直難以估量。雖然中國從不缺乏有有志者，但是何時才能又培育出一批力量出來我簡直無法預測。

應該說我在裏面待遇還是可以的。因為我的案子只有我一個人，我的同學孔傑、楊么、歐陽懿、馬烈等雖然受到牽連，但是由於之前的串通，大家都不承認所做的事情是經過商量和合作做出的，他們在被當地關押數量不等的時間後就都被釋放了，而且還分配了工作。雖然他們的工作分配明顯的受到歧視，在以後的多年時間裏遭受了比別人更多的苦難，但畢竟沒有被宣佈為罪犯。我也從不欺淩別人，在我看來人人平等是不證自明的公理，所以我在號子裏還是有一些人緣的。我們的管教甚至在一段時間讓我當“學習號”，協助他管理該號。在物資特別匱乏的時候，“學習號”具有很大的權力，因為他和其他牢頭可以享用從菜桶表面舀出的浮油，而其他犯人則只能吃一點油珠都沒有的水煮菜。為此，在看守所裏每個房間都分成幾板吃飯，也就是說等級森嚴。

我當上了“學習號”後，就要改變這種克扣的潛規則，每個人的飯菜都一樣。結果實行下去問題頗多，先不說這點油分攤下去基本每個人都像沒有油腥，而這一潛規則被打破也讓號內秩序無法維繫。所以我最後只有停止了這一短暫的革新。將重點放在不要讓老犯隨意打罵和欺負新進來的人上面。看來條件太差才是滋生牢頭獄霸的根本因素呀。

91 年的中秋節這天，我們被從秦城監獄轉到已經修好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我們之所以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是因為“北看”在重修。這個呈 K 字型的看守所大名鼎鼎，關押過許多著名的犯人，也在許多回憶文章裏以“K 字樓”出現過。這一天是傳統節日，街上人比較少，也便於實施這場大轉移。我們沒有吃晚飯，因為廚房等都撤掉了。每個人背著自己的東西。一路上都有員警戒嚴，我們每輛車內也有荷槍實彈的武警。我們被要求不得交談，不得將頭抬起來。氣氛相當緊張。近 12 點我們才來到新修的看守所，對於許多犯人來說這場轉移是非常值得的，因為我們每個人得到兩個劣質月餅以及兩包速食麵，既作為晚飯也是過節的禮物。

91 年底，看守所進行了一場革命，允許我們花錢買東西了。日用品和速食麵、奶粉，大致就是這些，還有對於我這個四川人非常重要的郫縣豆瓣。看守所賣的東西並不都比市面上的價格高，不過日用品等都是價格昂貴者，香皂都是舒膚佳，速食麵都是最貴的品牌，好像是一品速食麵。每個人每月只許家裏寄 50 元。不過跟管教關係好的、家裏有錢者例外。

有了速食麵和奶粉，許多人可以吃飽了，牢頭獄霸也失去了動力。轉眼就是春節了，這期間發生了一起我唯一經歷的越獄事件。由於春節期間按以前的慣例，員警將會放假，所以一些死刑犯就打起了越獄的主意。我們號旁邊一個號裏有一個外號叫“東北虎”的犯人，身上背有幾條人命，肯定會判死刑。於是他就在號子裏稱王稱霸，聯合了幾個同樣會被判死刑的人，進行準備。他們將金屬窗條取下，磨成鋒利的刀子，將牙刷也磨尖，成為他們的武器。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裏，他們的行動不可能完全隱瞞得了其他人。但是其他人不可能出門報告，如有人表現出要告密，馬上就會有被滅口的危險。

因此“東北虎”等六人就準備在大年初一時殺死看守，挾持員

警，打開牢門進行越獄。但是這次發生了一個意外，就是他們號子裏有一個我曾經提到的王勝利，他非常機智，不想讓這些殺人犯逃脫法律的嚴懲，出去危害社會。在下午每個號領開水時，他猛地趁開門提水時沖出牢門，馬上將門從身後撞上，並大喊“有人要越獄”。王勝利馬上被員警保護起來，“東北虎”的越獄計畫就此暴露，員警進行了嚴密的準備。不過“東北虎”並不想就此放棄。當天晚上他依然準備動手，然而在“馬道”（就是號子上方員警巡邏走的通道）上竄出許多持槍的武警。“東北虎”見敗局已定，垂死掙扎，對著武警咆哮，結果武警開槍將其當場擊斃，其他人也被要求趴著出去。我所在號子跟他們緊挨著，三聲槍響非常清晰。隨後這個春節過得非常緊張，每天上午下午都要求那些重刑犯出去檢查戒具。房間也被反復搜查，金屬物品全部取走。王勝利因此也立了功，被釋放了。本來他的案情也不重，不過這顯然也是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我的案子隨後有較大的進展，員警多次找我談話，希望我認罪，並保證以後不參與類似活動。他們說只要我做出這些表態，他們就可以放我出去，還可以得到畢業證參加工作分配。我不知道這是否是真的，或者這只是一個陷阱。但是我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要求。我不希望違背自己的良知，雖然這可能給我帶來難以想像的後果。

不出所料，後來我被判了兩年半。不過這時剩下的刑期只有不到一年了。我經常出去參加像擦玻璃、打掃衛生這些活動。

93 年 10 月 14 日是我出獄的日子，我最後打掃衛生，來到胡石根所在號子向他打招呼，他從窗子上爬上來，跟我握手，雖然我們沒有說什麼，但是我知道這是他對我的祝賀和囑託。

走出監獄大門時，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氣，結束了這一段難忘的經歷，我又要去開展新的征程了。

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文件（選二）[3]

1 China Human Rights Watch

（第 399 號）敬請賜予準確消息（發出時間：1998.12.5）

臨時主辦人：劉賢斌（電話／傳真：0825-2248222）
秘書長：余萬寶（電話：0839-3229315）辦公室主任：歐陽懿（電話：0825-2861875）

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通告

鑒於中國人權觀察主辦人秦永敏先生已被當局予以拘留，致使中國人權觀察總部的日常工作現已陷於停頓；

鑒於中國人權觀察總部此前曾授權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在總部因故不能正常運行時，四川分部即為臨時總部；

鑒於言論自由乃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乃是公民不可後退半步的最後底線，捍衛公民的言論自由乃是公民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茲決定：

---

[3] 劉賢斌擔任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負責人期間，撰寫、簽發了多份文件。原書稿收錄六篇，這裏收錄其中的兩篇。其中的第二篇在 1999 年起訴書中曾經提及，但實際作者爲中國民主黨湖北總部。

一、從即日起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正式運行，臨時總部設在四川省遂寧市遂寧中學 04 幢 1 單元 6 號（郵遞區號：629000）；

二、臨時主辦人為劉賢斌（電話／傳真：0825-2248222），秘書長為佘萬寶（電話：0839-3229315），辦公室主任為歐陽懿（電話：0825-2861875）；

三、除非臨時總部遭到當局封殺，否則將堅持到秦永敏先生重獲自由。一俟總部重新運行，臨時總部即自動停止工作。

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呼籲海內外社會各界人士繼續關心、愛護和幫助中國人權觀察，繼續向中國人權觀察提供準確、及時的消息；臨時總部呼籲國內各地人權觀察員和人權觀察之友繼續關注中國社會的人權狀況，並與臨時總部保持密切的聯繫，以促進中國的人權民主進程。

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

2 China Human Rights Watch

（第 405 號） 敬請賜予準確消息 （發出時間：1998.12.7）

臨時主辦人：劉賢斌（電話／傳真：0825-2248222）
秘書長：佘萬寶（電話：0839-3229315）辦公室主任：歐陽懿（電話：0825-2861875）

緊 急 呼 籲

1998 年 11 月 30 日，中共國家安全機關再次將著名民運人士徐

文立、王有才、秦永敏關押。在武漢，秦永敏的經營小店於當晚被不明身份的暴徒洗劫，這是自中共在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上簽字後再次藐視國際社會，踐踏人權的又一惡劣行為。為此，中國民主黨湖北總部對中共的這種暴行提出強烈的抗議，並向全國人民和國際社會進行緊急呼籲：

一、中共必須立即釋放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等民運人士，停止對所有愛國民運人士的迫害。

二、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不能凌駕於國家法律之上、中國人民之上而為所欲為，一切行動必須受法律的制約和人民的監督。

三、中共幹部包括中共控制下的群眾組織，必須自食其力，不得向人民徵稅納稅，以食民者而幹反人民的勾當。

四、中共必須尊重人權，推進民主，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司法獨立，國家軍隊獨立，讓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五、目前中共作為執政黨，必須切實關心人民的生存，真正減輕農民負擔，解決全國的失業問題，把反腐敗的任務交人民來執行，適應世界民主大潮，早日結束一黨專政，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這才是中華民族進入世界民族之林的真正開始。

六、全國同胞應行動起來，展開對中共迫害民運人士的抗爭，以各種形式，包括集會、簽名等等。中共如不立即釋放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等民運人士，我們將向國際法庭起訴。同時，呼籲國際社會密切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給中共施加壓力，聯合國應派觀察員進行監督，為防止類似"六四"慘案那樣的反人類暴行重演，聯合國在必要時應派維和部隊來進行維和任務。

中國民主黨湖北總部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

1999 年法庭辯護詞

在座諸位：

剛才你們已經看到，我已拒絕回答了審判長和公訴人的所有提問，而且我現在還要告訴你們，在此之前在遂寧市公安局一處和遂寧市檢察院的人對我進行的多次審訊之中，我也沒有回答他們的任何提問。我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我相信我這次被關押、審訊和審判，並不是由於我違犯了中國現行法律，而是由於上面有人下達了要處理我這個持不同政見者的命令，甚至我敢肯定，我最後會被判處多少年徒刑，都是上面早已安排好了的。這和去年年底當局處理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等持不同政見者公民的情況完全一樣。因此，我今天站在這個法庭上受到審判，只不過是有關部門走走過場而已，我深信我不可能從這個法庭上討回我的公道。儘管如此，我現在還是準備利用這短短的時間給大家說明一下事情的真相，尤其要徹底駁斥那份荒唐的起訴書對我的各項指控，以使大家免受他們一面之詞的蒙蔽。

首先，去年 10 月我和佘萬寶等人到四川省民政廳遞交“中國民主黨四川籌委會”註冊申請書並沒有違犯中國法律，因為迄今為止中國並沒有任何一部法律明令禁止公民自由組黨，對於我們公民而言，法律未禁止的事情自然就是合法的事情。況且，在我們申請未獲批准之後，我們並沒有開展組黨的實際活動，我們沒有建立黨部，也沒有參加聯合總部。因此，起訴書指控我非法組黨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起訴書指控我起草《中國民主黨章程（草案）》與事實不符。我並沒有起草《中國民主黨章程（草案）》，我們在申請註

冊時使用的是浙江省民主黨籌委會起草的《中國民主黨章程（草案）》，遼寧民主黨籌委會在申請註冊時使用的也是這個章程。

第三，今年 1 月，我到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北京等地旅遊訪友，主要是為了躲避遂寧市公安局一處對我進行的瘋狂的政治迫害。在去年 12 月，遂寧市公安局一處動輒對我進行跟蹤、監視、傳訊、拘押，使我不堪忍受。在這次旅行中，我並沒有如起訴書所說的那樣煽動組黨，更沒有煽動與政府對抗。

第四，我們成立“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和“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並沒有違犯中國法律。眾所周知，我國憲法規定公民享有結社自由，但是湖北秦永敏先生多次依法申請註冊“中國人權觀察”卻都未獲批准，說明當局根本就不尊重我國憲法所賦予公民的結社自由的權利。1998 年我國政府簽署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也規定人人享有自由結社的權利，但是我國政府不僅沒有認真落實這一精神，相反還大肆打壓自由結社的公民，踐踏公民自由結社的權利。

第五，我在《後鄧時期與鄧後時期的中國政局》一文中稱江李體制將迅速瓦解，這只是學術上的理論分析，並不是我的政治主張。而《反思中共歷史》一文則是我在 1989 年張貼的一篇大字報，為此我已被判處過二年半的徒刑，我不明白公訴人為什麼現在還要追究這個問題。而 1998 年 12 月 7 日發表的《緊急呼籲》也不是我寫的，上面清楚地印有“湖北民主黨黨部”的落款，我不知道公訴人為什麼也要栽到我的頭上。至於說到成都的“文化沙龍”，那其實是一個自由沙龍，沒有人去負責舉辦，我只是其中的一個參與者，而且每次聚會也只是喝茶閒聊，只是偶爾討論一下社會上的焦點、熱點問題。由此可見，起訴書指控我“惡毒攻擊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攻擊黨的政策”毫無事實根據。誠然，我曾撰寫並發表過許多文章、呼籲書和公開信，但這並沒有違犯中國的法律，

我只是行使了憲法賦予我的言論自由的權利而已。

第六，起訴書指控我接受境外資助也與事實不符。1995 年 9 月、10 月我所得到的 200 美元和 500 美元是我在海外發表的兩篇文章的稿費，這兩篇文章分別是《中國農村社會的現狀與出路——川中地區農村社會調查報告》和《後鄧時期與鄧後時期的中國政局》。因此這 700 美元完全是我個人正當的勞動收入。至於 1998 年 11 月得到的 5000 元人民幣則是海外朋友送給我治病的，當時我患有肺結核，正在吃藥治療。為了治這個病，我三次住院，欠了很多債，遂寧市公安局一處的人對此情況應當很清楚。

由此可以看出，這份起訴書對我的各種指控根本就不能成立，我搞不清楚遂寧市公安局一處為何要捏造罪證構陷於我，我也搞不清楚遂寧市檢察院為何在起訴書上竟然還能寫上“上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並且居然給我扣上了“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在這裏我要告訴大家，我的所作所為並沒有違犯中國法律，我只不過是認真行使了我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利而已。這在世界上許多文明國家裏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國我卻要受到沒完沒了的政治迫害。雖然我知道這個法庭不會因為我的上述辯護而改變對我的判決，但是我也深深地相信，早晚總有那麼一天，歷史必然會對此進行重新的評判，而那些在這一政治迫害事件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人也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劉賢斌

寫於 1999 年 8 月初靈泉寺看守所

出獄一百天[4]

一、回家

我是在 2008 年 11 月 6 日滿刑出獄的。

奇怪的是頭天晚上居然睡了個好覺，一點也沒有出獄前應有的激動。之所以會這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最後一次減完刑後被留了 4 個多月的尾巴，經過 4 個多月的煎熬，誰還能保持起初那種興奮狀態呢？但早上 6 點鐘我還是習慣性地起來了，剛洗漱完畢穿好嶄新的衣服並準備與同改們話別時，就聽見有人在操場裏叫我。我出去一看，原來是監區教育管教李飛在值班室等我。我在監獄裏一直擔任文化教員，李飛是我的頂頭上司，我們之間相處得甚是融洽。前兩天李飛就曾告訴我，監區領導可能要安排他來送我，我聽了很高興，因為我相信他不會在我出獄時為難我。果然他很早就來接我了，我走出監區大門時還不到 7 點，而以前服刑人員滿刑通常都是在 8 點以後才能走出監區大門。出獄的手續李飛也在前一天辦好了，因此我們很快就走出了監獄大門。本來我以為像我這樣一個重量級政治犯出獄，其過程一定會相當麻煩，沒想到一切都是非常的順利。這時天上雖然下著小雨，但我的心情卻很晴朗明媚。

走出監獄大門後，我首先深深地呼了一口氣，這口氣與我以前 9 年零 4 個月喝的空氣完全不同，這是一口自由的空氣。自由，祇有當你失去了它之後才會感覺到它的珍貴。沒有人願意失去自由，4 個多月來我一直在渴望著這種自由，9 年多以來我也一直在努力

---

[4] 2011 年劉賢斌遭重判，本篇為判決書提到的三篇文章之一。

爭取這種自由。這個時候我沒有回過頭來看監獄一眼，我直接跟隨李飛上了一輛警車。一般服刑人員滿刑後都是自己回去，監獄還要給他們發一點路費，但對我們這種級別的政治犯，監獄卻會安排專人專車送交當地公安機關。對此情況我早已料到，因此在一個多月之前我就叫我妻子不要來接我，因為來了也接不到我。但此時此刻我卻很想看到我的妻子、女兒和以前的朋友，我知道他們這個時候也在翹首以盼。川東監獄位於大竹縣城郊，我在這裏呆了近 10 年，從來沒有離開高墻半步，我一直不知道大竹是一個怎樣的縣城，衹聽說這裏的醪糟很有名。有些服刑人員滿刑時總會在大竹盤桓半天，但這個時候我卻歸心似箭，我不想在大竹縣城多呆一分鐘。

出獄日與父親、大哥合影

車子開出縣城後很快就上了高速公路。李飛告訴我，現在從大

竹到遂寧全是高速公路，祇要兩個多小時就可以到達遂寧，我聽了非常吃驚。記得當初我來的時候，遂寧市公安局國保支隊用“桑塔納”送我，一路上全是彎彎曲曲的柏油馬路，早上 6 點鐘出發，下午 4 點多才到達。當然這中間還出了一個事故：在渠縣爬山時，我們的車子撞死了兩個小孩。後來聽說遂寧國保為此向小孩的父母賠償了 7 萬元錢。當時他們沒有給我戴手銬，圍觀的群眾很多，我一直站在路邊，沒有人知道我是被押送的犯人。如果是一般刑事犯遇到這種情況肯定會選擇逃跑，但我沒有產生這種念頭。我認為人家沒有給我戴手銬就是相信我不會跑，我不能讓人家說我是一個不講信義的人。更何況如果我跑了，他們在氣憤之下完全有可能把事故的責任推到我身上。直到交警把事故處理完了，才知道這輛肇事車輛是專門押送犯人的，於是他們才想起給我戴上手銬，並用一輛交警巡邏車把我送到了大竹的川東監獄。現在好了，一路上都是高速公路，我再也不擔心會出現交通事故，祇是靜靜的欣賞迅速消逝的景色。

上午 10 點我們進入遂寧境內後，李飛與遂寧國保取得了聯繫。出了高速公路後，我們就在一個加油站等著，一會兒遂寧國保的汽車就開過來了，打過招呼後遂寧國保就把我們直接送到了育才路派出所。近 10 年不見遂寧，遂寧的城市變化很大，我一時還搞不清方向。到了派出所之後，李飛給我妻子打了個電話，告訴她我已經到了遂寧，說辦手續還要耽誤一點時間。。所謂辦手續就是在派出所進行移交和登記。辦完之後，派出所的所長給我作了一番教育講話，希望我回來之後要遵紀守法，好好回報家人。由於他態度比較客氣，我也就沒有與他進行爭辯。這時國保的兩個人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原以為會與他們發生一番口舌上的交鋒，但他們既然不主動找我麻煩，我也樂得省去了一場衝突。10 點半的時候，李飛又給我妻子打了個電話，叫她到派出所來接我。打完電話後，他就與我

握手告別，我說我要請他吃飯，他說他要急著回去。李飛是一個正直善良的普通員警，許多時候我們之間處得就像朋友一樣，他一直對我的為人和才能都十分佩服。在川東監獄，像他這樣的員警很多，並不是如外界所想像的那樣黑暗。

2007 年出獄日與妻子在家中合影

幾分鐘後我妻子陳明先就來了，在她身後跟著我最好的朋友歐陽懿，他手裏抱著一大束鮮花，後面還跟著我的另一個朋友孔傑和我的侄女小鳳。他們的臉上都掛著喜色，但我的心情卻好像一點也不激動，我以前本是一個熱情洋溢的人，面對 10 年不見的親友本應該十分高興才對，難道多年的牢獄生活已經使我的神經變得麻木？以前在監獄裏就常聽人說，監獄會讓傻子變聰明，也會讓聰明人變傻。我在監獄裏一直受到員警和犯人的尊重，本以為自己的性情沒有受到影響，但現在看來長期的牢獄生活還是讓我產生了變

化，我變得遲鈍了。後來許多天裏，我在妻子和女兒面前也表現得非常平靜，不，是遲鈍。她們說話，我祇是聽著，妻子看見我沒有反應就對我生氣，害得我不停的對她解釋和道歉。我得承認，近幾年來中國監獄的生活條件和勞改政策已經有了巨大改善，但它摧殘人的本性的這個本質卻沒有任何變化。儘管我表現平靜，但歐陽和孔傑還是熱情地擁抱了我，然後我們又一起合了影。

在回家的路上，歐陽一直對我講個不停，看得出他這個時候非常興奮。他告訴我，在我進去之後他就走到了民運的第一線，如今已是一個全國有名的網路異議作家，而且在幾年前得過一次“青年人權”獎。他真誠地說：“賢斌，你應該感到高興，因為你出來的時候我沒讓你對我感到失望，我沒辜負你當初對我的託付”。我聽後感到很滿意。記得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我一直走在四川民運的第一線，為了運動的長遠發展，我一直有意地將歐陽、胡明君和陳衛放到第二線。他們 3 人的個人素質和能力都比我強，都是可以獨當一面的將才，我一直將他們看成振興四川民運的希望。我進去之後，歐陽和胡明君都迅速地站了出來，但胡明君很快就因與王森一起組黨而進去了，歐陽則十分艱難地支撐了許多年。歐陽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學，我們的友情已經延續了 20 多年，他以前做事有點缺乏信心，但在我進去之後卻迅速地成長了起來。看見他變化如此之大，我心裏能不為他感到高興嗎？

在回家的路上，我再一次體會到了家鄉的巨大變化，如果沒有他們為我領路，我一個人還真的找不到家。幾經轉折之後，我們一行人來到了鹽市街，以前明先給我講過我們的家就在鹽市街的“百盛家園”。這時我突然看見一群人朝我湧來，仔細一看才認出他們是我的父親、大哥、大嫂和我的侄兒侄女，但跑在最前面的卻是陳衛、陳兵兩兄弟和從成都趕來的張明。他們舉著一張橫幅，上面印著“賢斌，歡迎你歸來！”幾個大字，一看就知道是曾經做過廣告

業務的陳衛的傑作。老實說，我根本就沒有想到出獄時會遇到這樣的場景，在出獄之前我告訴明先最好保持低調，但當明先把我的意見告訴朋友們時，歐陽他們卻堅決不答應，他和陳衛商量一定要搞個隆重的歡迎儀式。從這裏我再一次體會到了我們之間牢不可破的深厚情誼。父親的手裏也拿著一塊紅布，非要掛在我的脖子上，意思是要衝掉以前的晦氣並希望我以後能平安順利，我本不相信這一套，但考慮到年邁老父的心情，我還是順從了他。走進“百盛家園”後，我們又在樓下一起合了許多影，當天歐陽就將這些合影全都發到了網上，讓許多相隔多年的老朋友在千裏之外都看見了我出獄時的樣子。當時我缺了一顆門牙，是我在監獄裏打籃球時撞缺的，我一直沒有在裏面進行修補，因為我想保持真實的形像走出監獄。當天晚上徐文立在電話上就提到了我的牙齒，我費了好一番口舌才解釋清楚。這讓我一下子就感受到了網路的威力，我預感到這是上帝製造出來用來結束專制統治的工具。後來西安的楊海也告訴我說：“中國的專制統治將最後栽在互聯網上面。”

合完影後，陳衛就領著親友們一起到一家餐館去了，他們為我準備了一場盛大的接風宴會，明先則把我領到了家裏。以前我們家住在學校裏，都是租的學校的舊房，面積不大，傢俱也非常簡陋。由於我一心從事民運，因此從來沒有為家裏購置什麼像樣的物件，只是在 1997 年胡平托人給我送了幾千元錢，我才從中拿出兩千元交給明先，明先用這筆錢買了一部電冰箱。與明先結婚 10 多年了，我只給她買過一雙皮鞋，家裏的一切開支都是靠明先在學校的工資。女兒出生後，除了有時候陪她玩，我也沒給她買任何東西。那時我掙的稿費和國內外朋友的資助，我幾乎都用在了民運方面。我對明先、女兒和這個家的虧欠實在太多，在監獄裏面我每每想到此事就會動情流淚。但明先是一個淡泊之人，她從來沒有在這方面埋怨過我，她只是默默地承受著一切不幸和辛酸。2003 年明先來信告

訴我說她買了房子，並將新房子的照片寄給了我，我看見房間的佈置還是明先的風格：樸素而雅致。後來我才知道，這是我們家最困難的時候，明先買房子用了 4 萬多塊錢，幾乎都是找朋友借的，重慶的鄧煥武老先生也借給明先 5 千元。但到我出來之前不久，明先就說她已經把欠帳還清了，當然這主要得益於我與明先在 2005 年左右先後獲得“魏京生人權鬥士獎”和“受難者家屬獎”總共近 4 千美圓的獎金。

這時已經到中午了，陳衛一直催我們出去吃飯，但由於女兒上學還沒回來，我就一直在家裏等著。12 點 10 分左右，女兒終於回來了，但她進門之後卻一直不敢看我，只是生澀地喊了一聲“爸爸”。我有 10 個月沒有見到女兒了，以前她每年都要和她媽媽一起來看我兩次，沒想到她一下子就長高了許多，比她媽媽還高一點。我進去的時候女兒才兩歲，走的那天晚上她一直哭個不停，9 年多來她的哭聲一直在撕扯著我的心。我進去的時候本來打算不減刑，但後來想到為了女兒的成長我還是選擇了減刑之路。在一個柔弱的孩子面前，我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堅硬冷酷的心。當然我的減刑還有個前提條件，那就是不能認罪，如果他們要強迫我認罪，我寧願讓家人陪我多受些痛苦。監獄方面也比較靈活，說只要能遵規守紀、完成勞動任務就可以給我減刑。這樣我一共減了 3 次刑，總共減了 3 年零八個月。雖然這是川東監獄減得最差的，但比起川中監獄的佘萬寶減刑半年、胡明君和王森一天沒減，我感到自己還是幸運多了。3 年 8 個月，我可以做多少事情啊，3 年 8 個月陪伴女兒，這對女兒是多麼重要啊。女兒現在 11 歲了，正在讀小學六年級，在學校的表現和成績都非常好，與我以前差不多。我知道這都是明先的功勞。在監獄裏的時候，我經常與女兒通信，開始是給她畫漫畫、講故事，後來就給她講人生的道理，出獄前一年我還給她系統地講過《論語》。但孩子畢竟不在我身邊長大，回來了很久她還對我有

些疏遠。

中午的飯局是陳衛、陳兵兩兄弟安排的，除了迎接我的那些人之外，還有遂寧的不少朋友，擠滿了 3 張桌子。但吃了幾分鐘之後我就吃不下去了，因為我吃著吃著就想起了我的母親，一想起我的母親眼淚就在我的眼眶裏直打轉。於是我把大哥拉到旁邊，哽咽著說："我要去看媽媽。"說完就拉著明先直奔母親的墓地。到了墓地後，我看見母親那熟悉而慈祥的遺容，想到母親含辛茹苦地把我養大，而我卻沒有好好孝敬她老人家，我就忍不住大聲抽搐起來，明先則靜靜地安撫我。母親曾經說，有個算命先生告訴她，她去世的時候有個兒子不會在她身邊送終，沒想到這個兒子就是我。1999 年我入獄後，母親每年都要到監獄來看我，每次她都沒說多少話，只是望著我默默地流淚，我就勸她好好保重身體，說我出來之後還要好好孝敬她老人家。2004 年母親沒有來看我，我就給她打了個電話，在電話那頭母親說她很好，叫我不要掛念。其實她當時已經病了，只是不想讓我在裏面擔心才故意這麼說。2005 年 4 月 30 日，監區領導突然給我一份電報，上面寫著"母危速歸"，我立即意識到母親可能要去了，於是我就要求回家探視母親。遇到這種情況，如果是一般服刑人員通常都會得到批准，但由於我是川東監獄的"重要犯人"，監獄領導拒絕了我的要求，只允許我打次電話回家。但是當我第二天打通電話後，大哥卻告訴我說母親頭天晚上已經去世了。大哥還說，母親臨終前一直在輕聲地喊著我的名字。之後的幾個晚上我一直在被窩裏以淚洗面，沒能親自為母親送終是我心中永遠的痛。

從墓地回來後已是下午 2 點多，大家都在"卓茗居"喝茶，而我卻承受著手機電話的密集轟炸。由於明先把我出獄的消息提前告訴了許多朋友，整個下午我都在接受國內外朋友的祝賀和問候，先後打來電話的有：北京的康玉春、高洪明、趙昕，王立超，西安的

楊海、李智英、鄧永亮，山東的楊寬興，浙江的程凡，貴州的陳西、曾寧，重慶的鄧煥武、王明、雷雲海，成都的邢宏偉、盧剛、文強，綿陽的李必豐，雲南的歐陽小戎，瑞典的張越，美國的徐文力等人。由於我的腦子當時已經被電話轟昏了，還有些朋友的名字我沒有記住。後來幾天打來電話的還有北京的江棋生，湖南的譚力、劉建安，美國的胡平、吳嗣宇，澳大利亞的孫力勇等人。這些朋友大多是我以前的老朋友，看見他們這麼多年了還關心著我，我真的非常感動。下午 6 點多，我又接到了自由亞洲電臺的記者小丁的電話，她要求對我進行採訪。由於我現在還有兩年“剝奪政治權利”的附加刑，因此在滿刑前，我曾專門看過《刑事訴訟法》和《公安機關工作條例》的相關內容，按它們的規定，我在“剝權期”不得接受採訪。但是這兩個法律的這些規定與憲法相抵觸，屬於侵犯公民權利的惡法，對於這些惡法，公民當然可以不服從。因此我欣然接受了小丁的採訪，回答了小丁的所有問題。最後我向小丁表示，不管中國的民主之路多麼坎坷和漫長，我都會堅持不懈的奮鬥下去，並呼籲國際正義力量繼續關注中國異議人士的命運，呼籲國內外朋友從精神上物質上多關心獄中的朋友，這幾句話表達了我出獄時的基本想法。

晚上又有許多朋友為我接風洗塵，直到深夜我才獲得輕鬆和自由。新的一天開始了，但我明白這並不意味著我會有新的生活，中國的民主之途仍然佈滿荊棘，我還得重新拿起以前用過的武器去繼續戰鬥，如果這些武器生銹了，我還得找塊石頭來磨一磨。對我們這種死硬的民運分子來說，坐牢就是休息，自由就得戰鬥。

二、會友

我這個人很喜歡結交朋友，而且對朋友總是以誠相待，從不做

對不起朋友的事情。記得在 1991 年我第一次出事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時，提審總想從我嘴裏瞭解我朋友的情況，並暗示衹要交代了他們的情況，我就可以回校完成學業。當時我不到 23 歲，正是大學快畢業的時候，能夠完成學業順利畢業當然是我的夢想，但我認為實現夢想不能以犧牲朋友為代價，因此我毫不由猶豫地拒絕了提審的“好意”，我沒有向他吐露不利於朋友們的任何情況，最後我當然沒能大學畢業，但我卻從來沒有為之後悔。我雖然沒有拿到大學畢業證，但贏得了朋友們的牢固友誼。近 20 年來，我一直在惡劣的條件下與專制強權進行不懈的鬥爭，朋友們自然會受到牽連和拖累，但他們從來沒有後悔過，我們的友情在嚴峻的政治考驗面前變得更加純潔和深厚。1989 年初我與幾個志趣相投的高中同學結拜成了兄弟。八九民運發生後，我們都迅速地卷了進去，特別是歐陽懿和馬烈還參與了我在遂寧張貼傳單的事情，六四事件發生後我還與馬烈一起回過北京，差點在人民大會堂後面被戒嚴部隊開槍打死。1991 年我第一次入獄後，我的這幫兄弟都受到了牽連，好幾個都被關過一段時間，歐陽懿被關押了 3 個月，其他幾個兄弟的畢業分配都受到了嚴重影響。1995 年我因參與《吸取血的教訓，推動民主與法制進程》公開信簽名而受到追捕時，又有幾個兄弟受到關押迫害。但這些兄弟一直都沒有怨恨我，我第二次入獄之後，他們每年都要去看望我的家人，母親去世後，他們還與陳衛一起在靈堂裏守了兩個通宵。這次出來之後，他們又接連為我舉辦接風洗塵的宴會，讓我好多天都沒有得到休息。

好不容易安靜下來，一些民運朋友又找上門來。出來沒幾天，就遇到了一個新朋友，他叫補紅星，是遂寧市河東新區的一名政府幹部。他說在網上知道了我的情況，從 2005 年開始就一直在找我，直到我這次出來他才從網上找到我家的電話和住址。對於這種新朋友，我向來很歡迎，因此後來幾天我們又見了幾次面，聊得也比較

投機。我知道在民運內部，有些朋友的警惕性非常高，對於來路不明的新朋友總是要加以懷疑，經常在沒有根據的情況下就說別人是“特務”、“線人”。對於這種做法我是堅決反對的，認為這將極大地傷害別人的尊嚴，也不利於民運力量的發展。記得在 1998 年，一個叫李作的朋友曾來找過我幾次，他給我的印像就有點神秘兮兮，如果換個人一定會判定他是“特務”，但我卻一直放心地與他交往。1999 年 7 月當局審判我時，他曾到遂寧為我進行聲援，我到川東監獄後又收到過他寄來的賀年片，不久外面的公安機關就到監獄找我瞭解他的情況，我猜他一定出事了，出來之後才知道他被判了 15 年，同時也知道了他的真名叫雄鷹。但在抓他之前四川的有些人卻說他是“特務”。其實李作之所以會表現得神秘兮兮，更多是出於自我保護的考慮。今年春節前夕，我聯繫到了李作的妻子雷鳳鳴，知道李作很快就要出來，到時我一定要去看望他。

陳雲飛、劉賢斌、張先癡、李宇、梁凱旋（左至右）

類似的情況還有對黃曉敏的懷疑。也是在 1998 年，黃曉敏通過

徐文立找到了我，當我把他帶進四川的民運圈內時，有人立即就說他是“特務”。後來黃曉敏的妻子謝軍曾給我詳細講過他們家的情況，說黃曉敏成天都在聽“美國之音”，對家庭很不關心。在我的印像中，那個時候的黃曉敏確實經常隨身帶著一個收音機，四川公開組黨後，他曾把“美國之音”的相關報導整理成文字，在四川民運圈內廣為散發。我進去之後，黃曉敏曾把我妻子、女兒接到成都去玩。謝軍是一個樸素、善良的普通女人，正是因為受不了黃曉敏對民運的太投入，她最後才與他離了婚。我在監獄裏的時候，黃曉敏也曾給我寄過幾次明信片，我想“特務”不會對民運人士這麼關心吧。我這次出來之後，他又從成都專程來看過我兩次，而現在他也鳥槍換大炮，隨身帶著的已是手提電腦。但是現在還有人說他是“特務”，理由正是他經常帶著手提電腦。不久前我從別的朋友那裏瞭解到，黃曉敏現在的生活非常窘迫。如果他是“特務”，情況會是這樣的嗎？一個人做“特務”，不可能是為了理想，而主要是基於利益的考慮，如果他長期做“特務”卻得不到應有的經濟收益，換成任何人都是不會願意的。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情況，有些民運人士性格比較軟弱，面對國保的打擊和壓力，他可能會答應國保的要求，但我想他一定會經常處於痛苦之中，因為從人性這個角度來看，任何人都是不願意出賣朋友的。我從事民主運動近 20 年來祇遇到一個真正的“特務”，他就是貴陽的彭方中，據說他目前已經當上了某個縣的公安局長。前不久我從網上看見一篇文章，說在民運圈子裏“特務”的數量已經超過了民運人士的數量，我認為這是誇大其詞，實在是自己嚇唬自己。其實，從上個世紀 90 年代開始，中國的民主運動就主要表現為公開的公民運動，我們做的許多事情都是可以見陽光的，我們一不搞密謀，二不搞暴力，有什麼值得害怕的呢？即使當局真派有“特務”打進我們民運圈子，我們也可以影響他的思想，促進他走向進步。所以出獄之後許多像補紅星

一樣的新朋友找到我，我都很樂意與他們交往。

出獄日與歐陽懿、陳衛、張明、田輝合影

除了補紅星之外，在我剛出來的這段時間我還見了許多慕名而來的新朋友。這些新朋友普遍熱情很高，但經驗不足，他們雖然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但對民主運動的基本理念卻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認識。他們普遍對“公開、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則比較輕視，而對密謀和暴力這些傳統政治鬥爭模式則比較感興趣，這尤其讓我感到憂慮。他們不知道當代中國的民主運動並不看重政權的更替，而更看重社會的重新建構。在未來的民主社會，共產黨不一定要下臺，但它在臺上一定要經過大多數選民的同意。他們不知道民主不僅是目的而且也是手段，為了實現民主的理想就衹能採取民主的手段。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傳統的政治鬥爭模式是小人的鬥爭方式，因為

它更重視功利成敗，強調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而當代中國的民主運動則更像君子之爭，它更重視道義原則，它不會為了崇高的目的而採取卑鄙的手段。政治學原理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違背了民主的原則，那麼我們最後即使取得了政權，我們也會離民主的目標越來越遠。以暴易暴衹能使中國陷入歷史怪圈並加深這個民族的災難。我們不應當在推翻一個專制政權之後又建立一個新的專制政權。更何況在當今中國社會，密謀和暴力這條道路根本就走不通。共產黨靠密謀和暴力手段起家，對付密謀和暴力共產黨會很有辦法，而且它還掌控著國家的暴力資源。如果我們採用密謀和暴力的手段，無疑是以己之短攻敵之長，根本就沒有獲勝的機會。因此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並設法在共產黨不擅長的領域作戰，我們應當以己之長攻敵之短，讓共產黨所掌控的暴力資源無用武之地。在今天的中國，民運力量能做的事情應當主要是進行公開抗爭，這不僅能夠影響和團結民眾，壯大民運的力量，而且能夠較好地保護自己，並贏得世界正義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對共產黨來說，公開抗爭是比較陌生的領域，它應付起來會相當吃力。共產黨今天也在講自由、民主和人權，當然他們這樣做主要是為了欺騙國內人民和世界正義力量，如果他們對我們的公開抗爭進行鎮壓，他們的虛偽本質就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無遺，我們反而能夠擴大和確立我們的道義優勢。中國的民運力量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無法與共產黨相抗衡，但共產黨在道義方面也不是我們的對手。我們衹要始終堅持“公開、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則，我們就可以取得對共產黨的戰略優勢和主導地位，我們就可以以最小的代價贏得最後的勝利。當然這是一個相當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克服急躁的情緒，打消投機的心理，我們不能寄希望於“畢其功於一役”，而應當堅忍不拔地穩打穩紮。我們一定要記住，當代中國的民主運動決不是一場你死

我活和不擇手段的傳統政治鬥爭，而是一場爭取人權和公民權利的公民運動。所以在這場運動中，我們應當像真正的人和真正的公民那樣去生活和戰鬥，我們不需要謊言、不需要陰謀、不需要暴力，我們祇需要服從自己的良心和行使公民的職責和權利。

劉賢斌、鄧煥武和陳衛在一起

與此同時，許多老朋友也來到遂寧來看望我，其中最讓我感動的是重慶的鄧煥武老先生的到來。1 月 26 日（大年初三）是老鄧 71 歲的生日，我本來準備與陳衛一起去看望他，但由於準備接受一個日本記者的採訪而沒有去成。1 月 28 日下午他卻拖著一把老骨頭過來了。為了不引起國保的注意，他先到了歐陽家，然後再讓歐陽叫我過去喝酒。開始我還真以為是喝酒，可是一進歐陽家就看見鄧煥武老先生坐在沙發上。我們什麼話也沒有說，祇是緊緊地擁抱在了一起。過了一會兒，老先生才望著我說："你沒有變，看到你現

在這個樣子我終於可以放心了。”說著就用手去揩自己的眼淚，我的眼眶也有些濕潤。看見他還是像以前那樣鬥志飽滿，我真的感到很高興。我是在 1995 年認識鄧煥武的，當時從王丹那裏知道他也參加了《吸取血的教訓，推動民主與法制進程》的公開信簽名，於是就要了他在重慶的地址。回到四川後我找了兩次才找到他。記得有一次我還差點被他家樓下的門衛扭送到派出所去，幸虧他的鄰居把門衛拉住，我才脫身走掉。鄧煥武是 50 年代的老右派，坐過近 20 年的監獄，出獄後又參加了民主墻運動，直到現在仍活躍在中國民運的第一線。我將他的事蹟講給許多人聽，沒有人不受到感動。找到鄧煥武之後，他立即給我引見了重慶的幾個朋友，他們是王明、雷雲海、何兵、梁俊西、白和平，他們幾乎都是民主墻時期的老戰士。通過他們我又找到了貴州的楊在行等人，並知道了貴州廖雙元、陳西等人 1995 年組黨的事情。從此西南民運圈的狀況有了根本的改變，在整個 90 年代的中後期，西南民運一直都相當活躍，我與鄧煥武分別扮演了四川和重慶民運圈的領軍人物，我們之間的友情正是在那個時候建立起來的。我與老鄧一直聊了幾個小時，考慮到他年紀太大且旅途勞頓，我於 10 點鐘就告辭了。

第二天，我與老鄧又在一個茶樓上聊了一整天，主要是老鄧在講，我在聽。老鄧是一個心思縝密的人，他知道我進去這麼久，對外面的情況不是很瞭解，於是他就準備了一個提綱，然後按著上面的內容向我娓娓道來。他從 98 年組黨聊到《零八憲章》，從民運狀況聊到了體制內的情況，從國內聊到了國外。老實說，我出來快 3 個月了，這次與老鄧見面使我獲益最大，他告訴我的這些資訊，我要用好幾天才能消化。在聊天過程中，老鄧特別提到了“拒郭事件”和“劉青事件”的情況，我聽了之後心情感到特別沉重。我這個人雖然天資不高，能力不強，但是很有大局觀念，看見民運裏面出現紛爭和內耗的情況，就感到特別痛心。在專制力量面前，民運

的力量本來就很弱小，如果還不斷出現紛爭和內耗，民運什麼時候才能讓人產生希望？這兩起事件發生的具體情況我現在還不是很清楚，不好進行評說，但我認為，中國民運不應分什麼“精英民運”、“草根民運”，也不應分什麼體制內的人、體制外的人，只要認同自由民主這個大目標，我們就應是朋友和同志。我們可以各做各的事，但不能夠互相攻擊，這應是我們的一個基本原則。如果某個朋友的言行有錯誤，我們可以當面向他提出，但不要搞得沸沸揚揚，讓全世界都看我們的笑話。我們不能為了爭奪所謂的資源而互相拆臺，我們更不能毫無根據地對別人進行人身攻擊。老鄧還給我講了郭飛雄、高智晟、胡佳的情況，說他們是中國民運新一代傑出領袖，我聽了感到非常高興。我一直希望民運力量不斷壯大，我很不願意看到 10 年之後還是那些老面孔在搞民運。老鄧在遂寧整整呆了兩天，臨走的時候我約他下了兩盤象棋，以前我與他是棋逢對手，這次依然下成一比一。

現在網上流行一句話，叫做“相見不如思念”，但我認為民運朋友還是應當盡可能多見面。出來之後我常聽朋友說，現在網路技術這麼發達，搞民運用不著再像以前那樣東奔西跑了。開始我還覺得他們說得有道理，但後來我卻覺得事情不是這麼簡單。網路的普及確實有利於民運的發展，它不僅可以迅速地傳播真理和真相，擴大民運對民眾的影響，而且可以提高我們的辦事效率，使我們之間的溝通交流更為方便。但是民運的一些基礎性工作仍然離不開人員的走動和麵對面的交流。出來之後我也經常在網上與朋友聊天，但我始終感覺這樣的聊天其實祇是政治清談，當然我並不是說這種政治清談沒有意義，事實上如果我們利用網路開設講座或論壇，我們可以對一些新朋友進行很好的啟蒙，可以幫助他們澄清許多糊塗觀念。但是網上交流有一個明顯的缺陷，那就是由於缺乏深入的交流，人與人之間不容易取得信任。朋友之間如果沒有信任，就肯定沒有

默契，沒有默契，有些事情做起來就肯定不會順暢。因此我主張朋友之間還是應當多見面交流，因為這比網上交流更真實、更直觀、更全面。記得在 90 年代中後期，我經常在全國各地之間跑動，後來又在成都搞了個沙龍，通過這兩種方式，我接識了許多朋友，經過見面交流，我們不僅互相取得了信任，而且彼此之間還培養了深厚的感情。正是基於這種信任和深厚的感情，我們才在那個時候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事情。所以，我現在還是希望國內的朋友不要滿足於只在網上結交朋友，而應當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儘量多與朋友進行面對面的交流，這種基礎性的工作對民運力量的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出來之後，我迅速與以前的老朋友取得了聯繫，我們經常在電話上或網上一起回憶過去的戰鬥歲月和交流對時局的看法。但我還是想在適當的時候去看一下他們，特別想看一下成都的蕭雪慧、汪建輝，西安的楊海、李智英，山東的楊寬興，湖南的劉建安、李華明，浙江的祝正明、程凡，北京的許良英、丁子霖、江棋生、胡石根、康玉春、陳清林、高洪明、查建國和趙昕，他們有的是我的良師，有的是我的戰友，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對我的深厚情意。在這裏我還必須提到我的一個好兄弟，他叫吳忠富，是人大法律系 89 級的學生。1991 年我第一次被抓捕後，是他第一個將我的情況告訴了我的許多朋友。1999 年我第二次被抓捕後，他曾申請做我的辯護律師。出來之後一直沒有他的消息，我很想和他一起到一個小酒館喝上幾杯。

三、抗爭

這次出獄之後，許多老朋友都勸我要保持低調，多休息，多照顧家人，這顯示出了他們對我的真誠關心，在此我要向他們表示真

誠的感謝。然而作為一個與中國民運共命運的人，在中國的民主大業仍未成功的時候，我能夠忍心獨善其身、抽身而退嗎？儘管我現在由於受到限制做不了有些事情，但總有一些事情我可以做，而且有些事情我還必須做。共產黨說他們有底線，我們民運人士何嘗沒有自己的底線，我可以暫時不去觸碰他們的底線，但必須誓死捍衛我們自己的底線。記得我出來之後不久，育才路派出所的幾名員警曾到我家裏來找我談話，勸我不要再去搞民運，要多照顧家人，多盡點兒子、丈夫和父親的責任。我對他們說："我肯定要盡到作為兒子、丈夫和父親的責任，但同時我也要盡到作為一個公民的責任。"他們說："你這樣做會害了你的家人，你不感到愧疚嗎？"我說："我沒有害我的家人，是你們在害他們，我這樣的人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不會坐牢和受到打壓，只有在中國等極少數國家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所以應該愧疚的是你們。"他們見我如此頑固，就恐嚇我說："你現在在'剝權期'，你做了我們就要處罰你。"我說："那是你們的事情，但我明確告訴你們，有些事情我肯定要做。"是的，有些事情我們必須去做，哪怕為此受到迫害和關押。如果我們不做的話，我們就會失去公民的尊嚴，而專制強權就會突破我們的底線並把我們推下懸崖。

記得認識補紅星不久，有一天他突然告訴我說鄧永固出事了，並從網上給我發過來一些資料，全是鄧永固在網上發表的上訪材料。當時我並不認識鄧永固這個人，看了這些材料我才知道，鄧永固是遂寧市蓬溪縣的一個林業員，他因不滿蓬溪縣的一些鄉鎮幹部在退耕還林過程中大肆侵害農民利益而不斷上訪，結果不僅上告無門，而且還受到當地政府的不斷打壓。過了幾天，補紅星又告訴我，據當地農民反映，鄧永固被抓後曾經遭受毒打。對此我感到非常氣憤，立即決定要對鄧永固的事情予以關注。雖然我不認識鄧永固，但是通過補紅星的介紹我已經把他當成了我的朋友，對於朋友的事

情，我向來是不會袖手旁觀的。1996 年我曾見過一次劉曉波，不久他因“雙十宣言”被判勞教，於是我與重慶的王明搞了個《公民言論自由宣言》為曉波呼籲，結果王明也因此被勞教。1999 年，秦永敏曾委託我，如果他被抓希望我能接過他所主辦的《人權觀察》，我雖然自知能力有限，但在秦永敏被抓後，我還是毫不猶豫地繼續辦起了《人權觀察》。現在我雖然還在“剝權期”，但關心和援助朋友乃是我們必須堅守的一個底線，因此我就把鄧永固的情況告訴了陳衛。陳衛立即起草了一份《就鄧永固事件致遂寧市委、市政府公開信》，然後在上面簽了我們的名字，在征得鄧永亮同意後又簽了他的名字。由於我的網路技術還比較差，就由陳衛發了出去。

劉賢斌、顏魯國在臨江閣竹林喝茶

公開信發出後，我一直在家裏靜靜地等著國保他們來找我，但他們卻遲遲不肯露面。事實上，在我出來之後，國保他們一直都沒有主動理會我，我原以為出來後他們會嚴密監視我，但我連他們的

人影都看不到。直到有一天，由於有個美國記者準備到遂寧對我和陳衛進行採訪，國保他們才不得不找我打招呼。他們把我約到育才路派出所的一個會議室裏，一見面我才發現這兩名國保我都認識，其中一名叫鄭強，是我出獄那天來接我的兩名國保之一，另一名叫鄭大雙，以前就經常與我打交道，據說他現在是遂寧國保的副支隊長。一番寒暄之後，鄭大雙就向我正式宣佈了“剝權期”的 8 條規定，特別要求我在“剝權期”不得接受採訪、不得發表言論、不得未經允許擅自離開遂寧，但他們卻一直沒有提到鄧永固的事情。我明確向他們指出，作為公民有些事情我必須要做，並說像鄧永固這種事情我就必須管。他們裝得也挺像，好像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鄧永固這件事情，但我想當時他們可能還沒有調查清楚吧。在約談我之後，他們又到遂寧中學找了我妻子，要她勸告我不要接受採訪。與此同時，遂寧國保的其他人也對陳衛進行了約談，同樣是警告他不得接受採訪。但這名記者最後並沒有來到遂寧，也許他在成都就被他們控制住了。

又過了幾天，遂寧國保又約我到育才路派出所，這次是由兩名年紀較大的人出面，根據他們的自我介紹，一個叫龍修福，一個叫劉崇超。他們都不是市國保支隊的，而是區國保支隊的，但這並沒有實質意義，因為兩級國保長期是混在一起做事。這兩名國保以前都沒有直接與我打過交道，但劉崇超的名字我早就知道。1989 年我在遂寧貼傳單的事情他就參與了調查，並且他當時直接主導了對歐陽懿的迫害。快 20 年了，我沒想到他還在區國保支隊工作。這兩名老國保的經驗顯然更加豐富，一副和藹可親笑眯眯的樣子，使我很難對他們義正詞嚴。在繞了一個大圈子之後，他們終於問我最近發表了什麼東西，看見他們含含糊糊的曖昧樣子，我也就乾脆支支唔唔地裝著什麼都不知道，其實我知道他們想問的是公開信的事情。由於這次約談不是正式的傳喚，他們看見我不願主動說出事情，

最後就祇好以長者的身份勸告我出來之後應當多關心家人，不要再像以前那樣“折騰”。這樣的話我已經聽過無數次了，十多年來，他們在“挽救”我時總是勸我要考慮自己的前途，要為父母、妻子、女兒著想，從來沒有勸我要追求真理和履行公民責任。這說明他們自己也不相信他們的那一套理論，他們知道自己在道義上不是我們的對手。儘管他們在公開場合還在繼續高談什麼主義，但事實上他們已經墮落為了一個沒有理想沒有精神沒有道義原則的利益集團，我為當初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中共“革命先烈”們感到羞愧。

12 月 10 日是世界人權日，也是《世界人權宣言》發表 60 周年的紀念日。在此之前幾天，我接到了一個朋友打來的電話，他說他們起草了一份文件，題目是《零八憲章》，問我願不願意簽名，並說我剛出來，如果條件不允許就不要勉強。我說我要先看一下文件，然後再決定是否簽名。於是這個朋友就把《零八憲章》（徵求意見稿）給我發了過來。我看後，覺得這個文件言辭比較溫和理性，基本上代表了我的一貫主張，於是我馬上就告訴他同意簽名。後來在 12 月 9 日我從網上看到了《零八憲章》發佈的消息，並且在 303 個首批簽名人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本來那個朋友告訴我《憲章》原計畫在 10 日公佈，但由於《憲章》起草者之一劉曉波於 8 日晚上被抓，於是就提前發佈了。《零八憲章》的發佈打破了目前國內沉悶的政治僵局，中國民運第一次向世人系統地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綱領，它向世人揭示了中共當局拖延改革的本來面目，使國內人民看到了未來民主中國的曙光。《零八憲章》發佈後，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極大地喚醒了中國人的良知和熱情，雖然中共當局對它進行百般破壞和阻撓，但到目前為止，已有 8 千多人在上面莊嚴地簽上了自己的真實姓名。中國民運在經過多年的抗爭和積蓄之後，終於第一次強有力地顯示出了自己的力量，《零八憲章》的發佈宣告了一個健康理性的政治反對派的形成，它告訴人們，中國

完全可以不按照當前的狀況繼續拖混下去，中國完全可以選擇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零八憲章》發佈後，引起了中共當局的極度恐慌，在抓捕劉曉波之後，各地國保人員相繼約談、傳喚了許多簽名人，企圖嚇阻《零八憲章》運動的繼續發展。在這段時期，我一直靜靜地呆在家裏，等待著遂寧國保找上門來。但直到 12 月 29 日上午，他們才通知我當天下午 3 點到育才路派出所報到。下午我準時到了派出所，祇見在所長辦公室裏坐著 5 個國保人員，市、區和派出所的國保人員都有，陣勢還相當大。他們這次沒有繞圈子，開門見山就問我是否在網上發表了《就鄧永固事件致遂寧市委、市政府公開信》，並直接將這封公開信的影本擺在了我面前。我覺得這個事情沒有什麼好隱瞞的，就如實地回答了這個問題，祇是沒有說出補紅星的名字。但他們顯然已經把事情調查得非常清楚，說我不講他們也知道。接下來他們就問我是否還簽署了《零八憲章》，並詳細詢問了我簽署的經過。我覺得這個事情也沒有什麼好隱瞞的，因此又如實回答，但我拒絕說出找我簽名的那個朋友的名字。遂寧國保與我打了許多年的交道了，知道我決定不說的事情就永遠不會說出來，因此他們就沒有扭住這個事情不放。然後一個叫李波的年輕國保說，《零八憲章》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內容，涉嫌非法結社，要我宣佈退出《零八憲章》的簽名。我理直氣壯地進行了反駁，並明確宣佈我不會退出《零八憲章》的簽名。最後他們又假惺惺地問了我的生活和家庭情況，再次勸告我出來之後應以家庭為重。整個詢問大概持續了一個小時。我本來作好了被關押的準備，但他們卻並沒有這麼做。回來之後我與遂寧國保打過幾次交道了，我感覺他們現在比以前有了一點進步，至少他們在對待我們這種人時不像以前那樣粗暴了。不知道這是不是全國的普遍情況。

第二天即 12 月 30 日，遂寧國保又強行傳喚了陳衛，他也是《零

八憲章》的首批簽名人之一。與我一樣，陳衛在遂寧國保面前也沒有退讓。事實上，在這次較量過程中，所有被傳喚或被約談的《零八憲章》的簽名人都表現得非常棒，沒有一個人在當局的壓力面前表現出了軟弱和退讓，而且在沒有事先約好的情況下，大家的口徑居然驚人的一致，顯示出了空前的團結和默契。這表明中國民運的群體素質比以前已有了極大的提高。記得在八九民運之前，陳軍曾經組織過一次很有影響的簽名活動，但在事後就有人說自己的簽名受到了別人的蒙蔽和利用。在 1995 年的“呼喚國內政治寬容”的簽名活動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這肯定會被中共當局利用，從而給簽名活動的形像造成傷害。但是在這次《零八憲章》運動中，簽名人的規模如此之大，簽名人的社會階層如此複雜，卻沒有一個人在事後表示後悔，這真的非常難能可貴。我以前參加和組織過無數次公開簽名，沒有一次搞得有這麼好。我不知道具體是哪些人在操作這個事情，我要向他們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時我也要對每一個簽名者表示敬意，他們敢於在一個並不寬鬆的社會裏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看法，顯示出了應有的勇氣和公民精神，這正是未來民主中國得以建立的基石。一般來說，專制統治得以維繫主要依賴於兩個基礎：一是謊言，二是恐懼。經過 80 年代的啟蒙運動和八九民運的衝擊後，中共當局的謊言已經被徹底戳穿了，它之所以還能撐到今天，主要就是靠赤裸裸的暴力。這種赤裸裸的暴力確實對一般民眾產生了有效的恐嚇，這是中國社會危機如此嚴重但社會變革卻一直沒有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打破這個政治僵局，我們每一個公民就必須首先打破自己對專制統治恐懼心理，必須敢於對專制統治公開說“不”。《零八憲章》運動做到了這一點，這是《零八憲章》實名簽署的最重大的意義。在民主運動中，欺騙和詭計衹會成為笑柄，勇氣和負責的態度才是對付專制統治最具殺傷力的武器。

《零八憲章》這件事過去後，很快就面臨著春節的到來。這是

我出獄後的第一個春節，我本想好好與家人聚聚，然而這個春節我卻過得並不平靜。2009 年 1 月 23 日，一個日本記者突然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從香港“人權民運資訊中心”知道了我的情況，準備到四川來對我進行採訪。雖然遂寧國保已經明確告訴我在“剝權期”不得接受採訪，但我認為他們的這個規定沒有道理，因此我決定不理睬他們的這個規定。我在 90 年代從事民運時，常常聽到有些朋友說要搞合法鬥爭，開始我認為還挺有道理，後來我才認識到這會極大地限制民運的發展。在 19 世紀 80 年代，社會民主黨人曾經也提出過以合法鬥爭取代馬克思的暴力革命，但是他們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是西方自由民主社會，採取合法鬥爭、議會道路的“修正主義”路線確實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但是在當今中國社會，共產黨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它所制定的所有法律都是用來維護其統治地位的，幾乎都是用來限制而不是保障公民權利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採取合法鬥爭無疑就是把自己局限為一種體制內的鬥爭，很難能有較大作為。比如說，我們如果遵守他們的《遊行示威法》，那麼我們根本就無法開展任何遊行示威活動，如果我們遵守他們的關於結社方面的規定，那麼我們根本就無法進行真正的結社活動。因此在我看來，所謂的合法鬥爭其實是一個陷阱，它將阻礙中國社會的真正進步。30 年前，小崗村的幾個農民如果採取合法鬥爭，他們根本就不可能在分田協議上按下血印，中國的農村改革就不知會被推遲多少年。所以在今天推動中國的自由民主進程中，我們必須要敢於對那些惡法進行公開的挑戰，我們必須像一個真正的公民那樣去追求自己的自由民主權利。政治鬥爭肯定有衝突，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不可能是一場和諧的運動。因此當接到日本記者的電話後，我立即就接受了他的採訪要求。

然而我的電話卻是受到監控的，遂寧國保馬上就知道了這個消息。第二天下午遂寧國保就約我“喝茶”，奉勸我不要接受日本記

者的採訪，我當場予以拒絕。然後我又告訴他們，我相信他們都是有人性的普通員警，做什麼事情一定要遵循自己的良心，不要衹為了往上爬而做傷天害理的事情。他們對此似乎也表示同意。我還告訴他們，中國民運是健康理性的反對派力量，如果在中國實現民主化以後有人要迫害他們，我一定要站出來捍衛他們的人權。他們聽後很不自然地哈哈大笑，我猜他們一定在內心深處受到了震動。後來貴州的陳西來看我時也說到，在他們舉辦貴州人權研討會期間，經常有國保人員旁聽，他們也借機向國保人員進行啟蒙教育。所以我們這些在國內從事民運的人一定不要害怕與國保打交道，我們不要衹把他們當成敵人，我們應該把他們當成對手，有時候我們甚至可以把他們當成普通的聽眾，我們要利用一切機會對他們進行宣傳教育，要讓他們覺得我們的追求是負責任和高尚的，即使我們不能改變他們的思想，我們也要贏得他們的尊敬。記得在監獄裏的時候，監獄曾經先後派了 3 個服刑人員來監視我的日常言行，但是後來他們 3 個都成了我的朋友，都主動向我說明了他們的身份，他們在寫彙報材料時都對我筆下留情，這可能也是我在監獄了“表現較好”並獲得 3 次減刑的重要原因。其實我在監獄裏面經常向其他服刑人員宣講我們的事情和主張，但很少被反映上去，如果我為人處世很差的話，我的“改造”肯定就不會這麼順利，我也不可能提前 3 年 8 個月出來。所以在與國保打交道時，我們可以把他們當成有人性的普通人，我們要以自己的人格來影響和感染他們，這是我 10 多年來積累的一個重要經驗。

1 月 27 日晚上那個日本記者又打來電話，說他已經乘飛機從香港到了成都，並且在國內買了一個手機。這時我才知道他是日本《讀賣新聞》的記者，名字叫竹內，從他說普通話的水準來看，他算得上是一個中國通。稍後他又從手機上發短信告訴我，他第二天上午到遂寧。我告訴竹內，國保已經知道此事，可能他們對此會進行破

壞。竹內說，他還是要來遂寧對我進行採訪。第二天上午 9 點鐘我從家裏出來，準備在外面找個地方接受採訪，因為我擔心竹內進不了我家。但是我剛走出“百盛家園”，一輛汽車就停在我的面前，車上下來兩個國保人員，其中一個是遂寧國保的副支隊長鄭大雙，他說約我去“喝茶”，我知道我已經被他們控制起來了。他們把我帶到一個茶樓上，一直等著日本記者的到來。9 點半時竹內又發短信說，他已經出發，正在到遂寧的車上。鄭大雙他們沒有干涉我回電話，我就告訴竹內，我已經被國保控制起來，見不了他。但他還是回話說他要過來，哪怕只見我一面。11 點鐘左右竹內到了遂寧，我叫他到我們“喝茶”的樓下。鄭大雙他們立即緊張起來，馬上就在電話上進行佈置安排。竹內到了茶樓之後又表示要見我，我說恐怕見不了，他說他有禮品要送給我。我就徵詢鄭大雙的意見，他說他們負責把禮品轉交給我。後來我透過窗戶看見了竹內，他個子不高，穿著一件紅衣服，遂寧國保的幾個人正在與竹內談話，不久就陪著竹內走了。過了半個小時，鄭大雙說，竹內是國際友人，他們已安排外事局的人陪他觀賞遂寧的風景名勝去了。但這時他們還是不讓我回家，我只好與他們一起在茶樓上吃了午飯。直到下午 3 點，竹內才告訴我說他已離開遂寧，並說他很同情支持我，表示以後還會來見我。聽後我深受感動，竹內此行雖然沒有完成採訪任務，但他畢竟親身體驗了一下中國的不自由狀況，他的這一趟也可以說沒有白來。下午 4 點，遂寧國保終於解除了對我的控制，並且把竹內的禮品轉交給了我，那是一盒“碧螺春”茶葉。我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再見到竹內，但我將永遠記住他那堅忍不拔的職業精神以及對中國民運的同情態度。

竹內走後，我的生活又暫時恢復了平靜，但我知道，在危機、轉機、勝機並存的中國，前面還有許多戰鬥在等著我，中國民運與專制強權的較量還遠遠沒有結束。

第九屆中國青年人權獎獲獎答謝辭

5月31日，王天成先生打來電話，說我獲得了今年的第九屆“青年人權獎”。老實說，聽到這個消息後，我一點也不激動，我只覺得朋友們對我真的是太偏愛了。

雖然這二十年來，我一直在惡劣的環境下與中國的專制統治進行著不懈的鬥爭並因此而屢受當局的打壓和折磨，但是我始終覺得我所做的這一切只不過是一個正直、勇敢的公民所應該做的。二十年前，偉大的“八九”民運席捲了神州大地，同時也喚醒了年少懵懂的我，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認識到了專制制度不僅會滋生腐敗，造成社會不公正，而且還會閹割人性，扭曲道德，它是一個公民、一個民族乃至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最大障礙，它是人世間一切不幸和災難的總根源。因此作為一

萬潤南七絕贈賢斌

個沒有失去良心的中國公民，我不可能對專制統治的各種罪惡熟視無睹，我不可能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污，我必須吶喊，必須抗爭，必須誓死捍衛公民的尊嚴和行使我自有永有的人權。二十年來，雖然我走過了一條漫長的坎坷的抗爭之路，但這是我自己自覺的選擇，我求仁得仁，無怨無悔。

幸運的是，我不是孤軍奮戰，在我的前面、後面和周圍一直都有無數朋友通過各種方式與專制制度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抗爭，其中還有許多朋友如秦永敏、王炳章、劉曉波、郭飛雄、胡佳、吳義龍、佘萬寶、胡明君等人至今仍身陷囹圄，他們的道德、勇氣和卓越的貢獻深為我所欽佩，他們是這個時代的英雄，他們是中華民族不屈的脊樑，他們是未來民主中國的燈塔。因此在這“六四”二十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我獲此殊榮，真的感到萬分慚愧，我唯有以此來激勵自己，為了民主中國的早日到來，為了“八九”民運的理想的早日實現，為了“六四”英靈早日得到安息而竭盡我的全力。

2009 年 6 月 1 日

卷二 思想者

中國社會要想走出災難—毀滅—重建的怪圈，必須從文化的根基上建立起對權力的不信任和制約機制，必須設定統治者的權力和人民的權利之間的明確界限，必須從西方文明中引入和吸納憲政民主的理念，必須確保每個人的自由和尊嚴不受到權力的侵害。——《走出東方專制主義藩籬》

街頭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形式，是一個社會實現民主變革不可繞開的必經階段。它既是專制統治長期以來拒絕主動進行社會變革的一個必然結果，也是民眾人權意識和公民權利意識普遍覺醒之後的自然表現，還是民主運動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手段，更是未來民主社會得以建立的嶄新的起點。——《街頭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形式》

走出東方專制主義藩籬

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一個專制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算得上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究其原因，根深蒂固的專制文化及其衍生的奴性文化可以說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本來，中國文化與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樣都包含著對善的追求和對理想社會的渴望，都涵蓋有人類基本的普世價值，例如早在上古時候，中國文化中就產生了“天下為公”的理念，堯舜禹時期的禪讓制度就是這種“天下為公”理念的具體實踐。“天下為公”，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指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指人民當家作主。這是現代政治學中民主這個核心概念的應有之義。後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兩個最主要的流派儒家和道家都繼承了“天下為公”這一理念，在他們的心目中最理想的統治者就是能夠貫徹“天下為公”這個理念的人，孟子就曾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孟子這句話的意思概括起來就是指：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這與現代民主政治也有相通之處。

不僅如此，先秦儒家中還有許多思想也與現代民主政治的原則相一致，例如在《論語》“樊遲問智”這個故事中，孔子就曾說過“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樣的話，“舉直錯諸枉”的意思就是要推選賢能的人來領導和管理這個社會。孟子也曾經說過“尊賢使能，俊傑在位”這樣的話，其意思也是應當讓那些品德高尚、才能優秀的人來治理國家。這種思想與現代民主政治的目標完全一致。更有甚者，孟子還對那些獨夫民賊進行了猛烈地攻擊，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

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當齊宣王問他怎樣看待商湯誅滅夏桀、周武王誅滅商紂這兩件事時，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據說孟子的這種思想後來傳播到西方，對法國大革命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孟子的這種主張顯然不利於專制統治者維持自己的統治，因此朱元璋後來讀到孟子的這些話時感到非常生氣，居然下令把孟子從孔廟中趕出去，並親自刪除了孟子的這些言論。所以，先秦儒家思想中確實含有樸素的民主思想，它們與現代民主理論並不是完全對立的。

然而為什麼後來西方文化中發展出了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而中國卻在專制集權的泥淖裏越陷越深呢？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只對統治者提出了道德約束，卻沒有設計出相應的制度約束，只是希望統治者自覺做到“天下為公”，卻沒有相應的制度迫使統治者必須做到“天下為公”。不管是儒家還是道家，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統治者就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聖人”，一部《道德經》講述的就是聖人治理天下的道理，而一部《論語》講述的則是輔佐聖人治理天下的君子如何修養自己的德行，因此期待“明君賢相”就成為了幾千年來中國人不變的最高理想。毫無疑問，對統治者提出道德約束是很有道理的，但僅此還不夠，因為道德約束在權力面前是非常虛弱無力的，一旦統治者獲得了絕對的不受制約的權力，他們就可能腐化變質，他們就可能為了自己的私欲私利而戕害天下人的利益。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王權統治中，真正的“聖人明君”並沒有幾個，大多數都是平庸無能之輩，有的甚至是荼毒天下的暴君，是孟子所抨擊的那種殘害天下的獨夫民賊。對於這種統治者，中國文化中並沒有產生出制度制衡的機制，使得這些昏君暴君能夠不受制約地恣意而為，從而使天下人遭受痛苦和磨難，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悲哀。其實在中國文化大發展的春

秋戰國時期，孔孟老莊等人應當對當時各國的統治者有著清醒的認識，在他們的眼中，這些統治者都不是他們所期待的那種“聖人明君”，他們根本就無法做到孔孟老莊所提出的道德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孔孟老莊卻仍然沒有進行制度約束方面的任何思考，這是中國文化之大不幸。

中國文化對道德的過分強調源於儒家的人性善論，先秦儒家認為每個人本來就是善良的，每個人生來都有仁慈、羞恥、是非之心，只是由於後天的環境的影響人們才逐漸走向惡的，因此他們認為通過後天的學習和修養，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正如孟子所說“人皆可以為堯舜”。由於這個緣故，他們便將理想社會的實現寄託在每個人的道德修養上面，要求人們要堅持不懈地修養自己的道德，尤其要求治理國家的統治者應通過道德修養成為道德高尚的聖人或君子。這與西方文化中的人性惡論完全不同，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每個人都被認為是不完美的，即使一個道德人格相當完美的人也有原罪，因此在基督教文明中，一個人再偉大，他也會被看成是一個會犯錯誤甚至會犯罪的人，因此他居於統治地位時，人們自然就會對他加以提防和制約，從而自然就產生了自由民主和人權憲政理論。不過在先秦時候的戰國時期，荀子已經提出對人性善論的質疑，並進而提出了人性惡論，後來法家的各種主張就是基於人性惡論，要求統治者對臣民必須時時提防，必須用一套完備的制度來制約臣民的思想和行為。然而法家有一個重大的失誤，那就是沒有將人性惡論應用到統治者身上，他們提出的一系列主張都是用來對付臣民的，而沒有一條主張是用來制約統治者的，因此法家學說最後反而成為了中國專制制度建立和發展的幫兇。秦朝之後的歷代王朝的統治者，雖然表面上推崇儒家學說，但實際上他們在內心裏一直都迷戀法家學說的好處，所謂“外儒內法”是也。以儒家的美好言辭來粉飾自己的統治合法性，同時卻以法家的嚴刑峻法來

壓制臣下和人民，這就是東方專制主義的主要特徵。

因此不管是儒家、道家還是法家，它們都沒有提出對統治者的制度約束，這是中國文化的重大缺失。在先秦時期，中國社會本來還有一些自由空間，尤其是士大夫階層還有一些自由權利，例如孔子就曾經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第19節）也就是說，臣下對君主盡忠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君主必須對臣下尊重，如果君主對臣下不夠尊重，臣下也可以不對君主盡忠，所以孔子在魯國受到排擠後就離開了魯國，齊莊公因為爭奪一個女人被殺，晏子也沒有為齊莊公死節。孟子也曾經說："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孟子・離婁章句下》）因此在先秦時期，士大夫階層對統治者並沒有必然的依附關係。但是從秦朝開始，當中國的皇權專制制度建立起來以後，士大夫階層就失去了這種自由，他們再也不能對效忠的對象進行自由的選擇，他們的權力、地位甚至生命都失去了根本的保障。按照《周禮》的規定，"刑不上大夫"，但是在秦朝以後的專制集權社會裏，專制君主卻具有了對臣下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連社會地位較高的士大夫都沒有了基本的人權，一般臣民的命運自然可想而知。從此，每一個中國人都匍匐在了至高無上的皇權之下，本來擁有的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統統喪失殆盡，每個人都變成了專制皇權任意驅使和宰割的奴隸。

在強大的專制皇權的統治下，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所有的人都變得怯懦、自私而又狡猾，甚至有時候還被扭曲到了變態的程度，為了保護自己或者為了追求利益，每個人都不擇手段和無所不用其極，具有浩然之氣的君子越來越少，而小人文化和奴性文化則在這個社會裏大行其道，儒家的道德說教成為了自欺欺人的道德空談，成為了粉飾專制皇權的點綴品。奴性文化的氾濫也從另一方面助長了專制主義的鞏固發展，專制主義者非常需要

人們對他們惟命是從，而且他們也非常善於挑起和掌握君子與小人之間的不停內鬥，他們正是在這樣的內鬥中逐漸鞏固了自己的專制統治。所以，沒有尊嚴和自由的奴性文化也是專制主義得以長期維持的重要條件。我們民族的所有災難並不完全是專制統治者強加給我們的，我們的民族性格、我們的文化本身也給專制主義的滋生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由於專制皇權不受制約，統治者可以不受限制地運用手中的權力，因此他們也不可避免地最後走向腐敗，並貪得無厭地壓榨和掠奪人民，當人民實在活不下去的時候，他們就會鋌而走險、奮起反抗，從而造成社會的嚴重動盪和衰退，經濟、社會和文化都會在這種動亂之中受到極大的破壞。所以，不受制約的專制強權是二千多年來中國社會一切災難的總根源，中國社會要想走出災難—毀滅—重建的怪圈，必須從文化的根基上建立起對權力的不信任和制約機制，必須設定統治者的權力和人民的權利之間的明確界限，必須從西方文明中引入和吸納憲政民主的理念，必須確保每個人的自由和尊嚴不受到權力的侵害。只有憲政民主的理念內化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變成所有國民的基本觀念，我們才能從根本上剷除專制主義得以滋生的土壤，我們子孫後代的幸福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中國社會才能最終走出東方專制主義的藩籬。

寫於 2009 年 12 月 9 日 四川遂寧“百盛家園”

街頭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形式[5]

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葡萄牙進行民主變革以來，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席捲了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縱觀這些國家的民主變革，由民間反對派力量所領導、由全體人民參與的大規模的街頭運動在其中往往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可以這麼說，舊的獨裁專制體制的崩潰和新的憲政民主體制的建立，是在民間反對派長期努力的基礎上最後通過大規模的街頭運動來迅速實現的。所以，街頭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形式，民主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表現為轟轟烈烈的街頭運動。

民主運動必然發展到街頭運動是由專制統治的本質所決定的。在一個專制社會裏，專制統治者總是控制著國家和社會的一切資源，官僚、軍隊和員警等行政和暴力資源都牢牢地掌控在他們的手中，各種社會組織也變成他們的週邊組織，於是他們就會自以為很強大，從而漠視人民的願望和要求，並最大限度地壓榨人民和聚斂財富，以滿足他們窮奢極欲的腐朽生活。同時他們還把自己的觸角伸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使每個人的言行和思想都受到嚴格的控制。對此人民自然會起來反抗，但當人民還沒有組織起來的時候，這種零星分散的反抗自然也會受到專制統治者的殘酷鎮壓。鎮壓活動的一再得逞又進一步促使專制統治者變得更加狂妄，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和延續他們的腐敗統治，他們會拒絕一切形式的實質性變革，從而導致各種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當所有的社會危機積累到一定的時候，社會革命就自然爆發了。但在此之前，他們那種專

---

[5] 2011 年劉賢斌遭重判，本篇為判決書提到的三篇文章之一。

橫、狂妄、狹隘、冷酷和愚蠢的本質決定了他們很難能夠主動進行社會變革，他們只會在足夠強大的外部壓力下才會作出妥協退讓。對專制統治者來說，國際上的壓力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國內民眾普遍覺醒並走上街頭，才能對他們施加足夠大的壓力，才能促使他們被迫進行社會變革，或者促使他們走向分化和瓦解。

然而人民的覺醒不是自覺的，它有賴於少數先知先覺者的宣傳和鼓動。儘管專制統治者一直致力於散佈謊言和製造恐怖，但每一個社會總會自然產生有良知和勇氣的人，當他們看穿謊言、瞭解真相和真理之後，他們就會走出恐怖，

大膽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就會主張實行社會變革，呼喚自由和民主，這些持不同政見公民的零星抗爭是民主運動的早期的主要表現方式。當然專制統治者會對這些持不同政見的公民即“異類”進行嚴厲的打壓，然而只要這些持不同政見者具有堅韌頑強的意志，他們的聲音將註定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聽到，他們的主張就會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最後當越來越多的人瞭解真相和真理之後，早期的持不同政見者的零星抗爭就會慢慢演變成越來越多的人參與的反對派運動，民主運動就由此進入到了第二個階段。

只要一個社會出現了政治反對派，那麼當局對他們的鎮壓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不管他們將多少有良心和勇氣的公民關進監獄，他們都無法阻擋更多的人公開站起來進行抗爭。但是由於民間反對派無法掌握與專制統治者相抗衡的各種資源，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裏，民間反對派的抗爭將表現得異常困難和曲折。然而與專制統治者相比較，民間反對派卻掌握著道義優勢，這就決定了他們最後必然獲得民眾的普遍支持。一旦民間反對派能夠有效地動員民眾，那麼這場政治鬥爭的天平就會發生不可逆轉的傾斜，民主運動就註定會走向波瀾壯闊的街頭運動，是謂民主運動的第三階段。在這個階段，由民間反對派所領導的街頭抗爭將成為一種社會常態，

民間反對派將以街頭抗爭的方式對專制統治者施加強大的壓力，促使他們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並實現社會的根本變革。因此大規模的街頭運動實際上就是民主力量與專制力量的最後決戰。

然而大規模的街頭運動是一項複雜的社會工程，如果民間反對派不夠成熟和強大，這場運動也仍然有可能不會結出自由民主的碩果。因此，民間反對派雖然離不開民眾的廣泛支持，離不開轟轟烈烈的街頭運動，但街頭運動反過來也對民間反對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民主運動的早期和前期，民間反對派擴大影響主要靠的是勇氣和對專制統治不服從的精神。當民主運動走向高潮之後，民間反對派就必須自覺承擔起主導這場變革的重任，在這種情況下，民間反對派的實力和智慧將決定這場變革的方向和結果。當大規模的街頭運動興起之後，民間反對派如果想保證民主運動的健康發展方向，避免民主運動受到當局的鎮壓，避免暴力革命的發生，確保社會的和平民主轉型順利進行，民間反對派就必須有足夠的力量引導和控制民眾，同時還必須有足夠的智慧與對手打交道，從而不斷贏得和鞏固民主變革的成果。如果民間反對派達不到這個要求，那麼這場大規模的街頭運動就有可能失敗或者失控，要麼遭到對手的嚴厲鎮壓，要麼變成一場吞噬一切的暴民運動。因此大規模的街頭運動是對民間反對派能力的全面檢驗，在民主運動的高潮沒有到來之前，民間反對派對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做好充分的準備。

一般來說，在民主運動的低潮時期，由於專制統治者的宣傳和恐嚇，民眾對政治運動不是很感興趣，但同時他們卻對自身的基本人權、公民權利以及作為人的尊嚴和生存利益可能很在乎，這就是哈維爾所說的“在後極權主義社會裏，政治空間在別處”。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民間反對派並不適合以政治綱領動員民眾，而應當以關心民生、關注民眾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利為突破口，尤其是對於受到民眾普遍關注的比較典型的侵權案例，民間反對派一定要進行

強有力的關心和援助，這樣民間反對派就可以逐漸在民眾中產生影響，並引導民眾學會採用理性和非暴力的抗爭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由於這些典型的侵權案例受到民眾的廣泛關注，因此執政當局在處理這些問題和矛盾時就會面臨很大的壓力，他們就可能出於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或者為了自己的面子而被迫依法處理這些問題和矛盾。這樣就不僅提高了民眾的公民意識，而且也讓執政當局受到了民主法治方面的訓練，這對未來的民主變革非常重要，這可以極大地降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成本。因此在民主運動的低潮時期，民間反對派應當將主要精力用於從事維權運動和公民運動，這可以為他們以後領導大規模的街頭運動積累許多重要的經驗。

在這個過程中，民間反對派應當始終高舉“公開、理性和非暴力”的大旗，及時化解民眾中可能出現的暴力傾向。由於長期以來備受專制統治的欺壓且一直沒有正常的發洩管道，當大規模的街頭運動爆發後，民眾就有可能將心中的怒火發洩到專制統治集團身上，就有可能發生暴力事件。一旦大規模的街頭運動演化成不可控制的暴民運動，民主運動的發展方向就會受到嚴重影響，而且還可能會遭到專制集團的血腥鎮壓。因此在大規模的街頭運動中，引導民眾克服暴力傾向將是民間反對派的一個重要任務。與此同時，民間反對派還要下大力氣啟蒙民眾。其實，當大規模的街頭運動興起之後，民眾的政治熱情自然會高漲起來，他們會對國家的前途和社會的發展等問題產生極大的興趣，因此這個時候正是民間反對派對民眾進行民主啟蒙和民主訓練的絕好時期，民間反對派應當在這個時候公佈並廣泛宣傳自己的一系列政治綱領，使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憲政等價值理念深入人心，使民眾成為民主運動的堅定支持者。在此基礎上，民間反對派才能引領人民爭取和實現一個又一個的憲政民主目標。

在民主運動的低潮時期，民間反對派也不適合成立嚴密的組織，

因為這容易遭到當局的嚴厲鎮壓，在民間反對派還很弱小的情況下，這樣的嚴厲鎮壓將是致命的。因此在這個時候，民間反對派主要表現為一種鬆散的沒有約束力的團體，反對派領袖以及反對派人士之間的關係是在長期抗爭過程中自然形成的。這樣即使當局要對民間反對派進行鎮壓，也將只是個別反對派人士失去自由，但民間反對派的主體力量卻不會受到嚴重的損害，這對未來的民主變革也很重要，因為當民主運動高潮來臨的時候，散佈在全社會的民間反對派力量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雖然結社自由是公民的一個基本權利，但只有當民眾的政治熱情被普遍喚起、民主運動已經需要強有力的政治組織來領導的時候，才是民間反對派成立組織的最佳時機。而民間反對派組織一旦成立，它就應當以開放的態度廣泛吸納民眾，迅速成為一個可以與專制統治集團相抗衡的強大力量，那些經過長期抗爭考驗、具有堅定的民主信念和卓越的政治才能的人自然會成為民間反對派組織的領袖。所以在民主運動的低潮時期，民間反對派的組織建設實際上並不是一定要成立某個嚴密的組織，而是要求每一個反對派人士持續不斷地進行公開抗爭，影響和團結周圍的志同道合者，在深入溝通的基礎上逐漸形成比較默契的關係，一旦時機成熟，這種看似鬆散的民間反對派就可以迅速成為一個有戰鬥力的政治組織，他們將在大規模的街頭運動中發揮關鍵的作用。

當然在大規模的街頭運動中，除了建立一個強大的反對派組織並有效地領導民眾之外，民間反對派還應當有足夠的智慧與專制統治集團進行較量。民間反對派應當看到，專制統治集團雖然掌控著強大的資源，但他們並不是鐵板一塊，他們其實只是一個利益集團。當大規模的街頭運動興起之後，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之下，貌似強大的專制集團有可能出現分化和失去戰鬥力，專制集團內部的普通官員、士兵和員警完全有可能站到人民一邊，因此民間反對派應當將

他們看成可以團結和爭取的對象。同時在專制集團內部甚至在權力高層也有一些人會同情和支持民主運動，當大規模的街頭運動到來之後，專制集團內部的一些改革派人士就可能會公開地站到人民一邊，並在內部與專制統治集團中的頑固強硬派進行激烈的鬥爭，這時民間反對派就應當迅速與改革派人士結盟，至少應當與改革派人士的抗爭相呼應，將鬥爭的矛頭指向少數頑固強硬勢力，促使專制集團內部出現分化瓦解。在這個過程中，民間反對派切忌不要採取過激的行為去促使專制集團抱成一團，要確保改革派人士在專制集團內部的鬥爭中獲得勝利，只要改革派人士控制了專制集團高層的權力，那麼這場民主運動就立於了不敗之地。在這個過程中，民間反對派要學會談判和妥協，要學會贏得和鞏固一個又一個的民主成果，從而推動社會的真正進步。在這個時候，民間反對派不要急於奪取政權，只要民間反對派實現了合法存在，只要民主的基本框架得以建立，只要公民的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政治權利得到了根本的保障，那麼這個社會的民主轉型就會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進程。政權的更替並不是民主運動的首要目標，而是民主運動發展的自然結果。

總之，街頭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形式，是一個社會實現民主變革不可繞開的必經階段。它既是專制統治長期以來拒絕主動進行社會變革的一個必然結果，也是民眾人權意識和公民權利意識普遍覺醒之後的自然表現，還是民主運動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手段，更是未來民主社會得以建立的嶄新的起點。在持續不斷的大規模的街頭運動中，民間反對派有沒有能力和智慧通過街頭運動實現社會的和平民主轉型，將直接決定專制統治和民主運動的命運，也將直接決定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因此對於那些正在為自由民主不懈奮鬥的人們來說，思考和研究街頭運動這個課題實在具有重大的意義。目前那些仍在黑暗中苦苦堅持和摸索的人們，應當有理由對民

主變革的到來充滿信心，但同時也應當對這場社會大變革的到來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憂懼之心，這樣才能儘量減少社會大變革所可能帶來的負面震盪，並確保未來民主社會在一個堅實的起點上順利前行。

寫於 2010 年 2 月 9 日 四川遂寧“百盛家園”

劉曉波遭重判後的民間道路選擇

2009 年 12 月 25 日，中國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零八憲章》的起草者和簽署者劉曉波先生被中共當局判處 11 年有期徒刑。如此嚴厲的判決出乎許多人的預料。眾所周知，長期以來劉曉波先生主要在從事自由寫作，他一直主張中國社會實現和平民主轉型，一直拒絕可能造成社會嚴重動盪的激進變革路線，一直主張並踐行理性溫和的抗爭方式。對如此溫和理性的劉曉波，中共當局施以重刑，實在是愚蠢之極，這不僅再一次暴露出了中共當局狹隘、冷酷的本質，而且在它那本已不光彩的人權紀錄上增添了新的劣跡，它想通過重判劉曉波來嚇阻國內風起雲湧的民主維權運動，殊不知這反而會讓越來越多的人看清它的本質。中共當局對劉曉波先生的重判並不能阻擋中國民主運動的繼續發展，我相信，由劉曉波先生所發起的《零八憲章》運動一定會在今後的若干年裏深刻地影響中國社會的和平轉型進程。

但是在劉曉波先生被重判之後，我注意到一些朋友對劉曉波所堅持的理性抗爭路線產生了懷疑，他們認為中共當局對劉曉波的重判表明中共當局現在對一切形式的反對派運動都會予以嚴厲的鎮壓，認為中國社會和平轉型的道路已經徹底被堵死，認為中國民運現在應當放棄理性抗爭的道路，甚至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推翻中共的暴虐統治。對於這些言論，我感到深深的憂慮。如果這些朋友是基於劉曉波被重判而在悲憤的情緒下說出這些話，我還能表示理解，但如果他們是基於冷靜的思索而說出這樣的話，我則不敢苟同。我認為這些朋友沒有很好地理解劉曉波之所以會選擇堅持理性抗爭路線的深刻原因，沒有弄明白劉曉波發起的《零八憲章》運動所蘊含的重大意義。我認為，在劉曉波被重判之後，我們不但不能

放棄理性抗爭的道路，而且更應該高舉“公開、理性和非暴力”的大旗，我們應當沿著劉曉波的足跡繼續前行，將《零八憲章》運動持續深入地開展下去，其理由如次：

首先，在我看來，劉曉波被重判只是一個單一的侵犯人權個案，並不意味著《零八憲章》運動受到了全面的鎮壓。我們知道，《零八憲章》自發布之日起迄今已有一年時間，除了劉曉波一個人受到當局的抓捕判刑之外，全國並無第二個人因為參與《零八憲章》運動而受到當局的抓捕判刑（此文寫於趙達功先生被抓之前——編者注）。雖然在《零八憲章》發佈的最初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全國各地的許多簽署者都受到了各地國保人員的約談、傳喚、騷擾、威脅和監控，這些行徑雖然是對公民權利的嚴重侵犯，但畢竟與抓捕判刑有著本質的不同。而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不管是“九二”組黨還是“九八”組黨都遭受了中共當局的大面積打壓，數十上百人因此而被抓捕判刑，全國各地的民運精英人物幾乎都被中共當局投進了監獄，這種大面積的打壓使國內民運受到了重創，使得國內民運在許多年裏都未能恢復元氣。因此當中國民運力量還非常弱小的時候，我們在國內從事民運活動一定要考慮到如何避免受到當局的嚴厲打擊，我們可以勇敢地選擇自己去坐監獄，但我們卻無權動員大家一起去坐監獄。所以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中，勇氣固然不可缺少，但高明的鬥爭策略更為重要。在當今中國這種政治環境裏，我們必須探求一條既能不斷拓展民運的發展空間和擴大民運對社會和民眾的影響力、又能避免民運力量受到嚴厲打壓、從而能夠確保國內民運得到長期發展的抗爭路徑。經過二十年來的摸索和積累，堅持“公開、理性和非暴力”這個原則的理性抗爭道路逐漸為國內民運人士普遍認同，最近幾年興起的國內維權運動就是這種理性抗爭道路的具體實踐，而《零八憲章》運動則將這種理性抗爭的原則發揮到了極致，她是“八九”民運之後國內民運堅持理性抗爭最成

功的一個範例，因此我們現在不能因為劉曉波被重判而放棄這條來之不易且行之有效的抗爭路徑。

其次，劉曉波被抓捕重判並沒有妨礙《零八憲章》運動和國內民運的持續發展。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零八憲章》在發佈之前已經醞釀了兩年時間，其原始文本經過廣泛徵求意見和幾經修改，最後基本上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廣泛認同，甫一公佈就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烈回應，她在最大程度上將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和憲政的力量團結在了一起，這是當局不敢隨便鎮壓《零八憲章》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零八憲章》運動的重大成就。當然《零八憲章》的問世肯定會引起當局的緊張和恐慌，為了嚇阻運動的持續發展，他們就拘捕了《零八憲章》的發起者和起草者劉曉波和張祖樺，同時又對其他簽署者進行各種形式的恐嚇打壓，沒想到當局的這一愚蠢行為反而促使了《零八憲章》運動朝更深和更廣的地方發展，短短時間裏就有成千上萬的中國公民勇敢地在《零八憲章》上面簽署了自己的名字，這個結果不僅讓當局始料未及，而且可能也出乎《零八憲章》運動組織者的預料。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由於劉曉波被抓捕反而促使《零八憲章》運動和中國民運得到了空前的大發展。今次劉曉波被重判，當局也不可能從中獲得任何好處，這只會促使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參與到《零八憲章》運動中來，只會讓中共當局承受更多更大的國內國際壓力。所以在我看來，劉曉波此次坐牢是非常值得的，他雖然犧牲了個人的自由和幸福，卻喚醒了千萬個公民勇敢地站起，這是劉曉波先生的重大歷史功績，他將因此而名留青史。

其三，作為“八九”民運之後國內最重大的民運事件，《零八憲章》運動之所以能夠以如此小的代價贏得了如此大的成就，我以為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零八憲章》運動自始至終秉持了“公開、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則，這種理性抗爭是目前中國民運最有效也最應

當繼續堅持的鬥爭手段。在這種鬥爭中，由於我們堅持公開的原則，我們做的許多事情就可以對國內民眾產生影響，同時也可以受到國際正義力量的關注和重視，這對中共當局就會造成一定的壓力。同時由於我們堅持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則，我們也可以贏得國內外的廣泛同情和支持，還可以避免受到中共當局的嚴厲鎮壓，如果它一定要對我們的理性抗爭進行鎮壓的話，我們反而可以在道義上獲得更大的優勢。因此在這種鬥爭中，我們就將中共當局置於一種既想鎮壓又不敢隨便鎮壓的二難境地。另一方面，由於中共以暴力革命起家，我們選擇和平理性的公開抗爭方式，對中共當局來說是一個比較陌生的領域，它應付起來就會比較困難，它所掌控的暴力資源就會無用武之地，這樣我們就避開了中共當局的強項和鋒芒，讓它不得不在自己並不擅長的領域與我們較量。而且在這種鬥爭中，我們並不追求政權的更替，我們只是要求實現基本的人權和公民權利，我們只是希望像一個真正的人和一個真正的公民那樣去生活，這種最基本的政治訴求很容易被大多數人所接受和效仿，並將促使越來越多的人走出謊言和恐懼。雖然這種和平理性的公開抗爭不會在短時間裏對專制統治造成直接的威脅，但經過長期的努力，我們卻可以瓦解專制統治的根基，讓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看清這個政權和體制的本質，並對當局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從而導致中國社會最後的和平民主轉型。所以在我看來，劉曉波所堅持的這種理性溫和的抗爭策略真的非常高明，它是對付後極權主義的最有效的途徑。因此在劉曉波被重判之後，我們更有理由將他所堅持的理性抗爭原則繼續堅持下去，我相信這也是獄中的劉曉波所願意看到的。

其四，我認為，在當今中國政治環境下，不管從操作技術上來講還是從民主理念上來講，密謀暴力這種激進道路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當知道，密謀暴力是中共當局的強項，在中共當局壟斷國家一切資源的情況下，我們採取密謀暴力的抗爭方式無疑是以己之短

攻人之長，顯然沒有獲勝的機會。且不說我們現在根本無法組建自己的軍隊，而且即使我們組建了自己的軍隊，在武裝到牙齒的中共軍隊面前，我們也遠不是他們的對手。所以我們並不適合與中共當局正面較量，我們應當發揮我們的道義優勢，並通過持續不斷的公開抗爭來擴大這種優勢，使更多的人民站到我們一邊，這樣無論中共的暴力機器多麼強大，他們最終也必然會被淹沒在億萬人民的抗議浪潮之中。到那個時候，也許中共的暴力機器頃刻間就會瓦解，他們不僅可能拒絕鎮壓人民，而且還可能反而站到人民一邊。這種情況已經在許多國家的民主化浪潮出現過，在中國未來的民主化浪潮中也並非沒有出現的可能。然而我們反對密謀暴力的最主要的理由是因為這種鬥爭方式並沒有走出傳統政治鬥爭的陳舊思維，我們如果以傳統的政治鬥爭方式來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即使最後僥倖取得了所謂的勝利，最後也不一定會讓中國社會變得更加自由和民主，這就違背了我們追求自由民主的初衷。以暴易暴不僅意味著歷史的重複，而且意味著更大的災難。更何況這種對國家和人民不負責任的行為本身也難以得到人民和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失道者寡助，因此這種激進的密謀暴力抗爭方式將註定沒有出路。事實上到目前為止，那些主張密謀暴力路線的朋友也並沒有在這方面取得任何成效，所以我把他們的這種激進主張只看成是他們自說自話罷了。

當然按照傳統的民主理論來說，暴力反抗是人民的一個權利，但這個權利的實施是有一定條件的，那就是除非統治者堵死了和平變革的一切希望。但在我看來，目前中國社會的形勢遠沒有達到如此糟糕的程度，儘管中共當局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而拒絕進行主動的社會變革，但國內的民運力量還是有許多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的，儘管溫和理性的劉曉波受到了當局的重判，但他所發起的《零八憲章》運動仍在繼續發展壯大。在這個時刻，我們應當儘快平復

心中的悲憤情緒，重新拾起我們的信心和熱情，並沿著劉曉波的所堅持的理性抗爭道路繼續前行。劉曉波被重判了，我們只能更加努力地把《零八憲章》運動繼續推動下去，直至她最後變為中國社會的現實。

寫於 2010 年 1 月 5 日 四川遂寧“百盛家園”

以哈維爾之眼看中國

瓦茨拉夫·哈維爾是當今世界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是前捷克斯洛伐克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也是民主捷克的首任民選總統。他在反抗後極權主義、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中，本著自己的良心和勇氣，對後極權主義社會進行了鞭辟入裏的深刻分析，從中摸索出了瓦解後極權主義的有效方法和途徑，並在付諸實踐的過程中積累和總結了若干彌足珍貴的經驗，這對當代中國的民主運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在中國社會大變革的前夜，重溫哈維爾的著作，挖掘和研究他的思想，可以讓我們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中少一些困惑和迷茫，多一些勇氣和信心。

一、哈維爾對後極權社會的批判與當今中國社會現實

哈維爾本身是一個劇作家，在 1975 年他給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寫了一封公開信。他根據自己多年的觀察和思考，對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客觀分析，他說：在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入團並參加是否必要的活動；……因為恐懼拒絕的後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被推薦的候選人投票，並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前程的恐懼，他們不得不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或至少保持沉默；……恐懼導致人們出席各種官方的慶祝會、示威和遊行。因為恐懼被從正在進行的工作中驅趕出來，許多科學家和藝術家效忠於他們事實上並不願接受的觀念，

寫他們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虛假的東西，參加官方的組織和參與他們認為是無價值的工作，歪曲和刪改他們自己的作品。”

他又說：在這種後極權主義社會，“每個人都有東西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擔憂。……國家員警可以在任何時候干涉一個人的生活，沒有他反抗的任何機會，可以充分地剝奪一個人的生活中本來的和可靠的方面。……我們社會中有公眾影響的位置前所未有地被那些臭名昭著的野心家、機會主義者、騙子、有可疑記錄的人，——總之，由典型的合夥勾結者所把持。……在這些環境中，腐敗存在於所有形式的公務員之中，他們公開地願意為任何事情接受賄賂，並且允許自己寡廉鮮恥地為考慮他們私人利益和受貪欲支配而搖擺不定。……每個公民都被迫成為一個偽善者。”

他還指出：恐懼導致人們情感冷漠，“人們便失去了對前途、對建立公共事務權利的可能性，對為真理和正義而鬥爭的意義等全部信任。他們對超出其每天以外的任何事情漠然置之，對自己的日常生活例行公事，他們尋找解脫的途徑；他們屈服於冷漠，屈服於對超個人的價值及對他們同胞的漠不關心，屈服於精神上的被動和壓抑。……今天的人們一心一意想著他們的家庭和房子，他們在那兒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體驗他們的創造性才華。他們在自己的房子裏佈滿各種用具和可愛的東西，他們試圖改善他們的食宿，他們為了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愉快，修建小別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車，將更多的興趣放在食物、穿著和家庭舒適上。簡言之，他們將興趣轉向他們私人生活的物質方面。”

這就是哈維爾眼中的後極權主義社會的主要狀況，這就是“布拉格之春”之後捷克斯洛伐克的真實圖景，概而言之就是：恐懼、冷漠、偽善和犬儒主義。我之所以要大段摘錄哈維爾的這些原話，一是因為他的分析確實很精彩，也很真實；二是因為我覺得他的分析具有普遍的意義，他雖然直接在批判後極權主義的捷克斯洛伐

克，但他好像又在批判所有的共產主義體制國家，他所描繪的後極權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狀況竟然與近 20 年來中國社會狀況驚人地相似。

在當今中國社會，我們每一個中國公民不也是生活在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政治員警的恐怖統治之下嗎？我們每一個公民不也是因為害怕失去平靜的生活、害怕失去學業、地位、生計和前程，而不得不壓制自己的良心和人性，不得不假裝擁護和贊成當局的一切決議，不得不服從當局的意志和上級的命令嗎？我們每一個公民現在不也像當初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樣爭先恐後地加入當局的各種組織，參與當局的各種活動嗎？當中國政府以舉國之力興辦歷史上最豪華的奧運盛宴時，當中國政府的各級官員大肆貪污腐化時，當他們厚顏無恥地拼命掠奪和聚斂財富時，我們有誰公開地反對或譴責過他們呢？當有些人的資產被侵佔，當有些人的權利被侵犯，當有些人因為公開地表達不同的意見而受到迫害，當不公正的社會現象在我們眼皮底下發生，當冤案和人權災難普遍在這個國家蔓延時，我們有沒有睜只眼閉只眼呢？

在當局長期的意識形態宣傳下，在我們從小就受到的灌輸洗腦的過程中，我們的神經已經麻木了，我們的良心已經沉睡了，我們的道德已經崩潰了，我們變得怯懦、自私而又狡猾，這種狀況正是當局所歡迎的。我們不再關心這個民族的未來，只知道保住自己的工作和飯碗，只知道構築自己的小巢、梳理自己的羽毛，只知道保證自己的平安和順利升遷，並且對當局編造的所謂“生存權是最大的人權”這一謊言深信不疑。在這種萬能政府的統治下，我們像奴僕一樣機械地生活，不再關心自己本來就有的各種權利，並對人的尊嚴和社會的公義抱著無所謂的態度，對我們的同胞和祖國的前途漠然視之。在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我們信奉著個人服從集體的教條，把我們生來就有的權利和尊嚴拱手讓出，我們不再是一個

個活生生的人，而是這部國家機器上的一個沒有意識、沒有創造性活力的螺絲釘，我們一起承受著這個反人性的制度的無止境的折磨，並經常壓制和折磨其他有思想有勇氣的公民。不管你身處這部國家機器上的何種位置，你都是它的受害者，但同時你又是他所製造的許多災難的幫兇，你都對這部國家機器的繼續運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一個讓人窒息的社會，這是一個讓人絕望的時代，這是一種讓人厭倦的可憎的生活，如果說它還有些平靜的話，那它也只不過是一個平靜的臭水溝而已。

幸好這樣的社會註定要解體，這樣的時代早晚要結束，因為我們對人性和豐富多彩的生活的追求不僅是永恆的，而且是強有力的，它是我們內心深處最原始的動力，也是後極權主義最主要的敵人。不管這個社會還要繼續維持多久，不管這個政權還要繼續玩弄什麼樣的花招，我們終歸總想過人一樣的生活，我們總會在某種時刻去追回我們的權利和尊嚴。對此我像哈維爾一樣深信不疑。在寫給胡薩克的信中，哈維爾繼續寫道："生活可能臣服於一個長時間的徹底的被強暴、令其衰竭和麻痹的過程。但是，她不可能永遠止步不前。……儘管她一千次被疏遠自身，但她總是能以某種方式復原；不管怎樣被粗暴地蹂躪，她最終要比蹂躪她的力量活得更長久。……如果生活不可能永久地被毀滅，那麼，歷史也不可能全部進入一種止步不前。……這或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有一天它必然發生：這種覆蓋將不再有約束並將要揭開。……所有長時間遭到壓抑的因素，那些不可重複的獨一無二的、非日曆化得事件，所有長時間遭到否定的神秘性，迅速沖決出來。……多年來為了表面上的完善、無懈可擊、不出一個故障而運轉的機器，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這種看起來非常像不可動搖的、永世長存的君主統治制度，在其所有那些一致的投票和選舉中不存在任何懷疑的表示，沒有任何跡象便分崩離析。"這就是哈維爾所說的"真實的時刻"來臨的

情況。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就是這種“真實的時刻”來臨的一次徹底表現，雖然她最後被蘇聯的坦克所扼殺，但這並不能阻止這種時刻的再度來臨。1989 年，當“真實的時刻”再度來臨的時候，哈維爾所反抗的後極權主義制度終於在人民的抗議風暴中徹底覆滅了，捷克斯洛伐克終於迎來了自由的春天。那麼，中國會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樣發生巨變嗎？我的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因為我們中國人也會像捷克斯洛伐克人那樣厭倦那種讓人厭倦的生活，我們中國人也會像捷克斯洛伐克人那樣尋求一種像人一樣的生活，我們中國人也自然需要自由、權利和尊嚴。1989 年，中國也曾經迎來一次“真實的時刻”，但它也像“布拉格之春”一樣被坦克扼殺了，但這樣的時刻必然還要再度來臨，但願這一次我們能夠讓那種讓人厭倦的生活徹底退出歷史的舞臺。

二、哈維爾的民主實踐理論與中國民運

讓人敬佩的是，哈維爾不僅是一個思想家和理論家，他還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是一個身體力行的人權捍衛者和民主運動的實踐者。針對後極權主義的特點，他獨創性地提出了瓦解後極權主義的一些新的方法和途徑，並在《無權者的權力》一文中進行了分析論證。哈維爾認為，後極權主義政治是靠謊言維持自己的統治，是對人性的全面攻擊，因此他主張人們應當走出謊言，學會生活在真實之中，認為“生活在真實之中具有獨一無二的不可估量的爆炸性的政治力量”。他認為：“在極權制度之內，那些日後逐漸演變為富有政治含義的運動背景，通常並不是由公開的政治事件和不同的政治觀點和力量的公開衝突所造成的。這些運動大部分來自政治之前的更廣泛的領域，是生活在謊言中與生活在真實中之間發生衝突，

也就是說，在後極權制度的要求與生活的真實目的之間發生衝突。生活的真實目的自然採取了大量不同的形式。它們有時候表現為某個人或某個集團的基本物質利益或社會利益；而在別的時候，可能表現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還有些時候，可能是最基本的存在論的需要，如人們渴望在尊嚴中生活。”後來他所領導的“七七憲章”運動並沒有提出系統的政治綱領，只提出了公民們要真實生活的願望，但這卻對後極權主義發出了強有力的挑戰，這種方法確實是瓦解後極權主義的一種有效手段。

哈維爾還認為，在後極權主義社會裏，人們對政治普遍比較冷漠，傳統的政治鬥爭很難喚起人們的政治熱情，因此他主張放棄以政權更替或制度革命為目的的傳統政治鬥爭模式，說：“不論一個新的政治模式多麼漂亮，它已經不能夠與‘隱藏的層面’對話，不再激勵人們和社會，喚起真正的政治熱情。後極權制度之內的政治空間在別處：制度的複雜操控與生活的目的處於持續的殘酷對峙中。生活的目標是人類生活的基本要求，不與人們自身相衝突，以某種可以接受的方式活下去，不受官員和上司的侮辱，不受員警的嚴密監控，自由表達自己，發揮創造力並享受法律保護等等。與此有關的一切具體事件，都必然引起人們的關注。關於政治經濟秩序的理想而抽象的規劃不能使他們感興趣。……在後極權制度下生活的人們實在太瞭解對他們來說是否能像人一樣活著，比哪個黨派掌權，或他們如何標榜自己來得更為重要。”一句話，哈維爾主張應當以喚起公民熱情和意識的公民運動來逐步瓦解後極權主義的統治。因此，當“宇宙塑膠人”搖滾樂隊受到當局的迫害時，哈維爾發起了對他們的聲援活動，這立即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知識文藝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和參與，最後終於迫使當局讓步，並促成了互相隔離、志趣各異的各種團體走到了一起。在後極權制度的社會裏，哈維爾的這種全新的鬥爭策略確實非常有效和高明，它讓當局對付起

來感到非常難受和吃力，當局除了妥協幾乎沒有其他道路可走，而這種妥協無疑會推動社會的真正進步，並對其他公民起到了良好的示範效應。

另外，哈維爾還主張進行合法抗爭，完全排斥暴力革命的選擇。在《無權者的權力》這篇論文中，他繼續說道："強調法治是後極權制度特定條件下的自然體現，是瞭解其特徵的必然結果。如果存在兩條為自由社會而鬥爭的途徑——一條是通過合法手段，另一條是通過起義（武裝的或非武裝的）——那麼，在後極權制度下採取第二條途徑是極為不恰當的。……社會把起義看著是對社會本身的攻擊，不但不支持起義，反而極有可能倒向制度一邊，因為它覺得制度起碼在某種程度上保證法規法治。……顯然，起義的企圖不僅在政治上死路一條，在技術上也沒有成功的可能。……不但面臨著國家（和超國家）政權機構的強大鎮壓，而且還會受到社會本身的反對。……'持異議者'頗懷疑不擇手段來改變制度和更換政府，也懷疑為了這些'根本的'變革來犧牲'不重要'的東西即人的生命。那樣的話，尊重理念就超過了尊重生命，是人類又一次面臨奴役的危險所在。……用暴力製造的未來只會比現行制度更糟糕。換句話來說，暴力換得的未來只會打上暴力的致命烙印。"因此他主張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公民們應當通過訴諸法律來解決問題並推動社會的進步。

雖然後極權制度下的統治者們總是用法律來裝飾自己的門面，用高尚的言辭來樹立自己的合法性，而實際上這些法律和意識形態具有很大的欺騙性，但哈維爾還是認為這種制度離不開法律，人們剛好可以通過訴諸法律的手段來揭示它的欺騙性，從而迫使當局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推動社會的真正進步。他說："人們堅持不懈地訴諸法律——不僅是有關人權的法律而且是全部的法律，表明他們並不對法律存有幻想，他們深知法律扮演的角色。正因為他們明

知現行制度絕對依賴法律，依賴它的崇高言辭，他們更明白這樣的訴求有什麼意義。因為現行制度不能沒有法律，它非得作出遵紀守法的樣子，於是不得不對訴諸法律的呼聲作出回應，要求依法行事就是生活在真實中的一樁行動。這樣就威脅到了虛偽結構的頂峰。這樣的訴求一次次讓人們看清了它純粹外衣的性質，作為擺設的性質，從而間接地迫使躲在法律條文背後的人們為了自己的良心也為了給外界製造良好形象，以及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這是制度的自我保護機制的一部分），或者乾脆就是怕別人抱怨他們在執行儀式時過於笨拙，他們不得不做的好一些。”也就是說，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儘管我們面對的是虛假的法律，但我們仍然可以“假戲真做”，讓統治者在自己制定的法律面前感到難堪，從而不得不妥協退讓，直至最後把“權力”這只老虎關進籠子裏。

當哈維爾開始提出這些全新的理論時，受到了許多人的嘲笑，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就公開說哈維爾所主張的這種抗爭將不會起到任何作用，但事實最後證明，哈維爾的這套全新的民主實踐理論在瓦解後極權主義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捷克斯洛伐克最後能順利地完成社會的民主轉型，哈維爾以及他的思想居功至偉。

對照哈維爾的思想主張，反思我們過去的作為，我們確實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比較重視政治運作，動不動就成立一個組織或制定一個綱領，殊不知這對後極權制度下的人民來說，他們根本就不感興趣。其實只有當人民的政治熱情已經被喚起之後，他們才會關注政治組織或政治綱領，也就是說那時才是我們成立組織和公佈綱領的最佳時機。如果時機不到，我們貿然成立組織或公佈綱領，我們不僅難以得到人民的理解和同情，而且容易受到當局的嚴厲鎮壓。長期以來我們總是在自己狹小的圈子裏自言自語，不願意或不屑於關心人民的真正希望和要求，不注重分析和研究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致使我們與人民和社會實際嚴重脫離，

日漸成為了一個沒有影響力的邊緣化的群體。其實在後極權主義時期，我們完全可以從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利出發，幫助人民改善自己的生活處境和爭取應有的權利和利益，這不僅可以壯大我們的力量，而且可以實實在在地促進中國社會的進步。“孫志剛案”和“鄧玉嬌案”告訴我們，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之下，當局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讓步的。所以我們要繼續開展各種形式的維權活動，這是我們在後極權社會裏進行鬥爭的一種十分有效的方式。

當今的中國政府也與前捷克斯洛伐克當局一樣，喜歡以美妙的言辭來裝飾自己，儘管它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欺騙人民從而維持自己的統治，但我們完全可以以此來要求政府履行自己的諾言，它一旦履行自己的諾言，我們就可以推動社會的進步，而如果它不願履行諾言，它的形象自然會在人民面前受到損害，人民就會逐步看清它的本來面目，從而最終對之唾棄。所以在後極權主義時期，我們應當以一種高明的鬥爭策略來指導我們的行為，我們要善於抓住典型事件，喚起人民的高度關注，使當局不僅不敢隨便鎮壓，而且最後還必須退讓妥協。這要求我們在參與這些事情時一定要依法行事，這樣才能迫使當局依法辦事。只要當局願意越來越經常地按照法律來解決問題，中國社會就可以慢慢地實現進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應提出過高的政治訴求，不要嚇跑群眾，也不要給當局鎮壓製造藉口，同時還要杜絕暴力和無政府狀態的出現，要引導人民合理合法地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我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訓練和提高人民的公民意識，同時也要培養政府的法制意識和養成依法辦事的習慣，這是未來民主中國不可缺少的基石。我們必須明白，未來的民主中國不是一個理想的空中樓閣，不是將西方成熟的民主制度照搬過來，而是應當在中國這個土壤上一步一步成長起來。如果人民和政府沒有養成民主的習慣，未來的中國就難以避免辛亥革命之後那種反復情況的出現。

因此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中，我們不應當像傳統政治鬥爭那樣以實現政權更替為目的，而應當以改善人民的生存處境、讓人們像一個真正的人或真正的公民一樣生活為目的，應當以恢復人的尊嚴和自由、確保人性得到弘揚而不是被扼殺為目的，應當以實現社會公正、讓權力受到限制為目的。作為率先覺醒的中國公民，我們不應當首先把自己定位為一個顛覆一切的革命家，而應當首先在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中活得像一個人的樣子，活得像一個公民的樣子。我們不要成天熱衷於搞組織或制定綱領，而應當將主要精力用於如何真正促進中國社會進步的事情中，用於如何有效地捍衛我們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利。對於中共當局和與我們打交道的具體官員，我們不要把他們簡單地當成敵人，而應當把他們看成可以做出某種改變甚至會做出妥協的對手，我們應當經常告訴他們，雖然他們一直在充當這部反人性國家機器的幫兇，但他們同時也是受害者，他們對我們追求人權和公民權利的行為愈是兇狠地鎮壓，那他們或他們的親人有朝一日也會受到這部國家機器的同樣戕害。所以我們要勸告他們要學會拒絕，對於明顯惡的命令或法律，他們應當本著自己的良心做出正確的選擇。總之，只要我們始終高擎“公開、理性、法治和非暴力”的大旗，中國社會的和平民主轉型就會越來越有可能變為現實。

咀嚼哈維爾的言論和思想真的對我們大有裨益，我們可以變得更加理性和寬容，也可以變得更加堅定和自信。我們可以把哈維爾的思想與中國的社會實際結合起來，走出一條更加有效的民運新路，確保中國社會朝著“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的目標順利轉型。

寫於 2009 年 12 月 2 日　四川遂寧“百盛家園”

從“人民當家作主”說起

在當今世界上，沒有哪個詞語能夠像“民主”這個詞語這樣受到如此廣泛的濫用。例如，中共就一直宣稱自己信奉民主，過去它提出過“新民主主義”，後來又提出過“人民民主專政”和“民主集中制”，現在又提出了“社會主義民主”和“黨內民主”，甚至在一首歌頌中共的歌裏還寫道“實現民主好處多”。然而這些辭藻與我們所理解的民主幾乎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也與民主這個概念的真正含義相去甚遠。所以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厘清民主這個概念的的基本含義就顯得十分必要。那麼到底什麼是民主呢？相當多的人也許會這樣回答：民主就是指人民當家作主。應當說這句話沒有全對，但也沒有全錯，它之所以沒有全對，是因為民主這個概念的內涵遠比這種描述更為深刻和豐富；它之所以沒有全錯，是因為這種描述揭示了民主這個概念最直接的內涵。這種描述雖然簡單，但它卻被當今社會大多數人所認同，甚至連中共也從來沒有反對這種意義上的民主，我們這些長期追求民主的民運人士自然也不會反對這種意義上的民主，因此這種對民主的最直接的描述應當是我們和普通人甚至當局之間的一個共識，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來厘清民主這個概念的真正含義。

我們知道，民主這個觀念來自西方文化。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也有樸素的民主思想。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國人就有了天下為公的觀念，因此我們看到了堯舜禹們實行的禪讓制度。儒家學說中也有大量的民本主義思想，例如孟子就曾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天下為公的觀念和民本主義思想與現代民主理論並不衝突，在現代民主理論看來，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國家的

唯一主人，任何個人和組織都無權將國家的政權長期據為己有，不管是誰要獲得國家的政權，必須基於人民的普遍同意，必須實現人民的意志，如果違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就有權推翻他們的統治。但是在中國歷史上，這種天下為公的觀念和民本主義思想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實踐，在堯舜禹時代之後，中國社會就出現了家天下的統治，統治者逐漸將國家的一切視為自己的私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因此除了少數比較賢明的君王，大多數統治者都會漠視人民的希望和要求，都會犧牲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來滿足自己的私欲和享受。尤其是從秦朝開始，中國的專制統治越來越強大，專制制度也越來越完善，人民完全失去了主人的身份而變成了受統治者壓制和奴役的臣民甚至奴隸。直到今天，人民在獲得“解放”之後也並沒有完全成為國家的主人，雖然憲法規定公民享有諸多民主權利，但人民卻從來沒有真正享受到這些權利，許多像我們一樣勇敢天真的公民企圖爭取和得到這些權利，其結果卻是遭受被鎮壓的命運。所以，不管是家天下，還是黨天下，它們在本質上都是與人民對立的專制統治，它們都與民主的理念格格不入，它們都違背了人民的意志。幾千年來中國人民從來沒有成為這個國家的主人，這是中國人民的巨大悲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癥結所在。

中國社會一直缺乏民主，中國人民一直不能當家作主，中國傳統文化對此要負很大責任。中國傳統文化太強調德治，它將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福祉完全寄託在統治者的道德修養上面，並對統治者提出了許多道德期盼和道德約束，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道德期盼和道德約束往往是不可靠的。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希望聖人來治理天下，但現實中的統治者卻不可能是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聖人，他們也跟常人一樣會有私心、會犯錯誤，面對這種情況，中國傳統文化卻缺少相應的制度約束，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缺

失。因此儘管中國文化中一直有天下為公的觀念和民本主義思想，但卻從來沒有落實這種思想觀念的具體制度。直到今天我們還看到，中國各級政府官員常常宣稱自己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但我們卻沒有看到當局為此制定過任何的制度，連官員定期申報財產這麼簡單的制度都拖到現在還未實行。所以，要使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我們應當設計並安排出相應的制度。

林蔭道上，步伐堅定

在這方面西方文化走到了我們的前頭，他們在很早的時候就創立了很多民主的政治制度，現代民主制度的許多原則和內容在二千多年前的希臘就已經出現了，並且經過千百年來的發展和完善，一種成熟的現代民主制度已經在西方國家普遍得到確立，而且正在世界各國推廣和普及。中國文化向來具有包容性和融合能力，在國門

早已打開的今天，我們不能對這些先進的文化熟視無睹，我們應當加以接納和消化。中國的現代化不可能還是歷代王朝興衰的重演，中華民族要想繼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必須痛下決心向西方學習，必須在我們的文化中注入新鮮的血液，必須建立民主的社會制度。如果統治者還繼續貪戀專制制度的各種好處而不願進行變革，那麼作為國家的主人，人民就應當自覺起來完成這樣的社會變革，讓中國社會未來的命運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讓人民的意志得到真正的實現，讓人民的福祉得到可靠的保證。

在我們看來，要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首先要保證人民有權選擇統治者，這一點對人民的福祉至關重要，也是民主的重要內容。人民當家作主，並不意味著人民直接來管理國家，管理國家需要專門的知識和能力，人民只需要選擇那些有專門的知識和能力並能代表自己的意志的人來管理國家就行了。那麼人民如何來選擇統治者呢？我們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實行自由、公開的選舉。在中國歷史上，人民從來沒有選舉過統治者，政權的更替主要表現為流血的暴力奪權方式，每一次朝代更替甚至每一次權力交接都充滿了謊言、陰謀和暴力。這種暴力奪權的後果十分嚴重，它不僅會導致社會動盪，而且會讓人民蒙受巨大的災難，每一次暴力奪權都會使中國社會出現全面的倒退，因此從秦朝到漢朝，再到唐朝、宋朝、明朝、清朝，中國的社會總是毀壞了再重建，發展了又遭破壞，歷時兩千多年中國的社會並沒有實現真正的進步。所以我們很反對這種暴力奪權的政權更替方式，不管這種方式是以多麼崇高的理由或多麼堂皇的藉口。時代進步到今天，我們不能容許這樣的災難再度發生，我們不能容許中國的歷史再度陷於這種惡性循環之中，我們必須選擇一種更加理性、更加文明、更加有智慧也更加代表人民意志的政治制度來保證政權的和平轉移。通過參考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我們認為自由公開的選舉制度最能代表人民的意志，也最能保證社會

的和平穩定，這種制度正是現代民主制度最重要的部分。

在現代社會裏，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公開自由的選舉，我們就可以判定它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也沒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共已經執政六十年了，但它從來沒有搞過公開自由的選舉，它仍然抱著“打天下的就應當坐天下”的陳舊思維，缺少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合法性。即使六十年前人民擁護它打敗了國民黨，但這並不意味著六十年之後人民仍然會繼續擁護它。因此中共要想繼續領導這個國家，就必須重塑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就必須通過公開自由的選舉來得到人民的認同和授權。

然而，一場真正自由、公開的選舉實行起來也是很複雜的，讓人民來投票是容易的，但要確保這場選舉是一場真正公正的選舉則是很困難的，這還需要若干制度性保證。例如為了保證選舉的公正，就應當允許不同政治勢力的存在，如果只是一種政治勢力參與選舉，這樣的選舉肯定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這樣的選舉只是政治上的作秀，難以得到人民的認同。因此要實行公開自由的選舉，就必須實行多黨制，讓人民在各個黨派之間進行選擇。中共幾十年來也搞過一些選舉，但由於中國是一個一黨制國家，因此人民實際上並沒有選擇的機會。在這樣的選舉制度下，即使執政者以百分之百的高票當選，這也沒有任何意義。

近年來，中共在推行差額選舉制度，目前它又在強調黨內民主，這比以前有所進步，但離真正的公開自由選舉還差得很遠，真正的公開自由選舉離不開多黨制。需要說明的是，中國現在的多黨合作制並不是多黨制，因為那些民主黨派並沒有自己獨立的黨格，與其說它們是一些政黨，還不如說它們是中共的週邊組織，因為它們都在自己的黨章裏明確表示要接受中共的領導。另外，為了保障選舉的公正，各種政治勢力或政黨還應當進行充分的自由辯論，讓人民能夠分清真理和真相，讓人民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這就要求實現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如果某種政治勢力不能自由發表言論，不能自由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它的對手卻控制著所有的新聞媒體，那麼這樣的選舉就不是一場公正的選舉。同時為了保證權力的交接能平穩進行，在競選過程中，所有參與競選的政治勢力都不能訴諸武力，因為武力脅迫下的同意很可能就強姦了民意，這就要求軍隊、員警等國家機器必須嚴守中立，而不能為任何一個政治勢力所利用。所以軍隊、員警必須實現“國家化”，他們不能參與國內政治鬥爭。軍隊、員警本來就是國家的公器，它們應當為國家、人民負責和服務，而不應當成為某個個人或政黨的利用工具，它們應當明白，是人民而不是某個政黨在供養這些軍隊和員警。最後，這種公開自由的選舉必須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定期舉行，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兩次選舉的間隔一般在五年左右，間隔太長的話，執政者可能就會為了自己的私欲而違背民意。

在我們看來，要使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還必須讓統治者或者政府受到人民的監督和制約，不能讓他們在執政期間為所欲為。就統治者和政府而言，他們總是希望自己的權力越大越好，他們總想控制社會的方方面面，總想讓人民對他們感到恐懼並屈服於他們的統治，因此他們從本能上就會追求無限的權力，他們很容易走向專制。自秦以降的二千多年來，中國的專制制度越來越完善，中國的專制統治越來越強大，這就使得整個社會的自由空間則越來越狹小，人民的力量也越來越弱小，人民的苦難也越來越深重了。因此一個強大的統治者或者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對人民來說並不是好事，在這樣一個強大的統治者或者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的統治下，人民根本就不可能當家作主。

因此，為了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為了確保人民的福祉不受到侵犯，我們必須限制統治者或政府的權力，我們必須把權力這只老虎關進籠子裏。在當今世界的民主國家裏，政府的權力是非常有限的，

人民隨時都在提防政府擴張自己的權力，隨時都在提防政府可能會侵害自己的自由和福祉。在這樣的國家裏，統治者或政府想亂用一分錢都是不可能的，他們想做任何事情都必須得到人民的代表的同意。但是在我們中國，統治者或政府卻可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根本就無需征得人民的同意，他們可以以舉國之力舉辦一次盛大的奧運會，也可以將幾千億美元用來購買美國的國債，在做出這些決定時他們從來沒有徵求過人民的意見。鄧小平曾經說過類似這樣的話：權力集中有很大的好處，我們可以很容易做大的事情。但是鄧小平忘了，具有絕對權力的毛澤東，很輕易地把他本人下放到江西去改造，很輕易地奪去了國家主席的生命，很輕易地讓這個民族蒙受了十年浩劫的巨大災難。事實上，在那些民主國家裏，政府的權力雖然受到制約，但他們仍然可以做大的事情，他們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點也不遜於鄧小平們的事業。在權力受到制約的民主國家裏，統治者或政府只能幹好事，想幹一件壞事都很難，而在權力不受制約的國家裏，統治者或政府卻既可以幹好事，也可以幹壞事。因此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我們不能再放任統治者或政府為所欲為了，我們必須對他們的權力進行制約和控制。

由於人性中有惡的動機，任何一個人或一個政黨在得到權力以後，他們都有可能會為了自己的私欲而違背人民的意志，因此我們必須對權力本身進行制約，我們不能讓某個人或某個政黨獲得絕對的、不受控制的權力。中共長期以來實行所謂的“民主集中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民主是假，集中是真，其結果就是讓某些人具有了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這樣的絕對權力如果落在有道德的人手中，可能還能給人民帶來一些好處，但如果落在品行惡劣的人手中就可能會帶來嚴重的災難。政治學原理告訴我們，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當今中國社會的普遍腐敗，都表明絕對的權力會給一個民族造成多麼嚴重的損害。“八

九”之後，中共開始重視自身的腐敗問題，要求各級官員要廉潔自律，但二十年來日益嚴重的腐敗事實表明，這種道德上的制約是多麼地虛弱無力，有識之士早就指出，要解決腐敗問題必須從制度方面著手。因此我們應當建立一套制約權力的制度安排，使執政者受到這種制度安排的約束。參考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我們認為“三權分立”的制度能夠較好地制約權力、克服腐敗。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已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得到卓有成效的實踐，中共不應當頑固地拒絕。同時為了有效地監督和制約政府的權力，新聞媒體也必須具有獨立的自由報導權力，它們不能成天為政府歌功頌德，而應當對社會問題予以足夠的關注，必須對政府的失誤進行及時的披露。在許多成熟的民主國家裏，新聞媒體的監督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被稱為“第四權力”，是制約政府或統治者的一個十分有效的途徑。

劉賢斌夫婦與李宇、陳衛全家在一起

當然，對政府或統治者最強有力的制約和控制來自離不開人民，這就要求人民具有各項基本的自由和權利。這些基本的自由和權利主要包括：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集會自由。信仰自由是指人民有權決定自己信仰什麼樣的價值理念，他可以相信無神論，也可以相信有神論，他可以相信社會主義，也可以相信自由民主主義，他可以成為一個基督徒，也可以成為一個法輪功修煉者，他選擇什麼樣的信仰完全是他自己的自由，政府對此無權干涉，政府無權將一種價值理念強加在人民的頭上。任何一種價值理念，不管它自認為多麼正確和先進，不管它自認為對社會和人民有多麼重要，人民都有權自己決定相信它或是拒絕它。

言論自由是指人民有權自由發表言論，他可以公開批評政府，也可以公開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只要他的言論沒有對他人或政府構成誹謗，只要他的言論沒有宣揚暴力、色情或明顯違背人類基本道德的主張，政府就無權進行干涉和壓制。結社自由是指人民可以為了保障自己的權利或利益不受侵犯而聯合起來組建各種社會組織，他們可以依賴這樣的組織與政府進行交涉和談判，以免政府對他們的權利或利益進行過度的侵犯。

在當今中國，農民作為一個最大的社會階層卻沒有能夠代表自己意願的農會存在，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也難怪農民的權利或利益一直受到政府最嚴重的侵犯。這些社會組織是一些獨立的組織，而不應當是政府的週邊群眾組織，一旦它依附於政府並成為政府的週邊組織，就像中國現在的工會那樣，它就再也不會自覺保護人民的權利或利益。集會自由是指人民可以走上街頭或廣場表達自己的各種願望，迫使政府解決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長期以來，當局一直將公民的集會示威行為看成是“社會動亂”，但在西方民主國家，這卻被看成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是人民表達自己意志和願望的重要方式。只要社會的法治秩序沒有受到破壞，人民的集會

示威就是正當的行為，政府就無權對之進行鎮壓。所有這些權利都是人民作為國家的主人本應擁有的權利，任何政府都無權予以剝奪和限制。一個政府如果對人民的這些權利進行剝奪和限制，這樣的政府就肯定不是一個民主的政府，即使它在憲法中寫進了這些權利，但人民如果不能在事實上予以履行，它就難以擺脫專制政府的惡名。

所以，“人民當家作主”說起來是很容易的，但要變成現實卻是很複雜的，這需要我們建立若干制度性保證，這需要我們在社會生活中確立自由公開的選舉制度、多黨競選制度、軍隊、員警的國家化、新聞自由、三權分立制度以及公民的信仰、言論、集會、結社的各項權利的完全實現，沒有這些具體的制度性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就會淪為空談和謊言。因此，真正的民主絕不只是在口頭上承諾“人民當家作主”，真正的民主離不開公民自由民主權利的確立，離不開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和限制，真正的民主就是《零八憲章》所昭示的憲政民主。顯然當今中國社會距此目標還相當遙遠，中國的民主之路上還佈滿荊棘和陷阱，所以我們每一個有志於追求民主理想的人從現在起就要大力宣傳《零八憲章》的精神並儘快推動《零八憲章》在中國社會中結出碩果，這樣才能實現從根本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2010 年 1 月 12 日

圍棋中的民運啟示

多年來，我一直喜歡下圍棋。我的圍棋啟蒙老師是我的妻子陳明先。大概在 1995 年，我們結婚後不久的一天，她在我面前說起她會下圍棋，於是我就到商店買了一副圍棋並請她教我，不料三天之後，她就不是我的對手了，但由此我卻與圍棋結下了不解之緣。後來我在空閒的時候就經常找人下棋，有時候還買一些棋書來看，不知不覺中就達到了業餘初段的水準。

後來在從事民運活動中，我碰到了許多會下圍棋的民運朋友，四川的李作、李必豐、胡明軍、杜力都與我下過棋，只有李作的水準與我差不多，因此他每次來遂寧找我的時候，我們就會抽空殺兩盤。後來我又知道西安的楊海、張鑒康也喜歡下圍棋，聽說張鑒康還是業餘三段。由於每次到西安都是來去匆匆，我就沒有與他們下過棋。聽說浙江王有才也是業餘三段，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因此也無緣向他討教。1999 年初我到杭州時，王有才已經進去了，我就與祝正明在王榮清的家裏下了兩盤棋，王榮清、吳義龍都在旁邊作壁上觀。

在川東監獄服刑的時候，我們每個週末都可以娛樂，這時我一般都會找人下棋。川東監獄的圍棋水準很高，我們監區就有一個業餘三段，後來又碰到了一個業餘五段。由於經常與這些高手過招，我的圍棋水準也長進了不少，現在大概有業餘二段水準。監區每逢大的節日都會舉行圍棋比賽，我曾經獲得過監區的圍棋冠軍。那次我居然戰勝了那個業餘三段，這讓我興奮了好幾天。川東監獄每兩年會舉辦一次服刑人員運動會，其中也設有圍棋比賽專案，每次我都會代表監區參加比賽，但多數時候是遭到淘汰，只有一次我獲得

過全獄比賽的第三名。

2003 年因在網上加入民主黨而被判刑八年的李志來到了川東監獄，他在五監區，我在六監區，由於我們都屬於監獄嚴格管理的對象，因此平常我們根本見不上面，更別說溝通交流了。後來在 2004 年的監獄運動會上，李志也參加了圍棋比賽，我們終於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了。其實李志的圍棋水準並不高，當時我大概可以讓他四子，但能在比賽之餘繼續切磋棋藝，我們都很高興。我們一邊下棋一邊交流資訊和思想，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從此每屆運動會的圍棋比賽就成為了我們見面交流的唯一機會。記得有次李志告訴我說，出去後我們不要再搞那種比較激進的活動了，我們應當像一個公民那樣去生活，應當像一個公民那樣合理合法地追求自己的權利。對此觀點我很贊同，出來之後我也基本上是這樣要求自己的。2008 年我即將滿刑，於是在我的最後一次運動會上我送了許多書給李志，既有政治哲學方面的書籍，也有我訂購的圍棋雜誌。

這次出獄之後，我下棋的時間少了，但有一次我卻與歐陽懿聊到了圍棋這個話題。歐陽懿是我的高中同學，也是四川的一個老民運，他不會下圍棋，但他在幾年前寫過一篇《民運如棋》的文章，在文中他從現代博弈論的角度談到了民運的策略問題。我雖然一直沒有看過這篇文章，但這篇文章的題目卻給我以極大的啟發。作為一個老民運，作為一個圍棋愛好者，我想如果我來講一下圍棋理論與民運理論的關係，可能比不懂圍棋的歐陽懿說得更加內行一些。因此在此文接下來的部分，我就準備從下圍棋這個角度來侃一侃民運的策略問題。

在學會下圍棋之前，我本來是喜歡下象棋的，但迷上圍棋之後我就很少下象棋了。因為在我看來，象棋比賽只是短兵相接，就像一場戰爭中的一個局部戰鬥一樣，而圍棋比賽則像一場全面戰爭，整個棋盤上到處都是硝煙彌漫，因此我覺得下圍棋比下象棋更過

癮。在象棋比賽中，如果自己損失了一顆棋子，那麼自己很快就會面臨被動的局面甚至輸棋，但在圍棋比賽中，自己損失一顆棋子並不會帶來嚴重的後果，有時候出於全局的考慮，我們還會經常故意棄子，不是棄去一顆，而是棄去許多顆，我們雖然有可能在一個局部的戰鬥中處於不利的境況，但換來的卻是全局的主動。所以要下好圍棋，光憑喜歡搏殺的勇氣顯然是不夠的，你還必須具備良好的大局觀，你必須學會不貪戀小利，要明白“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由此我想到在從事民主運動中，我們每一個民運人士都應當具有大局意識，該犧牲的時候就應當犧牲，該忍辱負重的時候就應當忍辱負重，不要把自己的小利看得太重，不要成天只是想自己或自己的小圈子的發展，也不要意氣用事動輒以激進的行為去綁架整個民運。

李宇、劉賢斌、陳衛在臨江閣前合影

在圍棋比賽中，每一顆棋子的效能和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就像

我們社會中每個公民的權利和地位是完全平等的一樣，每顆棋子的價值就在於它必須為全局的勝利充分發揮自己的效力。由此我想到，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中，我們每一個民運人士和每一個反對專制統治的公民儘管所從事的具體活動不一樣，但每個人的努力都必須受到尊重。有些人比較擅長寫作，通過發表言論來影響周圍的民眾；有些人比較喜歡與底層民眾接觸，從事一些草根維權活動；有些人宗教情懷很濃，投身於各種宗教活動；有些人善於思考，致力於民主憲政理論的研究和突破；有些人適合組織運作，善於把大家團結在一起。在我看來，這些都是民主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每一種活動方式都對專制社會的瓦解和公民社會的建立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不能因為自己在從事某種方式的活動，就指責其他人的活動方式不正確，相反我們應當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關心，只要是因為行使自己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利而受到當局的鎮壓或壓制，我們都應當對之予以強有力的關心和援助。我相信，只要每一個民運人士或公民按照自己的抗爭方式不斷努力，只要每一個人充分發揮自己的效力，專制統治是很難能夠長期維持下去的。

另外，在圍棋這種遊戲中還有許多專門的術語用來指稱下棋過程中的各種爭鬥情形，我發覺用這些術語來分析民運人士的一些具體行為方式也非常有趣。例如圍棋中有個術語叫“俗手”，意思是比較平庸的手段，這種手段除了讓自己被動地逃跑或活棋之外，對對手根本就沒有什麼壓力，這是棋力不高的表現。我們大部分民運人士在民運活動中都會有這種表現。還有個術語叫“惡手”，也就是臭棋，它不僅對對手沒有什麼威脅，而且反而會使自己境況迅速惡化，這是下棋的人最忌諱的事情。在民運活動中，我們會經常看到有個別民運人士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中走出“惡手”，他們做事情總是缺少常識感，做出來的事情讓人啼笑皆非，不僅對自己不利，而且對民運大局也會造成不小的傷害。還有個術語叫“過分

手”，這是一種過分自信、輕視對手的表現，如果遇到棋力較低的對手，這種手段可以讓自己獲得一些便宜，但如果遇到與自己棋力相等或更強的對手，則會使自己付出慘重的代價。在民主運動中，激進的朋友特別容易走出“過分手”，他們總喜歡以貌似激烈的手段出擊，雖然一時間可能會讓大家感到很興奮，但最後的結果卻往往會讓整個民運付出代價。所以我非常希望各地的民運朋友加強自身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水準和實踐能力，少走一些“俗手”，儘量避免走出損害自己和民運、而讓對手高興並讓旁觀者笑話的“惡手”和“過分手”，沒事的時候可以“打打譜”，學習學習高手的“對局”經驗，這是提高“棋藝”的一個有效途徑。

與“過分手”相對的是“本手”，意思是順其自然、恰如其分、本來該採用的手段，它不僅可以化解對方的攻擊，而且同時還會給對方施加一定的壓力，因此這是一種攻守兼備的手段，那些棋力高超的棋手在一盤棋裏幾乎走的都是“本手”，不給對方一點可乘之機，從而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與此相對應，我們看到在民主運動當中，那些常識感強或者身經百戰的經驗豐富的民運人士做事情就很有分寸，他們既能堅定不移地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又能避免受到當局的嚴厲打壓，使民運力量得到穩步的發展，這就與圍棋的“本手”原理相合乎。還有一個術語叫“手筋”，也叫妙手或好棋，它能讓自己完全掌握主動而讓對方完全陷於被動。“手筋”又分為防守型的“手筋”和進攻性的“手筋”，防守型的“手筋”可以讓自己立即擺脫對方的進攻，使自己化險為夷，進攻性的“手筋”則是在看到對方破綻時給對方致命一擊，這種“手筋”使用出來小則可以確立局部優勢，大則可以讓對方全局崩盤，是圍棋活動中最厲害的手段。但在高手對局中，攻擊性的“手筋”是不容易走出來的，因為對手不會輕易給你這樣的機會。不過由於專橫狂妄和利令智昏，中共當局現在顯然不是博弈的高手，因此他們會經常露出破綻，

甚至會犯低級錯誤，所以我們現在有許多機會可以走出“手筋”，讓它陷於被動的狀態，確立我們的局部優勢甚至全局優勢。比如說2008年底《零八憲章》的發表就是一記漂亮的“手筋”，中國民運以極小的代價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又比如在“鄧玉嬌”事件中，由於地方官員的狂妄、愚蠢和笨拙，我們又以漂亮的“手筋”讓當局陷入了被動，最後終於迫使當局妥協退讓。所以在民運活動中，我們應當儘量走出“本手”，這樣我們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當對方出現漏洞時我們就看準時機施展“手筋”，給對方致命一擊，從而確立我們的優勢。

在圍棋遊戲中還有一個術語叫“大場”，也就是全局最有價值的地方，誰先搶到“大場”，誰就容易獲得主動和優勢。所以高手下棋經常要考慮“脫先”，有時候他們不會糾纏於局部的小利，而會“脫先”搶佔“大場”，這是圍棋遊戲中的高級手段。但是在幾個“大場“中間如何判斷哪個“大場”的價值更大也很困難，這是令高手常常感到困惑的地方，也是圍棋最玄奧的地方，只有最頂尖的高手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但有時候一盤棋中也會出現明顯的“大場”，最典型的就是所謂的“天王山”，即戰略制高點，一旦搶到這個“天王山”，就可以大大限制對方的發展而擴展自己的勢力。所以我認為中國民運的領袖級人物應當隨時嚴密關注國內局勢，始終要有大局觀念，不要糾纏於價值不大的事務性事情中，而應當注意及時搶佔“大場”和“天王山”，使中國民運得到巨大的發展。但是“大場”的價值再大，也不如“急所”重要，因為這個“急所”一旦被對方控制，自己就只有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急所”的意思就是“當務之為急”的那個地方，就是指當雙方發生激烈戰鬥時那個決定生死存亡的地方。在前蘇聯瓦解過程中，葉利欽勇敢地爬上坦克在我看來就是搶佔了“急所”，他由此而迅速扭轉了整個局面。所以在中國未來的民主浪潮中，民運領袖一定要注意

搶佔“急所”，否則再好的形勢也有可能在我們手中葬送，就像二十年前我們親手葬送“八九”民運一樣。

當然，目前中國民運的力量還非常弱小，還無法與專制統治進行最後的決戰，所以目前國內民運的主要任務應當是如何生存和發展、如何堅持長期抗爭。初學圍棋的人都知道，一塊棋只要做出了兩只“眼”，對方就會拿它沒辦法。所以我認為目前國內各個地方的民運人士應當儘快積聚力量，加緊建設，使每個地方的民運力量具有韌性和長期抗爭的能力，只要全國各地的民運人士都把自己那塊地盤做活了，中國民運就基本上立於了不敗之地。在我看來，目前北京、浙江、貴州、西安和四川等幾個地方的民運力量基本上已經做活了，他們現在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很有層次，這樣他們就具有了較強的抗打擊能力，當局很難能夠把他們一下子消滅乾淨。但是其他地方的情況卻不是很好，要麼“子力”太少，僅靠個別人勉強支撐，要麼“棋形”不整，“子力”分散而沒有戰鬥力，這樣的地方很容易被當局擊潰。所以“子力”太少的地方應當積極發展力量，“棋形”不整的地方應當加緊內部建設，儘快形成凝聚力和戰鬥力，這樣才能為全局的勝利貢獻自己的力量。

人們常說：世事如棋局局新。古往今來圍棋對局何止千萬，然千古以來無同局。中國歷史源遠流長，而中國的民主變革卻是幾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如何更加平穩地完成這場大變革是我們每一個民運人士都必須思考的問題。這場社會大變革雖然是一場全新的社會政治運動，但有些基本的方式方法也可以從此前發生的世界各國的民主運動中和中國近百年的民主憲政史上找到答案，就像我們通過“打譜”也可以掌握圍棋的基本技戰術一樣。只要我們熟練地掌握了這些基本的技戰術，我們就可以下出精彩的對局。

寫於 2010 年 1 月 8 日四川遂寧“百盛家園”

專制統治的最後壁壘

歷代專制王朝的興衰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朝代都大致經歷了兩個時期：充滿活力的上升時期和勉強維持的衰敗時期，這是中國歷代專制王朝興衰的一個鐵律。在充滿活力的上升時期，由於人心思定，再加上統治者謹慎治國，統治者往往能夠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他們所宣揚的“天命在茲”的謊言也能被大多數人所接受。在這個時候，一些對社會現實不滿的人或窺視最高權力的人企圖反抗或作亂，最後基本上都以失敗告終。如周朝的“管蔡之亂”、漢朝的“六國之亂”、晉朝的“八王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宋朝的“王小波、宋江、方臘之亂”都不能從根本上動搖當時的統治秩序。但是到了後來，由於專制統治的權力的不受制約，很容易走向腐敗，人民利益普遍受到嚴重侵犯，社會矛盾會急劇惡化，這個時候人民就會渴求社會的變革，人心就會思變，這個時候人們不會再相信統治者“天命在茲”的謊言，而會議論說這個朝代“氣數已盡”，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少數幾個人振臂一呼，天下人就會群起回應，既存的統治秩序就會很快土崩瓦解，而那些窺視最高權力的陰謀家也很容易取得成功，中國歷代專制王朝基本上就是這樣覆滅的。

將審視歷史的眼光轉向現在，可以發現當今中國社會似乎也難以擺脫受到這個鐵律的制約。中共建政之後，不管它的理論宣傳現在看起來是多麼的荒謬，但一開始它確實是得到人民廣泛擁護的，人民真的對它抱有很大的希望，否則它就不可能取代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而且在它建政之後的前面 30 年裏，大多數人是真心相信

它那一套理論宣傳的，是真心相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這一現代天命論的。因此我們看到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那些被專政的“敵人”在當時確實被人民當成了壞人，甚至連這些被專政的“敵人”也經常認為自己確實很反動。所以，儘管“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和“文化大革命”對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但人民還是把這些看成“前進道路上的困難”，人民還是相信中國社會能夠進行“螺旋式的上升”。在中國古時候，人民安於現狀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人民能夠有飯吃，在那個時候，“民以食為天”是一個被普遍接受的思想。但是在毛澤東時期，在中共長期的愚民教育下，人民即使沒有飯吃了也想不到要起來造反，即使成千上萬的人被餓死或被害死，人民也相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到來。但是從 80 年代開始，隨著“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尤其是“自由化運動”的衝擊，人們逐漸看穿了歷史的真相和中共的本質，其結果是導致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這一現代天命論的徹底破產，人們不想再過以前那種沒有自由、沒有尊嚴的生活，人民普遍期待國家和社會得到根本的變革。所以當北京的學生走上街頭呼喚“自由、民主和人權、法治”的時候，中國社會各階層都紛紛站出來支持和回應，中共遇到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統治危機。最後，鄧小平只好下令調集幾十萬軍隊進京，將一場風起雲湧的偉大的民主運動殘酷地鎮壓了下去，從而使風雨飄搖的中共政權維持到了現在。

八九民運失敗後的中國前途

八九民運失敗之後，許多人對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失去了希望，也對中國的未來失去了信心。但在我看來，中國的前途遠沒有那麼黯淡，因為我不相信靠軍隊、員警維持統治的政權能堅持很長的時

間，我不相信業已衰敗的統治能夠長久維持下去。毛澤東說：凡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這並不是說毛澤東不願意鎮壓學生運動，而是反映了他當時對維持自己統治的高度自信，他不相信學生運動會危害自己的統治。如果“文化大革命”的學生運動將矛頭指向毛澤東，他肯定也會毫不猶豫地進行鎮壓。只不過當時學生運動的出發點就是維護毛澤東的權威和統治地位，所以他才會說出這句還像人樣的話。在那個時候，毛澤東儘管幹盡了壞事，但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卻很高，根本就用不著動用軍隊和員警，就可以將少數“敵人”踩在腳下，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在 1989 年，中共的意識形態宣傳已經不起任何作用了，鄧小平儘管被人們看成一個偉人，但並沒有被看成一個神人，他在 1989 年對學生運動的錯誤處理方式使他個人的聲望受到了極大的損害，根據他講話精神發表的“4.26”社論不僅沒能嚇阻學生運動的發展，反而宣告了他與人民的徹底決裂，從而導致學生運動將矛頭指向了他本人。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護中共和他本人的統治利益，他只好直接訴諸武力，赤裸裸地用暴力手段將學生運動鎮壓了下去，即使留下千古罵名也在所不惜。從此之後，中共維持統治就只剩下了暴力恐怖這一最後的手段，它如果不依靠軍隊和員警就根本維持不了自己的統治地位。

20 年來，鄧小平的繼承者雖然很想重新樹立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但一切都是徒勞，遇到統治危機他們還是只有選擇使用暴力手段。這 20 年來，中共一開始以為只要經濟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會就能保持穩定，殊不知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反而會促使越來越多的人追求自由、民主權利，人民更加要求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人民更加迫切希望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現狀。後來江澤民又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妄圖從意識形態上重新建立統治的合法性，但人民根本就不把它當回事，各級政府幹部在宣傳執行的過程中也是流於形式。如今胡錦濤又提出“建設和諧社會”和“落實

科學發展觀”，幾年來也沒有取得任何實效。現在人民的權利意識已經有了很大提高，空洞的政治說教已經對他們不起任何作用，只要他們的權利或利益受到侵害，只要社會不公正落實到他們身上，他們就會起來追求自己的權利和捍衛自己的利益，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忍氣吞聲了。另一方面，中共統治集團對自己的意識形態也不再抱有幻想，他們不僅不再相信傳統的共產主義教條，而且對江澤民、胡錦濤提出的新的意識形態理論也並不當回事，他們只對自己的利益感興趣，只知道追求更大的權力和更多的利益。因此目前中國社會的最主要矛盾就是官民之間的利益矛盾，在現有體制下這個矛盾根本就無法解決，只會更加激化。所以儘管中國的經濟在這些年來取得巨大的發展，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改善和提高，但人民對中共的不滿卻越來越嚴重了。近幾年來，社會群體性事件不斷發生，這嚴重地威脅到了社會的穩定和中共的統治，因此中共才將維穩工作當成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對於這些群體性事件，中共有時會進行妥協，滿足群眾的利益訴求，但由於他們與人民群眾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利益衝突，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每次都滿足人民的要求，於是他們就只好對群體性事件進行鎮壓，只好靠軍隊和員警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只好赤裸裸地訴諸暴力手段。

軍警暴力是專制統治的最後手段

在我看來，一個政權如果到了只能依靠軍隊和員警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那麼這個政權的日子已經沒有多久了。如果我們把目光從中國移到世界各國，我們會發現，那些靠軍隊和員警維持統治的國家都在不長的時間裏實現了社會的民主變革。在上個世紀 7、80 年代，臺灣的國民黨對島內的自由民主運動一直予以嚴厲的鎮壓，許多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都被投進了監獄，但在 1988 年，蔣經國

便不得不主動推行臺灣的民主化。同樣在韓國，全鬥煥政權一開始也是對國內的民主運動進行鎮壓，民主鬥士金大中曾差點被特務綁架暗殺，1980 又用軍隊和員警製造了“光州事件”血案，但沒過多久，韓國的軍警統治就瓦解了，韓國也因此而變成了一個民主國家。在前蘇聯和東歐各國，持不同政見者也長期受到鎮壓，許多人被監禁和流放，在“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和“波茲南事件”中，人民的抗議浪潮都受到了軍隊的血腥鎮壓，但是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短短的幾年時間內，前蘇聯和東歐各國都發生了巨變，共產黨很快就退出了歷史舞臺。所以，靠軍隊和員警是無法長期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的，不管那個國家的軍隊和員警有多麼強大，他們都最終會被淹沒在人民的抗議浪潮中。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曾把天下兵器收繳到咸陽，鑄成了 12 個金人，以為這樣就可以實現他的萬世美夢，但陳勝吳廣振臂一呼，強大的秦朝也最終二世而亡。所以，將維持統治的希望寄託在軍隊和員警的身上，本身就是一種無奈的短視行為，也是一種飲鴆止渴式的愚蠢行為，這只能讓它苟延殘喘，但卻無法避免它的最後覆亡。

所以，軍警統治乃是一切專制統治的最後壁壘。如果我們看到一個政權已經喪失人心而不得不靠軍隊和員警來維持自己的統治，不得不靠暴力鎮壓來解決國內的社會危機和社會矛盾，那麼我們就可以判定：這個政權可能已經快維持不下去了，一場社會大變革可能已經快到來了。1989 年，鄧小平動用軍隊血腥地鎮壓了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之後江澤民和胡錦濤又繼續依靠軍隊和員警來維持中共的統治地位，在我看來，這一切都無法阻擋社會變革的到來，無法阻擋必然到來的民主化浪潮。國父孫中山說：“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存，逆之者亡。”為中共今日計，我奉勸它最好還是像蔣經國那樣主動實現社會變革為好，這樣雖然社會政治制度會發生根本變化，但中共卻不至於退出歷史舞臺，它還可以在未來的民

主中國佔有一席之地，如果它還繼續將維持統治的希望寄託在軍隊和員警之上，不願主動進行社會變革，我不敢想像它最後會面臨什麼樣的命運。而對於那些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人來說，在軍警的暴力恐怖面前，我們不要畏懼害怕，也不要灰心絕望，我們應當明白，暴力恐怖已經是專制統治者的最後手段，軍警治國已經是專制統治的強弩之末。當我們看到軍警們耀武揚威的時候，我們不要忘了那句老話：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寫於 2009 年 11 月 8 日，四川遂寧“百盛家園”

劉賢斌和女兒陳橋

卷三

同路人

曉波，在當今的中國社會，你已經不是孤獨的堂吉訶德，在你的身後已經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沿著你的足跡繼續前行。——《曉波，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牽掛你嗎？》

只要中國社會還存在奴役和暴政，只要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得不到保障，只要腐敗和不公義的社會現象還繼續存在，不管當局進行多麼殘酷的打壓，都難以遏制越來越多的公民奮起反抗，因為對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的追求乃是人類最原始、最深刻的內在要求。——《蜀中多義士，如韭割複生》

曉波，
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牽掛你嗎？

曉波，今天是你受到當局審判的日子，實際上也是我們所有《零八憲章》簽署者受到當局審判的日子，只是你一個人在承擔責任罷了。所以在這個日子裏，我決定要與你同行，所以我前幾天參加了一個與你共同承擔責任的簽名活動，所以我決定今天要絕食一天以對你進行聲援，所以在這一天你不是孤立的，至少在中國的西南之角有一個朋友在牽掛著你的命運，也牽掛著《零八憲章》和民主中國的命運。

曉波，我已經不是第一次牽掛你了。記得在十三年以前，你和王希哲發表《雙十宣言》之後，我曾經與一個朋友一起到你的寓所拜訪你，當時你家的樓下已經有國保人員站崗，因此我見到你之後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希望你注意安全，你很坦然地說沒關係，看得出來在這種迫在眉睫的危急關頭你的內心是很平靜的，就憑這點我就很佩服你。哈維爾說，有時候我們是值得去坐牢的，我知道你也早已參透了這點。後來你在我們面前一邊抽著“萬寶路”香煙，一邊侃侃而談，讓我們這些後進獲益匪淺。這次見面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十幾年來一直在激勵著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做出正確的選擇。所以我們雖然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在我的心目中你卻是我的良師。這次見面之後我很快就回到了遂寧，不久就得知你因為發表《雙十宣言》而被當局勞教三年，對此我感到非常氣憤，立即在家裏面起草了一份《公民言論自由宣言》，後來在朋友們的勸說下以重慶王明的名義予以公開發表，最後王明也和你一樣被當局勞教三

年。這就是我對你第一次牽掛的情況。

曉波，其實我們之間這麼多年來基本上沒有什麼直接的交往，我與你的關係遠不如廖亦武、王怡和余傑與你的關係密切和深厚，但我仍然要關注、聲援你，因為你受到當局的迫害就是因為你做了我們想做又做不了或沒有做的事情，因此我們牽掛你並不完全是牽掛你個人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是在共同捍衛公民的一些基本權利，我們牽掛你就是不想因為某一天我們在做類似的事情時遭受與你一樣的命運，就是不想我們的子孫後代以後仍然遭受與你一樣的命運。所以今天我願意與你一起承擔責任並進行絕食聲援也是基於這同樣的理由。

曉波，在當今的中國社會，你已經不是孤獨的堂吉訶德，在你的身後已經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沿著你的足跡繼續前行。你進去之後，《零八憲章》運動風起雲湧，迄今已有上萬人鄭重地在上面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去年 11 月我剛從監獄裏出來，非常幸運地在 12 月初看見了《零八憲章》的文本，有朋友出於關心勸我不要簽名，但我認為《零八憲章》代表了我二十年來一貫的思想主張，認為《零八憲章》指明了未來中國社會的唯一值得期待的前途，所以經過慎重考慮我就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有幸與你和一大批其名如雷貫耳的賢哲勇士同忝其列。從後來事態的發展來看，《零八憲章運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這是“八九”民運之後中國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我相信她會深刻地影響當今中國社會的轉型進程。所以，曉波你雖然進去了，但你的進去卻讓成千上萬個劉曉波勇敢地站了起來，中國的公民運動和民主事業從來沒有現在這樣讓人充滿信心。

今天，他們與我一樣都在牽掛著你的命運，我們已經與你一樣覺得“為《零八憲章》坐牢而感到驕傲”（自貢劉正有語）。所以今天當你受到當局的審判，我們在外面也與你一起在接受審判，我們能夠到法庭去的都去了，不能去的也在通過各種管道和方式堅定地

與你站在一起，包括一些因為各種原因沒有簽署《零八憲章》的人都在這個時候牽掛著你，此外還有許多國際進步力量在牽掛著你，其中包括《七七憲章》的領導人哈維爾也在牽掛著你。

曉波，你當然知道，今天牽掛你的還有你的對手，那些長期以來對國內民主運動進行打壓迫害的人這幾天也在牽掛著你。長期以來，他們靠謊言和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今天他們自己也感到了恐懼，他們害怕因為你被受審而發生不可控制的政治事故，害怕因此而丟掉自己的飯碗和前途，因此他們這幾天很不好過，他們被迫像看家狗一樣在寒冷的冬天守在你的許多朋友的門口，或者自掏腰包、強作歡顏地請你的許多朋友去“喝茶”聊天。所以當中國更多的人覺醒之後，當越來越多的人起來追求和捍衛自己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利的時候，專制統治的成本就會越來越高，他們最後自然會感到無力繼續下去。所以曉波，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你比當年長阪坡的趙子龍更厲害，你一個人就敵住了比你強大一萬倍的力量。我知道，你之所以會讓這麼多製造恐懼的人感到恐懼，是因為你掌握了道義這個制勝的法寶，千百年來那些真正能夠澤被後世並名垂千古的人物都有這個法寶，所以我相信你將與他們一樣而名垂後世。所以，為了道義的實現，有時候即使坐牢也是值得的。

當主耶穌被釘於十字架之後，世界上各個角落的人才慢慢享受到了祂的無盡的恩典。

審判還在繼續，宣判還沒到來，但我知道，你這個時候是平靜而坦然的，你可能也知道今天在法庭外面有無數牽掛你的人。

寫於四川遂寧“百盛家園” 2009 年 12 月 23 日

民主黨人印象（之一）
胡明軍

胡明軍是四川民主黨的一個重要領袖，我認識他緣於我的一篇文章。1995 年初我曾寫了一篇《後鄧時期與鄧後時期的中國政局》的長文，寫成之後我拿了一份列印稿給成都的王林建。當時我與王林建也認識不久，王林建是四川大學“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曾被當局關押過一年多時間，他與成都的民運朋友很熟稔。不久他就告訴我，說我的這篇文章在成都的民運朋友中得到了很高的評價，有幾個朋友很想見我。於是在他的安排下，我認識了汪建輝、袁亞娟、買天讓、杜力等幾位朋友。汪建輝是福建人，也因參與“八九”民運被當局判處勞教一年，出獄之後就在成都謀生，我認識他時，他正在《成都商報》工作，袁亞娟是他的妻子，也是成都某報的記者。有一天，汪建輝夫婦告訴我，說有個叫胡明軍的朋友在看了我的文章後也很想見我。當時我正致力於四川民運的整合工作，因此我也迫不及待地想認識他。沒過幾天，汪建輝夫婦就帶我到胡明軍家登門拜訪。

當時胡明軍住在成都西邊的“八一”中學，他的妻子在這所學校任教。胡明軍見到我後非常高興，他很熱情地與我握手，並說他已從汪建輝那裏知道了我的基本情況。在此之前，我聽見汪建輝他們稱他為"老胡"，我以為他比我們要年長許多，誰知見面之後才發現他只比我大幾歲，個頭比我略高，戴著一副眼鏡，面容白皙，舉止文靜，一看就知道他是個有思想的讀書人。一番寒暄之後，胡明軍給我們講起了他的經歷，原來他是四川攀枝花人，“八九”民運時他積極參加了攀枝花市的民主運動。說著他就拿出了當年參加遊

行的幾張照片給我們看，照片上的他頭上系著一條布帶，正在高呼著口號，完全是一個熱血青年的樣子。他又告訴我們，在“八九”民運之後，他也受到了單位的政治審查，於是在九十年代初他就辭職下海，開始幹起了個體戶。最早他在成都靠擺地攤謀生，積攢一些資金之後他就開了一家電腦婚紗攝影，經過幾年的打拼，他終於躋身於有產者之列。面對胡明軍的勤奮和精明，我只能感到慚愧，1994 年初我與歐陽懿也曾在成都荷花池市場裏賣過皮鞋，但最後卻以失敗告終。

尤為可貴的是，胡明軍在謀生和經商的過程中沒有忘記自己的信念和追求，沒有忘記“八九”民運的理想，他一邊掙錢，一邊學習，一邊思考，一邊寫作，在成都的幾年，他居然寫出了幾十萬字的文稿，其中充滿了對中國時局的深切憂慮和強烈的使命感。經過幾個小時的交流，我的直覺告訴我，他以後肯定會成為我的戰友。但可能是由於受到傳統思想的影響，他當時的思想顯得還不是很成熟，甚至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來實現民主。在“八九”民運之前，我也有過這樣的想法，但經過“八九”民運的洗禮後，尤其是 1994 年我到北京與王丹、李海等人相處一年之後，我已徹底放棄了這種思路，我覺得中國的民主運動應當選擇“公開、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為此我與胡明軍進行了激烈的辯論，當時雖然沒有說服他，但後來幾年胡明軍卻逐漸接受了這個原則。

認識胡明軍之後，我們很快就成為了要好的朋友，我們經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交流思想認識和對時局的看法，沒多久他就成為了四川民運圈子裏面的一個重要人物。在那幾年，我一直沒有工作，也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是一個典型的“無業革命家”，經常在四川各地、西南各地甚至全國各地走動。胡明軍知道我在經濟上很困難，就經常對我施以援手，當然在他看來，援助我就等於在支持四川的民運工作。有一段時間，他還在成都為我租了房子，並一再勸

我要安心搞民運，不要考慮經濟方面的事情。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國內民運在經濟方面非常困難，如果沒有胡明軍等朋友的支持，我不知道自己在從事民運活動中能堅持多久。除此之外，胡明軍還從經濟上幫助過許多其他朋友。

1998 年，因參加“八九”民運而被判處十年重刑的張明出獄，我與胡明軍一起到郫縣看望了張明，在瞭解到張明急切地想找份工作時，胡明軍馬上就決定讓張明到他那裏打工，月薪一千元。前不久我和張明談到胡明軍時，張明還對“老胡”當年的幫助深表感激。也是在 1998 年，四川廣元的民運人士佘萬寶也來到成都找工作，胡明軍又讓佘萬寶在自己那裏打工，並讓佘萬寶擔任公司的總經理，而且還在"中央花園"租了一套房子讓佘萬寶住，當然我這個東西南北人有時也會住在那裏。這個時候，浙江的王有才等人已經拉開了組黨運動的序幕，我們四川雖然沒有馬上跟進，卻一直關注著形勢的發展。當時四川的民運也比較活躍，我們在成都每週都要舉辦一次沙龍，每次聚會都有至少十多個人，一切費用全是胡明軍承擔。

在籌備組黨期間，胡明軍又專門為我們配置了一臺電腦，用以列印文稿。而且在那個時候，經常有全國各地的朋友到成都來商討組黨事宜，如浙江的吳義龍、北京的查建國、東北的王澤臣、西安的傅升等人都來過成都，不用說，這些費用也全是胡明軍承擔。記得在四川組黨前夕，我們平均每天要開銷幾百元錢，其中大部分開銷都是由胡明軍來承擔。如果換成一般的生意人，對於這麼大的開銷一定會感到心痛，但胡明軍卻從來沒有為此計較過，尤其是他本人當時並不怎麼富裕。這只能說明，在胡明軍的心中，中國的民主運動重於一切。1998 年底，我接過秦永敏的“人權觀察”之後，胡明軍又專門為我提供了一臺價值幾千元的傳真機。所以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若說到在經濟方面對四川民運的貢獻，沒有人能與胡明

軍相比，可以說他是那個時候四川民運的蕭何，他為四川民運做出了巨大的個人犧牲。直到今天，想起這些往事，我還對"老胡"充滿深深的敬意。

然而胡明軍卻並不滿足於當四川民運的蕭何，在他內心深處，他很想像我一樣公開從事民主運動，而且就我對他的瞭解，他的理論水準、組織才能都是非常不錯的，但考慮到他對四川民運的重要性，我們就一直有意地限制他，儘量不讓他從事公開的民運活動，生怕因此而毀了他的經濟事業。但是在我們內心深處，我們卻一直把他看成四川民運的重要一員，所以每當遇到民運方面的重要事情，我和佘萬寶都要找他商量。我們之間的信任、默契深為當時各地民運朋友所稱道，有人戲稱我們三人是當時四川民運的"三駕馬車"。在組黨運動前期，我們四川民運對組黨這件事一直非常謹慎，我們認為這會導致當局的嚴厲鎮壓，所以儘管山東、北京、天津、湖北等地已跟隨浙江公開組黨，但我們四川方面卻一直按兵不動。後來考慮到中國政府即將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個公約明確規定公民有結社的自由，作為公民，尤其是作為當時國內民運的重要地區，我們認為有必要表明我們的態度，於是在經過分析、討論之後，就決定在 1998 年 10 月 15 日也就是公約簽署的第二天公開申請組黨。

但是我們仍然擔心受到當局的鎮壓，所以就決定不傾巢而出，而只派三個代表去做這件事情，這樣即使受到當局的鎮壓，四川民運的有生力量還能得到保存，有利於四川民運的長遠發展。在這段時期，胡明軍表現得相當積極，很想參加四川民運的公開組黨活動。按理說，以當時胡明軍的能力水準和在四川民運圈內的影響力來說，他應當是四川民運公開組黨活動的合適代表，但考慮到他對四川民運長遠發展的重要性，我和佘萬寶最後還是勸阻了他，並決定讓黃曉敏來彌補這個空缺。當時黃曉敏才剛進入四川民運圈子，只

是一個普通的打工者，當局對黃曉敏還不是很重視，如果當局真的最後要進行鎮壓，黃曉敏也不會受到太嚴厲的判處，同時也就保護了胡明軍。當然這樣的後果是跟黃曉敏講清楚並征得他的同意了的。因此在 10 月 15 日，佘萬寶、黃曉敏和我就代表四川民運界到四川省民政廳公開申請成立“中國民主黨四川籌備委員會”，而胡明軍則和文強、楊偉等人跟隨助陣。四川的組黨活動掀起了國內組黨運動的第三波高潮，緊隨我們之後，貴州、陝西、河南、湖南等省也進行了公開的組黨。

胡明軍雖然沒有代表四川民運去公開組黨，但他卻一直是四川民運組黨活動的重要參與者。那段時期我們一直在他經商的辦公室裏一起商討組黨事宜和其他民運事宜，他在成都磨子橋的那間辦公室實際上就是當時四川民運的總部。在此期間，我們還以"萬賢明"的名義發表了幾篇時政文章，“萬”就是佘萬寶，“賢”就是劉賢斌，而“明”就是胡明軍，其中有兩篇文章就是由胡明軍親自執筆寫成的。四川公開組黨之後不久，北京的民主黨領導人徐文立邀請四川民主黨代表過去商討民運事宜，胡明軍自告奮勇表示願意去拜見徐文立，看見他熱情這麼高，幹勁這麼足，我與佘萬寶就不好意思再阻攔，只好同意他去。他這次到北京不僅見了徐文立，而且還見了“中國發展聯合會”的彭明。

不久，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三位民主黨領袖被當局正式逮捕，在此之前秦永敏曾委託我們四川方面，說如果他遭到逮捕就由我們四川方面繼續主辦他所創立的“中國人權觀察”。君子重然諾，為了不辜負秦永敏的託付，我就回到遂寧以臨時主辦人的身份繼續辦起了“中國人權觀察”。但在當局的打壓之下，我後來也無法再辦下去。於是在 1999 年 1 月我又來到成都，與胡明軍等朋友見過一面之後，又到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北京走了一圈，與各地朋友商討組黨運動的下一步發展。到北京之後不久，我就被當

局抓捕，在北京市收容所被關押一月後又被送回遂寧，從此我就受到當局的監視居住，再也無法離開遂寧，直到 1999 年 7 月 7 日被正式逮捕。同年 8 月 6 日，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我進行了公開審理，在進入法庭之前，我看見了胡明軍與許多朋友在法院門口對我進行聲援，這是我見到胡明軍的最後一面，但他卻並沒有看見我。當天法院就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庭判處我有期徒刑十三年，我對此只是一笑置之，因為我相信四川民運不會因為我的入獄而停滯不前，我相信胡明軍他們會為了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壯大而繼續努力。

果然，在我與佘萬寶入獄之後，胡明軍、歐陽懿、陳衛等人相繼扛起了四川民運的大旗，而胡明軍更因為與王森等人組建“中國民主黨四川黨部”而被當局判以重刑。直到 2002 年，我才在監獄裏面獲知了這一不幸的消息。告訴我這個消息的是從達州監獄轉監過來的一名服刑人員，他告訴我說，他曾在達州看守所與胡明軍關押在一起，胡明軍已被判了十一年徒刑，王森被判了十年徒刑，都已被押送到南充的川中監獄服刑。他還說，胡明軍與王森在看守所裏表現得很堅強，並且經常向其他被關押的人員宣講民主黨的主張和事蹟。這個消息讓我感到十分難受，雖然以胡明軍的性格來說，他遲早會走到這一步，但從四川民運的長期發展來說，他的入獄實在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民主黨人印象（之二）

佘萬寶

對中國民運來說，1999 年可以說是一個寒冷的冬天，在這一年裏，一大批民主黨人士遭到中共當局的抓捕和重判，其中就包括四川組黨運動的領導人佘萬寶。雖然我與佘萬寶在 1998 年夏天才認識，但很早以前我就聽說過他的名字。1995 年“六四”前夕，國內五十六位異議人士聯名發表了《吸取血的教訓，推動民主與法治進程》公開信，我與廖亦武是四川的兩個簽名人。因為這個緣故，我很快就與廖亦武認識了。廖亦武是成都著名詩人，也是國內著名異議人士。“六四”之後，他因為製作“六四”光碟而被當局判處四年有期徒刑，被關押在川東監獄。當時四川的所有“六四動亂分子”都集中關押在川東監獄，廖亦武與他們非常熟悉，於是我就通過廖亦武認識了曾在川東監獄被關押過的李必豐、楊偉等人，而且從他們那裏聽說了雷鳳雲、侯多蜀、許萬平、佘萬寶等人的名字。聽他們講，在“八九”民運之前，佘萬寶是四川省廣元市農業銀行的副行長，由於在“八九”民運中公開支持學生運動並在"六四"後公開發表反對鎮壓學生的演講而被判處了四年有期徒刑。作為一個體制內的人，在歷史發展的重大時刻，佘萬寶能夠做出這樣的選擇，表現出他的道德良心和勇氣，真的很不容易。所以甫一聽說佘萬寶的事蹟，我就對他充滿了敬意。

出獄之後，佘萬寶一直在廣元謀生，很少與朋友聯繫，我雖經多方打聽，也無法與他取得聯繫。1997 年 8 月，我由於長期奔波勞累而患了肺結核，只好丟下我所熱愛的民運事業在家中休息。經過將近一年的治療，我的身體已基本康復，於是 1998 年夏天我又來

到了成都。當時國內的組黨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除浙江首義外，山東、北京、湖北和遼寧等地都已經迅速跟進回應，紛紛成立了黨部。我剛到成都不久，胡明軍就告訴我說佘萬寶想到成都找工作。沒過幾天，我終於在胡明軍的辦公室裏見到了這位我聞名已久的民運人士。佘萬寶比我要大十來歲，瘦高個子，兩眼炯炯有神，言談舉止很有風度，給我以精明強幹的印象。他待人隨和，但原則性很強，說話很有邏輯，因此他馬上就贏得了我們的尊敬，我們都稱他為“老佘”。一開始，佘萬寶確實是準備在成都找個工作，所以他接受了胡明軍的邀請而做了胡明軍公司的總經理。那個時候，他白天在胡明軍的辦公室上班，晚上則住在成都西郊"中央花園"，我在成都的時候也經常在這兩個地方落腳，因此我們相處的時間很多。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和溝通，我們之間很快就有了信任和默契，我感覺他以後會在四川民運圈內發揮重要的作用。與胡明軍和我相比，佘萬寶的政治經驗更為豐富一些，其政治直覺也更為敏銳一些，這得益於他以前在體制內工作和“六四”後坐牢的經歷。佘萬寶不是那種誇誇其談的人，而是那種幹實事的人。他平常言語不多，但說出來的話卻很有分量，往往能一語中的，因此在許多事情上我們都很尊重他的意見。那個時候，我們常常談到組黨方面的事情，我發現他對此充滿了興趣，儘管他還在為生存而奔波，但骨子裏他卻是一個民運戰士。終於有一天，他向我和胡明軍提到了四川組黨的問題。

長期以來，我對組黨這種事情是比較謹慎的，1992 年的"自由民主黨"案給我以深刻的教訓。根據多年的經驗，我深知在當今中國這種政治體制下，一切形式的組黨都不會得到中共的容忍，我們成立一個組織無非是準備集體走進監獄。而且我一向認為，即使不組黨，我們一樣可以做許多事情，而組黨反而會束縛我們的手腳。因此在 1998 年 6 月浙江組黨前後，王有才等浙江方面的朋友曾希

望我們四川方面跟進，我與陳衛一致表示不同意。陳衛曾因為 92″自由民主黨″案被判刑五年，對組黨的利弊體會深刻，尤其反對。但是佘萬寶認為，四川民運作為當時國內民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組黨運動已經蓬勃發展的情況下不能再繼續無所作為，而應當與浙江等地的朋友一道為突破″黨禁″共同努力。胡明軍率先對他的意見表示了贊同。在這種情況下我就對自己以前的態度進行了重新審視，最後我認為組黨是我們公民應有的權利，當局永遠不可能將這個權利恩賜給我們，我們只能自己去爭取。同時我認為，這次組黨運動有可能會拉開中國社會大變革的序幕，如果這真是一次歷史性的機遇，我們就不能讓它在我們的手中溜走，我們應當當仁不讓，負起我們的責任。或許我們會因判斷失誤而最後受到當局的鎮壓，但與其讓歷史性的機遇溜走，還不如冒險一搏。因此我很快就與佘萬寶、胡明軍取得了一致意見，這樣四川的組黨活動就終於正式啟動。對於我的這種轉變，陳衛、楊海等朋友一直苦苦規勸，但我沒有聽從他們的勸告，而是毅然決然地承擔起了四川組黨的責任。

這個時候，佘萬寶和胡明軍都對組黨運動的前景比較樂觀，但我知道前途充滿荊棘，我不知道他們那時有沒有想到有一天我們會因此而坐牢，但我當時確實已經做好了坐牢的準備。為了避免受到當局的鎮壓，我提出四川申請組黨的時間應當定在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後，因為這個公約規定簽約國的公民有結社的自由。同時我還提出，四川不能像有些省份那樣一哄而上，而應當呈梯隊形地慢慢跟進，最多只能選派三名代表去衝擊，因為我不想讓四川太多的朋友最後走進監獄，我不想讓四川民運的有生力量在這次冒險中全軍覆沒。我的這些提議立即得到了佘萬寶的贊成，由此可見佘萬寶很具有大局意識。在落實這三名代表時，胡明軍表達了強烈的願望，但我和佘萬寶沒有贊成，我們希望胡明軍能夠和歐陽懿、陳衛一道組成四川民運的第二梯隊，確保四

川民運能夠得到長期的延續和發展。最後佘萬寶想到了黃曉敏，而且他親自找黃曉敏談了話，沒想到黃曉敏立即就表示同意。組黨活動的框架敲定下來之後，距我們準備公開申請的日子就只有十多天了，於是我們抓緊時間進行準備，我們三個代表分別寫好了自己的簡歷，我還起草了《中國民主黨四川籌備委員會註冊申請書》，佘萬寶和胡明軍對此也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見。

10 月 15 日是我們既定的四川民主黨公開申請的日子，這天上午，佘萬寶、黃曉敏和我先在胡明軍公司的樓下合了影，然後我們就一起從容地來到了四川省民政廳。這個時候我們都知道自己正在書寫歷史，我們正在做一件史無前例且意義深遠的事情。公開組黨，這在四川的歷史上肯定是第一次，我們能夠預想到這會給當局造成多麼嚴重的衝擊。但是當我們走進負責社團登記的辦公室之後，我們卻發現對方一點也不驚奇，他們好像早就在等著我們的到來，一點也看不出他們有任何慌亂。看來在浙江組黨之後，各省民政廳都統一被打了招呼，否則他們不可能會表現得這麼冷靜。但我們表現得也同樣冷靜，我們首先說明了我們的來意，然後將申請書和個人簡歷遞給了他們。他們卻不願接受我們的申請書和個人簡歷，並說他們不負責辦理政黨的註冊和登記。這個時候佘萬寶就顯示出了他的政治急智，他問道："請問以前共產黨是在什麼地方辦理註冊和登記的？"對方聽了之後感到很慌亂，連說："不知道，不知道。"看來他們沒有預想到我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不久，外面又進來一個民政廳的人，他將一個公事包放在桌上，我們立即就看出他是在偷偷對我們進行錄影，但我們一點也不害怕，因為我們本身就是在公開組黨。後來一個姓文的處長同意接收我們的申請材料，我們交完材料後就從容不迫地走出了民政廳。交完申請之後，我們就按照既定的計畫回到各自的家裏，佘萬寶回到廣元，我回到遂寧，黃曉敏則回到公司繼續上班。不管當局要對我們採取什麼手段，我們都

願意坦然面對。

但是當局並沒有馬上對我們採取措施，於是我們幾天之後又回到了成都，並以“中國民主黨四川籌委會”的名義正式開展活動。我們首先進行了工作分工，我負責理論和全局，佘萬寶負責對外聯絡，胡明軍負責經濟。當時浙江民主黨辦了一份《在野黨》的刊物，我們看了之後很受鼓舞，就決定辦一份《公民論壇》作為四川民主黨的機關刊物，並由我來具體負責這件事情。同時我們還決定大量印刷《世界人權宣言》，在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那天在成都各個路口散發，這件事情由佘萬寶具體負責。不久，我們聽說四川綿陽異議人士李必豐被當局判刑八年，於是我們又發表了《致四川省並重慶市當局公開信》，要求改善四川和重慶的人權狀況，立即釋放李必豐、雷鳳雲、王明等異議人士。這封公開信有川渝地區三十多人簽名，其中包括佘萬寶的妻子文穎。佘萬寶曾詳細地給我講述他是如何勸他妻子簽名的，我聽了之後感到有些憂慮，因為我知道像他這樣不顧一切地從事民運可能會給他將來的家庭幸福造成不利的影響。這個時候佘萬寶已經全身心投入民運，他基本上不再管公司的事了，而是將精力全部用在了與各地朋友的溝通交流方面。有一天，湖北的秦永敏告訴佘萬寶，希望我們四川能夠建立起“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經過商討之後我們一致表示同意。由於“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不像“中國民主黨四川籌委會”那樣敏感，我們就決定除佘萬寶、黃曉敏和我之外，再增添胡明軍、歐陽懿為“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的成員。後來秦永敏考慮到當局可能會對他進行打壓，他又託付佘萬寶說，如果他不幸被捕，希望我們四川能夠將“中國人權觀察”繼續辦下去。後來，秦永敏果然與徐文立、王有才一起被捕，除了與全國各地民運朋友一起對他們聲援之外，我們還立即成立了“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由我任臨時主辦人，佘萬寶任秘書長，歐陽懿任辦公室主任。為了主辦“中國人

權觀察”，我只好離開成都，回到遂寧的家裏。不料這次離開之後我就再也沒能見到佘萬寶，不久之後我們都分別被當地國保嚴格地控制起來。

1999 年 7 月，中國民主黨遭到了當局的第二波打擊，我與佘萬寶同時被捕，其他省份也有不少人被捕。這波打擊使中國民主黨遭受了重大的損失，各省民主黨的主要領導人都先後被判處重刑，這是“八九”民運之後中國民運遭受的最沉重打擊，其經驗教訓值得後來人深思。幾年之後，我在監獄裏聽說佘萬寶被判處了有期徒刑十二年，在四川南充的川中監獄服刑。2008 年我又從幾個轉監犯那裏獲知，佘萬寶在川中監獄只獲得過一次減刑，被減了半年，我能夠體會到他所面臨的艱苦環境。佘萬寶的原判刑期本來只比我少一年，但我現在已經出獄快一年了，他卻仍在監獄裏服刑。前不久又聽說他在監獄裏身體很差，我不能想像他那本來就瘦削的身體如今已變成了什麼摸樣。我還聽說他入獄後又離了婚，不知道他的家人去看過他沒有。

我們這些坐過牢的人都知道，在監獄裏面，如果沒有親人和朋友的關心，一個人要度過漫漫刑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佘萬寶雖然與我只相處了幾個月時間，但我們之間卻結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誼，他在組黨運動中所展現出來的勇氣和才華以及所做的貢獻深為我所敬佩。出獄之後我一直在設法聯繫佘萬寶的家人，我很想讓他的家人帶去我誠摯的問候，但我至今仍未聯繫上，看來他只能孤獨地走出監獄的大門。佘萬寶的遭遇讓我們看到了，在當今的中國，一個人要爭取民主和自由會付出多麼沉重的代價，但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不再重複我們的命運，我們還必須繼續前行。只是佘萬寶為中國民運付出的犧牲實在太大了，我真心地希望他這次出獄後能夠像一個正常人那樣好好地生活下去，如果前途仍有磨難在等著我們，那就讓我們這些年輕人去面對和承擔吧。

民主黨人印象（之三）

許萬平

我初次知道許萬平的名字是在 1996 年，那個時候他仍在監獄裏服刑。大概是這年 5 月的一天，我到廖亦武家裏去，一見面廖亦武就說前兩天又被國保抄了家，而且他還被關押了兩天。我問其中的緣由，他說是因為一張照片的事情。這張照片是四川省第三監獄幾名政治犯在獄中的合影，廖亦武將這張照片交給了境外某刊物發表。說著他就把這份刊物給我看，果然我看見在這份刊物的封面上赫然印著這張照片和“中國政治犯”幾個大字。當時廖亦武還指著照片上的人給我進行了介紹，他們是雷鳳雲、侯多蜀、楊偉、許萬平、蔣世華等人，都是因為參加“八九”民運而入獄的川渝地區的政治犯。雖然他們當時都穿著深藍色的棉衣，但許萬平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因為在這幾個人中，他的個子最瘦小。但就是這樣一個個子瘦小的人，在“八九”民運以及後來的組黨運動中卻做出了驚天動地的事情。據廖亦武介紹，許萬平是重慶市大渡口區的人，在“八九”民運中，他曾經在自己的脖子上掛著“我是李鵬”的牌子站在重慶市大禮堂接受成千上萬人的批判。那個時候中國已經有了許多行為藝術家，而現在民運圈內也有許多人愛搞行為藝術，但在我看來他們都不如許萬平當年的這個行為藝術更加直指人心。後來，許萬平就是因為這件事情而被當局判了八年有期徒刑。

1997 年，綿陽的異議人士李必豐在朋友的幫助下在成都開了一家“張姐泉水魚”的餐廳，那時我經常住在那裏，文強也在那裏幫忙，因此那裏很快就成了四川民運人士聚會的地方。大概在這年 7

月的一天，都江堰的楊偉帶了一個人到餐廳來，他還沒來得及介紹，我就喊出了“許萬平”的名字，因為那張照片留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許萬平個子不高，但精神很好，看得出來他是一個性格倔強、意志堅定的人。這時許萬平剛從監獄裏出來，生活沒有著落，我們就讓他先在這個餐廳幫忙。沒多久，我就因患病離開了成都，許萬平則一直在這個餐廳工作。

後來，李必豐因為向境外媒體報導綿陽工人罷工的事情而受到當局的追捕，為了躲避綿陽市公安局的抓捕而四處流浪，這家餐廳就由許萬平幫忙經營。但到 1998 年我再回到成都時，這家餐廳已經停止營業了，不過我在成都還是碰見了許萬平，他當時跟楊偉在一起。有幾天，我與他一起住在"中央花園"，我們聊了很多。從他談話中得知，前不久他曾到幾個地方見了許多民運朋友，他甚至專門到湖北去拜見了秦永敏。他又說他很想公開地從事民運活動，我就勸他要多交朋友，積蓄力量，不要去做無謂的犧牲。我還問到了他的個人問題，他說前不久他到湖北秦永敏那裏去時，在火車上遇見了一個女子，彼此之間很投緣，不知以後能不能與她生活在一起。我聽了之後很高興，說實話我不願看見我們這些民運朋友成天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我認為追求民主事業與我們的個人幸福並不矛盾。許多年之後，我才知道許萬平後來跟這個女子結了婚，她叫陳賢英。在當今中國社會，從事民運事業是有很大風險的，一個女子如果敢於同這樣的人結婚，本身就證明這個女子是一個不俗的人。只可惜，直到今天我還沒有見到陳賢英，但卻聽到許多朋友說她是一個好妻子。這次見面之後沒幾天，許萬平就回到了重慶，沒想到這一分別就是十年。

許萬平以前在重鋼共青團工作，雖然平時他較少談什麼理論，但他卻具有一往無前的沖勁。在我所認識的民運人士中，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對民運事業這麼執著，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為了民運事

業而放棄一切，他是我們川渝地區的一名民運猛將，這是我們川渝地區民運朋友對他的共同評價。在 1995 年的《吸取血的教訓，推動民主與法治進程》公開信連署活動中，重慶的鄧煥武是簽名者之一。當時我很注意結交川渝地區的民運朋友，於是我就從王丹那裏要到了鄧煥武的聯繫電話和家庭住址。幾經周折之後，我終於聯繫上了鄧煥武的妻子餘德靜，當時鄧煥武因參加這次簽名活動正受到當局的迫害，被關押在老家浙江還沒有出來。但餘姐卻將重慶的王明、白和平、何兵、雷雲海、梁俊西等朋友引薦給我，他們與鄧煥武一樣都是民主牆時期的老戰士。一下子認識這麼多民運朋友，別提我當時有多高興。後來我就經常到重慶去，有時還組織川渝地區的民運朋友一起搞一些公開簽名的活動，發表我們的不同政見。當時王明沒有具體工作，我就讓他負責重慶方面的民運事宜。1996 年，王明因發表《公民言論自由宣言》而被當局勞教三年。在那個時候，重慶的民運朋友在經濟上都很困難，老鄧年紀又大，梁俊西剛出獄不久，何兵女兒又得了白血病，其他幾位也主要在忙於生計，都不可能全身心投入民運。許萬平回到重慶後很快就負起了這個責任，在他的努力下，重慶的民運局面又開始活躍起來。然而許萬平的所作所為卻引起了重慶當局的恐慌，他們在 1998 年 9 月將許萬平抓捕，並立即對他處以三年勞教，因此許萬平沒有能夠參加中國民主黨最初的組黨運動。但按他的性格，我估計如果他不被勞教的話，他一定會在組黨運動中掀起滔天的巨浪。

果然不出我所料，2001 年許萬平在勞教期滿後，立即又全身心投入到了民運活動中，並且很快就成為了中國民主黨後續發展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從許萬平的刑事判決書和朋友們的談話中得知，許萬平在那幾年裏一直在全國各地奔波，與各地民主黨人士積極商討民主黨的各項事宜，他們準備在國內召開中國民主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他還在互聯網上發表了大量批評當局的言論，並與

海外民運組織保持著密切聯繫。應當說，許萬平當時所面對的環境比我們當初組黨時更為嚴峻。在 1998 年我們對當局是否鎮壓民主黨還不是很清楚，而且後來也確實有一些參加過組黨活動的人並沒有被判刑。但後來幾年的形勢卻很明朗，當局對組黨活動卻肯定會毫不留情地予以鎮壓，在 2001 年，胡明軍、王森因繼續組建中國民主黨四川黨部剛被判處重刑。在這種情況下，許萬平仍然敢於繼續從事民運及組黨活動，充分顯示了他的道德勇氣和犧牲精神。更何況許萬平在此之前已經坐過兩次共十一年的監獄，難道他真的不在乎再次失去自由嗎？難道他真的願意將共產黨的牢底坐穿？也許有人會認為許萬平這麼做沒有什麼價值，但我認為，在當局不願主動進行社會變革的今天，中國社會的每一丁點進步都離不開許萬平這樣的人的付出和犧牲。我們不要忘了，我們今天之所以在某些方面感到比以前更加寬鬆，那正是無數像許萬平那樣的人用青春、幸福甚至生命的代價換來的。也許有人會認為許萬平這麼做失之魯莽，但我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不需要太講究策略，中國的民主運動實際上是一場公民們大膽追求自己的基本人權和政治權利的運動，她與以前那些傳統政治鬥爭有著本質的不同。作為當今中國社會的政治反對派，組黨乃是我們應有的權利。在這場運動中，策略和技巧固然重要，但勇氣和擔當精神卻是每一個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首先要具備的品質。我一向自以為是一個有勇氣的人，但與許萬平比較起來，我其實是一個充滿顧慮、矛盾和軟弱的人，許萬平才真是一個悍不畏死的民運戰士。

許萬平雖然只與我相處了不長的一段時間，但我們之間的感情卻很深厚。我入獄之後，許萬平曾多次到我家看望我的妻兒，讓備受分離之苦煎熬的妻兒得到了安慰、溫暖和鼓勵。2004 年我在川東監獄服刑時，有一次，重慶市公安局到監獄來問我是否收到過許萬平給我的錢，我說不知道，因為寄進來的一切物品都受到過監獄方

面的嚴格檢查。他們又問，是否我的妻子將許萬平的錢送了進來，我仍然回答說不知道。之後我立即猜測許萬平可能快出事了，因為我知道當局正在收集他的材料。在當今中國社會，一個人如果因為政治原因在坐牢，那麼關心和同情他的朋友也一定會受到當局的騷擾甚至迫害，如果他們捐款資助坐牢的朋友或其家屬，那麼當局就會將這種行為當成迫害他們的罪證。果然在這之後不久，許萬平就出事了，他被判處了十二年有期徒刑，其中一條罪狀就是資助坐牢的民運人士。當局的這種做法明顯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我不知道是什麼讓他們這樣冷酷。許萬平以前也在川東監獄坐過牢，我去的時候還有一些服刑人員記得他以前坐牢的情況，甚至還有人記得許萬平他們因為那張照片而被送到“嚴管隊”關禁閉的事情。他們對許萬平在獄中的表現讚不絕口，說許萬平與侯多蜀都是“反改造分子”，他們不僅沒有減一天刑，而且還經常被關禁閉，他們特別提到了在鄧小平死後，許萬平與侯多蜀因為拒絕參加追悼會而被關了禁閉。我在川東監獄的時候，我們政治犯的環境已經有了一些改善，當局對我的管理已經變得比較靈活而寬鬆，我不僅減了三年多刑期，而且沒有被關過一天禁閉。這一方面說明我沒有許萬平那樣堅強，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許萬平他們當初的抗爭起了作用，正是由於他們以前辛辛苦苦地栽下了樹，我後來才能舒舒服服地乘涼。

我出獄之後，重慶的鄧煥武、王明、雷雲海等朋友曾到遂寧來看我。當我們聊到許萬平時，他們都認為許萬平的入獄是重慶民運界的重大損失，許萬平被抓後，他們進行過多次抗議，鄧煥武還專門撰寫文章為許萬平呼籲。據他們說，許萬平目前被關押在重慶市江北監獄，他們經常去看望許萬平的妻子陳賢英，陳賢英現在與年僅九歲的兒子相依為命，生活得很不容易。前不久，陳衛專門到重慶去看望過陳賢英，我托陳衛帶去了我對他們母子的問候。陳衛回來後對我講，陳賢英非常堅強，每個月都會去看望許萬平，而且他

們的兒子也很像他爸爸，陳衛臨走前，小傢伙對陳衛說：“我代表我爸爸許萬平謝謝叔叔們的關心。”我聽了之後既感到好笑，又感到難受。許萬平是一個正直、善良、勇敢的人，他如果生活在一個政治清明的時代，他一定能夠為國家和社會做出突出的貢獻，他一定能生活得相當幸福，但是他卻不幸生活在當今中國社會，在這樣一個“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時代，像他那樣正直、善良、勇敢的人註定會有坎坷的命運，註定不能與妻兒好好生活在一起。

最近聽到陳賢英說，許萬平在獄中身體很不好，監獄不給醫治，今天正逢中秋佳節，我剛好在上午收到了陳賢英的一個短信祝福，看完之後心裏異常難受，我知道當別人在享受闔家歡聚的快樂時，她卻正在忍受離別和相思之苦。我不知道怎樣去安慰她，我只能詛咒這個時代早點結束。

民主黨人印象（之四）
秦永敏

在中國民運圈內，秦永敏是我最尊敬的人，但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也一直沒有見過他。我第一次聽說秦永敏的名字是在 1993 年 10 月。1991 年 4 月，我因參加“八九”民運被捕，並於 1992 年 12 月被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一直關押在北京市秦城監獄和半步橋看守所，直到 1993 年 10 月刑滿釋放。出獄之後，我沒有立即回家，而是在北京盤桓了半個月，見到了剛出獄不久的王丹，又找到了以前的老朋友李海。記得有天晚上在李海的家裏，李海拿了一份文件給我看，說武漢的秦永敏起草了一份《和平憲章》，當時正在徵集簽名。考慮到我剛剛出獄，李海就不讓我簽名，但我卻看到這份文件的最後已經有六七個人簽了名。在我印象中，秦永敏的名字排在第一個，後面好像還有李海、袁紅兵等人的名字。李海還告訴我，秦永敏是民主牆時期的老戰士，主辦過民刊《鐘聲》並因此而入獄八年。我聽了之後立即對這位老“運動員”充滿了敬意，從此“秦永敏”這個名字就刻在了我的腦海裏。

回到四川不久，我就從“美國之音”裏聽到了《和平憲章》發佈的消息。《和平憲章》的發表立即在海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它就像黑暗中的一聲驚雷讓人感到震顫、興奮。《和平憲章》運動是中國民運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深刻地影響了後來國內民運的發展進程。“八九”民運失敗之後，在中共當局的暴力恐嚇之下，殘存的國內民運被迫轉入地下，為了集結力量和進行抗爭，一部分不甘屈

服的民運人士不得不採取秘密抗爭的方式，如 1992 年胡石根、康玉春、劉京生等人秘密組建“中國自由民主黨”以及丁矛等人秘密組建“中國社會民主黨”。但是這種秘密抗爭的成效十分有限，不容易在國內民眾中產生影響，而且其代價也十分巨大，胡石根、康玉春、劉京生、丁矛等人後來都被當局判以重刑。因此這種秘密抗爭的方式並不適合於當今中國社會的民主運動，中國民運要想在中共的高壓恐怖統治下拓展空間和壯大力量，必須另闢蹊徑。

在這方面，秦永敏等人所領導的《和平憲章》運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們以公民的身份大膽地發出不同的聲音，顯示出了藐視專制強權的勇氣和追求民主理想的堅強意志，他們是“八九”民運之後走出恐懼的第一批戰士，他們所採用的公開抗爭的方式為後來的民主運動樹立了典範，這是秦永敏先生的重大歷史功績。從此之後，公開抗爭就逐漸成為國內民運的主要抗爭模式，1995 年的簽名運動、1998 年的公開組黨運動以及後來的維權運動和目前的《零八憲章》運動都是這種抗爭方式的具體體現，中國民運正是在這種持續不斷的公開抗爭中一天天走向了成熟和壯大。

後來幾年，我一直在四川和西南各省結交民運朋友，直到 1997 年患了重病之後才在家休息。1998 年初，北京的徐文立先生聯繫上了我，不久他就給我寄來了大量的資料，其中就有秦永敏先生主辦的《中國人權觀察》的許多資料，由此我就與秦永敏先生取得了聯繫。這個時候，徐文立和秦永敏是國內民運最活躍也最有影響力的兩個領袖，當時圈內人士都稱他們為“北徐南秦”。在《和平憲章》發表之後，秦永敏曾被當局勞教二年，但出獄之後他很快就與徐文立一起創辦了《中國人權觀察》，秦永敏任主辦人，徐文立任主任。聽朋友們說，其實那個時候秦永敏的處境非常困難，1997 年他與李金芳大姐離婚，為了生存和撫養女兒，他在武漢開了一家小商店，正是在那間小商店裏，秦永敏將《中國人權觀察》辦得有聲有色，

使《中國人權觀察》成為了國內民運一面不倒的旗幟。我與朋友們每當說到此事，都會對秦永敏先生唏噓不已，他對中國民運的忘我奮鬥精神對我們年輕一代民運人士產生了很大的激勵作用。作為一名民主牆時代的老戰士，秦永敏先生的“運動”經驗非常豐富，但最讓我佩服的還是他的那種堅韌、無私的精神。

與有些民運領袖不同，秦永敏先生對人非常謙和，非常具有大局觀和團隊意識，在我們年輕一代民運人士面前他從不談自己過去的資歷，也不擺民運領袖的架子。而且據我瞭解，他也從不對別人妄加評議，更不對名譽或金錢感興趣，只知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默默耕耘。在 1998 年組黨前後的大半年時間裏，我與秦永敏先生的聯繫十分密切，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面，但我們合作得非常愉快。在這個時候，我的身體還沒有完全康復，但在秦永敏和徐文立先生的感召下，我在沉寂快一年之後又開始出來為民運做事。1998 年 3 月，我發表了《為推動我國人權進程致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議書》，要求中國政府改善國內人權狀況和簽署人權公約，《中國人權觀察》對此進行了詳細報導。同年 4 月，聯合國人權專員訪問中國，秦永敏發文要求她會見中國異議人士，在秦永敏開具的異議人士名單裏，我也忝列其中。

1998 年 6 月，在浙江組黨之前，浙江朋友希望各地民運力量能夠與他們一道去衝擊和突破黨禁，但我們四川與徐文立、秦永敏交換意見後，一致決定不同意，並對浙江的朋友們進行了勸告。後來，浙江的朋友們還是以“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的名義到浙江省民政廳公開申請註冊，從而拉開了組黨運動的序幕。不久，浙江當局抓捕了王有才等十幾個民主黨人，徐文立和秦永敏立即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救援行動，也許在這種壓力之下，浙江當局被迫陸續釋放了被關押的人員，甚至王有才也在被關押五十多天後得以釋放。

王有才獲釋後，山東的謝萬軍、劉連軍又到民政廳申請註冊，

這樣組黨運動就開始朝全國蔓延。在這種情況下，徐文立、秦永敏果斷改變態度，決定介入組黨運動，並分別以“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和“中國民主黨湖北黨部”的名義申請註冊，從而將組黨運動推向了高潮。後來有人對徐、秦二人迅速轉變態度的行為表示不理解，認為二人有投機之嫌，並指責他們成立“黨部”的舉措太激進，直接導致了當局後來對組黨運動的嚴厲鎮壓。在這裏我要替他們說句公道話，我認為，在當局的眼裏，“籌委會”和“黨部”在性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對當局專制統治的挑戰，組黨運動會不會被鎮壓主要取決於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態度，並不取決於我們是以溫和的“籌委會”的名義還是以比較激進的“黨部”的名義去申請。而且對於徐、秦二人改變態度介入組黨運動這件事我也能理解，我認為，在當時國內民運界，膽識、才幹、經驗和影響力能超過徐、秦二人的並不多，如果組黨運動真的能夠極大地推動國內民運的發展，真的能夠啟動中國的民主變革進程，我覺得他們本身就有責任來領導這場運動。前不久我看了徐文立的一篇回憶文章，他說在“八九”民運中，他在監獄裏看見年輕的學生不懂政治而自己又無能為力時，他對此感到特別著急。我由此想到，作為一個具有歷史擔當的民運領袖，如果組黨運動真的是一次中國民主變革的歷史性的機遇，他肯定會勇敢地承擔起運動的領導責任，即使是自己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也會坦然面對一切後果。所以我很不願意看到有些朋友對徐文立、秦永敏妄加指責，我認為至少不應當懷疑他們的個人品行。在我看來，他們當時的所作所為不是投機行為，而是歷史關頭的當仁不讓。

在領導組黨運動的過程中，秦永敏並沒有丟下自己心愛的《中國人權觀察》，當時《中國人權觀察》已經存在了一年多，並成為了國內民運資訊的彙集和發佈中心。隨著國內民主運動的迅速發展，他報導的任務就越來越重，往往一天就要發幾篇稿子。1998 年

10 月，四川省簡陽市三岔鎮發生了一起農民堵截公路抗議政府過度收取提留款的事件，我迅速趕往現場瞭解情況，隨後將此事告訴了秦永敏。秦永敏馬上在《中國人權觀察》上進行了詳細報導。同月，秦永敏又告訴佘萬寶，希望我們四川能成立“中國人權觀察”的分支機構，經過商討，我們迅速成立了“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秦永敏對此也進行了詳細報導。後來，秦永敏又考慮到當局有可能對他下手，於是就委託我們四川方面，說如果他被當局抓捕，就由我們來繼續主辦《中國人權觀察》，希望《中國國人權觀察》能夠長期存在下去。1998 年 11 月 30 日，秦永敏果然與徐文立、王有才同時被捕。我們四川方面馬上對此情況進行了分析討論，並決定立即啟動“中國人權臨時總部”的運行，由我擔任“臨時主辦人”。12 月 5 日，我在四川遂寧發佈了《中國人權觀察》的第 399 號文稿，發表了《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通告》，表示“除非臨時總部遭到封殺，否則將堅持到秦永敏先生重獲自由。”但由於我個人能力有限，也由於當局的嚴厲封殺，我所主辦的《中國人權觀察》並沒有持續多久，我記得只發表了十幾篇文稿。

1998 年 12 月 17 日，中共當局不顧國內外的反對浪潮，分別判處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十三年、十二年和十一年有期徒刑，企圖嚇阻國內風起雲湧的組黨浪潮。但是我們並沒有屈服，徐、秦、王三人的入獄反而激發起了我們的鬥志，我與其他各省的民主黨領導人自覺地繼續扛起了組黨運動的大旗，我們一方面大力聲援徐、秦、王三人，一方面繼續宣傳民主黨的理念和擴展民主黨的影響力。在這方面湖北的陳忠和、浙江的吳義龍、祝正明、朱虞夫、北京的查建國、高洪明、何德普、東北的劉世遵、王澤臣、王文江、西安的傅升、湖南的佟適冬、謝長髮以及我們四川的佘萬寶、胡明軍等人表現得都特別突出。在“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遭到封殺之後，1999 年 1 月，為了與各地朋友商討組黨事宜，我決定到全國各

地行走一遍，首站就來到了湖北武漢。記得我與成都的記者袁亞娟剛下火車，陳忠和與董漢生就熱情地接待了我們。第二天，陳忠和又安排我們見了十幾個朋友，都是湖北民主黨成員，我們對組黨運動各方面的事情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袁亞娟的《追蹤中國民運》對此進行了詳細的描述，我在此就不再詳談。我只記得，在這次討論中，湖北同志們的精神鬥志都特別高昂，對可能來臨的危險沒有絲毫的畏懼，而且我感到秦永敏先生對他們的影響很大，他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這讓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秦永敏先生的崇高人格，我為沒能親眼見到他而深感遺憾。本來我還準備去看望一下秦永敏的女兒，並順便參觀一下秦永敏曾經戰鬥和生活過的那個小商店，但由於行程安排緊張，我也沒有去成。

2008 年 11 月我刑滿獲釋。出獄之後才知道秦永敏還在監獄裏，他沒能像徐文立、王有才一樣被中國政府“交易”到美國。秦永敏比我早進去半年多，刑期又比我少一年，然而他卻要到明年十一月份才能出來。僅根據他未能獲得減刑這一點，我也能想像到他在裏面所面臨的環境是多麼地艱苦。不久前我從網上看到，秦永敏的女兒曾在今年去漢陽監獄看過秦永敏，與我以前會見一樣，他們也只能在玻璃窗戶兩邊的電話上說一會兒話。據說秦永敏在這十年裏給女兒寫了不下一百封信，但他女兒只收到了兩封，對此我感到非常氣憤！

中國的《監獄法》明確規定，服刑人員有通信的自由，我在監獄裏一直能與家人保持通信，沒想到秦永敏先生連這點基本的權利都被剝奪了。漢陽監獄的這種做法真的太不人道了，他們妄圖掐滅關於秦永敏的所有資訊，殊不知這反而增添了他們的罪孽。秦永敏先生在第一次坐牢的時候留下了眼疾，在這次坐牢中又受到如此非人的待遇，我不知道中國政府糟糕的人權紀錄還會續寫到什麼時候。當然，對於一個真正的民主戰士來說，這一切只不過是徒勞，

當局愈是兇狠地對待我們，我們的意志反而會變得更加的堅定，我們的追求反而會變得更加的強烈。“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我相信，明年 11 月 29 日從漢陽監獄走出來的一定是一個更加偉岸的秦永敏，我不知道在十年煉獄之後他又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驚喜，但到時候我一定要去武漢聆聽他的教誨。

民主黨人印象（之五）
浙江群英

在中國近現代和當代歷史上，浙江一直是一個人才輩出的地方，在近幾十年的民主運動中，浙江也湧現出了許多優秀的人才。當歷史的指針指向 1998 年的時候，王有才、王東海、吳義龍、祝正明、朱虞夫和他們的戰友們又再次發出了國內公開組黨的先聲，掀起了“八九”民運之後國內民主運動的又一個高潮，他們以自己的勇氣和智慧在中國民運史上譜寫了新的篇章。

我與浙江的民運朋友建立聯繫始於 1995 年。那一年是“國際寬容年”，許良英老先生發起了一次《呼喚實現國內寬容》的政治簽名活動。與此相配合，為了紀念“六四”六周年，劉曉波、王丹等人也組織國內民運界發表了《吸取血的教訓，推動民主與法治進程》的公開信。在這次活動中，浙江方面表現得很突出，王東海、陳龍德等人都參與了簽名。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在“五月鎮壓”之後，浙江方面的朋友不畏當局的高壓恐怖統治，繼續大力聲援王丹、魏京生等人，堅守言論自由的最後底線，在中國的東南之角撐起了國內民運的半邊天空。

在整個九十年代中期，浙江、西安的民運狀況最讓我佩服。正是從 1995 年開始，浙江、西安和我們四川方面經常就國內各方面情況進行溝通交流，並常常一起共同做事。1996 年初，由於李登輝訪問美國和在諸多政策上顯露出臺獨意向，臺海局勢驟然緊張，中共當局竟然在臺灣海峽開展“飛彈演習”，雙方劍拔弩張，一時間臺海上空陰雲密佈，兩岸的和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面對這種

情況，全世界熱愛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紛紛對此予以強烈關注，國內民運界也憂心忡忡。這個時候，浙江的民運朋友決定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他們提出了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實現兩岸統一的主張，並對中共對臺的武力威脅政策進行了質疑。在發表這封公開信之前，陳龍德與我進行了聯繫，希望我們四川方面的朋友能參加這次簽名，隨後他就把這封公開信傳了過來。我看了這封公開信之後，立即表示同意，並馬上趕往成都徵集朋友們的簽名。然而我們此舉已經受到了當局的注意，他們對此深感恐懼。因此我在成都的過程中一直受到警方的跟蹤，我根本就無法與朋友們見面交流，這樣四川的這次簽名活動最終就被當局破壞了。後來浙江方面的朋友還是在這年3月克服重重困難、頂著壓力發表了這封公開信，發表之後不久，陳龍德就被當局處以三年勞動教養。

正是由於我們與浙江方面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係，所以在1998年6月浙江開展組黨活動之前，他們向我們通報了他們準備公開組黨的想法，我記得是王有才親自打電話告訴我的，他當時還希望我們四川能夠與他們一起去衝擊黨禁。我與陳衛立即對這一情況進行了分析討論，最後我們一致認為浙江方面的組黨行為並不妥當。陳衛是“九二”組黨活動的重要參與者，我也曾經涉足這個事情，我們對“九二”組黨活動所付出的慘重代價記憶猶新。在我們看來，作為中國社會的政治反對派，中國民運早晚要進行組黨，但我們認為當時的時機並不成熟，如果我們貿然組黨，肯定會遭到中共的嚴厲鎮壓。我們認為，目前國內民運最主要的任務是積聚力量，時機一旦成熟，宣佈成立政黨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廣交友，緩結社”乃是我們的基本主張。這個時候，西安、北京、湖北方面也知道了浙江準備組黨的事情，楊海、徐文立、秦永敏就此與我們進行了充分的交流，我們都不贊成浙江的想法，並將我們的意見告訴了浙江方面的朋友，但他們沒有接受。6月25日，他們選派王有才、王東

海、林輝等三人為代表，以“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的名義公開到浙江省民政廳進行了登記註冊，從而掀起了九八組黨運動的浪潮。

雖然我已經提前知道並反對浙江組黨的事情，但是當他們真的付諸行動時，我還是感到特別振奮。浙江的公開組黨行動仿佛就像一聲驚雷，震動了當時整個中國社會，也對中共當局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在中共建政之後，中國社會一直沒有出現公開組黨的事情，所有的組黨行為都是秘密進行的，對於這種秘密組黨行為，中共歷來的態度就是進行嚴厲的鎮壓，那麼對浙江的公開組黨行為，中共當局會如何應對呢？他們還會像過去一樣進行嚴厲的鎮壓嗎？我相信當時海內外大多數民運人士都在對此進行密切的關注。

中共當局在憲法中規定公民有結社的自由，而且在此之前克林頓訪華時，江澤民承諾中國將馬上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個公約也規定簽約國的公民享有結社的自由。如果中共當局對浙江朋友的這一履行自己公民權利的行為進行鎮壓，那麼他們一定會受到國際、國內的廣泛指責，他們對自由民主的虛假承諾就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無遺。如果他們對浙江的組黨行為進行寬容，那麼這勢必引起各地的連鎖反應，中國的民主變革就會由此拉開序幕，中共的專制統治就會受到嚴重的威脅。所以，浙江的公開組黨行為不僅顯示出了他們的勇氣，而且顯示出了他們的智慧，他們不僅掌握了道義的制高點，而且還將中共當局置於到了一種既想鎮壓又不敢隨便鎮壓的二難境地。這和“八九”民運中的絕食活動一樣，讓中共當局既感到害怕，又感到無從下手。因此雖然我對浙江的組黨活動一開始是持反對的態度，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密切關注，我最後終於認識到了這一勇敢之舉的重要意義。隨著形勢的發展，我甚至感到這場組黨運動有可能會撕開專制統治的壁壘，從而創造出中國民主變革的歷史性機遇。我深知這種歷史性的機遇不

多，我們不能讓它從我們手中滑過，我們必須努力把握自己的命運，這是我後來改變態度轉而參與組黨活動的重要原因，我想這可能也是徐文立、秦永敏改變態度的重要原因吧。

中國有句老話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但在許多事情上，其實當局者比旁觀者更清醒，比如兩個高手對弈，那些旁觀者就往往不如對局者考慮得更深，往往要在幾步棋之後才能看出對局者的深謀遠慮。我曾聽陳衛說過，他在"秦城一期"時與王有才是同室難友，在他的印象中，王有才這個人不怎麼愛說話，但是卻特別聰明。我還聽西安朋友說過，王有才的圍棋水準很高，他是一個業餘三段棋手。難怪他剛提出公開組黨的想法時，我這個業餘初段棋手還真的不能很好理解他的用心何在。按理說，王有才等浙江朋友都是身經百戰的民運老將，他們不可能不會考慮到他們的組黨行為會受到當局的鎮壓，但他們為什麼明知會這樣卻還要固執地堅持呢？原來他們就是想借克林頓訪華這個機會對專制壁壘發起主動出擊，希望通過履行自己的結社權利來實現國內民運的重大突破。而且據我瞭解，浙江的朋友們並非暴虎馮河的有勇無謀之輩，事實上他們對組黨活動進行了充分的研究和準備。浙江公開組黨之後，吳義龍與上海的姚振憲曾一起來到四川，吳義龍特別向我談到，在公開組黨之前，他們連續召開了多次會議，對組黨行動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詳細的討論並制定出了具體的應對方案。因此我們看到，在組黨的過程中浙江方面並沒有一哄而上，而是保持了梯隊形狀的有序跟進，當王有才等九人被抓後，浙江的後援工作也搞得有聲有色，迫使當局最後不得不放人。吳義龍甚至還談到，在組黨之前他們對這個政黨的名字也經過了反復討論，最後才確定為"中國民主黨"這個十分響亮的名字。如今"中國民主黨"已經基本上成為了中國民運的代名詞，我相信，在未來的民主運動以及民主社會裏，中國民主黨必將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為自己曾經參與中國民主黨的創

建活動感到無比驕傲。

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三人被當局重判後，浙江乃至全國的組黨運動並沒有受到特別嚴重的影響，浙江的吳義龍、祝正明、朱虞夫等人與各省民主黨的負責人繼續推動著組黨運動的深入開展。1999 年 1 月，為了與各地朋友商量組黨方面的事宜，我先後來到了湖北、湖南、浙江等地。當我來到杭州的時候，我受到了浙江朋友們的熱情接待，他們讓我住在王榮清的家裏。王榮清是民主牆時期的老戰士，當時他開有一家美容店，經濟情況比較好，外地朋友到杭州一般都住在他家裏。但王榮清當時並沒有走到組黨運動的前線，我估計他被安排在第四乃至第五梯隊，所以直到 2008 年我出獄後他才因為組織領導浙江民主黨的事情被當局判了六年有期徒刑。

在王有才進去之後，吳義龍、祝正明、朱虞夫馬上就接了上來。我與吳義龍比較熟悉，他當時還是浙江大學的在讀研究生，因為參與民主運動而被學校開除。吳義龍是“八九”之後國內民運中成長起來的優秀民運戰士，他不僅具有出色的組織才能，而且理論水準也相當高，我從他身上看到了中國民運振興的希望。一開始吳義龍並沒有站在公開組黨的第一線，但他卻肩負著更加艱巨的一個任務，那就是“神行中國”、推動各省組黨。他本來身有殘疾，但是在 1998 年夏天，他卻以一只病腿走遍了全國每一個省份，他的堅強意志讓全國各地的民運朋友見了都深受感動。後來浙江方面又創辦了一份《在野黨》的刊物，吳義龍和祝正明是這個刊物的主要負責人。我記得當時我從這份刊物上看到過吳義龍寫的一篇批駁李鵬言論的文章，他寫得既有邏輯又有文采而且很有戰鬥力。吳義龍的大局觀念和團隊意識也特別強，與他合作讓我感到非常舒服，在許多事情上我們配合得十分默契。所以時隔十年之後，我仍然時時想起我與吳義龍愉快交往的各種場景，中國民運真的很需要這樣一個

優秀的組織者和戰略家。

祝正明也是浙江民主黨人中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家，言談舉止間自帶幾分儒雅。他當時已經寫有一本關於憲政民主的書籍，我在王榮清家裏看完了這本書，這使我對民主理念的認識又有了新的收穫。可能是受到王有才的影響，他也喜歡下圍棋，但他的水準與我差不多，我在杭州期間與他交過手，不知現在我是否還是他的對手。朱虞夫也是民主牆時期的老戰士，當時浙江方面想安排他出國，讓他在外面做國內組黨運動的策應，但他可能後來沒有去成，所以最後他也因參與組黨而被捕入獄，並且在出獄後不久又被當局勞教一年，直到今年 4 月才出獄。

我在浙江還見了許多其他民主黨人包括吳義龍的未婚妻子單稱峰，他們每天晚上都要在吳義龍家裏聚會，有天晚上單稱峰親自為大家煮了一頓水餃，氣氛非常活躍，一點也看不出他們對當局的恐懼。由於在杭州行程安排緊張，我整天都與吳義龍他們商討民運方面的事情，居然沒有時間到西湖去遊玩，與我同行的成都女記者袁亞娟只好一個人去領略西湖的風景。不過我對此並不感到遺憾，我只是很遺憾在杭州期間沒有見到我所敬仰的王東海先生，他一直是浙江民運圈裏一個十分活躍也十分理性的民運戰士，他當時已經從組黨運動中退了下來，我估計這也許是他們從長計議的故意安排。臨走的時候，吳義龍、祝正明、朱虞夫等人親自到火車站為我們送行，我們依依不捨，揮淚而別。總之，浙江之行給我留下了特別難忘的美好印象，如果各地民運力量都能發展到浙江這麼高的水準，我相信中國的自由民主理想一定能更早實現。

不過，浙江的民主黨人也為組黨運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繼王有才被判處十一年有期徒刑之後，吳義龍、祝正明、朱虞夫、毛慶祥、高海兵、呂耿松、來金彪、陳樹慶、王榮清等人先後因為組黨而被當局判刑入獄，直到現在吳義龍、陳樹慶、王榮清等人還在監

獄裏服刑。雖然十年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仍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但國內民運力量卻實現了很大的發展，我認為這與浙江民主黨人的一貫努力是分不開的。我還記得，當浙江的朋友們公開組黨之後，全國各地有許多追求自由民主的朋友找到了各地的民主黨人，例如在我們四川，當時就有李作、馮達勳、王森、魯登川、李志等人匯入到了民運隊伍之中。而且經過組黨運動的洗禮，各地許多民主黨人都受到了鍛煉，這為未來中國社會的民主變革培養了一大批骨幹力量。今後幾年之內，獄中的民主黨人將陸續出獄，我相信那個時候國內民運局面一定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儘管組黨運動一直受到許多朋友的指責和質疑，但是這場運動畢竟公開亮出了中國民主黨的旗幟，我相信在未來的民主變革中，中國民主黨一定能發揮巨大的作用。到那個時候，人民和歷史將不會忘記浙江民主黨人的卓越功勳，就如同我們今天還記得辛亥革命中的徐錫麟、秋瑾一樣。

民主黨人印象（之六）
湖南群雄

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與幾個朋友一直在從事國內民運的橫向聯繫工作。“八九”民運失敗之後，民運的火種撒播到了全國各地，在每一個省市甚至每一個縣市都有許多人因為參與“八九”民運而受到當局的清查甚至迫害，例如據我瞭解，僅湖南省各市縣就有上百人遭到關押或判刑。在“八九”之後的九十年代初期，北京的李海作為一個民運有心人，一直致力於收集和聯繫各地受迫害的民運人士，這是李海對國內民運的重大貢獻。但是李海與各地民運人士的聯繫主要是一種單線的直接聯繫，各地民運人士之間並沒有建立起聯繫和交流，所以當時國內的民運力量顯得非常鬆散和弱小，王丹就曾經為此感歎：“我們的力量在哪里？”為了改變這種局面，從 1994 年開始，我與幾個朋友用了幾年時間尋找和聯繫各地的朋友，到 1997 年時，我們已基本上成功地建立起了國內民運的橫向聯繫，這是後來國內組黨運動能夠風起雲湧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在從事這種橫向聯繫的過程中，我認識了湖南的民運朋友。

1995 年，我非常偶然地從一個重慶朋友那裏知道了湖南兩個朋友的情況，其中一個叫胡卓毅，他在長沙，另一個朋友在湘潭。於是我決定儘快到湖南找到這兩個朋友。根據我在重慶尋找朋友的經驗，我知道只要找到他們，就可以順藤摸瓜地將一大批朋友找出來。“五月鎮壓”之後，我因為與王丹關係密切而受到當局的追捕，於是我就利用這個機會來到了湖南。我先從重慶乘船到了岳陽，然後

乘汽車來到了湘潭，準備先找到湘潭的這個朋友。但是當我找到這個朋友的住址時，卻得知他正在坐牢。於是我當天晚上又離開湘潭來到長沙，我以為找長沙的胡卓毅肯定也不會順利，沒想到一個傳呼就聯繫上了他。當時胡卓毅在長沙的一個公司打工，收入很低，僅夠維持自己的生存。

他見到我時非常高興，喝酒吃飯之後，我就與他一起住在那家公司的一個小房間裏，並非常愉快地進行了溝通交流。自從公開從事民運活動以來，不管是對於認識還是不認識的民運朋友，我幾乎都抱著坦誠相見的態度，我知道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對方的信任，如果我處處設防、言辭閃爍，別人就會對我產生誤解。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將當時國內的民運狀況和我們的主要思路都告訴了胡卓毅，他聽了之後感到很振奮。後來他就告訴我說，湖南的朋友很多，全省各個地方都有因為參與“八九”民運而受到當局迫害的人，許多人已經出獄，但這些人出獄後彼此之間聯繫很少，與其他外省朋友就更沒有交往，所以當時的湖南民運圈子是比較鬆散和封閉的，我算得上是到湖南的第一個外省民運朋友。

第二天，胡卓毅就約了幾個朋友與我見面，他們與胡卓毅一樣都不是學生，好像是“工自聯”的人。由於我後來在監獄裏呆的時間太長，記憶力受到了很大損害，我現在已經記不住他們的名字了，我只記得其中有一個朋友姓周，胡卓毅對他評價很高，說他是湖南民運圈的一個核心人物。接下來胡卓毅又介紹我認識了劉建安，他是一個中學教師，因參與“八九”民運而坐過牢，這時他剛從監獄裏出來，正在找工作謀生。我在劉建安家裏住了兩天，與他談得非常愉快。劉建安是一個比較理性的朋友，他不主張與當局嚴重對抗，而主張做一些能夠長期堅持下去的事情。所以十幾年來，他沒有再進監獄，但他卻一直在發出自己的聲音。2008 年我出獄後，我還經常看見他在網上發表的時政文章。為了幫助他們走出封閉的狀態，

臨走前我將四川、重慶、西安、浙江、杭州的許多朋友的聯繫方式告訴了胡卓毅和劉建安，並將外國主要的駐華媒體以及海外“中國人權”主席劉青的電話告訴了他們，以便他們遇到事情能夠得到外界的關心和援助。後來，胡卓毅和劉建安就根據我提供的聯繫方式與各省民運朋友和劉青建立了直接的聯繫，湖南的民運力量就此融入到了全國民運之中。

在湖南的時候，胡卓毅曾經告訴我說，湖南的民運人士很多，湖南的民風也特別剽悍，他說在未來的民主運動中他們湖南一定能夠扮演重要角色。果然在 1998 年的組黨運動中，湖南的組黨活動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浙江組黨之後，湖南的民運朋友一開始也與我們一樣只是予以密切關注，但是當我們四川在 1998 年 10 月公開組黨之後，湖南的謝長髮、鄒佩夫、劉力平、周大覺也到湖南省民政廳遞交了“中國民主黨黨湖南籌委會”的註冊申請書，從而掀起了湖南的組黨運動。不久，湖南大學的佟適冬教授等人又成立了“中國民主黨湖南大學籌委會”。在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被當局逮捕之後，甚至還有幾個朋友宣佈成立“中國民主黨長沙籌委會”。在湖南的組黨運動中，譚力、金繼武、周敏、張帆等人也表現得很活躍，他們幾個也是湖南民運圈裏很有影響的人物。一時間湖南群雄並起，迅速成為了國內組黨運動的重鎮。不過我對他們都不太熟悉，我一直期待著與他們見面交流。

終於在 1999 年 1 月，我再次來到了湖南，成都女記者袁亞娟與我同行。在此之前我與譚力有過一些交往，共同組織過一些重大的簽名活動，因此到長沙後我們就首先找到了譚力。譚力與我年紀相仿，也因參加“八九”民運坐過牢，出獄後開有一家金銀首飾店，生意還相當可以。見面後，我們就在他的這家店裏愉快地進行了交流，他不僅在外表上顯得溫文爾雅，而且他的思想也與我一樣比較理性，所以我們在許多問題上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見。當時我身上帶

有一本亨廷頓的《第三波》，譚力翻看之後十分喜歡，我就當作見面禮送給了他。當天下午，譚力又把我們帶到一間茶樓，在他的組織安排下，很快胡卓毅、劉建安、周敏、佟適冬、姚小舟等人也到來了，使一間不大的房間顯得有些擁擠。胡卓毅和劉建安對我特別熱情，不停地感謝我上次到湖南促進了湖南民運局面的巨大改觀，我聽了之後很是高興。但讓我更高興的是，這時胡卓毅和劉建安的經濟情況比幾年前已經有了很大改變，說起話來也比以前更有底氣。佟適冬教授也顯得很興奮，在此之前我們在電話上有過一些交往，他沒有想到我會這樣年輕。不過姚小舟與我比起來就更年輕，他當時還不到二十歲，當有人說他是長沙民主黨“籌委會”的成員時，我感到非常吃驚。整個下午，我們就在房間裏一直討論組黨方面的事情，我記得佟適冬和周敏發言最積極，譚力和我只是偶爾插進去講兩句，姚小舟則像一個小學生一樣瞪著一雙好看的大眼睛認真地聽。雖然無論從自然氣候還是政治氣候來說當時已是蕭殺的寒冬，但我感覺他們沒有一個人對此感到害怕。

按照原計畫，我們本來只準備在湖南待一天，但是當天晚上一件讓我意料不到的事情打亂了我們的行程。那天晚上譚力將我們安排在一家旅館住宿，沒想到半夜突然遇到員警查身份證，我開始以為是沖著我們來的，後來才知道是因為那幾天京廣線上連續發生了幾起爆炸案。由於我的身份證在此之前已經被遂寧公安局抄走，因此我和袁亞娟就被員警帶到了派出所盤問。為了證明我的身份，我只好說我是四川遂寧人，因為參加“八九”民運而坐過牢，這次到長沙是旅遊訪友，然後我將自己戶口所在的派出所以及譚力的電話告訴了他們。盤問完後，他們就將我和袁亞娟關進了一間拘押室裏，當時裏面還關有幾個與我們一樣沒有身份證的人。袁亞娟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事情，顯得有些沉不住氣，她居然流淚了，我只好不停地安慰她，說最壞的結果是把我們送回四川。第二天上午，派出所終

於查明了我們的身份，在讓我們寫了一份不會在長沙違法犯罪的保證書之後就將我們釋放了，看來這件事情並沒有驚動遂寧公安局。我們一走出派出所，就碰到了譚力、胡卓毅、姚小舟等人，他們已經在外面與派出所的人交涉很久了，而且他們已經把我們的情況告訴了劉青和“美國之音”。由於火車的班次已經過了，我們只好繼續留在長沙，沒想到這一留居然讓我見到了幾個重要的朋友，其中就包括湖南最重要的民運人士謝長髮。

從派出所出來的當天晚上，譚力提到劉青很關心我，於是我就與劉青通了一個越洋電話，劉青在電話中轉達了魏京生對我的問候，我就建議劉青轉告魏京生，說我希望他也能像徐文立一樣來領導國內的組黨運動，劉青就決定讓我與魏京生談一談。第二天上午，我在姚小舟的家裏與魏京生通了一個電話，談了國內組黨運動的基本情況，並談了我的那個想法。由於海外民運很複雜，後來魏京生並沒有出來領導組黨運動，但在幾年後當我在監獄裏時，他卻給我頒發了一個“人權鬥士獎”，以表彰我在組黨運動中的突出表現。

當天胡卓毅又告訴我，說張帆回到了長沙，希望見我一面。於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們就與張帆一起吃了早茶。我上次到湖南的時候，我就聽胡卓毅講到過張帆這個人，說他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強，是湖南民運圈內的一個核心人物。果然在這次見面中張帆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年齡與我差不多，但性格比我沉穩大氣，對民主理論和民運狀況也十分瞭解，是一個少見的民運大將。於是我就告訴他，說湖南的民運圈子山頭比較多，希望他能夠將湖南的民運圈子整合起來，他說他一直也在致力於這件事情，但困難很大，因為湖南人受毛澤東的影響很大，每個人都想成為一個小毛澤東。於是我就講了一下我們四川在這方面的一些經驗。與張帆見面後，劉建安又說湘潭的金繼武想見我，於是當天下午我們就乘車到了湘潭。與金繼武見面後，我們又對國內的組黨運動交換了看法。金繼武這

個人比較直爽，他當面向我指出，說我各方面都可以，但似乎還缺少某種說不出來的東西，我後來猜測他指的大概就是所謂的領袖氣質吧。對此我沒放在心上，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一個民運領袖，我只想為了早日實現“八九”民運的理想而不斷努力。最後，金繼武說謝長髮正在湘潭，問我是否願意見他。謝長髮的大名我早就聽說過，他是民主牆時期的老戰士，並且因為參與“八九”民運被勞教了兩年。對於這樣一個讓人尊敬的老運動員，我當然迫不及待地想見到他。於是金繼武親自帶我們去見了謝長髮。

我開始以為謝長髮就住在湘潭的城裏面，沒想到他這時卻躲在一個相當偏僻的鄉鎮上，因此我們走了很久才在一間破舊的民房裏見到了他。謝長髮年紀比我大十幾歲，滿臉絡腮鬍子，看起來像一個草莽英雄。我對他躲在這個地方的這種行為很不理解，雖然進行自我保護是他的權利，但我們既然是公開從事組黨活動，我們就應當坦然面對一切後果，我們應當以一種無畏的勇氣壓制住對手並影響民眾。由於我們交往還不深，我就沒有把我的看法告訴他，但很快我們就因一個原則性的問題爭執起來，我沒有想到他居然主張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來實現民主自由。

儘管我這個人性格溫和，與許多人都能合得來，但是在一些重大原則性問題上我卻從來不會讓步，我立即表示我不贊成暴力革命的方式，說暴力革命不僅會給中國社會和人民帶來災難，而且會使本來高尚的民主運動異化變質，從而最終違背我們自由民主的理想。更何況在以暴力革命起家的中共面前，我們採用這種傳統的密謀暴力手段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長，根本就不是中共的對手，我們必須以一種全新的鬥爭方式來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們必須堅持“公開、理性、非暴力”的原則。我還特別指出，中國民眾本身就崇尚暴力，在未來的民主變革中，用不著煽動和組織，民眾就很容易走向暴力，作為這場社會變革的領導力量，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反

對派，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化解民眾中的這種暴力情緒，帶領民眾行使自己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利，使中國社會實現和平的政治轉型。如果我們還想像共產黨以前那樣主張“打土豪、分田地”和“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那麼中國未來的社會變革就很可能會是一場吞噬一切的災難。但謝長髮的這種暴力革命的思想根深蒂固，我當時並沒有說服他。所以這場見面最後讓我們不歡而散，此後我就離開了湖南。

不過，我不知道是否是因為這場辯論對他有所觸動，後來謝長髮並沒有繼續在暴力革命的歧途上滑行。據我瞭解，在我入獄之後他一直在從事公開的民運活動，並且成為了組黨運動後期的一個重要領袖。出獄之後，我的妻子告訴我，說我在監獄裏的時候，謝長髮曾經兩次到遂寧來看望過她和我們的女兒，並與陳衛和歐陽懿見過幾次面，而且還幫歐陽懿買了一臺電腦。去年“5·12”地震後，他又在網路上大力抨擊災區的“豆腐渣”工程，為此他終於被當局抓捕關押，並在前不久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十三年有期徒刑。這是繼十年前佟適冬教授因為組黨而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之後湖南又一個因為組黨而受到重判的民運人士。十三年，這對我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數字了，十年之前我與徐文立正是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了十三年有期徒刑，這是九八組黨人士所遭受的最重的刑期。同樣的罪名，同樣的刑期，這充分說明了這十年來中國政府在政治體制改革和人權進程中沒有取得任何進步，充分說明了這十年來這個政權的本質並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變化，這也告訴今天的人們，中國的人權民主事業仍然任重而道遠。

民主黨人印象（之七）

貴州同仁

“中國民主黨”在1998年沖天而起，在如鐵桶一樣控制民間政治力量的中國不啻是向平靜的湖面丟下一塊巨石，許多人也是在這個時候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知道中國還有一批人不畏艱難在衝擊似乎如頑石一樣堅固的一黨體制。但是很多人並不知道，幾年前貴州的一批志士在更加艱難的情況下已經吃了這只“螃蟹”！1995年，貴州的陳西、廖雙元、黃燕明等人經過思考和磋商毅然建立了“中國民主黨貴州分部”，當然等待他們的不出意外，向來不容臥榻之側有其他人酣睡的中共也絕沒有羞羞答答，最後陳西等人因此被當局判處重刑。

與友人陳西合影

在1998年組黨前夕，首義的浙江朋友們在商討以什麼名字作為

旗幟時，吳義龍提到了貴州朋友們的壯舉，最後大家一直同意採用“中國民主黨”這個簡單而又響亮的名字，其中自然暗含著對貴州朋友們前期探索的承認和繼續。感謝貴州的朋友們，感謝他們以自己的勇氣表明了中國民運組黨結社的決心，感謝他們第一次亮出了中國民主黨的旗幟。雖然貴州地處中國西南之角，社會經濟比許多省份都顯得落後，但若說到對中國民主運動的貢獻，貴州卻位居前列，它是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一個重鎮。

我第一次聽說貴州的朋友是在 1995 年，那時我剛認識廖亦武，在有次談話中他向我提到貴州的詩人黃翔，說他是民刊時期貴州啟蒙社的主要人物，當時已經流亡海外，好像在主編什麼刊物。後來廖亦武又介紹我認識了覃禮尚，他是我認識的第一個來自貴州的民運朋友。“八九”民運時覃禮尚正在重慶讀書，因積極參與民主運動最後被當局判處有期徒刑三年，與廖亦武、楊偉他們一起在川東監獄服刑。覃禮尚是貴州遵義人，家庭條件很艱苦，出獄後就到成都找到以前的難友，最後就跟著楊偉賣啤酒謀生。1995 年底我認識重慶的鄧煥武、王明等朋友後，他們又在我面前經常提到貴州的一些民運朋友，特別提到了廖雙元、吳玉琴夫婦，說早在民刊時期貴州的朋友們就表現得特別活躍，並且與重慶的民運朋友常有來往。當時我正致力於西南民運的橫向聯繫工作，自然期待著早日認識和結交貴州的這些老運動員。

大概在 1996 年初，我終於在王明的陪同下滿懷希望地來到了貴陽，首先找到了楊在行，他與王明關係很熟，當時正在經營一家煉油廠。但楊在行當時的情緒特別低落，一方面是因為生意不好做，另一方面就是因為貴州的陳西、廖雙元他們剛因為組黨而受到嚴厲打擊。楊在行說他雖然沒有參與組黨的具體活動，但仍然受到當地國保人員的經常騷擾和恐嚇。楊在行還說貴州民運圈內比較活躍的朋友們基本上都進去了，沒有進去的現在也比較謹慎膽小。聽了楊

在行所說的情況，我感到有些沮喪。後來王明帶我又見了幾個朋友，果然他們這時對民運已沒有多大的熱情，看來貴州朋友們的這次組黨確實使貴州民運力量元氣大傷。這時我又想到王丹曾在我面前談到過袁紅兵當時好像正在貴州師大教書，我早就知道袁紅兵曾經是北大法律系的老師，因從事民主運動尤其是參與《和平憲章》運動而受到當局的迫害，被發配到偏僻的老家貴州。我便對他們說我想見袁紅兵一面，他們說袁紅兵現在也比較低調，一直表示不願見民運朋友。我有些不甘心，不希望毫無所獲，談不了什麼見面也可以呀，於是跟袁紅兵打了電話，事實證明朋友們的推測是有道理的。所以，我的第一次貴陽之行基本上沒有什麼收穫，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得到了一本王希哲的自傳《走向黑暗》的影本。

我第二次到貴陽是在 1996 年下半年，這一次我差點在貴陽出事。1996 年，王希哲和劉曉波共同發表了《雙十宣言》，不久劉曉波就被當局予以三年勞教，王希哲則僥倖地逃到了海外。在此之前不久，我在北京曾拜見過劉曉波，剛回到四川就聽說他出事了，於是我立即起草了一份《公民言論自由宣言》，對劉曉波、王丹等因言獲罪的朋友進行聲援。寫成之後我拿給成都和重慶的朋友審議，鄧煥武認為這個事情應該做，但是又有風險，說不適合以我的名義發表。這時王明主動提出以他的名義發表，我們權衡再三就聽從了王明的意見，最後就以王明的名義發表了這封公開信，當時王明還將這一情況向王希哲作了通報。為了躲避可能來臨的風險，我與王明馬上就來到了貴陽，準備在貴陽呆上一段時間。我們首先找到了李偉，並在李偉家裏碰到了一個叫彭方中的人。聽王明說，彭方中和李偉都是貴陽民刊時期的積極分子。彭方中見到我們後很高興，當聽說我們發表了《公民言論自由宣言》後，就十分仔細地打聽我們發表的經過，甚至連我們在哪家打字店列印文件這種細節都不放過，而且他在詢問的過程中還不停地在一張紙上進行記錄。他這種

反常的舉動引起了我的懷疑，我立即以出去買菜為由與王明一起離開了李偉家。出來之後我就把我的感覺告訴了王明，並決定讓王明一個人繼續留在貴陽，繼續觀察彭方中的表現，我則馬上回到四川。後來王明在貴陽並沒有出事，直到十多天後他才在成都被捕，並被當局處以勞教三年，我估計他在離開貴陽時就已經被盯上了。王明出事後，我也被遂寧國保關押了兩天，其間他們曾告訴我，說我在貴陽如果走得不及時，當天晚上就會在貴陽出事。由此我終於確定彭方中是一個“特務”。

自從公開從事民主運動以來，我一直對所有朋友坦誠相見，從來沒有主動懷疑過某個人是“特務’，也從來沒有散佈過類似的懷疑，因為我認為如果沒有根據就對別人妄下結論，這會對別人造成很大的傷害，同時也會對中國民運造成嚴重的損害。我一向認為，在後極權時代的中國，我們所從事的民主運動應當主要是一種公開的公民運動，我們不會去追求政權的更替，而只會堅持不懈地行使我們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利，因此我們所做的許多事情本身就是可以見陽光的，即使有“特務”打進我們內部，我相信他們也不會對我們造成多大的傷害，他們最多能夠提前破壞我們的有些活動。我們每次走進監獄，不是因為當局掌握了我們的“罪證”，而是因為他們那種偏執狹隘的專制心態對我們這些持有不同意見的公民不能夠容忍，他們指控我們“顛覆國家政權”實在是“莫須有”的構陷，我們受到打壓迫害主要取決於這個政權的本質，“特務”的作用其實非常有限。我還認為，在這種後極權時代，我們能夠做的最有效的事情就是像一個真正的人和一個真正的公民那樣去生活和戰鬥，這首先要求我們打破對專制強權的恐懼，包括對所謂的“特務”的恐懼和對可能受到打壓迫害的恐懼，即使外部環境很兇險，我們也應當首先讓我們的心靈獲得自由。所以在從事民主運動中，我們應當將主要精力放在如何促進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事業上，而

不應當整日裏到處抓“特務”，製造緊張空氣和傷害朋友。老實說我從事民主運動二十年來認識的民運朋友不下一百人，但我唯一能夠確定的“特務”就只有彭方中一人。後來聽貴州朋友說他現在已經當上了貴州某縣的公安局長，可見我並沒有冤枉他。

好了，讓我結束“特務”這個話題來繼續介紹貴州的民運朋友吧。由於貴州民運在 1995 年蒙受了巨大的打擊，因此在九十年代的中後期貴州一直顯得比較沉寂。直到 1998 年組黨浪潮到來後，曾寧才代表貴州民運界發出了聲音。曾寧也曾經參與了 1995 年的組黨，而且也遭到了當局的判刑關押，只是他判得較輕，出來之後剛好趕上了 1998 年的公開組黨運動。浙江朋友組黨後，曾寧曾與我進行過交流，我們在許多事情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並共同決定在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後同時開始組黨行動。所以在 1998 年 10 月 15 日我們成立“中國民主黨四川籌委會”之後，曾寧就立即到貴州省民政廳申請註冊“中國民主黨貴州籌委會”，緊接著河南、陝西、湖南等地的朋友們也開始參與公開組黨活動，我們一起掀起了“九八組黨”運動的第三波高潮。應當說，當貴州大部分朋友還在監獄裏時，曾寧剛從監獄裏出來就代表貴州民運界參與組黨，他的這種勇氣確實讓人佩服。後來曾寧又參與了“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籌建工作，並參與了對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的救援活動，為“中國民主黨”的創建做出了重要貢獻。如果貴州的民運力量在 1995 年不受到沉重打擊，如果陳西、廖雙元、黃燕明等貴州民運的骨幹力量還在外面，我估計他們一定會在“九八組黨”運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果然，在 2008 年 11 月我出獄的當天，歐陽懿在向我介紹國內民運狀況時首先就對貴州朋友的傑出表現讚不絕口，說“貴州人權研討會”是我們西南民運乃至全國民運的一面旗幟。那天我還接到了曾寧、陳西的電話，他們對我刑滿釋放表示了衷心的祝賀。後來

我學會上網之後，我從網上看到了大量關於“貴州人權研討會”和貴州朋友的內容，得知他們每個星期都要在一個公園裏公開地舉辦人權研討活動，這讓我深受鼓舞，我覺得他們已經完全掌握了後極權時代政治反對派的鬥爭策略，他們已經發展到了一個相當成熟的層次。我從網上還看見了他們的許多照片，在聽說他們的名字十多年後，我終於目睹了這幫貴州同仁的雄姿英發，我期待著早日到貴州向他們逐一拜見。

今年春節期間，重慶鄧煥武老先生過生日，我因故沒有去成，但貴州的陳西、徐國慶卻到重慶看望了老鄧，隨後又順便到遂寧來看望了我，我們一起在“淩江閣”茶樓愉快地相處了一個下午。出獄之後，我從網上和朋友那裏瞭解到，陳西是貴州民運圈內的一個核心人物，他是“魏京生人權鬥士獎”第二屆的得主，是貴州民主黨的主要領袖。然而聞名不如見面，當陳西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時，我很快就感覺到他是目前國內少見的非常成熟的民運戰士。由於我剛從監獄出來，所掌握的信心很少，思維也不是很清晰，因此那天下午基本上是陳西在講。他首先對我在九十年代關心貴州民運表示感謝，然後談了他的個人經歷，原來在“八九”民運中他是一個大學教師，因參與“八九”民運而受到當局的迫害，從此就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反抗專制、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他現在已經五十多歲了，但看起來比我大不了多少，顯得年輕而有風度。我追問其中緣由，原來他早就皈依了主耶穌，難怪他會表現得如此平和、淡定和寬容。他說他以前也是一個目中無人、自以為是、棱角分明的人，是主耶穌改變了他的整個生命。在整個談話過程中，我感覺他思路特別清楚，對於從事民主運動抱著堅定且理性的態度，既明確反對中國的專制制度，又對中共及曾經迫害過他的國保人員非常寬容，力主實現中國社會的和平轉型。他說，他們在搞“人權研討會”時每次都要向當地國保提前進行通知，而且歡迎這些國保人員到場旁聽，這

樣既顯示出了他們的勇氣和決心，又對這些國保人員進行了啟蒙。用陳西的話來說，他們這麼做就是要“馴獸”，就是要教育國保人員懂得尊重人權和依法辦事，就是要把“權力”這只老虎關進籠子裏。這些主張和行為方式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我認為“貴州人權研討會”這種抗爭模式值得在全國各地推廣，這可以保證中國民運持續健康地穩步發展。雖然我希望多聽一些貴州朋友的介紹，讓我那長期缺乏營養的大腦飽餐一頓，但由於陳西他們還要急著趕回貴州，因此我們合影之後就做了道別。

今年六月，陳西又帶著黃燕明再一次來到了四川，在我與陳衛的一再挽留下，他們終於在四川盤桓了數日。以前歐陽懿和許多朋友都在我面前提到過黃燕明，說他也是貴州民主黨的重要領袖。黃燕明長得非常英俊，看起來年紀與我差不多，但實際上他卻比我大十歲，我再一次感歎貴州這方水土的神奇。黃燕明是一曾經是一個優秀的青年畫家，他那俊朗的外表上有一絲不和諧的因素，他的一只眼睛凹著。原來是在監獄裏因為堅持自己的信念被員警打瞎了的。陳西他們在貴州監獄裏也都受到過這種酷刑，但是他們都沒有放棄自己的立場。我對陳西、黃燕明等的尊敬油然而生。相比之下我的遭遇又算得了什麼。黃燕明現在也是一個基督徒，在參加“貴州人權研討會”各種活動的同時，也經常與陳西一起參加教會的各種活動。在今年“六四”期間，貴州朋友在一個公園裏舉行了紀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活動，由於參加的人很多，當局竟然調動了上千員警來阻撓活動的正常進行。黃燕明寫有一篇文章對此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後來，我又帶陳西、黃燕明到成都見了冉雲飛、陳雲飛、王怡、劉正有、張先癡夫婦和成都讀書會的朋友，我們一起喝茶聊天，把酒言歡，抒懷明志，其樂融融，很有幾分“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味道。其間，陳西、黃燕明又再一次向我們四川朋友介紹了“貴州人權研討會”的情況，讓我們四川朋友大受裨益。

經過這兩次見面，我對貴州的民運同仁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我感到，與貴州民運目前的發展水準相比，我們四川民運這幾年確實已經落後了，我深深地感到了肩頭責任的重大。前不久歐陽懿給我提到他以前寫過一篇《民運如棋》的文章，我聽了之後很受啟發。我認為我們每一個民運人士都是民運這個大棋局中的一顆棋子，而每個省份的民運力量都是這個大棋局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我們都能充分發揮每一顆棋子的效率，把自己這塊地盤做活，慢慢地積累力量和優勢，那麼我們最後自然就可以贏得全局的勝利。從這個角度來審視國內民運，我覺得貴州、浙江、西安、北京等幾個地方現在已經基本上做活了，因為他們已經能夠維持長時期的良性運轉，當局很難能夠把這幾塊棋殺死，但其他地方包括我們四川都還需要進一步努力。對於全國大多數地方的民運力量來說，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儘快做活自己的那塊棋，少走缺少效率的“俗手”，不走“過分手”和自殺性的“惡手”，多走“本手”，儘量走出像“貴州人權研討會”那樣的漂亮“手筋”。在中國民主運動這個大棋局中，我們沒有敵人，只有對手，我們不會吃掉對方所有的棋子，但我們卻要始終追求全局的勝利。

貴州的朋友給了我許多啟迪，他們在寒冷的冬天開出豔麗的花朵，我相信貴州的朋友必將為中國民主事業春天的到來發出更多的光和熱！也許民主事業就是一部分人率先堅持良知和不畏恐懼而發軔的吧。

蜀中多義士，如韭割複生

——寫在黃琦、譚作人被判刑之後

2010年立春之後，四川盆地的天氣是少見的連續幾個麗日，但在拂面的春風中我們並沒有感到任何暖意，相反我們卻在春寒料峭中感到了怖人的陣陣寒氣。2月8日，在被關押一年多之後，經過來回幾次提起公訴、退會補充偵查、審判、宣判和上訴，四川著名的人權鬥士、《六四天網》的主辦人黃琦先生的二審判決終於下來了，罪名依然是“洩露國家機密”，刑期依然是維持三年不變。緊接著黃琦先生就被迅速押送至一個轉送站，即將被送至四川的某個監獄服刑。第二天即2月9日，四川另一個著名的人權鬥士、成都著名的“文明市民”譚作人先生的一審判決也下來了，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他有期徒刑五年。

熟悉黃琦、譚作人的朋友都知道，當局扣在他們頭上的所謂“洩露國家機密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都是莫須有的罪名，他們之被當局抓捕、關押和判刑的主要原因乃在於他們在“5·12”地震後秉持自己的良心、大膽地揭示災區的“豆腐渣”工程，從而直接觸及了某些官員的政治經濟利益。這些喪盡天良的“豆腐渣”工程是四川某些官員運用手中權力大肆腐敗的產物，他們中飽了私囊，卻讓聚源中學、北川中學、漢旺中學、漢旺小學等19000名中小學生失去了生命。看著這些年輕生命的模糊血肉，看著這些“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豆腐渣”工程，每一個正直之士自然會拍案而起，然而致力於調查和揭露這些真相的黃琦、譚作人卻竟然受到了四川當局的打壓迫害，讓我們在經受天災的蹂躪之後又看到了人

禍的橫行。這樣的政治冤案在當今世界各國已經絕跡，甚至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也難以找到先例。只有在當今這種“中國特色”的政治環境裏，我們才能看到權力不受限制的政府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迫害如此正直勇敢的公民。黃琦和譚作人的遭遇揭示出了目前中國維權民運人士所面臨的惡劣環境，也揭示出了中國的自由民主之路仍佈滿荊棘。

黃琦、譚作人都是四川的聞人，也是我們四川人民的驕傲，但我至今仍無緣結識這兩位英雄。當他們戰鬥在四川維權民運第一線時，我正在四川的川東監獄服刑，不過我仍然在高牆電網裏面聽到了黃琦先生的大名。在川東監獄時我曾碰到一個因為印製“法輪功”宣傳刊物而入獄的服刑人員，他說他在外面時經常上網，他特別愛看黃琦主辦的《六四天網》，因為《六四天網》的宗旨就是“為無權、無勢、無名者說話”，從此黃琦這個名字就刻在了我的腦海裏。“5·12”地震後，我又從一個經常偷聽收音機的服刑人員那裏獲悉黃琦多次不聽警方勸阻、深入災區支援災民和調查“豆腐渣”工程的事蹟，這讓我對黃琦先生更加充滿敬意。然而當我在2008年底走出監獄時，卻聽說黃琦先生已經入獄。一年多來我見過許多曾經在《六四天網》當過義工的四川朋友，如黃曉敏、鄧永亮、梁凱旋、蒲飛、左小環等人，他們都提到過黃琦先生主辦的《六四天網》以及他深入災區如何夜以繼日忘我地工作的情況。

去年年底，黃琦先生的一審剛結束不久，他的年邁老父竟突然病逝，當局沒有允許黃琦先生回家看老父的最後一眼，這與2005年我的母親突然去世我卻無法回家弔孝的情況完全一樣，所以我能體會到此時黃琦先生的內心是何等的淒苦。由於處在“剝權期”無法親自參加黃琦父親的葬禮，我只好委託陳衛、陳雲飛替我送去一個花圈。黃琦進去了，我們這些在外面的維權民運人士自然就是黃琦父親的兒子。

譚作人的名字我是在出獄之後才聽說的，他那留著大鬍子、具有藝術家氣質的形象也是我從網路上看見的。出獄之後我聽說成都的周玉樵老先生辦了一個很有影響的讀書會，肖雪慧、王怡、冉雲飛等我所仰慕的朋友都曾經是讀書會的書友。於是在 2009 年 3 月中旬，我不顧“剝權期”的禁令偷偷地來到了成都，準備親自感受一下讀書會的盛況。當我的一個朋友通過手機聯繫上讀書會的重要人物譚作人之後，譚作人卻發短信告訴我們，由於正值“3·14”事件一周年，在當局的要求下這個星期的讀書會已經被迫取消了，我只好失望而歸。我剛回去沒幾天，就從網上獲悉譚作人先生出事了，就這樣我與譚作人先生失之交臂。不久我再一次來到成都參加讀書會，看見滿屋子已經坐了五六十個人，在屋子的中間，讀書會的朋友專門為譚作人先生安排了一個座位，並為他沏了一杯茶，茶杯下壓著一張紙條，紙條上寫著：“譚作人先生請用茶！”目睹此情此景，我被深深地感動了，我雖然沒有親自見過譚作人先生，但我完全能夠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以及在成都讀書會朋友中的重要影響力。後來在與冉雲飛、陳雲飛和王怡的交往中，我對譚作人先生的感人事蹟有了更多的瞭解。尤其是在 2009 年初，為了抗議成都當局破壞環境的“彭州石化”專案，譚作人先生發起了一場在府南河邊集體散步的活動，這給成都當局施加了一定的壓力，並最終促使“彭州石化”事件朝好的方向發展。譚作人先生進去後，成都的許多朋友都對他表達了關心和幫助，周玉樵先生一直與他保持通信，陳雲飛等朋友多次到看守所看望他，王怡也給他送去了一本《聖經》。

由於黃琦、譚作人長期以來一直無私地在四川推動維權民運事業，因此他們在四川乃至全國的知識界、文化界、政治異議群體和民運團體中享有崇高的聲望，所以當他們受到當局審判的時候，許多正直之士毅然前往法庭對他們進行聲援，這其中有成都著名自由

知識份子肖雪慧、冉雲飛、成都著名維權人士陳雲飛、成都著名作家周玉樵、成都著名右派人士張先癡以及一大批四川的維權民運人士，還有艾未未等全國知名人士。由於黃琦和譚作人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底層維權工作，因此他們與生活在中國社會最底層的廣大訪民、冤民結下了深厚的情意，由於他們自始至終真誠地關心災區人民尤其是災區的孩子，因此他們贏得了災區人民的普遍尊敬。所以當黃琦、譚作人受到審判的時候，大批訪民、冤民和災區人民也自動前往法庭旁聽。這讓四川當局感到了極大的壓力，每一次審判和宣判時他們都如臨大敵。由此可見，在處理黃琦、譚作人的問題上，執政當局為了維護既得的利益和所謂的穩定，他們已經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完全失去了政府應有的公義之心。他們以為通過抓捕、關押和判處黃琦、譚作人，就可以嚇阻和瓦解四川的維權民主運動，就可以繼續在四川為所欲為，殊不知在公民意識已經普遍覺醒、在民間反對派力量已經壯大起來的今天，他們的這種愚蠢、狂妄和倒行逆施之舉只會促使更多的公民公開站起來爭取和維護自己的自由與權利。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奴役，哪里就有抗爭。四川是個人傑地靈的地方，它從來就不缺少敢為天下先的正直勇敢的英雄，且不說鄒容躋身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列的英勇壯舉，也不說保路運動發辛亥革命之先聲，僅僅在最近二十年來四川就湧現出了一大批反抗專制、追求自由民主的英雄，其中包括因參加“八九”民運先後入獄的雷鳳雲、侯多蜀、蒲勇、李必豐、肖雪慧、廖亦武、陳衛，也包括因參加“九八”組黨運動而入獄的余萬寶、胡明君、王森、歐陽懿，還包括近年來因從事維權民主運動而入獄的黃曉敏、陳道軍、幸清賢、陸大椿、嚴文漢，現在黃琦和譚作人又再一次義無反顧地走進監獄。這些人是四川的驕傲，也是中華民族的真正的脊樑，他們犧牲了自己的幸福和青春年華，卻推動了四川

和中國社會的真正進步。只要中國社會還存在奴役和暴政，只要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得不到保障，只要腐敗和不公義的社會現象還繼續存在，不管當局進行多麼殘酷的打壓，都難以遏制越來越多的公民奮起反抗，因為對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的追求乃是人類最原始、最深刻的內在要求。黃琦、譚作人先生進去了，但四川的民間力量並不會因此而屈服，他們會像韭菜一樣在被割掉一茬之後又長出新的一茬，他們會以頑強的意志繼續推動四川和中國社會朝著自由民主的方向前行。

寫於 2009 年 2 月 13 日 四川遂寧“百盛家園

卷四 天倫劫

人們都以為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是那些坐牢的人，但我認為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是那些坐牢的人的親人！——《獄中書信》

記得一段描寫俄羅斯異見人士妻子的文字，說她的臉上再也看不出快樂和悲傷。我想我也終將變成那個麻木的老婦人，因為從2008年11月6日到2010年6月28日，只有1年零7個月又22天的時間…… ——陳明先《我和劉賢斌的聚散人生》

爸爸在我的生命中就像一個匆匆的過客，他在我童年裏的印象已經越來越模糊和遙遠了，在我長到11歲的時候，他突然又來到了我的生命中，和我們一起生活了兩年多的時間以後，忽然有一天又好像來不及道別又匆匆上路了。——陳橋《我和我的父親劉賢斌》

獄中家書（選十）[6]

1999 年 7 月 7 日，我因參與九八組黨運動被當局逮捕，先是被關押在四川省遂寧市靈泉寺看守所，同年 8 月 6 日，我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9 月 3 日我被押送到四川省大竹縣的川東監獄（即以前的四川省第三監獄）服刑，直到 2008 年 11 月 6 日刑滿獲釋。不管是在靈泉寺看守所，還是在川東監獄，我都是被嚴格監管的對象，很難能夠寫出更不用說帶出文字性的東西。不過，我在裏面卻可以給家人寫信，我可以與家人談家裏的事情，也可以談我在裏面服刑的情況，有時候也會很有節制地抒發一下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因此對我來說，這些信件很是珍貴，它至少將我過去近十年的牢獄生活進行了部分真實的記錄。出獄之後，我將這些信件進行了整理，除了少數信件遭到扣留或遺失，絕大部分信件我都整理出來了，我在給每封信件排序的時候才發現，這些保留下來的信件剛好有一百封。現在我把這些信件公佈出來，希望人們可以從中瞭解當前中國政治犯獄中生活的一些情況。當然，大家在讀這些信件的時候應當預先知道，這些信件都是受到了當局嚴格檢查的，有些話我在信中是無法寫出來的，那就只有麻煩讀者自己去猜度體會了。

---

[6] 《獄中家書》是劉賢斌第二次被拘押和服刑期間（1999 年 7 月—2008 年 11 月）寫給父母、妻子和女兒的信。原有 100 篇，刊發于勞改基金會主辦的網刊觀察網(www.guancha.org),限于篇幅，這裏僅選載其中的十篇。

1

爸爸媽媽：

你們好！並代我向全家問好！

我到靈泉寺已經二十天了，這裏條件還不錯，有錢就可以買日用品，也可以買菜買肉吃，因此我在這裏的情況，你們不必擔心。你們現在年紀已經很大了，兒孫們的事情不要操太多的心，好好保養身體，多享些清福。

我這裏可以來信，但不能涉及案情。通信地址為：遂寧市靈泉寺看守所。郵遞區號為：629000。

此致
祝好！

不孝之子：賢斌
1999 年 7 月 27 日

2

明先：

親愛的，星期一我一下子收到了三封信，其中一封是媽媽寫來的，兩封是你寫來的，而在此之前幾天我還曾收到歐陽的一封信。我簡直高興極了，同改們也羨慕死了。明先，我要感謝你，感謝你讓我得到了快樂，感謝你讓我知道了家裏尤其是我們的寶貝女兒的許多情況。按理說我應當馬上回信，但由於這裏規定每星期只能寄一封信，因此只好拖到今天（星

期六）才給你回信，請你見諒。你在信裏說你已被評為一級教師，在此我表示祝賀，而我的心裏同時也在說：明先，好樣的。明先，五年以前我們從認識到結婚，並非僅僅由於緣分，更重要的是，我當時就認定你是一個不俗的女子。現在我終於得到了回報，我雖然成了一名囚犯，但我卻是一名幸福的囚犯。從你來信中得知，女兒成長的狀況是令人滿意的，對此我又要感謝你。我們知道，孩子的學前教育對孩子的一生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遺憾的是我現在無法親自教她，一切都只有拜託你了。你在信中又說你準備給我寄些冬天的衣物來，我勸你還是改變主意，因為我們這裏要發衣物的，如果我缺什麼東西我會寫信告訴你的。最後，請你轉告媽媽，我現在身體很好，心情也不錯，請她老人家放心，希望她和爸爸保重身體，安享晚年。

此致

祝好並順利！

賢斌

親草於 1999 年 10 月 30 日川東監獄

3

明先、圓圓：

你們好！

轉眼間我入獄已快二年了，雖然日子一天一天地過起來總是覺得異常地慢，但是募然回首，離別那天的一幕幕情景回想起來卻清晰如同在昨天，尤其是當我離開家時圓圓那傷心的號啕大哭更是時

常撕扯著我的心。那個時候，圓圓是那麼地稚嫩，仿佛一棵剛破土而出的幼苗，正需要我們的呵護和愛憐，但我卻離她而去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上次接見時，圓圓哭著問我為什麼不回家去看她，當時我無言以對，只是眼淚直在眼眶裏打轉。真的，此生我最對不起的人有三個，一是媽媽，二是你，三是圓圓，尤其是圓圓，一想到出獄之時她可能已經小學畢業了，我就覺得我這輩子欠女兒的真是太多了。圓圓是不幸的，因為她有一個不負責任的父親，但圓圓又是幸運的，因為她同時有一個偉大的母親。眼看著圓圓一天一天地健康成長，我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也說不出地感激你。監獄的生活雖然很苦，但只要看到你和圓圓過得很快樂，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最近，由於幾乎天天打籃球，我的身體也強健了一些，身材也當然苗條了一些，而肉卻並沒有少吃。除了隔三岔五地吃你寄來的香腸臘肉，我還經常吃餅乾、雞蛋和水果。因此我的情況良好，不用擔心。記住，只要你們過得快樂幸福，我就會過得快樂幸福。

對了，楊海的來信已收到，請代我向他們一家人問好。

賢斌

親草於 2001 年 3 月 18 日川東監獄

4

親愛的圓圓：

你過得好嗎？爸爸一直都很想念你。你是爸爸的心肝寶貝，爸爸每天都在掛念著你，爸爸還經常在夢裏夢見你。媽媽把你最近的照片寄來了，我看了很高興，看見你快樂、健康，爸爸就放心了。媽媽說你很喜歡畫畫，而且說你以後要畫得比我好，我心裏就更高興了。

圓圓，我的乖女兒，你現在已經六歲了。你生日那天，爸爸沒有打電話回家，你沒有生氣吧。再過兩個月，你就要上小學了。爸爸以前讀小學時，成績好得很，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同學們和老師都很喜歡我。你以後讀書時也要像爸爸這樣，要聽老師的話，要團結同學，不管學什麼都要認真，要當第一名。在家裏要聽媽媽的話，媽媽很愛你，也很辛苦，你不能讓媽媽生氣。

你在電話裏一直問我好久回來，那麼我告訴你，還要等幾年我才能回來。到那時我再也不會離開你了，到那時爸爸要帶你到全國去玩，要坐火車、坐輪船、坐飛機，要帶你到成都、到上海、到北京、到好多好多地方去玩，要帶你去看草原、去看大海、去看長江，要帶你到迪士尼樂園去玩。但是爸爸現在卻不能回來，只能打電話和寫信給你。

圓圓，你以後會寫字了，要經常給爸爸寫信，要給爸爸講你的事情，爸爸最想知道你的事情。爸爸是你的一個好朋友，有什麼高興的事情要趕快告訴我啊，有什麼不好的事也要告訴我啊。你還要把你畫的畫給我寄來，爸爸最喜歡你的畫了。如果你不寫信來，爸爸會生氣的，如果你讓老師和媽媽生氣了，爸爸也會生氣的。記住了啊。

爸爸今天就說到這裏了，再見！

你的爸爸：劉賢斌

2003 年 8 月 11 日

5

親愛的明先：

你好！

剛過完春節十天長假，就收到了你和圓圓的來信，

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但是看完信後又滋生出了一些沉重的情緒，一整天我都高興不起來。明先，你辛苦了！人們都以為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是那些坐牢的人，但我認為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是那些坐牢的人的親人！比如你，不僅要關心坐牢的丈夫，而且要撫養年幼的孩子，為了支撐一個不完整的家，你拼命工作，拼命掙錢，完全不知道愛惜自己。就這樣你已堅持了五年，不知道前途還有多遠。我真擔心你突然哪天倒下，那才是我最不願看到的事情。明先，我不在身邊，孩子又小，你一定要學會照顧自己，不要只顧工作，應當學會享受生活。要注意營養、加強鍛煉、放鬆心情。你一定要記住，若干年後，當我們一家人相聚時，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一個健康、快樂和美麗的你。

此致
祝順利、安康！

賢斌
親草於 2004 年 2 月 3 日川東監獄

6

親愛的明先：

你好！

久未通信，對你和圓圓甚為掛念。我不在家的日子，你將家裏操持得井井有條、蒸蒸日上，並讓我們的女兒能夠健康茁壯地成長，我頗感欣慰。因此幾年來我在這裏頭也能安心服刑，苦中尋樂。然而自從得悉母親病了的消息後，我便經常覺得煩悶苦痛，一顆心也常惦記著她老人家的病情。

那日一紙電報飛來，我如遭雷擊，竟有些不能自持。以前我很少做夢，但最近我卻噩夢不斷，夜半驚醒時想到母親正遭受病痛的折磨，不免淚濕沾巾。明先，在我的眼中，母親是一個偉大的女人。記得你以前曾形容我母親是一頭兇狠的母獅，時刻提防著她的孩子受到傷害。我得承認，你這個比喻有幾分貼切，因為幾十年來在她的心中，幾個孩子就是她最珍視的一切。由於父親的庸弱，我們兄妹幾人幾乎全靠母親一人之力拉扯長大。雖然幾十年前我們國家還很貧窮，但我們兄妹幾人在生活上卻沒有吃過什麼苦頭，然而她老人家卻吃過數不清的苦啊。在那個時候，父親常年在外工作，掙點微薄的工資，家裏一切都靠母親。她完全像男人一樣參加各種生產勞動，掙的工分甚至比許多男勞動力還多。在那個時候，仁裏場還是一個碼頭，經常有煤炭、木料靠岸卸貨。每天母親就要和男人們一起挑煤炭抬木料，累得腰酸腿疼。那時我經常帶著妹妹到母親勞動的地方去玩耍，但那時我還年幼無知，現在回想起來卻有一種錐心的痛。後來到了八十年代國家搞改革開放，母親又做起了小生意，先是在城裏賣冰糕、涼粉和豆腐，後來在仁裏場做面生意。由於她的精明能幹，我們家最早在仁裏場蓋上了樓房，二哥和我讀書也用了不少錢。母親雖然沒有文化，但她非常明白事理，她深知孩子只有讀書才有前途，因此對我們兄妹管教甚嚴。仁裏場位於城郊，社會治安非常混亂，很多孩子從小就會偷東西、打架、殺人，我的小學同學中後來有許多人都因犯罪而坐牢或遭槍斃。但我們兄弟幾人卻都正直而有出息。這也是母親感到最驕傲和得意的事情。一九八七年我考上了大學，許多人都羨慕她，她自己也喜形於色，仿佛生活對她還是公平的，她幾十年的努力總算有了一個好的結果。不料後來我因涉足政治而兩次身陷囹圄，這於她也是很大的打擊。每次接見我看到她越來越衰老的模樣，我都自責自己真是一個不孝之子。去年她在電話上說今年春節要來看我，孰料她竟患上了這致命

的疾病，無疑這是我所造成的。這幾天她在痛苦的呻吟聲中，一定在念叨著我的名字。

明先，三十多年來我一直沒有好好報答我的母親，我懷疑以後是否還有這樣的機會。因此我希望在這段時間裏，你和圓圓多去看望一下她老人家，並希望我們幾兄妹齊心協力，盡一切力量治好母親的病。聽說她現在神智還很清醒，你們要勸她樹立信心，莫要失去生活的希望。我雖然不是一個基督徒，但我現在真心祝願：願主保佑她安康、快樂！

此致
祝好！

賢斌
親草於 2005 年 4 月 29 日川東監獄

7

親愛的圓圓：

你好！

爸爸又有幾個月沒有見你了，很想你。爸爸有很多你的照片，爸爸想你的時候，就翻開相冊看你的照片。爸爸離開你的時候，你才兩歲，到現在已經七年了。雖然爸爸慢慢變老了，但看到你也慢慢長大了，不僅學習成績好，而且喜歡畫畫和音樂，爸爸心裏就很高興，也很驕傲有你這麼一位乖女兒。

圓圓，你現在已經九歲了，你婆婆九歲時已經會做許多家務活了，而且敢到幾十裏外的城裏去賣柴買米，所以你先也應當可以幫媽媽做一些家裏的事情了，例如洗衣服、掃地、做飯。媽媽每天工

作很累，你要為她分擔點事情，要讓媽媽高興，不能讓她生氣。

圓圓，爸爸不能在家裏幫助和照顧你，你要學會自己照顧自己，要做一個堅強的女孩。在學習和生活中遇到困難，不能害怕，也不能逃避，而應當想辦法解決。圓圓，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別人能做到的事情，你一樣可以做到。不管做什麼事情，都要認真盡力做好，不能敷衍了事，不能投機取巧。還有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要堅持做完做好，不能半途而廢。

圓圓，你在班上是學生幹部，因此在每個方面都要比同學們做得更好，不能落後。要團結同學，不要做對不起同學的事情，如果別人對不起你，你也不要記在心上，要學會忍讓，心胸要寬廣。不要瞧不慣別人，更不要說別人的壞話。要熱心幫助別人，看見別人遇到困難，一定要盡力幫助。

圓圓，我們家並不富裕，你不能像別的同學那樣穿好的、用好的、玩好的，不要老叫媽媽買東西。那些愛亂花錢買東西的孩子其實是最讓人討厭的。

爸爸現在給你說的這些話，也許你現在不太明白，但你以後慢慢會懂的。如果你想給爸爸說什麼話，就寫信來吧。

你的老爸

2006 年 5 月 7 日

8

親愛的明先：

你好！很久沒有收到你和圓圓的來信了，心中十分掛念你們，家中的一切都還好嗎？

我知道你現在的心境一定十分平靜，因為長久的苦

痛已將你折磨得十分麻木，你早已習慣了別人怪異的目光，也懶得去理會別人無聊的議論。你本是個愛幻想的女人，但你已經很久不去幻想了，因為你已經明白，幻想並不能改變嚴酷的現實，而只會讓人徒增煩惱。你甚至也很少思念了，因為思念只會讓自己感傷，卻並不能縮短我們分離的距離。在這七年多來，你已變得越來越堅強，你對這個家、你對女兒和丈夫的愛也變得越來越深沉了。你將精力全用在了工作和培養孩子上面，而將幻想、思念和對丈夫的愛深深地藏在心裏，苦苦地堅持，默默地等待。儘管現在透過窗戶已可以看見東方的晨曦，但你的心中仍然平靜如初，只有當朝陽真真切切地噴薄而出時，你才會滿懷心喜地張開雙臂迎接上去。那一刻，就是我們新生活的開始。明先，我愛你！我不知道我前世到底修了什麼好事，上天賜給我這麼好的一個女人！像我這種以天下為己任、不太重視家庭幸福的男人是不該得到你如此厚愛的。

從我們相識以來，我記得我只給你買過一雙皮鞋，我們結婚之後，我也沒有對家裏做過什麼真正有益的事情，反而不斷地讓你擔驚受怕，反而讓你承受近十年的不幸和委屈。人們說愛的真諦就是奉獻，我奉獻了什麼給你呢？我奉獻了什麼給我們的女兒和家呢？作為一個丈夫，作為一個父親，作為一個兒子，我是真正沒有盡到自己責任的，我對你、對女兒、對已經去世的母親，我是有許多虧欠的。我本想出獄之後好好孝敬母親的，但卻已經沒有這種機會了，真讓人痛心。但對你和圓圓，我還是有機會來彌補自己的過錯的。以後我再也不會離開你們了，我要盡自己的努力讓你享有幸福的生活，讓女兒受到良好的教育。目前我所能做的就是多減些刑，已早日回到你們身邊。9 月底，政府給我減刑一年零四個月，我確實高興了好幾天，因為付出總算有了收穫，經過自己的不懈努力，漫長的刑期又終於縮短了不少。但很快我又恢復了平靜，我又投入到了正常的改造生活之中，為了那個幸福時刻的早日來臨，我還必須繼

續努力。現在我的心境也非常平靜，除了有時思念你和圓圓之外，我很少想外面的人和事情，平常除了完成自己的勞動任務之外，我將主要精力用於看書學習。你寄來的書我已基本上看完了，我又從監獄的圖書館借了不少書看。目前我對我國古代的哲學書籍比較感興趣，尤其是《論語》這本書我已看了很多遍，許多內容都幾乎能夠背誦了。

以前自己只注重學習文化知識，但現在我才明白，一個人如果沒有道德智慧，如果不知道基本的為人處事原則，那麼他就會在人生的道路上栽跟頭的。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我現在很贊同這個觀點，因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同性格的人就會有不同的選擇。性格是天生的，而且再好的性格也有其局限之處，只有通過不斷的學習、修養，才能彌補自己性格的不足之處。一個性格完善的人就是一個有道德的人，有道德的人能夠享受到正常的命運，而道德修養不夠或者沒有道德的人就享受不到正常的命運。我的人生之路如此坎坷，大概就是因為我的道德修養不夠的緣故吧。因此在剩餘的刑期裏，我要加緊研讀這些聖賢的道理，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前幾天，我們組上有位同改的家裏發生了火災，房屋、糧食、衣物都被燒光，這位同改的妻子幾年前就已去世，家裏只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和一個老父，因此面對這種情況我自然就動了惻隱之心，把僅有的 100 元錢捐了出來，雖然自己以後這兩個月生活會比較艱苦，但做了這種事心裏卻感到無比寬慰。有道德的人不需要別人同情，但卻應當同情別人，自己有困難應自己想辦法解決，但別人有困難卻應伸出援助的手。有道德的人應當幸福地生活，他們蒙受不幸是因為偶然，而無道德者本應受到命運的懲罰，他們暫時風光體面只是因為僥倖。

所以我們如果希望我們的女兒以後有美好的人生，就應當重視

對她的道德教育，知識、才藝、技能只是一個人謀生的手段，道德才是一個人立世為人的根本。所以每次給女兒寫信，我都是主要教導她如何做人，至於她以後到底有沒有出息，那要靠她自己的天賦來決定。天賦聰明，又為人正直仁厚，以後必成大器；天賦聰明，卻為人狡猾自私，以後必為禍患。所以我們教育女兒，一方面要開發她的天賦，一方面還要培養她的正直善良的品性。到目前為止，經過你多年的正確教育，我們女兒的表現還是讓我感到滿意的。等我出來以後，讓我來承擔教育她的責任吧。她小小年紀就想到要讀劍橋大學，那麼我無論如何也要幫助她實現這個夢想的。

新的一年又要來臨了，春節期間你們會來看我嗎？以前你們總是幾經轉折才到這裏，我建議你們這次先乘火車到達州，再轉汽車到這裏，這樣可能會節省些時間，也可以順便領略一下達州的風景。我什麼東西都不缺，只希望你們旅途順利平安！

祝新年快樂，萬事順心！

賢斌

親草於 2006 年 12 月 20 日川東監獄

9

親愛的明先：

你好嗎？寄來的東西已收到，請放心。

馬上又要辦“五一”壁報了，可能我又要忙一段時間，因此趕快抽空給你寫封信。

不知怎的，隨著我們團聚日子的越來越近，我對你們的思念也越來越頻繁了。不僅晚上睡在床上會想你們，甚至有時白天無事時

也會在眼前浮現出你和圓圓的樣子。這大概是有了希望就會有憧憬的緣故吧。老實說，在前面幾年我是很少這樣的，在那個時候為了減輕坐牢的痛苦，我常常故意麻醉自己，儘量避免想外面的事情，除了埋頭改造之外，我將自己過剩的精力幾乎都用在了看書、打球和下棋等事情上面。這樣，單調、乏味、枯燥的日子終於被我拋在了後面，現在回想起來，才感到這幾年居然是我人生中過得最快的幾年。

三十多年來，我經受的苦難是很多的，兩次大病，兩次坐牢，但只要學會了苦中取樂的辦法，苦難也終將被我踩在腳下。當然，戰勝苦難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那就是離不開親情的溫暖。為什麼許多人在苦難災患面前會消沉下去並走向毀滅，就是因為他缺少親人的關心和朋友的鼓勵啊，就是因為他只看到自己的無力卻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只感受到生之痛苦卻體會不到生之快樂啊。所以，對於這麼多年來你一如既往地關心和支持我，我心裏是充滿了感激之情的。我一生也許犯過很多錯誤，但我至少還是做對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遇見你之後愛上了你。

明先，在當今這個世界上，像你這樣的女人是很少的，你不僅具有高尚的品德，而且擁有一顆善良而美麗的心。你就像那些世界名著和世界經典電影中的女主人公一樣，真誠地追尋和踐行著愛的真諦。看看那些在金錢、權位、利欲面前暴露出來的眾生相吧，我們的愛情和婚姻真的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偉大的愛情和婚姻呢。可惜我缺少文學的素養，也沒有文學的衝動，要不我會為我們的愛情寫部小說的。以前在外面曾看見徐文立和他夫人攜手相行的照片，我很受感動，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我希望我們將來也能像他們那樣相親相愛地生活下去。《詩經·終風》中寫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是千百年來多少有情人的心聲啊，它也道盡了我現在對你的全部情意。

此致

賢斌

親草於 2007 年 4 月 8 日川東監獄

10

親愛的明先：

你好！來信已經收到，勿念！

上次我在信中希望你在外面替我買幾件衣服並在國慶時送來，現在看來用不著了，因為最近我有個剛進來的老鄉，他剛好有幾件衣服沒打標記，我一穿正合身，而且正適合我出來的時節穿，於是他就大方地送給了我，我也就毫不客氣地收下了。這樣終於省去了你替我買衣服時的麻煩，等我出來之後，你再陪我到商店去買吧，那樣既可以重溫我們過去的恩愛溫馨生活，又可以買到更合適的衣物。

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你國慶日時來一趟，一是因為我有許多書要麻煩你帶回，這樣我出來時就可以輕便一些，二是希望你再買個旅行袋送來，因為我還有許多有價值的物品屆時要帶回。對你來說，大竹是個討厭的地方，但願這是你最後一次被迫到這個鬼地方！

你說得對，我出來的時候是用不著你們來接的，因為政府會專門安排人送我回家的。這樣也好，可以省去我在路上的花費。記得 99 年初，我在北京被收容了一個月，後來遂寧市公安局和四川省公安廳用波音 747 飛機把我接回了四川，而我這一輩子恰恰就只坐了這麼一次飛機！

這麼多年來，遂寧的變化一定是相當大的，回家的路我可能找不到了，畢竟我是“少小離家老大回”，現在已“鄉音無改鬢毛衰”，

很可能回來後會“兒童相見不相識”，並且“笑問客從何處來”。幸好現在通信技術發達，我雖然找不到家，但卻可以通過電話找到你們。當然，在回家之前我還是決定先到船山坡看一下我的媽媽，她雖然已走了三年多了，但我知道她現在還沒有完全閉上她的眼睛，在她的喉嚨裏還有幾句話要親自給我講！

經過這麼多年的煎熬，我的學問和能力雖然沒有什麼長進，但是我卻深刻地體會到了親情的彌足珍貴。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我以前確實太自私、太輕狂了，“一朝之忿而忘其身以及其親”，根本不像一個有責任心的男人。經過深刻的檢討之後，我決定在出來之後要有一個徹底的改變，我已經對不起父母了，絕不能再對不起你們。你在信中說圓圓現在對我有些隔膜，我對此並不感到特別詫異和憂慮，長期的分離肯定會傷害她那顆幼小的心，但畢竟她是我的女兒，我們之間有天生的不可分割的血脈之親，只要我以後盡到父親的責任，我相信過不了多久她就會自然親近我的。以前我多次說過，而且現在我仍然確信，在這個世界上，圓圓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願意為她放棄一切，甚至願意為她熄滅我胸中的萬丈雄心。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不是金錢和權力，而是真愛，它可以融化一切、改變一切、撫平一切、實現一切。所以你應當相信，圓圓的心靈之傷一定可以癒合，而你那顆疲憊之心也一定可以重新變得年輕！還有兩個月的時間我們一家人又要重新團聚了，讓我們醞釀一下情緒，收拾一下心情，準備迎接東方的第一抹朝陽吧！

此致

祝平安健康快樂！

賢斌

寫於 2008 年 9 月 1 日川東監獄

我和劉賢斌的聚散人生

陳明先

一

幾年前，賢斌還在四川省第三監獄（在大竹縣城）裏服刑，一直在外面為他奔走呼號的朋友歐陽懿就正告我，要我寫點關於我和賢斌的文字。我想我實在寫不出。我和賢斌的相識很簡單，並沒有人們想像的傳奇。1993 年 11 月，我在遂寧中學教書。賢斌從秦城監獄出來了，幫他二嫂看守過店面。我常常去和他二嫂聊天，我們就這樣認識了。

和賢斌說過些什麼呢？現在的我已無從回憶。雖然見證過 1989 年事件的場景，但對他的經歷，我仍充滿了好奇。遭遇過如此苦難還能樂觀積極的男子，還有什麼苦不能吃呢？我對他有著十二分的好感。雖然他沒有工作，戶口又在城郊的農村，但那時我已經意識到單位和戶口在以後都沒有多大的意義，只要他能養活自己，我就能養活自己和孩子。

我和賢斌交往，始於 1994 年 3 月。當時賢斌已經離開遂寧，開始穿梭於遂寧與成都之間，推銷一種叫芒果茶的飲料。我一向疏於對錢財的關注，但看他吃苦耐勞，也就喜在心裏。

大概是 5 月，賢斌說要到北京去。臨行前，我們在遂寧破舊的街上溜達了很久。賢斌怕我孤單，提出給我買一臺黑白的電視，我拒絕了；他又提出給我買一串金項鏈，我不願意。後來我們想去照張合影來做紀念。可轉了好幾個相館，老闆都不願意接受這樣的生

意，我和賢斌只好花 35 塊錢奢侈一下，照了一套（4 張）黑白的婚紗合影。

暑假，二哥全家到北京旅遊，捎去了我的信和送給他的衣衫。後來他們帶回賢斌的信和一盒《似水年華》的磁帶。信中說黃昏時分，他一個人坐在公園裏，聽著遠處傳來的鋼琴曲，思念著家鄉的親人，是如何地淚流滿面。

9 月 13 日，我們登記結婚。因為賢斌又要匆匆離開，來不及照標準相，我們就把一張黑白婚紗合影貼在了結婚證上。賢斌帶著一張合影到了北京，我守著三張照片呆在遂寧。也許是不堪相思之苦，賢斌也曾有讓我到北京找工作的打算，但後來不了了之。

在賢斌母親的催促之下，1995 年的 1 月 28 日，我們舉行了簡樸的婚禮。想是賢斌從人大學生一下變成監獄囚徒的遭遇，讓他的母親背負了太多的壓力，而今她才有了揚眉吐氣之日。賢斌的母親說，她在婚禮上一直想唱歌。而我那可憐的母親卻一直在流淚，她是在婚禮前夕才得知賢斌全部的情況。我的母親無奈地問："劉賢斌有幾分田地？"

二

在遂寧中學繼光樓一樓西側緊鄰男生寢室的那間小屋，我成了賢斌的新娘。我們的新家很簡單：一張 24 寸的黑白合影掛上了牆，漏光的塑膠綠方格紙貼滿了大大的窗戶。如果站在窗前眺望，可以看見院裏的一棵大榕樹、一座青瓦蓋的小亭子和一口古鐘。古鐘早已被人遺棄，幾乎就沒有發出過聲音。婚後的第一天早晨，賢斌孩子似地拿著鐵錘去敲鐘。假期的校園很寧靜，那渾厚古樸的鐘聲悠遠而綿長。

這個生活細節，賢斌在不同的場合多次提起過。我想那是因為

小屋和鐘聲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記憶，也是我們不可多得的安寧生活的象徵。

正月初四的晚上，我們和賢斌的同學聚會回來，發現學生寢室的大門沒上鎖，小屋的門已經被打開。房間裏的東西井然有序，但放在書桌裏的兩臺相機中的一臺不翼而飛。對於這次被盜的蹊蹺之處，賢斌有別樣的理解：小偷的目的在於膠片，而不是財物。這樣，友人陳兵被迫丟失了他的相機，而我和賢斌被迫丟失了關於婚禮的所有記錄。

賢斌已隱約感覺到了些什麼，但這並沒有影響他的心情。我雖有些遺憾，但也無從追究。只是一提那些相片，我常一廂情願地想它們還躺在一個安全的角落，也許某一天會被如數歸還。

婚後賢斌和我呆了多久，我記不清。他總是匆匆而去，突然而回。他一走，我的心就跌入了無底的深淵，沒有他的一點音訊，我的擔心無處傾訴。也許是相聚的日子太少太少，以至於結婚多年之後，看他突然回來，我還會滿懷羞澀，心跳不止。

1995 年的夏天，賢斌帶著我去保石中學看望他的好友歐陽懿。那時，歐陽懿已經為人父了。孩子甚小，我和羅老師在家看小孩，歐陽懿就帶著賢斌到當地農民家裏搞調查。調查歸來，賢斌很興奮，揮筆寫了好幾天。

等到公安第一次抄家的時候，我們已經搬到了繼光樓的三樓東側。那是木制的三間屋的房子，還有一個陽臺和簡易的廚房廁所。家佈置得簡單而溫馨，賢斌在這裏學會了做飯炒菜。

1996 年的 3、4 月，賢斌的出行就沒有以前那麼自由了，他回家的消息很快就會被公安知道，然後被帶去問話。那個時候的問話多少有些劍拔弩張的味道，賢斌不想與他們糾纏，後來乾脆就不回家。

我們夫妻的相見變得越來越艱難。5 月的一天上午，賢斌的母

親過來說賢斌回來了，在她小東街的出租屋裏。我慌慌張張地趕過去，躲躲閃閃地進了母親的房屋，看見賢斌坐在破舊的長凳上，削著香桃在等我。

下午，賢斌帶我到遂寧一中隔壁的公園漫步。相對於家來說，偏僻的公園是比較安全的地方。我們依偎在公園的長凳上，一直坐到黃昏。晚飯吃過“馮水餃”，賢斌帶我到涪江邊上。那時的江邊垃圾滿地，亂石成堆，很少有人行走。我們手拉手在暗淡的燈光下走來走去，一直走到深夜。後來走累了，賢斌才決定進城。我們穿街走巷，好不容易找了一家不需要登記的小旅館住下。

公安好長時間沒有看到賢斌了，他們一定很著急。6 月初，我接到父親病危的電報，急急忙忙趕回了仁壽老家。一路上，我發現有個穿戴體面的男子一直跟著我。他跟著我一次次地換車，還會拿出一個黑乎乎的東西（不知道是不是大哥大）躲到一邊去和誰聯繫。我的直覺告訴我他們在找賢斌呢！關於這個人身份的判斷，我後來在嫂子那兒得到了印證。因為不久她就問我：“妹夫出什麼事了？為什麼公安到這兒來打聽他？”

1996 年的美洲杯開賽了，賢斌像一只倦飛的鳥兒回到了家裏。國保聞風而至，賢斌中學時的班主任（學校的副校長）帶著一群人敲開了我家的門。師生在這樣的場合下見面，多少有些尷尬。很快，賢斌就被氣勢洶洶的公安政保處長王延文帶走，另一些人則留在我家翻箱倒櫃。

員警移動了我的床褥！

員警翻亂了我的衣物！

員警打開了我的日記！

員警在閱讀我的文字！

……

他們肆無忌憚地侵犯了我的隱私，我就像第一次被人剝光了衣服扔在大街上，感到從未有過的屈辱！我緊張，憤怒，全身都在發抖。我懷揣著賢斌塞給我的通訊錄，故作鎮靜地在陽臺上走動。

第二天，賢斌安全地回來了，而那些記錄了一個女孩十四年的青春與夢想的六大本日記卻被我燒個精光。

三

1997 年 5 月底，在孩子出生前夕，賢斌暫時結束了他的行程，決定在家裏呆一段時間。看我已經“大腹便便”，步履艱難，他常暗自擔心。一天，我上街閑走，到了二嫂的店面，一時聊得開心，忘了歸家。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6 月 13 日上午，孩子剖腹降生，賢斌喜不自禁。每天，他洗衣做飯，照顧孩子，忙得不亦樂乎。孩子還沒滿月，他說：“我最近要出去一趟，我讓媽過來幫你！”

給我留下一些生活費，賢斌好似無所牽掛地離開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似乎也不用知道。可是那個秋天，等他再次回來的時候，賢斌已經不是我們的賢斌，而是一個肺結核復發的病人。他嗑血不

止，只好住進了醫院。我推著小孩，穿梭於家、菜市場和醫院之間，心中充滿了無限的哀傷。

賢斌是一個堅強的人，但復發的病情讓他脆弱得像一個需要寵愛的孩子。為了支付他的醫藥費和營養費，我絞盡腦汁，四處籌借。後來實在是沒有顏面借錢了，就賤賣了賢斌的母親給我的金戒指——我永遠記得那天自己小心翼翼地走進天上街私人小金鋪時的心酸："我拿什麼來拯救你，我的愛人？"

那是賢斌第二次患結核病。賢斌的母親心急如焚，她想盡了各種辦法，試用了各種偏方，企圖將病魔趕走。聽說用一種草藥泡洗可以減輕病情，賢斌的母親從幾公里外的仁裏場背了一口大鐵鍋到我家熬草藥水。她節約家裏的生活費，不停地周濟我們，我們才得以勉強度日。

員警也曾到醫院看望賢斌，當然他們的看望是否還有別的意味，就不得而知了。98 年的春天，賢斌的病情已經好轉，可以在家靜養了。4 月，我們搬到學校大門口的一所房子裏。房子陳舊，但空格很多，可以安排成三居室。這樣，賢斌的父親就能住到我家來，照顧我們達 12 年之久。

那時，賢斌的父親 70 歲，身體還算利索，他常用竹車推著孩子四處走走，賢斌也就跟了去。他們常把孩子推到隔壁的川北教育學院。學院有個大花園，花園裏面一年四季都有花開。我一上完課，常常跑到一棵婆娑的桂花樹下去找他們，一家人便在那裏團聚。去的次數多了，那些美好的金桂、檉柳、紫藤便長在了我們的心裏。賢斌出獄後不止一次地告訴孩子他曾帶她去看花開聽鳥叫，可在 13 歲的少女那裏，怎會有父女相依的溫馨記憶？

賢斌的身體還沒完全康復，但他還是有些等不及了。夏天一過，賢斌就到了成都。不久，他從家裏帶走了床單、棉被等日常用品，似乎是要長住下去。孩子幼小，需要人疼愛，我加倍努力試圖彌補

缺失的父愛，並在她的成長中感受到了快樂。

12 月，賢斌興高采烈地回來了，並帶回一臺傳真機。傳真機要和電話連通，才可以用來向通話的對方傳輸文件。為此，家裏才裝上了電話：0825—2248222。

賢斌難以抑制自己對傳真機的熱情，他足不出戶，終日忙忙碌碌。而周圍的氣氛似乎異常緊張：王警官的脾氣越來越大，員警抄家的次數也越來越多，他被傳喚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往往一去就是 48 小時。

後來，員警的車沒日沒夜地停在樓下，我們在三樓也能聽到它的轟鳴聲。賢斌的行動受到了限制，他呆在家裏，沒辦法把寫好的文章列印出來傳真。

一天，我去買菜。賢斌把他的文稿給了我。我找了家偏僻的小店，把它們列印出來，裝在買菜的布袋裏提回了家。賢斌的文字繼續不斷地傳真出去，國保感到奇怪，就跟蹤了我，並扣押了小店老闆的印表機和影印機。我被帶到公安局，第一次受到員警的盤問。

對於員警無休止的騷擾，賢斌十分氣憤，他帶著孩子到遂寧市公安局抗議。12 月 19 日，在公安局大門口，因賢斌拒絕接受傳訊，氣急敗壞的王延文就指使手下的幾名員警暴力拉扯，以致撕破了他的衣袖。1999 年的 1 月，氣氛似乎有些緩和，賢斌又離開了遂寧。

寒假一到，賢斌的父親就回到仁裏老家，忙著準備年貨。我和孩子相依為伴，盼著賢斌早日歸來。雖然家裏已經安裝了電話，但賢斌很謹慎，他的電話從不曾為我們母女響起。直到春節前兩天，歐陽懿說賢斌出事了，他被關進了北京的收容所，我忐忑不安的心才落了地。

1999 年，我和孩子過了一個殘缺的春節，但我沒想到這種殘缺只是一個開始，它將一直延續到 2008 年。

四

1999 年的 6 月 13 日，孩子滿兩歲了，我們照了張全家福，這是我們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張滿載幸福和快樂的照片。20 日，在幹女兒的生日宴後，賢斌抱著孩子合影，但誰也不會想到這將成為他今生的懷抱溫暖過孩子的唯一證明。

7 月 7 日，員警闖進家門，簡陋的家頓時狼藉滿地。孩子幼小，無甚驚恐。賢斌被帶走時，緊緊地擁抱了一下孩子，就像以前每次離家和我的永別（他總是在告別，但對我而言，他每一次的告別都是永別）。8 月 6 日，賢斌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 13 年，剝奪政治權利 3 年。9 月 3 日，他被送到了四川省第三監獄（在大竹縣城）。

大竹原本是川東的一座小城，是我不曾到過的地方。但在漫長的十年中，我和我的孩子一次次擠火車乘大巴在崎嶇的山路上狂奔。因為山高路險，大巴車開得險象環生，每次我都是緊緊地抱著孩子猶如去奔赴死亡的約會。

為了轉移緊張的心情，我和孩子看山，看樹，看冒著白煙的山坡。只有大巴車駛過長滿麻杆的九龍山腳，我懸著的心才能放下來。在那個偏僻的山中小縣城，我們住過 8 元的旅館，吃過最簡單的飯菜，我和賢斌的母親及孩子相依為命。

我對監獄的印象來自 1995 年的那個夏天，好友陳衛從北京被轉送到四川省第一監獄（在南充市高坪區），我和賢斌去看他。在一個類似大食堂的屋子裏，隔著一個鋪滿白瓷磚的長臺，賢斌和陳衛抽著香煙握手言談。從此，我以為在中國的監獄裏犯人和他的親人都是可以握手言談的。

見賢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穿過兩道大門，經過繁瑣的程式，才能在一間滿是監視的眼睛的房間裏見到他。當歐美電影中探監的

場景真實地出現在面前，我才明白讓孩子和賢斌在獄中共度春節的想法是多麼幼稚和天真。

在三樓一個不太大的房間裏，有一個用防彈玻璃隔出的長方形空間。每次，賢斌滿臉微笑從玻璃罩的那頭走過來，坐在我們的對面。雖然是面對面，我們卻感受不到對方的氣息，只能在電話裏閒聊半個小時。

有一年的春節，我帶著幾個侄子去看賢斌。那年運氣特好，居然被允許和他吃一頓火鍋。我和賢斌挨著坐了一個多小時，居然不敢去拉一下對方的手。孩子 7 歲那年，她歡天喜地地跑進玻璃罩擁抱了賢斌，然後對我做了一個鬼臉："媽媽，你們倆也擁抱一下吧！"我和賢斌遲疑地站在兩邊的門口，不約而同地望了一眼管教幹部，好不容易邁出一步，完成了夫妻間的十年一抱。

賢斌是一個內斂的人，在信中卻柔情萬種。他不停地教育孩子，給孩子畫畫、講故事。而我自從知道第一讀信人不是他，信就變成了公式化的文字。我總是向他彙報家人的情況，極少流露出我的悲傷——我不想讓公安和獄政科的人在我的悲傷中狂歡。但我的有些文字是傷感的，而賢斌居然看不出，以至於後來我說寫信時總要淚流滿面，他甚為驚訝。

大概是 2001 年，賢斌來信說長胖了。我有些擔心他的病身（肺結核並未痊癒），就提醒他注意是不是浮腫，順帶提及 50 年代的全國大饑荒。結果在下一次的探望中，獄政科的一個像模像樣的人拿著我的信指責說："你還是老師，怎麼能這樣說呢？什麼叫全國一片腫啊？"我毫不退讓，和他大聲爭吵起來。

2005 年以後，我的信更多地變成了對照片的解說。我開始習慣用照片和賢斌交流，比如郊外一只翻飛的紅蜻蜓、孩子的長笛演出和家人春節的聚會，我希望賢斌能在我的照片中直觀地感受自然和生活，從而用靈魂走近我們。

五

賢斌在獄中了，我以為生活會從此平靜：他將不再漂泊無期衣食無著，而我和孩子也將免受驚嚇與傷害，不在惆悵與無助中度日。

謝軍大姐（黃曉敏的前妻）和羅碧珍老師（歐陽懿的妻子）曾說過她們的孩子如何在驚恐中看著公安翻箱倒櫃然後把父親帶走，我慶倖我的孩子還幼小，不曾懂得恐懼和傷害。我安享暴風雨之後的這種寧靜，並在寧靜中生出些幸福的感覺來。

賢斌的朋友偶爾會來看望，走時會留下一些關於賢斌的文稿。我忙著照顧兩歲的孩子和那養家的工作，也無心細細欣賞。

但“六四”前後，我還會被怒目圓睜的公安人員鄭大雙帶到學校的保衛科去詢問。有時是咄咄逼人，有時是好言相勸。也許是我對賢斌的不離不棄讓他們失望了，他們曾威脅說要弄我到鄉村小學去教書。其實，我都做好了回家種田的準備，這些威脅對我沒有一點殺傷力。

2001 年 5 月 28 日的晚上（賢斌已入獄快兩年了），鄭大雙帶著大隊人馬突然敲開了我家的門。說是賢斌在獄中有違法行為，需要抄家協助調查。員警再次翻閱了我家的每一個角落，最後只找到歐陽懿和火戈的幾篇文學味特濃的文章，還有張先生（很遺憾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寫的一封信。他們如獲至寶，就把我帶到學校的行政辦公室，詢問至深夜。

張先生是荷蘭人，年輕的時候被劃成右派。出於同情，2000 年的春節他在信中夾寄了 100 美元和 40 荷蘭幣作為孩子的壓歲錢。信是用繁體字寫的，內容一清二楚。但員警在這封信上糾纏了很久，似乎想從裏面挖出什麼東西來。看他們小題大做的樣子，實在是很滑稽。但我不想陪他們玩這種把戲，就說孩子需要我照顧，我要回家。他們就利用我的弱點，威脅說：“你說不清楚就別想回家！”

在他們面前我永遠都說不清楚！我把心一橫拒絕說話了。他們沒辦法，就開車帶我到北門一個較遠的地方，把我關進了一間屋子。

那屋是在二樓，裏面有幾架雙層的鐵床，很像學生寢室。只是空蕩蕩的，似乎無人住過。我借著燈光打量，才發現中間那架床的上鋪有一棕墊。我爬上床，和衣而睡。

第二天早晨，“吃飯了！”的吆喝聲把我叫醒，我看到一個老頭從房間的小窗口推進來一碗稀飯。吃過早飯，我朝窗外看過去，能看到一棵大樹綠幽幽的樹梢。老頭在長廊上來回兩次，也許是看我太像正派人，就找了本雜誌給我打發時間。

到了下午 5 點，一個胖胖的女人把門打開了。在她的辦公室，我補填了一些登記手續。她敷衍地問我對昨天的問題還有沒有什麼補充之後，就讓我回了家。

在這個世界上被蒸發了 24 個小時，除了賢斌的父親和孩子，其他的人一無所知。等我和陳衛聯繫上的時候，他說：“我也剛從戒毒所被放出來！”原來我們是關在同一個地方，只是他在一樓而已。我問：“你中午吃的什麼菜？“土豆！”說完，我們倆放聲大笑。

六

1999 年的年底，在川北教育學院外面的廣場上，公安機關搞了一個大型的圖片成就展。聽說賢斌被審判的照片就掛在裏面，我沒去看。

我的丈夫被判刑的消息慢慢在社會上流傳。我和孩子成了可憐的人，我也成了有些人躲閃的對象。在那樣的年代，如果你還想升官發財，和我這樣背景的人交往是危險的。

為了讓仁壽老家的親朋好友過上安寧的生活，我幾乎和他們斷了聯繫。我的母親是在 2005 年底才知道賢斌被捕入獄的事，那時

賢斌已經在獄中熬過了 6 個春秋。

因害怕陳衛的母親一夜白頭的悲劇重演，我把母親帶到川北教育學院的花園裏，先告訴她賢斌獲獎的消息以及獲得的獎金，然後告訴她賢斌判刑的具體情況以及我現在的處境是如何之好。一字不識的老母親如釋重負，似乎能理解發生的一切。她顯得那麼年輕那麼恬靜那麼智慧，讓我覺得多年的擔心純屬杞人憂天。

可一連好幾天，母親總躲在廚房裏落淚。孩子不滿 8 歲，但已經懂得安慰別人："外婆，你不要哭。我爸爸在裏面教書，他好得很！"

雖然極少得到來自我老家親人的關懷與照顧，但我和孩子還是幸運的。2000 年的"六一"兒童節，一位退休的右派教師悄悄來到我家門口，送給三歲的孩子一袋李子和娃哈哈。我的一對朋友，他們夫婦帶著孩子常來我家走動，多年來對我的孩子呵護有加，形同己出。鹽市街診所的一個女醫生，有著悲憫的情懷，每次給我的孩子看病，她總是細心安撫，不收或少收藥費。陳衛的母親，毅然取出放在股市裏的養老金，借給我買下百盛家園的房子。而遠在重慶的鄧煥武老先生，多次登門看望我和孩子，並借給我房屋的簡裝費，讓我能在 2002 年的 9 月安頓好一個新家。雖然賢斌不能回家，但在百盛家園的生活是簡單而幸福的。

2002 年的 6 月 25 日國保再次傳喚了我，但在以後的 6 年裏，公安好象忘記（其實他們一直蠢蠢欲動）了我的存在，不曾到家打擾我。只有兩次（一次是重慶警方來調查肖雪慧是否為我送過美元；另一次是遂寧警方要求我在奧運期間不能離開遂寧）把我叫到學校的行政辦公室，要麼詢問，要麼警告。我安心工作，攢錢養家；孩子健康成長，學業優秀。

2002 年 12 月 5 日，歐陽懿被成都警方帶走，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 2 年。羅碧珍老師很悲傷，而我卻無從安慰她。因

為在當今的中國，每一個異見人士的妻子都有可能面對這樣的命運，我不知道我們的哭泣能改變多少現實。

與賢斌的漫漫刑期相比，歐陽的這 2 年似彈指一揮間。2004 年的 12 月 4 日上午，歐陽被獄警送回遂寧老家，與去成都迎接的羅老師錯過，保石派出所的人只好把他送進城裏。在和平路的橋頭，我和孔傑（歐陽懿的同學）終於見到了他。

兩年的牢獄，讓歐陽懿還是有了好些變化。當他單薄的身軀從對面穿過來，我竟看到了多年以後賢斌的無助與蒼涼。

在夢裏，我見過賢斌回家的無數種方式。最初，總是我去探監劫獄，助他虎口脫險；後來，變成了賢斌笑眯眯地回來，挎著包，風塵僕僕的樣子；再後來，只能聽到他提前回家的消息，但總是見不到身影：我想我的夢由希望到絕望而最終陷入了渺茫之中。

2008 年 9 月，賢斌在信中告訴我刑滿的具體日期，但我沒有人們想像的那般喜悅。對於我和他來說，自由顯得是多麼奢侈！賢斌用了 10 年的時間離開我，那我們又需要多少時間才能走近對方呢？我不忍見到他的無助與蒼涼，難道他就忍心看我似鹽鹼地般的堅硬？

記得一段描寫俄羅斯異見人士妻子的文字，說她的臉上再也看不出快樂和悲傷。我想我也終將變成那個麻木的老婦人，因為從 2008 年 11 月 6 日到 2010 年 6 月 28 日，只有 1 年零 7 個月又 22 天的時間，我和賢斌還在走向對方的路上。

後記：鑒於篇幅的原因，有些關懷與幫助難以細說，故在文中隱去。十五年來，我所經歷的一切，也是中國那些異見人士的妻子已經、正在或將要經歷的，謹以此文獻給那些曾經是、正是或將是異見人士妻子的女人們！

2010 年 7 月 14 日—8 月 10 日寫於百盛家園

我和我的父親劉賢斌

——陳橋自述[7]

這是爸爸媽媽 94 年的合影。

1997 年 6 月 13 日，我來到這個世界。

[7] 本文為劉賢斌女兒陳橋為2011年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召開的關于中國網絡審查問題的聽證會所寫的證詞。國會考慮到陳橋年齡尚小，決定由她的監護人張前進牧師代為作證。

我叫陳橋，今年十四歲。在我兩歲多的時候，我爸爸被帶進了監獄。我們三口之家只有兩張合影，都是在我兩歲前照的。

1999 年 6 月 20 日，生著病的爸爸抱著我合了一張影，17 天之後，他離開了我的童年。

2008 年 11 月 6 日，父親回家挽住的是一個青春美少女。

爸爸為我畫的卡通畫。

我已不記得第一次去監獄看他是什麼時候，我只知道每年的寒暑假我和媽媽就會擠著火車到南充，再從南充坐大巴到大竹，去看我的爸爸。爸爸會定時給我寫信，給我寄他畫的畫，他是用圓珠筆畫的，通常只有一種顏色，所以我會用水彩筆來給那些畫塗上顏色。

在春節等一些重要的節日，我也會和媽媽一起寫信給我爸爸，爸爸不在家的日子就這樣不知不覺地過去了。2008 年 11 月 6 日，爸爸突然回到了“我家”，

但可惜的是那時候我剛好才進入青春期，並不懂得怎樣和爸爸親近，也可能這麼多年沒有和爸爸一起生活，爸爸的突然回來就像家裏突然多了一個陌生人一樣，我一時有點不太習慣。和爸爸在一起的兩年的時光很快就過去了，爸爸和我的關係在開始慢慢恢復，也逐漸融洽，親密。

有一天，我記得我剛過完 13 歲生日不久，本來我還在教室上我們班主任的課，突然政教處的一個老師就給班主任說讓我去警衛室。到了警衛室，已有兩個男子坐在那裏，他們就介紹了自己的名字，說自己是員警。我們班主任來了以後，這場談話就開始了。班主任坐在我的旁邊，員警坐在我的對面，其中一個負責問我，另一個負責將我們的談話記錄在本子上。負責審問的員警嚴厲地告訴我，不管怎麼樣首先希望我如實回答，不要有什麼隱瞞的。我嚇得馬上答應了。他先問了我一些“平常喜歡幹什麼，有什麼愛好，假期喜歡幹什麼”等問題。我都如實作了回答。 我當時還很納悶，他問這些幹嘛呀。接著他開始問：“你家裏有幾臺電腦？”當時我家只有兩臺電腦，一個臺式電腦我媽用，一個筆記本我和我爸共用。我就照實回答了。他又問：“你和你爸共用筆記本嗎？你用這個來幹什麼？”這時我估計他們找我和我爸有關系了，然後我就回答：“我平時就用來上網啊。”他問我上網幹什麼？我回答：“聽音樂，看小說，聊天，看電影。”他說：“那你寫文章嗎？”我說：“偶爾寫些日記。”他就問：“那你爸用筆記本幹什麼阿？”我回答：“上網，下棋，還有寫文章。”他就說：“你爸喜歡寫文章嗎？”我說：“喜歡。”他說：“你爸爸什麼時候用電腦？”我繼續如實回答：“我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學，電腦幾乎都是他在用。”之後他又問：“你就沒用那個電腦打過文章嗎？”我說：“我有寫過一些小說，作文之類的。”他又問“你知道你爸爸寫過什麼樣的文章嗎？”。我說：“我也不太瞭解他寫的東西，只知道他寫過一篇關於‘三鹿奶粉’的文

章。”然後他問到這篇文章的具體內容，我告訴他我忘了，大概就是篇評論文章。”到了後來，員警讓我在我和他們的談話記錄上簽字，證明我說的情況屬實。

這個審訊完了之後，同學們都放學了。後來我同學們問我怎麼了，我告訴他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員警要找我。到了中午我給我媽打電話，就問她我爸怎麼了，說著說著我就擔心地哭了。我媽馬上安慰我說：“不要哭，不要哭，沒什麼事！”，我相信了我媽的話，心裏就平靜下來，以為員警可能只是隨便來問問我爸的事。下午上學時，發現我媽在我們寢室大門口（我在學校住校）等我，她一見到我就問我：“你沒事吧？”我告訴我媽沒事，就去上學了。

週五我從學校回到家中（我平時住校，每週回家一次），媽媽傷心地告訴我說我爸爸又被員警抓走了。爸爸的再次從我的生活中消失，其實當時對我來說沒有太多的感覺，儘管這麼多年我知道他是我的爸爸，但是我對他的瞭解並不多。其實應該說，從我懂事以後這麼多年，我一直不願意主動去瞭解他，有時甚至還故意避開有關他的消息。直到這次來美國前，媽媽才慢慢地告訴了我一些爸爸過去的經歷，讓我對他漸漸地多了一些瞭解和認識。

爸爸在我的生命中就像一個匆匆的過客，他在我童年裏的印象已經越來越模糊和遙遠了，在我長到 11 歲的時候，他突然又來到了我的生命中，和我們一起生活了兩年多的時間以後，忽然有一天又好像來不及道別又匆匆上路了。說實話，這麼多年我好像已經習慣了爸爸長期不在我身邊只和媽媽單獨生活的現實，所以他這次和我們分離我當時並沒有太難過，沒有爸爸的日子裏，我在媽媽的呵護下也健康快樂地慢慢長大了，但現在回想起來，我有時還是感受到我的生活中缺少點什麼東西。我本該擁有的正常生活常常被一種無形的勢力所包圍，干擾和影響。爸爸回來的那段日子，我沒有現在這樣懂事，那時的我就像個刺蝟一樣，不願意和我爸親近，現在

回想起來，心裏有許多的遺憾和愧疚，覺得自己當時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不該這樣。我現在也記不全那些和爸爸的回憶，腦海裏也只能浮現出一些和爸爸一起畫面，下五子棋的情景，還有爸爸教我學論語，讓我練習鋼筆字，給我買生日蛋糕等的一些零星片段。這些和爸爸在一起的經歷當時不覺得有什麼，但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心裏暖暖的，沒想到這些卻成了我這十四年來對爸爸僅有的一點溫馨的回憶。這些點點滴滴，因為稀少而顯得珍貴。

我是來到美國之後，才知道爸爸所受到的種種不公正的對待。我現在瞭解有些美國科技公司如思科，協助中國公安局監控與追查像我爸爸那樣的無辜的人。我也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總之我和媽媽在一起過得很幸福，快樂，只是我覺得我的成長中缺了爸爸還是很遺憾。14 年來我從沒對爸爸說過一句“我愛你”，但是我心裏知道我需要他，我和我媽媽都需要他。我覺得，如果我爸是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他應該坐牢；可是他做的事，僅僅就是寫了幾篇文章談談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就被共產黨關進監獄，而且是漫長的數十年的光陰，到他出來的時候，他都是一個 50 多歲的老頭了！

我雖然不覺得我爸爸做的事有多偉大，但至少都是正確的事，是一個有良心有責任感的人都應該做的事。我越瞭解我爸，我越覺得我爸冤枉，這樣的事本不應該發生，這不是傷害了一個人，這是傷害了一家人，一群人，每個關愛我爸的人，每個有良知的人，每個不願意屈服的人！

附錄

法庭文件

被告人劉賢斌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被告人劉賢斌犯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被告人劉賢斌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與尚未執行完畢的剝奪政治權利四個月零八天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四個月。——《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後記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決 書

（1992）中刑字第 2288 號

公訴機關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

被告人劉賢斌，男，24 歲（1968 年 8 月 25 日出生），漢族，四川省遂寧市人，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學生，住該校宿舍 9 號樓 2 層 47 號。因反革命宣傳煽動與 1991 年 4 月 15 日被羈押，因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與 1991 年 10 月 17 日被逮捕，現羈押於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辯護人周海峰，北京市海澱律師事務所律師。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與 1992 年 9 月 15 日以被告人劉賢斌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代理檢查員王美榮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劉賢斌及其辯護人周海峰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經合議庭評議，現已審理終結。

經審理查明：被告人劉賢斌與 1989 年 4 月至 6 月北京發生動亂好反革命暴亂期間，書寫了反革命的大字報，張貼在中國人民大學校園內，並給中學時的同學寫信，污蔑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煽動建立反動組織“中華民族先鋒黨”。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後，被告人劉賢斌又書寫、印製、張貼反革命傳單 200 餘張，煽動群眾抗拒、破壞國家法令。被告人劉賢斌被查獲歸案。

上述事實，有證人證言、書證、刑事科學技術鑒定結論在俺證實，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

本院認為，被告人劉賢斌目無國法，在北京發生動亂和反革命暴亂期間，以書寫、印製、張貼反革命大字報、傳單的方法宣傳煽動破壞國家法令、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已構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鑒於其系青年學生，現能認罪悔罪，故依法酌予從輕懲處。為嚴明國法，保衛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二）項、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一條第一款、第六十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劉賢斌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刑期自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1991 年 4 月 15 日起，至 1993 年 10 月 14 日止），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二、查獲的藍皮筆記本 1 本予以沒收。

如不服從判決，可在接到本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審判長　張存英

審判員　任連才

代理審判員　王燕

1992 年 12 月 28 日

書記員　高潔

四川省遂寧市人民檢察院

起 訴 書

遂市檢刑訴（1999）字第 30 號

被告人劉賢斌，別名劉陳，筆名萬賢明，男，1968 年 8 月 25 日生，漢族，四川省遂寧市中區人，文化程度大學肆業，無業，住遂寧市遂寧中學校宿舍 4 幢 1 單元 3 樓 2 號。1999 年 7 月 7 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遂寧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 13 日經遂寧市人民檢察院批准，次日由遂寧市公安局逮捕。羈押於遂寧市看守所。

被告人劉賢斌顛覆國家政權一案，由遂寧市公安局偵查終結，於 1999 年 7 月 23 日移送我院審查起訴，經審查查明：

被告人劉賢斌在 1992 年 12 月因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兩年零六個月，1993 年 10 月刑滿釋放後，繼續宣傳其反動思想，網路[8]黨羽，非法組黨。1998 被告人劉賢斌與四川省廣元市的佘萬寶（另案處理），成都市的黃××、胡××等人共謀組織“中國民主黨四川籌備委員會”，起草了《中國民主黨章程（草案）》，在《章程》中明確提出：“直接民主選舉，建立憲政體制，剷除政治獨裁，確立分權機制”，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同年 10 月 15 日，被告人劉賢斌同佘萬寶、黃××公然到四川省民政廳遞交“中國民主黨四川委員會”註冊申請書及該黨章程等材料，並同時向境內外通報其組黨情況，並創辦《公民論壇》反動刊物為“中國民主黨四川籌備委員會”的機關刊物。遼寧省“民運“頭目王澤

[8] 應為“網羅”。

臣得到劉賢斌給予的《中國民主黨章程（草案）》，也作為了“中國民主黨遼寧籌備委員會”的章程。1998 年 11 月，被告入劉賢斌自薦為“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備委員會”協調人。

被告人劉賢斌非法組黨未被批准，仍不死心，又於 1998 年 10 月 26 日非法成立“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劉賢斌任秘書長，負責對外聯絡。當湖北“中國人權觀察總部”被政府查封後，劉賢斌於 1998 年 12 月 5 日竟在其家中成立“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自任臨時主辦人，並發通告接替“中國人權觀察總部”的全部工作，自此開始，劉就先後向境內外發佈各類反動稿件、“民運”資訊等材料二十餘篇，恣意攻擊我現行政策、法律、法規。被告人劉賢斌為反對國家對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等人顛覆國家政權罪行的審判，竟於 1998 年 12 月發起中國 23 省、市 214 位所謂政治異議人士百日接力絕食活動。1999 年 1 月，被告人劉賢斌又先後竄至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北京等地，串聯“民運”分子，煽動“民運”分子組建政黨與中國政府對抗。

1995 年以來，被告人劉賢斌以撰寫文章、呼籲書、致黨和國家領導人公開信等方式，惡毒攻擊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攻擊黨的政策，劉在其撰寫的《後鄧時期與鄧後時期的中國政局》一文中叫囂：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將迅速倒臺”，在《反思中共歷史》一文中稱中國共產黨為“一代奸黨”，是“即將潰敗之組織”。在 1998 年 12 月 7 日發出的《緊急呼籲》中煽動：“要早日結束中共一黨專政，號召全國同胞行動起來，展開對中共迫害異議人士的抗爭”，甚至要求“聯合國派維和部隊來中國進行維和”。被告人劉賢斌還在成都多次舉辦所謂“文化沙龍”，宣傳其反動思想。

被告人劉賢斌為了從事顛覆國家政權活動，從 1995 年以來，夥

同佘萬寶多次向境外“海外民運聯繫會9”、“中國人權”等組織彙報工作，提供情況，尋求資助，並於1995年9月、10月，1998年11月分別接受資助200美元、500美元、5000元人民幣。

上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

綜上所述，被告人劉賢斌為了顛覆國家政權，網路10人員，策劃組黨，並大肆實施危害國家政權的行為，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5條第1款、第66條之規定，已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且系累犯，應當從重處罰。本院為保衛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41條之規定，特提起公訴，請依法嚴懲。

此致

四川省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

檢察員　陳建新

李秀華

代理檢察員　胡邦勇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

1、本案材料影本一冊；

2、證據目錄一份。

---

9 應為“海外民運聯席會議”。

10 應為“網羅”。

四川省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決 書

（1999）遂刑初字第 24 號

公訴機關四川省遂寧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劉賢斌（別名劉陳、筆名萬賢明），男，1968 年 8 月 25 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四川省遂寧市市中區，文化程度大學肄業，無業，住址遂寧中學校宿舍 4 幢 1 單元 3 樓 2 號。因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於 1992 年 12 月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又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一年，1993 年 10 月刑滿釋放。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1999 年 7 月 7 日被遂寧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 14 日被執行逮捕。現羈押於遂寧市看守所。

四川省遂寧市人民檢察院以遂市檢刑訴（1999）字第 30 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劉賢斌犯顛覆國家政權罪，於 1999 年 7 月 26 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四川省遂寧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陳建新、李秀華、代理檢查員胡邦勇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劉賢斌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四川省遂寧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劉賢斌刑滿釋放後，多次舉辦所謂“文化沙龍”，創辦《公民論壇》，撰寫文章，製作並參與多份簽名的公開信、呼籲書等，宣傳其反動思想，攻擊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攻擊黨的政策，並於 1998 年 10 月夥同他人非法組建“中國民主黨四川籌備委員會”，草擬章程（草案），妄圖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1998 年 10 月至 1999 年 1 月，

被告人劉賢斌又非法成立“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其後又發通告接替“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的工作，向境內外發送多份反動稿件、“民運”資訊；積極進行“民運”串聯，煽動“民運分子”組建政黨與中國政府對抗。此外，還積極尋求並接受境外資助 700 美元和 5000 元人民幣。公訴機關就指控的事實，向本院提供了相關的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及視聽資料等證據目錄和主要證據影本。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劉賢斌的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款、第六十六條的規定，已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且系累犯和首要分子，應當從重處罰。

被告人劉賢斌辯解公訴機關的指控不能成立，其行為不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1、1998 年 10 月與佘萬寶等人向四川省民政廳遞交“中國民主黨四川委員會”註冊申請，沒有違反中國法律，且未開展組黨的實際活動；2、沒有起草《中國民主黨章程（草案）》；3、1999 年 1 月，到湖北、北京等地是旅遊訪友，沒有煽動組黨與政府對抗；4、成立“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和“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是憲法規定公民的結社自由；5、撰寫文章、呼籲書和公開信並未違反法律，是行使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6、700 美元是稿費，5000 元人民幣是海外朋友送給我治病的，未接受境外資助等。被告人劉賢斌在法庭審理中未提供證據。

經審理查明，被告人劉賢斌自 1993 年 10 月刑滿釋放以來，多次在成都與佘萬寶（另案處理）、胡 XX 等以舉辦“文化沙龍”為名，發表對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社會主義制度等不滿言論，參加者少則幾人，多則幾十人。創辦《公民論壇》，準備作為“中國民主黨四川委員會”的機關刊物，第一期擬刊稿 20 餘篇，主要由被告人劉賢斌編輯、校對和審核定稿，其所編稿件詆毀我國政府未給人民以權利，對已被國家司法機關依法判處反革命罪的魏京生、王

丹等歌功頌德，視其為“英雄”，稱對“六四”事件的定性處理是“暴政”，隊動暴亂分子的法律制裁是“屠殺”。1998 年 6 月至同年 10 月，被告人劉賢斌製作並參與多份簽名的致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關國家機關等的公開信、呼籲書中，攻擊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司法制度。1994 年以來，被告人劉賢斌還撰寫文章，稱“現代中國是專制社會，執政黨是反動勢力”；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迅速倒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為高壓恐怖統治，中國共產黨是民主變革的頭號敵人，要實現政權更替”等等。1995 年至 1998 年 8 月，被告人劉賢斌還加強與“民運分子”間的串聯和策劃，從思想上和組織上為非法組黨做準備。前述事實，有公訴機關當庭出示並經庭審質證的佘萬寶、黃 XX、文 X 等證人證言，證實多次舉辦“文化沙龍”的事實；公安機關收集的《公民論壇》（思想者）發刊詞、刊物編排目錄及相應文稿，佘萬寶的證言，證實創辦《公民論壇》的事實；公安機關手機的有關公開信、呼籲書、信件和文稿，以及刑事科學技術鑒定結論，證實被告人劉賢斌制發公開信、呼籲書，搞“民運”串聯和策劃，撰寫文章等事實。本院對前列證據確認。

被告人劉賢斌於 1998 年 7 月至同年 10 月，與佘萬寶、黃 XX 等人共謀非法組建“中國民主黨四川籌備委員會”，劉賢斌與佘萬寶擬定“中國民主黨章程（草案）”，該章程明確提出“建立憲政體制”、“確立分權機制”等，旨在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同年 10 月 15 日，被告人劉賢斌與佘萬寶、黃 XX 到四川省民政廳遞交了“中國民主黨四川委員會”的註冊申請書、該黨章程和申請人簡歷等書面材料，並同石向境內外通報其組黨情況。之後，被告人劉賢斌繼續實施非法組黨活動，並參與籌建“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備委員會”。前述事實，有公訴機關當庭出示並經庭審質證的佘萬寶、黃 XX、胡 XX、文 X 等證人證言，正是非法組黨的事實，佘萬

實的證言還證實劉賢斌參與籌建“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備委員會”；證人文 XX 證言及說明，證實遞交建黨申請的事實；公安機關收集的《中國民主黨章程（草案）》、註冊申請書、申請人簡歷，《中國人權觀察》第 333 號、第 345 號，“中國民主黨海外籌備委員會”的賀信，劉賢斌所寫的聲明，“中國民主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組”第 1 號公告，“中國民主黨”黑、吉、遼籌委會的提議，以及“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會臨時機構”選舉說明，“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會”選舉表、成員名單等，證實劉賢斌等人非法組黨、參與“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會”籌建和向海內外通報組黨情況的事實。本院對前列證據確認。

1998 年 10 月 26 日，被告人劉賢斌又夥同佘萬寶等人非法成立“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其任秘書長，負責對外聯絡工作。1998 年 12 月 5 日，被告人劉賢斌在其家中成立“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自任臨時主辦人，並發出通告接替“中國人權觀察總部”的全部工作。其間，先後向境內外發送有關“人權”資訊、材料 10 餘則（份），發表詆毀我國國家制度的言論。1998 年 12 月，被告人劉賢斌為反對國家司法機關對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等人顛覆國家政權罪行的審判，參加發起中國 23 省市 214 位所謂政治異議人士“百日絕食活動”。1999 年 1 月、2 月，被告人劉賢斌還先後到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北京等地，串聯並煽動“民運分子”組建政黨與中國政府對抗。前述事實，有公訴機關當庭示證並經庭審質證的佘萬寶證言，證實成立“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等事實；公安機關收集的《中國人權觀察》第 356 號、第 399 號至第 412 號，“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寫給“中國人權觀察總部”及秦永敏的信，“中國人權觀察”正式成員通訊錄，“中國人權狀況報告”第 3 號，“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通告，以及有關資訊材料，物證傳真機二部，證實劉賢斌與他人非法成立“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

接替“中國人權觀察總部”工作和發佈資訊、材料的事實；公安機關收集的相關書信、呼籲書和袁 XX 日記，證實劉賢斌參與發起“百日絕食活動”、搞“民運”串聯的事實。本院對前列證據確認。被告人劉賢斌從 1995 年以來，夥同佘萬寶多次向境外“海外民運聯席會”、“中國人權”等組織，魏京生、劉青、王炳章、王希哲等個人彙報工作，通報情況，積極尋求資助，並於 1998 年 11 月接受境外個人 5000 元人民幣資助。這一事實，有公訴機關當庭出示並經庭審質證的公安機關收集的有關書信予以證實，本院確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劉賢斌於 1995 年 9 月、10 月分別接受境外個人 200 美元和 500 美元的事實，雖當庭出示了相關書信和銀行傳票，但來源不明確，且劉賢斌未實際佔有，本院不予確認。

綜上所述，本院認為，被告人劉賢斌無視國家法律，夥同他人非法組建“中國民主黨四川籌備委員會”，並參與籌建“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備委員會”，並參與擬定《中國民主黨章程（草案）》，提出“建立憲政體制”、“確立分權機制”等；還非法成立“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後又發通告接替“中國人權觀察總部”的工作。其間，還撰寫文章，製作並參與多份簽名的公開信、呼籲書，恣意攻擊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搞民運串聯和煽動組建政黨與政府對抗，其目的在於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刑事定罪原則和刑法的有關規定，被告人劉賢斌的行為符合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構成特徵。公訴機關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劉賢斌的行為已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告人劉賢斌辯解公訴機關的指控不成立，其行為不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但未向法庭提供證據，且與本院查明的事實、確認的證據和刑法的規定不符，其辯解意見不能成立。被告人劉賢斌夥同他人為首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活動，應當認定其系首要分子；曾因犯危害國家安全罪受過刑罰處罰，刑罰執行完畢後又進行顛覆國家政權的

犯罪活動，應當認定系累犯；同時還與境外組織、個人相聯系，尋求和接受資助，進行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活動，均應依法從重處罰。本院根據被告人劉賢斌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以及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條、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六條和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劉賢斌犯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刑期自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七日起，至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止），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二、查獲供犯罪使用的先驅 HF-188 傳真機 1 部、多元 DY-5M 傳真機 1 部，予以沒收。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審判長　劉澤斌
審判員　鄧永太
審判員　李德昌

一九九九年八月七日

書記員　黃志勇（代）

遂寧市公安局
起訴意見書

遂公國訴字（2010）第01號

犯罪嫌疑人劉賢斌，男，漢族，生於1968年8月25日，身份證號碼：510902119680825265 7，大學肄業，四川省遂寧市船山區人，戶籍所在地為船山區靈泉辦事處橋東社區4組100號，現居住在遂寧市船山區凱旋上路40號“百盛家園”2棟2單元6樓2號，無業。

犯罪嫌疑人劉賢斌於1992年12月曾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1993年10月刑滿釋放，1999年8月7日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四川省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於2008年11月6日主刑執行完畢。2010年6月28日因涉嫌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遂寧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0年7月5日，經四川省遂寧市人民檢察院批准，於同日依法逮捕。

犯罪嫌疑人劉賢斌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由我局在工作中發現。我局經過審查，於2008年12月26日立案進行偵查[11]。犯罪嫌疑人劉賢斌於2010年6月28日被抓獲歸案。犯罪嫌疑人劉賢斌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現已偵查終結。

經依法偵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劉賢斌於2008年11月6日刑滿

[11] 劉賢斌于2008年11月6日刑滿釋放，一個多月後的12月26日便被遂甯公安局立案偵查，可見當局對異議人士監控之嚴。

釋放回到遂寧後，出於對我國人民民主政權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發誓要推翻我國國家政權，並與之較量到底。2009 年 4 月至 2010 年 2 月，劉賢斌在其單位於遂寧市船山區凱旋上路 40 號“百盛家園”2 棟 2 單元 6 樓 2 號的家中，利用互聯網傳遞資訊快，傳播範圍廣、社會影響大、公眾關注度高的特點，以撰寫並通過互聯網先後在“人與人權”、“北京之春”、“議報”、“民主中國”、“中國人權雙週刊”等境外網站發表文章的方式，誣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犯罪嫌疑人劉賢斌在發表的《血與火的洗禮》、《劉賢斌：出獄一百天》、《遲到的祭奠》、《以哈維爾之眼看中國》、《街頭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形式》、《從“人民當家作主”說起》、《劉曉波遭重判後的民間道路選擇》、《我的民運二十年：陳衛被捕（之一）》等文章造謠、誹謗：“中共一直奉行高壓恐怖統治”；中共當局“就靠赤裸裸的暴力”，《新聞聯播》“是當局進行愚民宣傳的重要喉舌”；中國公民生活在“政治員警的恐怖統治之下”，“像奴僕一樣機械地生活”；“中共當局和與我們打交道的具體官員，他們一直在充當這部反人性國家機器的幫兇”。並煽動：“營造一個強大的反對派組織”；“當人民政治熱情被喚起之後”，才是“成立組織和公佈綱領的最佳時機”；“要求每一個反對派人士持續不斷地進行公開抗爭”，“一旦時機成熟”，“迅速成為一個有戰鬥力的政治組織”，“在大規模的街頭運動中發揮關鍵的作用”；“讓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看清這個政權和體制的本質”，“對當局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瓦解統治根基。所發表的文章被廣為鏈接、轉載、流覽，影響十分惡劣。

認定上述犯罪事實的證據如下：證人證言、現場勘驗檢查記錄、電子證物檢查工作記錄、鑒定結論、物證、書證，犯罪嫌疑人劉賢斌亦供認不諱。

上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

犯罪嫌疑人劉賢斌曾因犯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在主刑執行完畢後，且在剝奪政治權利期間，再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六條之規定，都以累犯論處，應當從重處罰。

綜上所述，犯罪嫌疑人劉賢斌利用互聯網公開發表煽動性文章，意圖顛覆國家政權，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之規定，涉嫌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九條之規定，現將此案移送審查起訴。

此致

四川省遂寧市人民法院

局長：王華明（印）[12]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附件：

1、本案卷宗柒冊，共 794 頁；
2、隨案移交物品詳見移交清單；
3、犯罪嫌疑人劉賢斌現羈押於遂寧市看守所。

---

[12] 本起訴意見書的文件擡頭為“遂甯市公安局”，落款卻是“遂甯市人民法院”，無論是技術意義上的程序正義，或是法制意義上的司法獨立，該文件都是一個絕好的反面教材。

四川省遂寧市人民檢察院

起　訴　書

遂檢公刑訴（2010）42號

被告人劉賢斌，男，生於1968年8月25日，身份證號碼：510902119680825265 7，漢族，大學肄業，無業，四川省遂寧市船山區人，家住遂寧市船山區凱旋上路40號“百盛家園”2棟2單元6樓2號。1992年12月28日因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1993年10月刑滿釋放，1999年8月7日因犯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四川省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於2008年11月6日主刑執行完畢。在執行附加刑期間，2010年6月28日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遂寧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經本院批准，於同日由遂寧市公安局執行逮捕。

本案由遂寧市公安局偵查終結，以被告人劉賢斌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於2010年7月21日向本院移送審查起訴。本院受理後，於次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依法訊問了被告人，審查了全部案件材料。期間，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一次。

經依法審查查明：被告人劉賢斌曾因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兩次被判刑。2008年11月6日刑滿釋放後，劉賢斌仍不思悔改，2009年4月至2010年2月期間，劉賢斌先後撰寫了《我的民運二十年：陳衛被捕（之一）》、《街頭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形式》、《劉賢斌：出獄一百天》等多篇文章，並通過互聯網在“人與人權”、“民主中國”等多家境外網站發表，劉賢斌在文章中污蔑“‘中共一直奉行高壓恐怖統治’；中國公民生活在‘政治員警的恐怖統治之下’，‘像

奴僕一樣機械地生活’”；並鼓動：“‘營造一個強大的反對派組織’，‘一旦時機成熟’，‘迅速成為一個有戰鬥力的組織’，‘對當局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瓦解統治根基’”等，煽動他人顛覆我國國家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認定上述事實的證據如下：

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鑒定結論，現場勘驗檢查記錄，電子證物檢查工作記錄等在卷為證。

本院認為，被告人劉賢斌以在互聯網公開發表煽動性文章的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之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被告人劉賢斌之前因犯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在主刑執行完畢後，再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六條之規定，都以累犯論處，應當從重處罰。被告人劉賢斌在執行附加刑剝奪政治權利期間又犯新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五十五條、五十六條、七十一條之規定，對未執行完的附加刑應當並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的規定，提起公訴，請依法判處。

此致

四川省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

檢察員 李虹志

賴紅軍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附： 1、被告人劉賢斌現羈押於遂寧市看守所；

2、證據目錄和證人名單各一份；

3、主要證據影本一冊。

四川省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決 書

(2010) 遂中刑初字第 00044 號[13]

公訴機關四川省遂寧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劉賢斌，男，1968 年 8 月 25 日出生，漢族，四川省遂寧市船山區人，大學肄業，無業，住遂寧市船山區凱旋上路 40 號“百盛家園”2 棟 2 單元 6 樓 2 號。1992 年 12 月 28 日因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1999 年 8 月 7 日因犯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2008 年 11 月 6 日主刑執行完畢。在執行剝奪政治權利期間，因涉嫌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於 2010 年 6 月 28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7 月 5 日被逮捕。現羈押於遂寧市看守所。

辯護人馬小鵬，四川元海律師事務所律師。

辯護人王偉，四川元海律師事務所律師。

四川省遂寧市人民檢察院以遂檢公訴(2010) 42 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劉賢斌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於 2010 年 11 月 11 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四川省遂寧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李虹志、賴紅軍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劉賢斌及其辯護人馬小鵬、王偉到庭參加訴訟。在審理過程中，公訴機關建議對本案補充偵查，本院決定延期審理。因案情複雜，

---

[13] 本判決書的年份編號為 2010 年，實際判決卻在次年三月底（見文件落款時間），顯示出中共司法機關先定罪後補證、領導拍板，司法跑堂等一系列弊端。

依法延長審限一個月。現已審理終結。

四川省遂寧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劉賢斌曾因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兩次被判刑。2008 年 11 月 6 日刑滿釋放後，劉賢斌仍不思悔改。2009 年 4 月至 2010 年 2 月期間，劉賢斌先後撰寫了《我的民運二十年：陳衛被捕（之一）》、《街頭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形式》、《劉賢斌：出獄一百天》等多篇文章，並通過互聯網在“人與人權”、“民主中國”等多家境外網站發表。劉賢斌在文章中污蔑“‘中共一直奉行高壓恐怖統治’，中國公民生活在‘政治員警的恐怖統治之下’，‘像奴僕一樣機械地生活’”，並鼓動“‘營造一個強大的反對派組織’，‘一旦時機成熟’，‘迅速成為一個有戰鬥力的組織’，‘對當局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瓦解統治根基’”等，煽動他人顛覆我國國家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公訴機關當庭出示了扣押物品清單、現場勘驗檢查筆錄、電子證物檢查工作記錄、電子數據司法鑒定意見書、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等證據材料。起訴指控被告人劉賢斌的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之規定，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告人劉賢斌因犯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在主刑執行完畢後，再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系累犯，應當從重處罰。被告人劉賢斌在執行附加剝奪政治權利期間又犯新罪，對未執行完的附加刑應當並罰。

被告人劉賢斌及其辯護人辯解、辯護稱：劉賢斌沒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故意，所發表的是理論性文章，沒有造謠、誹謗、污蔑內容，其觀點屬於公民言論自由的範圍，不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經審理查明的事實與起訴指控的事實一致。該事實有公訴機關當庭舉證並經法庭質證予以確認的下列證據證實：

1. 接受刑事案件登記表、立案決定書、破案報告書、抓獲經過，

證實案件的來源、偵破以及抓獲被告人等經過情況。

2. 搜查證、搜查筆錄、扣押物品清單、現場勘驗檢查筆錄及照片、遂寧市公安局工作說明及陳明先的戶籍資料，證實偵查機關依法對劉賢斌的住處進行搜查，並扣押電腦硬碟 2 個、U 盤 2 個及光票、存摺等相關物品的情況。

3. 遂寧市公安局電子證物檢查工作記錄（遂公（網監）勘[2010]023 號、024 號）、遠程勘驗檢查記錄（遂公（網監）勘[2010]021 號）、協助調查函、遂寧中學復函，證實劉賢斌的臺式電腦及筆記本電腦硬碟的網路 IP 地址分別為 192.168.22.42 和 192.168.22.142，與其住處在遂寧中學局域網分配的 IP 地址相同。硬碟中 D、E 兩個盤目錄下保存有《我的民運二十年：陳衛被捕（之一）》、《出獄一百天》、《街頭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形式》等 DOC 文件。經遠程勘驗檢查，劉賢斌在“人與人權”、“民主中國’’等網站上發表的 26 篇文章，共計網頁鏈接 19 個，點擊數 4407 次。

4. 北京網路行業協會電子數據司法鑒定中心司法鑒定意見書（京網協鑒定中心［2010］鑒字第 23 號），證實對劉賢斌涉案的硬碟、U 盤進行了鑒定，發現了與涉案有關的文檔和突破網路封鎖軟體，包含《出獄一百天》、《街頭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形式》等文章。

5. 互聯網上發表的《我的民運二十年：陳衛被捕（之一）》、《劉賢斌：出獄一百天》、《街頭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形式》等署名文章紙質件，經劉賢斌簽字確認系其所發表，證實劉賢斌在互聯網上發表煽動性文章，其在文章中污蔑“‘中共一直奉行高壓恐怖統治’，中國公民生活在‘政治員警的恐怖統治之下’，‘像奴僕一樣機械地生活’”，並鼓動“‘營造一個強大的反對派組織’，‘一旦時機成熟’，‘迅速成為一個有戰鬥力的組織’，‘對當局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瓦解統治根基’”等。

6．查詢存款／匯款通知書以及光票等憑證，證實劉賢斌接受並領取境外匯款的情況。

7．證人陳明先、陳橋（分別系劉賢斌的妻子、女兒）證言，證實她們家大概是 2005 年左右開通遂寧中學局域網，先後用筆記本電腦和臺式電腦在家上網。劉賢斌的父親不上網。從她們家兩臺電腦硬碟中查出的《出獄一百天》《街頭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形式》《我的民運二十年：陳衛被捕（之一）》等文章都不是她們撰寫保存的。劉賢斌大概是從 2009 年開始上網的，也要在電腦上寫文章。收到過境外匯款，也匯結過境外匯款，家裏搜出的六張未結匯的中國銀行光票都是劉賢斌的稿費。

8．證人銀夏、余躍波的證言，證實他們認識劉賢斌，比較談得來，在“民主中國”、“獨立中文筆會”等網站上看過劉賢斌寫的文章。

9．被告人劉賢斌供述，證實其家的電腦可以上網，是遂寧中學開通的局域網，登記的戶主是其妻子陳明先。並先後在“人與人權”等境外媒體上發表了《出獄一百天》《我的民運二十年：陳衛被捕（之一）》、《街頭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形式》等多篇文章，全部都是自己寫的。出獄後至今的境外匯款全部是其所發表文章的稿費。

10．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四川省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釋放證明，證實劉賢斌 1992 年 12 月 28 日因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1999 年 8 月 7 日因犯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經減刑，於 2008 年 11 月 6 日刑滿釋放，剝奪政治權利減為二年。

11．戶籍資料，證實劉賢斌的個人身份情況。

本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本院認為，被告人劉賢斌撰寫並在互聯網上發佈煽動性文章，煽動他人顛覆我國國家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劉賢斌採取在互聯網上發表煽動性文章的方式，煽動性強，影響惡劣，且劉賢斌曾因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兩次被判刑仍不思悔改，並在剝奪政治權利執行期間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主觀惡性深，屬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應依法予以懲處。四川省遂寧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劉賢斌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劉賢斌曾因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被判處刑罰，主刑執行完畢後再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系累犯，依法應從重處罰。劉賢斌在執行附加剝奪政治權利期間又犯新罪，對未執行完的附加刑應當並罰。對劉賢斌及其辯護人所提出的辯解、辯護意見，本院認為，公民言論自由不得損害國家利益和安全，不得以污蔑、誹謗的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本案證據已充分證實，劉賢斌以在互聯網上發佈污蔑、誹謗性文章的方式實施煽動他人顛覆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其行為已明顯超出公民言論自由的範疇，依法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故劉賢斌及其辯護人的上述辯解、辯護意見，均不能成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六十六條、第七十一條、第六十四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執行附加刑剝奪政治權利期間犯新罪如何處理的批復》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劉賢斌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與尚未執行完畢的剝奪政治權利四個月零八天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四個月；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之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0 年 6 月 28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27 日止。）

二、隨案移送的犯罪所用物品予以沒收。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審判長 徐昌輝

審判員 危　曉

審判員 鄧　剛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書記員　文晏萍

若為自由故

劉賢斌文選

劉賢斌把人生大半時光（除去懵懂的孩提時代）交給了鐵窗和鐐銬，拋妻別子，無怨無悔……這種決絕的追求，義薄雲天，可歌可泣。

我們滿懷敬意地編印這部文集，惟願劉賢斌揮斥方遒的文字，像驚雷劃破鼾聲起伏的夜，搖撼東方專制的重重宮門。

——黑色文庫编者

若為自由故——劉賢斌文選
黑色文庫 第三十集
編者/黑色文庫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勞改基金會
封面設計/殷世文
華盛頓2011年12月第1版
© 作者 劉賢斌
本書版權為作者所有，勞改基金會擁有中文發行權。非經作者及基金會同意，不得翻印、複製或轉載文字與圖片。
本書由勞改基金會設計、編輯及出版。若獲盈利，僅用作《黑色文庫》的出版費用。

If It Is for Freedom
-- A Selection of Liu Xianbin
Black Series Volume 30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09
www.laogai.org
ISBN 13 : 978-1-931550-02-4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價：US$20, HK$60, NT$260